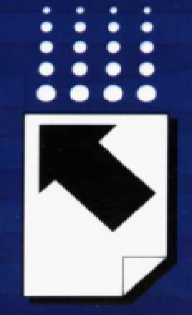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4~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主　编/景体华

副主编/陈孟平　陈维　刘品安　魏书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SSAP

盘点年度前沿资讯，预测时代变幻风云

皮书系列图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它们由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对每一年度中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近30种皮书，按颜色分，主要有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等。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法律、金融、农村发展、国际形势等多个领域，旅游、房地产、医疗卫生等多个产业以及北京、深圳、广州、西北、东北、长三角等多个区域。

该系列图书的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均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体现和反映了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和未来最高水平的理解和认识，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同时，每一本皮书均附有一张数据库光盘（SSDB），该光盘既是电子书，又是数据库，具有电子浏览、快速检索、相关资讯链接、新旧资讯智能累加等功能，阅读与检索更为方便快捷。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www.ssap.com.cn

3A 设计艺术工作室 · 装帧设计／孙元明



ISBN 7-80190-415-X/F·144　定价：45.00元（含光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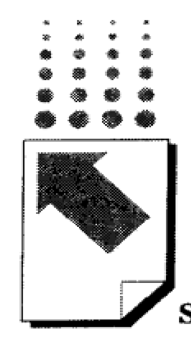


2004～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主　编　景体华

副主编　陈孟平　陈　维　刘品安　魏书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2004～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主　　编／景体华
副 主 编／陈孟平　陈　维　刘品安　魏书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 ssap. com. cn
项目经理／范广伟
责任编辑／范广伟　周学林　武　云
责任印制／盖永东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26
字　　数／349千字
版　　次／2005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90－415－X/F·144
定　　价／45.00元（含光盘）

盘点年度前沿资讯，预测时代变幻风云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资讯致胜，皮书助你捷足先登

《皮书系列》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　谢曙光

总 编 辑　邹东涛

项目负责人　范广伟

发 行 人　王　菲

编　　辑　范广伟　周学林　武　云
　　　　　张大伟　宋　娜　陈斗仁

封面设计　孙元明

内文设计　熠　菲

责任印制　盖永东

秘　　书　黑雅婧

联系电话：85117872　85111117－222、220

电子信箱：pishu@ssdph.com.cn

编 委 会

前言

从2004年初我们编撰的第一本《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问世起到现在，虽然只有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却十分迅速。

2004年3月12日，联通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的消费维权网络开通；2004年5月17日，在浙江湖州市举行的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上，长三角16个城市的代表共同签署了《共建信用长三角宣言》，合力打造区域性信用监管平台；2004年6月22日，“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沪召开；2004年8月27日，我国第一部由交通部牵头制订的区域性交通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出台；2004年11月2日，长江三角洲地区16城市的市长齐聚上海，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协议》……

2004年2月，广东省两会召开，黄华华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明确列入新一年政府工作重点。这预示着“泛珠三角”经济区已经由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向战略决策转变；2004年6月1~3日，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举办了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论坛分别在香港、澳门、广州举行，以“合作发展，共创未来”为主题，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泛珠三角各成员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将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在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推进了实施阶段；2004年11月14日，由广州市公安局牵头，11个泛珠三角省会市暨副省级市的警方负责人在广州共同签定《泛珠三角省会市暨副省级市警务协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泛珠三角跨地域警

务协作开启了新的篇章。……

2004年2月12～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暨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同志，在廊坊市共同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石家庄市、衡水市、邯郸市、邢台市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经充分协商，达成十点共识——廊坊共识；2004年5月21日，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环渤海七省市区领导同志参加的“环渤海经济圈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达成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三点共识，将合作机构的日常工作班子设在廊坊；2004年5月28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京津冀区域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并在京召开工作会议；11月15日，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决定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

区域经济日益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日益深入到决策者的心里。而决策者愈是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系统地指导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腾飞愈能成为现实。

我国几大经济区所展示的活力和令世人瞠目的前进速度不仅给予我们以广阔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对我们更加努力、更加深入地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极大激励。另外特别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更多的合作者加入我们的行列，参与到这项极具吸引力的工作中来。

在同仁的支持下，我们的区域经济网站步入正常运行，但是该网站作为区域经济研究者探索和交流园地尚未完全到位。该网站旨在集聚全国的区域经济研究者，共同为我国区域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提供智力支持和必要的信息化平台。2005年我们将在网站的建设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网站的地址是：*www. qyjjnet. com*，希望提出宝贵的改进意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朱明德

2005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CONTENTS

目　录

Comparison of Regional Economy across the Country

Economic Area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Shanghai and Changjiang Delta

Guangdong, Zhujiang Delta & Extensive Zhujiang Delta

Other Economic Areas

Summa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Main Economic Areas in China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京津冀经济圈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 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Blue Book

2004~200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4～2005 我国三大经济带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魏书华　邓丽姝

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山东半岛等城市群崛起，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愈发明朗，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作为经济社会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先发和引领地区，发展势头更为强劲。

一　三大经济圈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1. 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近况

长江三角洲地区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2003 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高速增长，区域内各个城市发展更加趋于平衡。区域发展的亮点城市当属苏州，其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均超过龙头城市上海。

从生产总值角度看，无论是长三角整个区域还是各市，2003 年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人均生产总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苏州市发展速度最快，不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8%，比最低的上海市 11.8% 的增长速度高出 6 个多百分点，而且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47693 元，首次超过上海，居长三角首位。区域整体第一、二、三产业相对结构为 5∶54.4∶40.6。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区域整体及各城市均呈现“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从三大需求角度看，反映投资、消费、出口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额等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区域投资和出口的增幅较大，分别达到了 38.9% 和 50.1%。各市的增势与区域整体基本

保持一致，苏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增速高达70%以上。

从经济外向度看，2003年长三角整体和各市的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幅均较高，说明这一地区的经济开放度正日益提高（见表1、表2）。

从主导产业看，长三角产业结构仍处于升级优化过程。按有关指标排序，2003年，江苏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取代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跃升至第二位；浙江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位次也在提升（见表3）。

2.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近况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进一步稳步发展，2003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增长。

从生产总值角度看，珠三角地区及各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生产总值都在稳步增长。区域内9个城市生产总值增速形成3个梯队：东莞、中山、珠海、深圳4市在17%以上；广州和佛山在15%～17%之间；惠州、肇庆、江门较低。珠三角的人均生产总值整体水平较高，9市中超过5万元的有2个，超过4万元的有2个，超过3万元的有2个。东莞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生产总值增速高达19.5%，超过深圳和广州，居区域之首。区域整体三次产业的相对结构为4.78:52.06:43.16，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在珠三角，除广州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外，其余城市均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从三大需求角度看，珠三角2003年相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额指标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增速均超过了2002年，各市增长相对均衡。

从经济外向度看，各市的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增长基本在20%以上，中山市更高达40%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增速也较高，表明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良好（见表4、表5）。

3.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近况

京津冀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基本在10%以上。

从生产总值角度看，京津冀地区整体和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人均生产总值都在稳步增长，各市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同步，最高的天津市为14.5%，最低的北京市10.7%。区域整体三次产业的相对结构

是7.9:45.6:46.5，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仍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其中北京、秦皇岛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其他均为“二三一”结构。区域内人均生产总值只有北京超过3万元，天津超过2万元，河北环京津七市中超过1万元的有3个，唐山最高为18387元，经济圈内最低为6550元。

从三大需求看，区域整体和各市的相应指标基本实现全面增长。

从经济外向度看，京津冀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北京、河北的实际利用外资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河北的增幅达到48.7%。总体来看，京津冀的外向型经济在稳步发展（见表7、表8）。

4. 三大经济圈经济发展状况比较

2003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经济水平都有长足提升。总体上看，长三角经济实力最雄厚，发展较快，其次是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从生产总值角度看，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均远大于珠三角和京津冀，从绝对值上比后两者之和还多。人均生产总值珠三角则明显优于长三角、京津冀，为长三角的1.2倍，京津冀的2倍。三次产业结构方面，由于北京的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在生产总值中占61.4%的绝对优势，从而使京津冀地区的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第二产业，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长三角和珠三角均为“二三一”结构。

在需求层面，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由大到小排序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序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人均出口额排序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其中出口方面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较大。

在经济外向度方面，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看，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京津冀的现实发展程度则相差较远。其中长三角经济外向度继续大幅度提高，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都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增速也略高于珠三角。同时，长三角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在规模上（出口略低）均已超过珠三角。表明外资投资的热点正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转移，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正在弱化，长三角将逐渐取代珠三角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见表10）。

三大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中，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最具竞争优势，明显领先于其他核心城市。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京津冀的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具有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且差距不大。根据2003年的数据，上海的经济总量最大，其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远大于其他三个城市，投资和消费需求、出口、实际利用外资也居首位。广州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从2004年1～9月的数据看，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位居榜首。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有差距居第二位。北京与广州的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大致相当。广州的突出优势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几大城市中最高。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稍逊色于上海，居第二位，其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在几大城市中最高。天津的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北京和广州，出口额也较高，显示出其较强的工业基础和发展势头良好的对外贸易（见表11、表12）。

与2002年相比，三大经济圈的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都略有上升，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国的一半，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3/4。三大经济圈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

二　三大经济圈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动向

1.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动向

2003年以来，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全面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首先，推进一体化的理念、机制不断深化和完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政府高层就区域一体化达成战略共识，江、浙主动提出“接轨上海”的发展战略。三地共同签署了《以承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意见》。区域协调机制日趋完善。主要体现在：长三角的最高层次协调会先就各方都感兴趣的议题开展专题研究，有共识地进入规划阶段，规划制定后就马上落实具体项目的实施；首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入会规程（建议稿）》出台；在交通、人才开发、信息等领

域的一体化协商机制初步确立；国家发改委决定制定长三角区域规划。

其次，具体领域的一体化有实质性举措。

交通方面。我国第一部由交通部牵头制订的区域性交通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出台，并通过国务院审批，长三角地区公路水路建设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至2020年左右，长三角高速公路网里程将由目前的3779公里提高到1.18万公里，基本连接10万人口以上城市、主要港口及机场。“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方案”出台。江浙沪三地建立了公交行业常年的协调会制度，从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政策法规、信息平台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协作探索。首届长三角地区道路运输稽查联席会议召开，并正式确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三地将逐步实现信息共享，联动稽查。苏嘉杭高速公路上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合并运营，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首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成为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从2005年1月1日起，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的4个部直属海事局和4个地方海事局全面实施船舶一卡通电子签证。浙江省运管局已与上海、江苏运管部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以推行长三角区域运输一体化，并将签署《长江三角洲道路运输一体化共同宣言》。

市场和工商监管方面。三省市工商部门将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行一体化，企业异地办厂实行市场准入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跨地区投资，在省际保护著名商标，共建三地工商管理部门办案协作机制，共建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三地质检部门签署了国内首份区域性合作互认宣言，在市场准入、联合打假、建立一体化标准体制、开放技术服务市场等方面达成互认协议。2004年3月12日开始，长三角地区所属的15城市消费者异地消费维权不再受地域限制。首部《长江三角洲零售市场白皮书》公开发行。2004年9月，沪、江、浙启动长三角质量月，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质量月。

信用体系建设方面。沪、江、浙联手推动“信用长三角”的建设进程，目前已就建立区域性信用信息共享模式等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并共同签署《共建信用长三角宣言》，合力打造区域性信用监管平台。

人力资源方面。沪、江、浙三地人事部门签订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互认”、“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异地人才服务”等6份合作协议书，并就制定长三角统一的5年人才规划进行了讨论。2004年10月，江苏省与上海市建立了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机制，这在全国尚属首

创。2004年11月，由沪、江、浙三地人事厅局联合发起“长三角地区首届网上人才交流大会”。

信息方面。为强化长三角区域内信息资源的互通互享，开拓长三角信息服务领域，有关部门联合召开长三角信息合作联席会议，并举行了首届“长三角信息一体化高峰论坛”。

金融方面。中国农业银行在首届“长三角16城市农行合作发展联席会议”上，做出在长三角建立区域性合作机制、进行区域合作经营的战略决策。近期，上海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向江苏、浙江的一些大企业直接发放贷款。

企业互动方面。沪、江、浙签署了《中小企业合作与发展协议》，长三角中小企业开始走向联合。2004年12月，举行长三角中小企业发展与政策论坛。2004年8月，开展上海著名企业浙江行活动。2004年12月，以“融合与发展，兴业与责任”为主题的长三角青年企业家浦东论坛举行。

同时，长三角在科技、统计、对外宣传、文化产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2. 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动向

珠三角在努力推进自身的功能整合、协调发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积极推动与其他区域的融合，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于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将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提高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内地实施CEPA的过程中，珠三角地区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在CEPA的框架下，珠三角与港澳层面的合作不仅有着大量的机会，且两地经贸合作的具体形式将更加多样灵活。两地的合作可以不限于取消关税，而是在跨境区域合作、区域发展规划、基础建设配套、人员交流、通关便利、经济政策协调等多个方面，开拓更广阔的合作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CEPA是开启大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一把“钥匙”，它的实施必将大大推动中国跨境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第二，第六次粤港联席会议上，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珠三角和香港就功能分工达成共识：珠三角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

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关系。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粤港两地将建立联合对外推介机制，通过公共媒体宣传、联合举办论坛、招商、推介等活动，联手推介“大珠三角”区域经济概念；广东为 CEPA 框架下的港澳服务业进入广东打开方便之门，实行本地居民待遇，简化工商手续，下放审批权限；加强口岸建设，提高通关效率；加强粤港双方在高科技产业、教育培训、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准许广东居民以个人身份赴港澳旅游等。

第三，CEPA 签订后，粤港联席会的合作架构和机制更完善。考虑到粤港两地制度的不同，在政府层面，研究层面和商界层面都做出了新的安排。在政府层面，粤港联席会召开时由粤港双方行政首脑出面主持。同时建立工作会议机制、督导机制、通报机制三大工作机制；在商界层面，粤港各自成立商界合作组织，实现两地企业、行业和商会之间不定期的交流；在研究层面，粤港各自就两地经贸发展合作进行深入研究，就粤港经贸发展的广泛领域分课题进行合作研究。

第四，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合作机制初步建立。广东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以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并初步建立了较完备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合作宗旨、合作原则、合作领域，以及每年举行一次的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及日常工作机构和部门衔接落实制度等，形成了合作与发展框架协议、论坛和经贸洽谈会三大交流与合作平台。

3. 京津冀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新动向

第一，政府合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2004 年，由国家发改委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部门召开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初步达成五项共识。一是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必须予以突破。二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应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统筹协调、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推进，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三是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

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尽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议定合作重大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地区政策和措施；联合设立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四是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五是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逐步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通道，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共同举办京津冀一体化论坛、经贸合作洽谈及招商引资等活动。

河北省坚持“以我为主，主动服务，迎接辐射，促进发展”的原则，面向京津，依托京津，服务京津，融入京津，争取与京津实现全方位的合作和战略协作。采取多种方式，在提供服务中求发展：紧紧围绕京津市场的需求，及时提供有效服务；在接受辐射中求发展：主动接受京津的人才扩散、技术扩散和产业扩散，特别是扩大与京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合作，把河北建成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生产基地；在加强联合中求发展：适应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趋势，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在产业错位中求发展：合理分工，形成特色产业群；以及在差别竞争中求发展。

另外，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已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十一五”规划体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将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由吴良镛院士主持的“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了国家建设部的审定。

第二，京津塘科技新干线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

以京津塘高速公路为主干线，中关村科技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科技园区为依托，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产业带正在崛起，并逐步成为促进京津冀新兴产业联动发展的主干线。有关方面已就区域协调发展达成了增创产业、竞争、市场、科研、生态、交通、财政、合作新优势等战略部署。

第三，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质性步伐加快。

这主要体现在：北京的高新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推广；跨行政区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跨行政区的产业链配置初步形成；京津冀“无障碍旅游共识”已初步达成；长途客运开始联合；在机场、港口、跨行政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合作；在公共交通业、商业贸易、房地产业、通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人工影响气象、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雪天道路交通应急保障体系等方面也初步显现一体化发展的势头。

三　三大经济圈区域发展趋势分析

1.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趋势

长三角未来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区域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深化。长三角的竞争优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长三角内部的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各城市的产业联系较密切，垂直分工、水平分工紧密，在长三角区域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次，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其他城市与上海接轨、联动发展的意识也较强。这都有利于长三角的整合和协调发展。

长三角日益深化的一体化进程，是应沪、江、浙三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共赢的愿望和需要而生，应三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需求而生。是由长三角不断提升的发展层次和水平所推动的，具有客观必然性。借助国家长三角区域规划启动的推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升。

第二，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2003 年，长三角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增速上，都居三大经济圈之首，逐渐成为三大经济圈的领跑地区。长三角产业基础、产业结构、科技竞争力都优于珠三角，随着区域发展更加趋于协调，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仍将持续，综合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领军地位必将进一步巩固。

第三，经济增长动力继续由内资带动向内外资并举转变。2003 年，长三角地区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逐步由原有内生性增长模式向内外资共同推动模式转变。在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环境不断得到优化的引力下，长三角的外向型经济还将得到大的发展，成为长三角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源。

2. 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趋势

根据对珠江三角洲的现状分析，其未来发展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随着长三角竞争力的迅速提升，珠三角发展速度放缓的趋势将延续。其主要原因，一是珠三角的发展以外资为主要增长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借助地理位置优势，通过与港台投资与经济贸易关系，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成长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但随着长三角的迅速崛起，外资不断向长三角转移，珠三角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减少，发展动力减弱，必将减缓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速度；二是珠三角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多为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挑战，以及科技竞争力相对较弱等原因，导致经济发展动力后劲不足。

第二，"大珠三角"的一体化发展将助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珠三角与香港进行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进一步完善，两地功能分工的进一步明晰，是珠三角和香港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必将推动两地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香港发达的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会为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有力的资金等支撑，香港为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联结国际提供了重要平台。"大珠三角"的一体化发展会助力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提升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层次，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益的"前店后厂"。

第三，"泛珠三角区域协作"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将为珠三角的发展拓展腹地。但合作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3.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发展趋势

京津冀经济圈下一步发展将表现为以下态势：

第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步入实质性合作阶段。虽然目前京津冀的区域一体化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随着三地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的加深，区域协作意识的强化，对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共识的逐步达成，并且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渐增强，特别是国家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的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将成为必然，三地优势互补、资源有效配置、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共同进步的良好局面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第二，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近年仍将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难有跨越式增长局面出现。这主要缘于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诸多

因素，在短期内难有改变。如：北京、天津自身经济尚处于极化发展阶段，对外扩散能力有限，自身产业升级和实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奢望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从而影响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京津冀经济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发展步伐缓慢，经济运行的活力不足，同时，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还不高，从而使地区间紧密联系难以形成，合理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尚需时日；京津冀经济圈地区间发展存在巨大落差，除京津外缺乏一定数量发达中小城市的有力支撑，区域整体经济发展难度较大；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主要依赖于产业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地区一体化发展行政藩篱的解除和一体化发展机制、体制的建立需要逐步培育，短期内不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大的推力。

第三，京津冀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存在巨大潜力。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的中心，赋予京津冀经济圈独特的优势。通过合理引导，这一优势将继续不断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促使这一地区形成具有首都圈特色的核心竞争力。

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上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在未来产业发展上，北京将突出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的制造业。天津将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并发挥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优势。河北则将对自身传统优势产业进行优化升级，并在新兴产业上依托京津，形成联动。因此，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潜力不可小视。

表1 2003年长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上海	6250.81（11.8%）	92.98（2.3%）	3130.72（16.1%）	3027.11（8%）	1.5	50.1	48.4	1341.77	46718（11.2%）	2452.11（12.1%）	2220.64（9.1%）	1123.97（54.7%）	484.82（51.2%）	58.50（30.1%）
南京	1576.33（15.1%）	65.12（4.5%）	804.49（18.7%）	706.72（12.5%）	4.1	51.0	44.9	572.23	27307（13.1%）	954.04（58.2%）	600.24（14.4%）	147.12（45.7%）	76.65（27.5%）	22.10（47.2%）
镇江	641.05（14%）	32.46（4.6%）	366.95（16%）	241.64（12.4%）	5.1	57.2	37.7	267.19	23995（13.45%）	237.10（27.8%）	168.24（11.5%）	26.70（27.1%）	12.89（20.2%）	8.06（60.8%）
无锡	1901.22（15.4%）	54.02（3.1%）	1093.02（17.8%）	754.18（13%）	2.8	57.5	39.7	442.54	43155（14.5%）	893.32（66.1%）	487.06（15.4%）	143.81（47.6%）	73.25（42.4%）	27.00（58.8%）
常州	901.42（14.5%）	47.18（2.4%）	520.25（16.5%）	333.99（13.3%）	5.2	57.7	37.1	346.22	26149（13.7%）	446.60（78.6%）	280.65（12.8%）	52.50（34%）	35.30（32.9%）	8.60（53.6%）
苏州	2801.56（18%）	75.75（-5.5%）	1771.86（21.7%）	953.95（15%）	2.8	63.1	34.1	590.97	47693	1408.93（73.3%）	526.05（16.5%）	656.63（80.4%）	326.34（76.2%）	68.05（41.4%）
南通	1006.71（13.4%）	138.81（4.1%）	517.76（16.8%）	350.14（12.6）	13.8	51.4	34.8	777.62	12924（13.8%）	448.42（44.7%）	331.28（12.7%）	51.64（32.6%）	32.85（29.8%）	7.31（206.5%）
扬州	647.22（13.4%）	69.92（2.1%）	332.42（17%）	244.88（12.1%）	10.8	51.4	37.8	453.61	14290（13.1%）	247.00（37.1%）	197.96（12.5%）	20.23（33.6%）	11.12（39%）	4.81（88.6%）

续表 1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泰州	580.04（13.4%）	72.62（3%）	300.37（17.6%）	207.05（11.7%）	12.5	52.8	35.7	503.38	11513（13.3%）	230.65（30.1%）	173.76（12.4%）	8.81（53.8%）	6.34（51%）	3.03（67.6%）
杭州	2099.77（15%）	126.59	1089.32	883.86（12.2%）	6.0	51.9	42.1	642.78	32819（13.9%）	1006.74（30.7%）	587.52（12.4%）	182.38（39.2%）	109.55（29.2%）	10.09（93.3%）
宁波	1786.85（15.6%）	112.23（3.6%）	1001.21（16.9%）	673.41（15.8%）	6.3	56.0	37.7	549.07	32629（15%）	837.59（39%）	521.53（12.7%）	188.10（53.3%）	120.74（47.9%）	17.27（57%）
嘉兴	858.03（16.9%）	68.37（4%）	508.66（20.8%）	281.00（13.9%）	8.0	59.3	32.7	332.96	25792（16.7%）	525.57（38.7%）	279.39（12.1%）	57.12（54.6%）	36.16（42%）	7.98（79.5%）
湖州	490.75（14.8%）	55.4（7%）	261.76（16.2%）	173.59（15.5%）	11.3	53.3	35.4	256.78	19102（14.8%）	267.97（23.8%）	182.34（11.8%）	12.17（37.2%）	10.11（42.6%）	5.37（49.5%）
绍兴	1089.29（15%）	82.45	644.86	361.98	7.6	59.2	33.2	433.84	25115	535.03（45.6%）	291.98（12.6%）	59.61（54%）	45.33（56.3%）	7.43（94.6%）
舟山	172.27（15.5%）	32.99	71.14	68.14	19.2	41.3	39.5	97.12	17679	98.01（51.9%）	75.11（12.1%）	6.21（25.1%）	5.40	0.17（240%）
合计	22803.32	1126.89	12414.79	9261.64	5.0	54.4	40.6	7608.08	29973	10589.08（38.9%）	6923.75（10.8%）	2737.00（56.2%）	1386.85（50.1%）	255.77（43.3%）

资料来源：《2004 上海统计年鉴》、《2004 浙江统计年鉴》、《2004 江苏统计年鉴》，各市关于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

注：括号内数据为比上年同期的增长速度（以下同）。

表2　2002、2003年长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2	19124.98	1112.72	9919.47	8092.80	5.8	51.9	42.3	25262
2003	22803.32	1126.89	12414.79	9261.64	5.0	54.4	40.6	29973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002	7626.25(40.2%)	6246.93(11.4%)	1752.17	923.97(25%)	178.51
2003	10589.08(38.9%)	6923.75(10.8%)	2737.00(56.2%)	1386.85(50.1%)	255.77(43.3%)

表3　长江三角洲主要产业

地区		支柱产业
上海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
江苏		纺织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浙江		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其他部分城市	无锡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子通信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常州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苏州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通用、专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杭州	纺织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宁波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
	嘉兴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湖州	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绍兴	纺织，医药，化工，机电等产业
	舟山	海洋经济：船舶修造，水产品精深加工，旅游与港口开发，海上运输，大宗货物储运加工

资料来源：《2004上海统计年鉴》、《2004浙江统计年鉴》、《2004江苏统计年鉴》，各市2003年统计公报。



表4 2003年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肇庆	501.15（11.2%）	133.03（5%）	194.27（16.5%）	173.85（10.6%）	26.5	38.8	34.7	392.65	12763	114.75（17.6%）	171.19（10.7%）	15.60（16.8%）	11.00（22%）	6.82（25%）
佛山	1381.39（16.1%）	75.86（3.8%）	771.85（20.5%）	533.68（12.0%）	5.5	55.9	38.6	344.24	40437（14.7%）	422.51（45.5%）	473.19（12.7%）	164.64（26.9%）	102.23（29.6%）	12.40（23.7%）
广州	3466.63（15%）	104.14（-0.3%）	1504.89（21.4%）	1857.60（11%）	3.0	43.4	53.6	725.19	47900（14%）	1157.77（14.7%）	1494.27（9%）	349.44（25.1%）	168.89（22.6%）	30.64（15.5%）
东莞	947.53（19.5%）	29.07（-5.7%）	513.43（21.8%）	405.03（18.8%）	3.1	54.2	42.7	158.96	59608	319.39（66.7%）	338.00（14.7%）	521.06（17.8%）	280.02（18%）	25.63（19.3%）
惠州	590.97（13.9%）	73.91（0.5%）	347.43（17%）	169.63（14.1%）	12.5	58.8	28.7	286.36	20758（12.7%）	224.53（114%）	181.67（12.8%）	131.31（16.9%）	71.46（21.3%）	16.90（27.4%）
江门	731.09（11.1%）	69.34（2.7%）	359.88（12.4%）	301.87（11.5%）	10.0	49.0	41.0	381.98	19157	161.11（17.66%）	277.84（12%）	58.71（22.9%）	36.53（23.8%）	8.57（15.6%）
中山	497.10（17.8%）	27.03（3.4%）	312.08（23.9%）	157.99（9.5%）	5.4	62.8	31.8	137.86	36278（16.4%）	262.06（19.7%）	151.17（12.5%）	131.29（40.6%）	82.54（44.2%）	9.47（23.8%）
珠海	476.73（18.1%）	17.30（7%）	272.90（22.3%）	186.53（13.4%）	3.63	57.24	39.13	127.89	37277	140.83（16.8%）	159.18（11%）	167.83（30.7%）	69.10（32.8%）	8.49（21.6%）
深圳	2860.51（17.3%）	18.16（-6%）	1685.37（22.4%）	1156.98（10.7%）	0.6	58.9	40.5	557.41	53887	946.49（20.1%）	801.77（16.3%）	1173.99（34.6%）	629.62（35.2%）	50.42（2.9%）
合计	11453.10	547.84	5962.10	4943.16	4.78	52.06	43.16	3112.54	36797	3749.44（27.3%）	4048.28（14.1%）	2713.87（28.1%）	1451.39（28.9%）	169.34（12.7%）

资料来源：各市2003年统计公报。

注：因资料限制，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代替珠海的“实际利用外资”；根据统计资料，东莞的人均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深圳按常住人口计算。

表5　2002、2003年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2	9565.30	536.01	4716.57	4312.72	5.60	49.30	45.10	31697
2003	11453.10	547.84	5962.10	4943.16	4.78	52.06	43.16	36797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002	2945.74（12.7%）	3546.83（11.5%）	2118.65	1126.08（24%）	150.21
2003	3749.44（27.3%）	4048.28（14.1%）	2713.87（28.1%）	1451.39（28.9%）	169.34（12.7%）

表6　珠江三角洲主要产业

地区		支柱产业
广东省		新兴支柱产业：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及化学；传统支柱产业：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
部分城市	佛山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塑料制品业
	广州	电子、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产业
	东莞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惠州	电子等产业
	中山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家具制造及包装印刷业，纺织及服装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珠海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深圳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资料来源：广东省、各市2003年统计公报等统计资料。

表 7 京津冀地区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北京		3663.10（10.7%）	95.64（3.3%）	1311.86（11.9%）	2255.60（10.3%）	2.6	36	61.4	1148.80	32061（9.4%）	2157.10（18.9%）	1916.70（14.5%）	684.63（30.4%）	168.52（33.6%）	21.47（19.8%）
天津		2386.94（14.5%）	89.70（6.1%）	1212.34（17.8%）	1084.90（11.5%）	3.7	50.8	45.5	926.00	25874（13.8%）	1046.72（29%）	1074.05（14.1%）	293.71（28.7%）	143.74（24%）	17.06
河北		7095.40（11.6%）	1064.30（5.9%）	3675.40（14.2%）	2355.70（10%）	15.0	51.8	33.2	6769.40	10508（10.9%）	2515.90（22.9%）	2177.90（10.7%）	89.80（34.7%）	59.30（29.1%）	15.60（48.7%）
河北环京津城市	廊坊	528.50（12.1%）	75.30（5.5%）	292.80（14%）	160.30（11.8%）	14.3	55.4	30.3	384.60	13704（11.6%）	224.30（22.8%）	120.60（11.7%）			1.91（38.4%）
	保定	928.60（12.6%）	139.80（4.6%）	456.30（16.5%）	332.40（11.1%）	15.1	49.1	35.8	1070.00	8614（11.9%）	359.10（33.8%）	316.20（11.7%）		4.80（31.7%）	2.66（168.5%）
	唐山	1295.30（13.2%）	194.00（5.1%）	715.00（17.4%）	386.00（10.8%）	15.0	55.2	29.8	703.00	18387（12.8%）	314.90（35.4%）	307.38（10.8%）	10.31（40.4%）	4.48（16.4%）	2.02（36.4%）
	秦皇岛	387.03（12.1%）	38.90（3.2%）	153.51（15.9%）	194.63（11.1%）	10.0	39.7	50.3	273.29	14236（11%）	115.17（18.8%）	117.73（11.2%）	16.86（20.4%）	10.06（4.1%）	1.54（10.9%）
	张家口	319.94（11.5%）	46.94（23.1%）	145.39（12.1%）	127.61（7.2%）	14.7	45.4	39.9	442.00	7102（11.3%）	96.22（13%）	124.92（5.9%）	2.45（96%）	1.19（33.3%）	0.22（110%）
	承德	235.20（12.1%）	42.60（6.1%）	111.10（18.2%）	81.60（8%）	18.1	47.2	34.7	359.10	6550（11.7%）	112.00（33.2%）	91.70（6%）	1.36（11.7%）	0.60（17.7%）	0.75（37.2%）
	沧州	628.86（12.1%）	93.92（9.6%）	329.20（13.2%）	205.74（11.3%）	15.0	52.3	32.7	677.42	9283.2（12%）	178.45（23.6%）	165.37（9.8%）	4.27（29.71%）	2.98（34.7%）	0.84（0.5%）
京津冀地区		10373.47	816.80	4727.50	4828.78	7.9	45.6	46.5	5984.21	17335	4603.96（25.2%）	4234.65（16.4%）	1068.14（30.2%）	371.56（29%）	48.47

资料来源：《2004 北京统计年鉴》、《2004 天津统计年鉴》、《2004 河北经济年鉴》。

注：京津冀地区的合计数为京津与河北省环京津七市之和；因资料限制，以河北省的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代替环京津七市之和。

表8　2002、2003年京津冀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2	8995.06	791.25	3903.93	4299.79	8.8	43.4	47.8	15070
2003	10373.47	816.80	4727.50	4828.78	7.9	45.6	46.5	17335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002	3676.67（13.6%）	3636.46（12%）	820.03	288.00（19.1%）	60.90
2003	4603.96（25.2%）	4234.65（16.4%）	1068.14（30.2%）	371.56（29%）	48.47

表9　京津冀地区主要产业

地区		支柱产业
北京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天津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河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
其他部分城市	廊坊	机械、电子、轻工、纺织、食品、医药、新型建材等产业
	唐山	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陶瓷、化工、纺织、造纸、食品等产业
	秦皇岛	建材、机电、食品、化工、金属压延等产业
	张家口	能源、钢铁、机械、制药、食品、卷烟等产业
	承德	冶金、机械、电子、电力、煤炭、化工、建材、轻工、纺织等产业
	沧州	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纺织业，轻工业

资料来源：《2004北京统计年鉴》、《2004天津统计年鉴》、《2004河北经济年鉴》，各市相关统计资料。

表 10　2003 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地　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长三角	22803.32	1126.89	12414.79	9261.64	5.00	54.40	40.60	29973
珠三角	11453.10	547.84	5962.10	4943.16	4.78	52.06	43.16	36797
京津冀	10373.47	816.80	4727.50	4828.78	7.90	45.60	46.50	17335
合　计	44629.89	2491.53	23104.39	19033.58	5.60	51.80	42.60	26717
全　国	116694.00 (9.1%)	17247.00 (2.5%)	61778.00 (12.5%)	37669.00 (6.7%)	14.80	52.90	32.30	9030

地　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长三角	10589.08(38.9%)	6923.75(10.8%)	2737.00(56.2%)	1386.85(50.1%)	255.77(43.3%)
珠三角	3749.44(27.3%)	4048.28(14.1%)	2713.87(28.1%)	1451.39(28.9%)	169.34(12.7%)
京津冀	4603.96(25.2%)	4234.65(16.4%)	1068.14(30.2%)	371.56(29%)	48.47
合　计	18942.48	15206.68	6519.01	3209.80	473.58
全　国	55118.00(26.7%)	45842.00(9.1%)	8512.00(37.1%)	4384.00(34.6%)	535.00(1.4%)

表 11　2003 年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地　区	核心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长三角	上海	6250.81 (11.8%)	92.98 (2.3%)	3130.72 (16.1%)	3027.11 (8%)	1.5	50.1	48.4	1341.77	46718 (11.2%)
珠三角	广州	3466.63 (15%)	104.14 (-0.3%)	1504.89 (21.4%)	1857.60 (11%)	3.0	43.4	53.6	725.19	47900 (14%)
京津冀	北京	3663.10 (10.7%)	95.64 (3.3%)	1311.86 (11.9%)	2255.60 (10.3%)	2.6	36	61.4	1148.80	32061 (9.4%)
	天津	2386.94 (14.5%)	89.70 (6.1%)	1212.34 (17.8%)	1084.90 (11.5%)	3.7	50.8	45.5	926.00	25874 (13.8%)

地　区	核心城市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长三角	上海	2452.11(12.1%)	2220.64(9.1%)	1123.97(54.7%)	484.82(51.2%)	58.50(30.1%)
珠三角	广州	1157.77(14.7%)	1494.27(9%)	349.44(25.1%)	168.89(22.6%)	30.64(15.5%)
京津冀	北京	2157.10(18.9%)	1916.70(14.5%)	684.63(30.4%)	168.52(33.6%)	21.47(19.8%)
	天津	1046.72(29%)	1074.05(14.1%)	293.71(28.7%)	143.74(24%)	17.06

表12　2004年1～9月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地　区	核心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长三角	上海	5303.7 (14.2%)	43.5 (-6.7%)	2753.7 (16%)	2506.5 (12.5%)	9298.0 (23.3%)	2312.5 (25.9%)	1823.6 (11.4%)
珠三角	广州	2934.2 (15.6%)	78.9 (6.0%)	1284.7 (18.9%)	1570.6 (13.4%)	3563.2 (23.5%)	794.9 (18.7%)	1212.8 (12.2%)
京津冀	北京	2969.5 (13.0%)	81.8 (0.8%)	1126.1 (16.7%)	1761.6 (11.2%)	3486.8 (26.9%)	1525.0 (16%)	1609.1 (16.1%)
	天津	2089.8 (15.7%)	64.8 (5.8%)	1138.6 (18.9%)	886.4 (12.3%)	3863.8 (30.5%)	883.7 (24.2%)	777.3 (14.9%)

地　区	核心城市	出口(亿美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长三角	上海	531.9(49.9%)	860.7(26.5%)	17030	53.8(19%)	12575(13.3%)
珠三角	广州	152.8(27.9%)	225.3(22.1%)	9211	17.8(38%)	12748(12.0%)
京津冀	北京	142.7(16.8%)	551.6(26.1%)	20802	25.6(50%)	11699(12.6%)
	天津	146.5(45.1%)	178.6(23.9%)	4501	19.2(35%)	8082(10.5%)

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经济实力评价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张赛飞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计15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2003年人口达7608万，占全国5.89%；GDP达22774亿元，占全国19.5%；固定资产投资达10588亿元，占全国19.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923.7亿元，占全国15.1%；出口达1386亿美元，占全国31.6%；实际利用外资达255.8亿美元，占全国47.8%；人均GDP达29934元，是全国的3.3倍。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肇庆9个城市，土地面积4.1万平方公里，2003年人口达3066万，占全国2.4%；GDP达11453亿元，占全国9.8%；固定资产投资达3748.5亿元，占全国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048.8亿元，占全国8.3%；出口达1451.4亿美元，占全国33.1%；实际利用外资达170.2亿美元，占全国31.8%；人均GDP达37347元，是全国的4.1倍。

这两个城市群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设施完备，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如何客观评价两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实力显得尤为必要，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为各城市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促进两大城市群全面协调发展。本文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研究。

一　指标体系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多方面的，任何单项指标都无法全面而客观地反

映该城市的经济实力。通常利用一个指标体系中的多个指标从不同侧面对该城市经济实力进行全面评价。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城市经济理论，选取GDP、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货物运输量、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等11个指标反映城市经济实力，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下：

①GDP（亿元）：从总体上概括了城市经济发展总量和规模。

②人均GDP（元）：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城市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模与高级程度。

③第三产业比重（%）：反映城市产业结构，衡量经济发展阶段。

④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从量化的角度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物质基础的规模和水平。

⑤货物运输量（万吨）：衡量城市物流量，反映城市间经济交流的频繁程度，是体现城市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

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衡量人民群众购买力及物质生活水平，反映城市经济实力。

⑦出口总额（亿美元）：衡量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反映经济的开放程度及城市经济实力的强弱。

⑧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衡量城市利用外资的规模，反映城市对外开放水平。

⑨地方财政收入（亿元）：衡量经济运行质量，反映城市经济实力。

⑩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元）：用来观察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和农民扩大再生产及改善生活的能力，是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是衡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二 评价方法

（一）主成分分析法

城市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经济实力的评价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单凭由各个数据构成的指标体系，无法对所选取的样本城市进行综合比

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数量分析方法和模型，确定各城市在经处理后若干个综合指标上的得分，再加以累计，才可以得出各城市在经过数量模型计算后的排序情况。这里采用多元统计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利用2004年各城市的统计公报数据，客观准确地评价2003年长江三角洲15城市和珠江三角洲9城市的经济实力。

1. 数据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y_{ij}=\frac{x_{ij}-x_j}{\sigma_j}$，其中，$X_{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y_{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_j$为第j个指标均值。$\sigma_j$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2. 主成分分析的计算

（1）计算由Y_{ij}构成的数据阵Y的相关阵R，R=（X'Y）/N。

（2）计算相关阵R的特征值，将其由大到小的顺序列成$\lambda_1 \geqslant \lambda_2 \geqslant \cdots \lambda_{11}$，同时求出它们相对应的特征向量。

（3）计算各指标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结果如表1。可以看出，当K=2时，其累积贡献率达85.9%，因此，取前2个主成分，记为F_1、F_2。

表1 主成分的特征值及解释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

	初始特征值			修正载荷开方和		
主成分	总值	总方差中的%	累计的%	总值	总方差中的%	累计的%
1	7.269	66.078	66.078	7.269	66.078	66.078
2	2.184	19.85	85.928	2.184	19.85	85.928
3	0.742	6.746	92.674			
4	0.354	3.218	95.892			
5	0.231	2.099	97.991			
6	1.12E-01	1.014	99.005			
7	4.23E-02	0.384	99.389			
8	2.89E-02	0.263	99.652			
9	2.47E-02	0.224	99.877			
10	1.01E-02	9.19E-02	99.968			
11	3.47E-03	3.15E-02	100			

（4）计算由F_1、F_2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构成的因子载荷阵和主成分得分系数，如表2。

表2 主成分得分系数表

	主成分	
	1	2
GDP	0.131	-0.117
人均GDP	0.097	0.233
第三产业比重	0.091	-0.119
固定资产投资	0.124	-0.13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127	-0.16
货物运输量	0.111	-0.23
出口总额	0.12	0.17
实际利用外资	0.118	0.065
地方财政收入	0.129	-0.139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0.086	0.33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8	0.339

（5）计算各城市的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和排名，如表3所示。

表3 2003年与2001年两大三角洲城市经济实力综合指数与排名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2003年	城　市	深圳	上海	广州	苏州	东莞	无锡	宁波	佛山
	综合指数	2.013	1.991	0.942	0.826	0.779	0.176	0.138	0.137
2001年	城　市	上海	深圳	广州	东莞	苏州	杭州	佛山	珠海
	综合指数	1.899	1.709	1.056	0.628	0.324	0.202	0.183	0.158
	排　名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03年	城　市	杭州	珠海	中山	南京	绍兴	嘉兴	常州	江门
	综合指数	0.090	0.054	-0.081	-0.082	-0.271	-0.300	-0.374	-0.477
2001年	城　市	宁波	无锡	南京	中山	江门	嘉兴	绍兴	常州
	综合指数	0.115	0.043	-0.064	-0.169	-0.279	-0.329	-0.352	-0.373
	排　名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003年	城　市	湖州	惠州	镇江	舟山	南通	扬州	肇庆	泰州
	综合指数	-0.512	-0.567	-0.618	-0.648	-0.666	-0.791	-0.872	-0.885
2001年	城　市	舟山	湖州	镇江	惠州	南通	扬州	肇庆	泰州
	综合指数	-0.452	-0.529	-0.541	-0.546	-0.577	-0.688	-0.691	-0.726

$$贡献率 = \frac{\lambda_i}{\sum_{i=1}^{m} \lambda_i} \qquad i = 1, 2\Lambda 11$$

$$累积贡献率 = \frac{i = \sum_{i=1}^{K} \lambda_1}{\sum_{i=1}^{M} \lambda_1} \qquad i = 1,\ 2\Lambda 11$$

$F_1 = 0.131L_1 + 0.097L_2 + \cdots\cdots + 0.086L_{10} + 0.08L_{11}$

$F_2 = -0.117L_1 + 0.233L_2 + \cdots\cdots + 0.334L_{10} + 0.339L_{11}$

$F = 0.769\ F_1 + 0.231F_2$

（二）聚类分析法

为了更好地分析城市经济实力，我们将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聚类分析对各城市经济实力进行分类 ，找出各类城市的不同特征。聚类分析是统计学所研究的物以类聚问题的一种方法，属于多变量统计分析的范畴。它能够将一批样本数据（或变量）按照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这里，一个类就是一个具有相似性的个体的集合，不同类之间具有明显的非相似性。在分类过程中，不必事先给出一个分类标准，聚类分析能够从样本数据出发，客观地决定分类标准。本文采用层次聚类分析进行测算。结果如图 1。

三　分析与评价

（一）因素分析

表 4　各指标对城市经济实力的影响

指　标	影响程度	指　标	影响程度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0.14329	地方财政收入	0.0670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39831	固定资产投资	0.0644
出口总额	0.1315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60701
人均 GDP	0.128417	第三产业比重	0.042488
实际利用外资	0.105757	货物运输量	0.032226
GDP	0.07371		

从表 4 可以看出，11 个指标对经济实力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其中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口总额、人均 GDP、实际利

用外资这五个因素影响较大，货物运输量影响最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两大三角洲城市要提升经济实力必须着重提高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减少城乡差别，与此同时，必须想方设法扩大出口与利用外资规模。

（二）两大三角洲城市经济实力分析与评价

从经济实力综合指数来看，如表5所示，长江三角洲城市总分为-1.93，珠江三角洲为1.93。说明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平均经济实力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具体来说，珠江三角洲城市在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六个方面领先于长江三角洲城市。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出口总额、人均GDP四方面优势明显。而在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运输量、地方性财政收入五个方面落后于长江三角洲。两大三角洲城市各指标的平均值如表6所示。总的来说，长江三角洲城市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方面占有优势，尤其是在投资需求优势较为明显，其平均水平是珠江三角洲的1.69倍。而珠江三角洲城市在人均收入和外向型经济具有相对优势，其中出口的优势比较明显，其平均水平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的1.75倍。

表5 两大三角洲城市经济实力比较

	综合指数	GDP	人均GDP	第三产业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运输量	出口总额	实际利用外资	地方性财政收入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长三角	-1.93	0.08	-0.56	-0.04	0.19	0.01	0.04	-0.32	-0.06	0.03	-0.50	-0.79
珠三角	1.93	-0.08	0.56	0.04	-0.19	-0.01	-0.04	0.32	0.06	-0.03	0.50	0.79

表6 两大三角洲城市各指标平均值比较

	GDP（亿元）	人均GDP（元）	第三产业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货物运输量（万吨）	出口总额（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地方性财政收入（亿元）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长三角	1518.31	2.99	37.95	705.89	461.58	11534.91	92.40	17.05	142.44	5628.90	11954.68
珠三角	1272.57	3.73	38.97	416.49	449.87	8805.68	161.27	18.91	125.97	6692.14	15755.98

（三）分类分析与评价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将24城市分成五大类，见表7。五大类城市中，五类城市中城市数比重分别为8.3%、12.5%、29.2%、37.5%、12.5%，第三、四类城市的比重之和达到66.7%，表现出“两头尖、中间粗”的特征。

表7　两大三角洲24城市经济实力分类

城市类别	城　　　市
第一类	深圳、上海
第二类	广州、苏州、东莞
第三类	无锡、宁波、佛山、杭州、珠海、中山、南京
第四类	绍兴、嘉兴、常州、江门、湖州、惠州、镇江、舟山、南通
第五类	扬州、肇庆、泰州

表8　五类城市平均经济实力比较

城市类别	经济实力综合指数	GDP（亿元）	人均GDP（元）	第三产业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货物运输量（万吨）	出口总额（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地方性财政收入（亿元	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第一类	2.00	4555.7	47974.3	44.5	1699.3	1511.2	33917.1	557.2	54.5	618.3	8033.9	18115.7
第二类	0.85	2405.4	48919.1	43.5	962.0	786.1	14042.3	258.4	41.4	249.3	6631.7	14318.3
第三类	0.06	1384.9	34989.0	39.0	645.1	425.8	10776.8	90.6	15.4	116.4	5934.5	12862.6
第四类	-0.49	719.7	20368.5	35.5	327.1	229.8	6167.7	31.7	7.8	41.4	5115.5	11544.9
第五类	-0.85	576.1	12803.6	36.1	197.5	181.0	3789.0	9.5	4.9	33.1	4147.0	8441.4

第一类城市含深圳、上海两个城市。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活力强，经济规模大，“三大”需求强劲，人民生活富裕。地方财政收入618.3亿元，出口总额557.9亿元，分别是第五类城市的18.7倍、58.7倍。因此，该类城市经济实力突出。

第二类城市含广州、苏州、东莞三个城市。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活力较强，经济规模较大，“三大”需求较强劲，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人均GDP达48919.1元，超过第一类城市。因此，该类城市经济实力较强。与第一类城

市相比，11个指标中差距最大的是地方财政收入，仅为第一类城市的40.3%。而要缩小与第一类城市经济实力的差距，则首要任务是尽可能的扩大出口。

第三类城市含无锡、宁波、佛山、杭州、珠海、中山、南京七个城市。其主要特征是：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活力、“三大”需求、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均处于中游水平，在24城市平均值上下波动。经济实力也处于中游略为偏上的水平。与第二类城市相比，11个指标中差距最大的是出口，仅为第二类城市的34.5%。而要缩小与第二类城市经济实力的差距，则首要任务是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第四类城市含绍兴、嘉兴、常州、江门、湖州、惠州、镇江、舟山、南通九个城市。其主要特征是：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活力、“三大”需求、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均处于中游偏下水平，总的经济实力处于中游偏下的水平。该类城市11个指标的平均值均低于24城市平均值。与第三类城市相比，11个指标中差距最大的是出口，仅为第三类城市的34.5%。而要缩小与第三类城市经济实力的差距，则首先需要提高人均GDP，创造更多财富。

第五类城市含扬州、肇庆、泰州三个城市。其主要特征是：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活力、“三大”需求、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均处于落后水平，经济实力处于较低水平。该类城市的11个指标的平均值均低于24城市平均值。与第四类城市相比，11个指标中差距最大的是出口，仅为第四类城市的30.3%。而要缩小与第四类城市经济实力的差距，则首先需要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2001年相比，第一、二、三类城市的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平均得分分别增加0.198、0.18、0.08，而第四、五类城市平均得分减少0.081、0.148。可见，五类城市经济实力的差距有所扩大。

（四）深沪穗苏四城市简评

深圳：2003年经济实力排在24城市之首，属于五类城市中的第一类，主要优势主要表现在出口规模大、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2003年深圳出口达629.62亿美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3万元与2.59万元，分别是24城市平均水平的3.33倍、2.73倍、2.83倍。与2001年相比，其经济实力排名由

第二升至第一，主要得益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与实际利用外资的快速增长。虽然如此，深圳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货物运输量低于24城市的平均水平，排在第13位；第三产业比重为40.5%，排在第七位。因此，深圳需要加大力度培育与发展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购物与消费环境，利用居民收入高的优势，促进本地消费。

上海：2003年经济实力排在深圳之后，居第二位，属于五类城市中的第一类。总的来看，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均衡发展，没有负数。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运输量、地方性财政收入排在24城市之首，分别占24城市总量的18.2%、17.1%、20.2%、24.2%、27.5%，说明上海的综合实力较强。与2001年相比，虽然经济实力排名由第一位落到第二位，但其综合指数得分仍然增加，说明上海的发展快于24城市的平均水平。200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658元、14867元，仅为深圳的58.7%、57.3%，排在第五位、第六位。因此，上海应该适当增加居民与农民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

广州：2003年广州的经济实力在两大三角洲24城市中排在第三位，属于五类城市中的第二类。11个指标的得分均为正数，说明广州的发展比较均衡，且高于24城市的平均水平。其中第三产业比重为53.6%，排在24城市之首。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运输量、地方性财政收入四指标均排在第2位，可见广州是个综合性较强的城市。与2001年相比，虽然经济实力排名没有发生变化，但其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得分却减少了。这说明相对于两大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广州近两年的发展相对偏慢，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优势有所削弱。尤其是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2003年位于第10位，低于深圳、上海，甚至低于佛山、宁波和绍兴。因此广州必须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解决城中村问题，切实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城乡差别。

苏州：2003年经济实力排在24城市的第四位，属于五类城市中的第二类。实际利用外资68.05亿美元，排在24城市之首。GDP、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地方性财政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排在2~4位。与2001年相比，苏州是24城市中经济实力增长最为强劲的城市，主要表现在实际利用外资、出口、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2003年苏州第三产业比重、货物运输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低于24城市的平均水平，

位于第19位、第12位、第15位。因此苏州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需要发展内源性经济；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注重发展服务业；应该适度提高居民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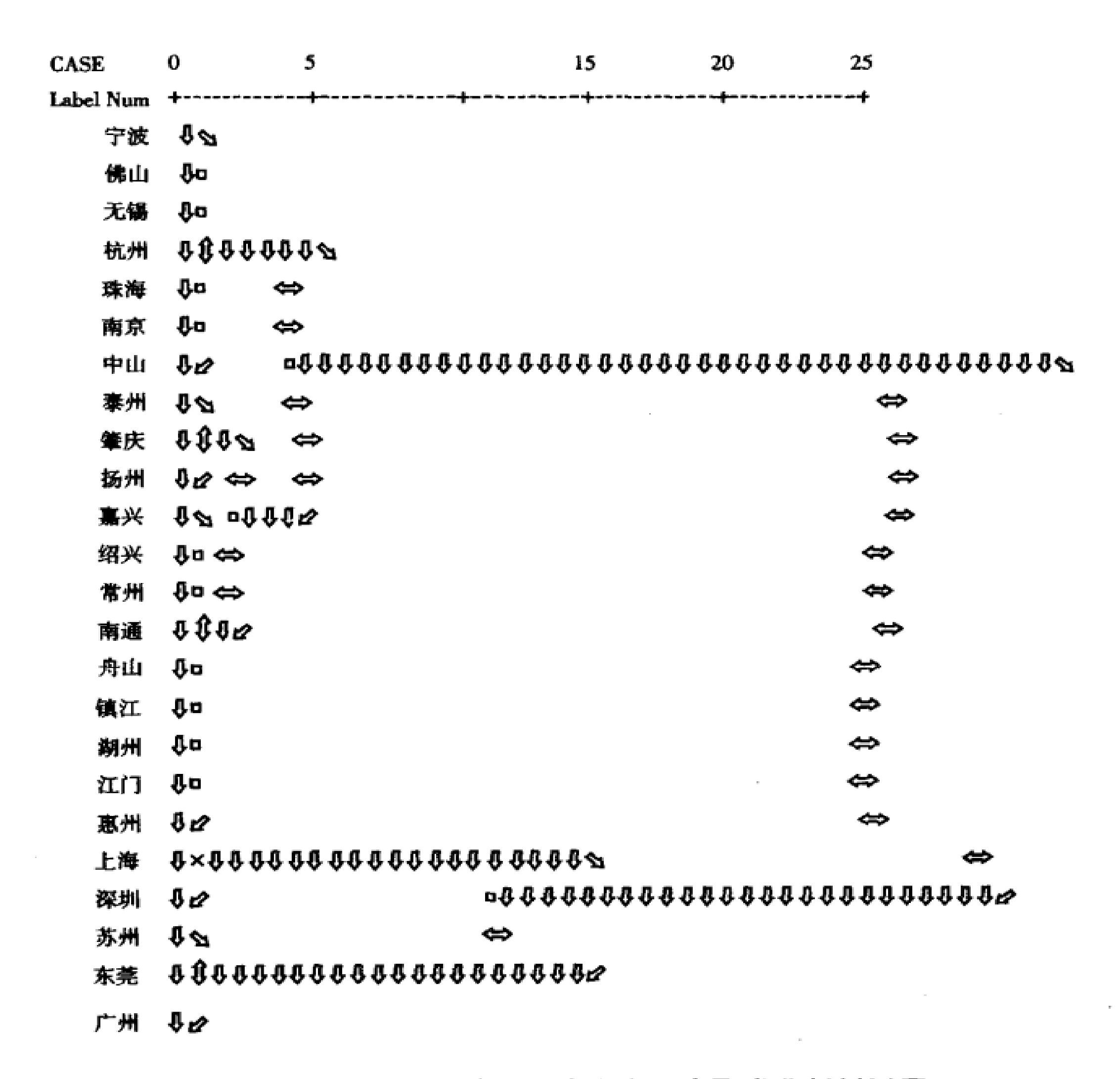


图1 两大三角洲24城市经济实力层次聚类分析树形图

四 几点结论

（1）现阶段两大三角洲城市要提升经济实力必须着重提高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必须想方设法扩大出口与利用外资规模。

（2）对两大三角洲24个城市的经济实力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其分成

五类，从城市数来看，表现出“两头尖、中间粗”的特征。与2001年相比，2003年五类城市间经济实力的差距有所扩大。

（3）总的来说，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平均经济实力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具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城市在人均收入和外向型经济具有相对优势，其中出口的优势比较明显；长江三角洲城市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方面占有优势，尤其是投资需求优势较为明显。

（4）近两年，与两大三角洲其他城市相比，广州的发展相对偏慢，优势有削弱的迹象。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

山东半岛城市群同京津唐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山东经济学院城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山东半岛城市群同京津唐城市群是两个环黄渤海区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城市群。同后者相比，前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后者是计划经济时代就基本形成的，并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发展。目前，两个城市群各有特长。山东半岛城市群也应主动与京津唐城市群找差距，以便于自身的崛起和超常规发展。

一　在经济总量上，山东半岛城市群高于京津唐城市群而同京津冀北城市群基本接近

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集中了山东半岛沿海开放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城市带、产业带和已整整百年的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带、产业带这两种优势资源而形成的城市群和经济带，所以它同京津唐城市群相比，各有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2002 年，济南、青岛、烟台、淄博、潍坊、威海、日照、东营等 8 个地级市共实现 GDP 7013.43 亿元，而京、津、唐三市分别实现 GDP 3130 亿元、2022.6 亿元和 1102 亿元，总计 6254.6 亿元。这样，即使再加上廊坊市，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也已超过了京津唐城市群。而若根据吴良墉院士主持的“大北京经济圈”的规划再加上保定等市，则山东半岛城市群与大北京经济圈在经济总量上基本接近。

“大北京经济圈”主要是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地区，面积近 7 万平方公里，云集了华北诸多大

中城市。它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的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也可称为包括保定在内的京津冀北城市群地区。

下面以2003年《中国城市年鉴》提供的城市群内所有城市（不包括市辖县）的数字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包括保定在内的京津冀北城市群进行比较（见表1）。

表1 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京津冀北城市群所有城市2002年GDP数量表

山东半岛城市群所有城市2002年GDP		京津冀北城市群所有城市2002年GDP	
城市名称	2002年GDP(万元)	城市名称	2002年GDP(万元)
济南	9305137	北京	31245124
青岛	7907586	天津	18192805
章丘	1279312	唐山	5448609
胶州	1512940	遵化	1102956
即墨	1594803	迁安	1162809
平度	1563496	保定	1643879
胶南	1581600	涿州	677995
莱西	1021238	定州	741522
淄博	6504628	安国	339771
东营	4235519	高碑店	563032
烟台	3921594	廊坊	928700
龙口	1620027	霸州	734340
莱阳	919431	三河	873585
莱州	1396531	合计	63655127
蓬莱	960000		
招远	1108373		
栖霞	569132		
海阳	581869		
潍坊	2421800		
青州	868998		
诸城	1131028		
寿光	1474662		
安丘	763400		
高密	731600		
昌邑	698241		
威海	1884530		
文登	1880399		
荣成	2206600		
乳山	1068262		
日照	1434300		
合计	64147036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年鉴》（2003）。

如上所述，经济总产出基本相同的京津冀北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面积都在7~8万平方公里之间，但前者具有两个超800万人口的世界著名巨型城市——北京和天津，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只有唐山和保定，中小城市只有9个，其大中城市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后者，是一个以巨型城市带动为特色的大城市群。而山东半岛城市群目前虽只有济南、青岛两个人口过200万的巨型城市，其核心城市的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前者，但由于有淄博和烟台两个特大城市和东营、潍坊、威海、日照四个大中城市，还有22个实力较前者雄厚得多的中小城市和更多的小城镇的支持，其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网络同样具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与山东半岛城市群对应的山东经济板块同与京津唐城市群对应的京津冀经济圈板块在经济总量上也基本接近

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总量同大京津唐城市群大体相当一样，山东省的经济总量也同京津冀两市一省和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三省经济板块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2003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GDP总量为13094.24亿元，山东省GDP总量为12430亿元，两大经济板块前者只比后者多664.24亿元；2003年东北三省经济总量为12957.3亿元。山东省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吸引外资的水平已远远超过前两个经济板块（见表2）。这是构成中国北方经济协作和竞争格局的重要现象。

表2　中国北方的三大经济板块2003年的GDP总量和吸引外资数量表

京津冀经济圈板块			东北三省经济圈板块			山东省经济板块		
地区	2003年GDP总量（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亿美元）	地区	2003年GDP总量（亿元）	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亿美元）	地区	GDP总量（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亿美元）
北京	3611.9	21.5	辽宁	6002.5	57.1	山东半岛城市群8市	8336.1	88.586
天津	2386.94	16.33	吉林	2521.8	3.18			
河北	7095.4	15.6	黑龙江	4433	12.9	其他9市	4093.9	21.714
合计	13094.24	53.43	合计	12957.3	73.18	合计	12430	110.3

资料来源：2003年度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经济社会统计公报。

2004年前9个月，山东抓住宏观调控的契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投资增速回落的情况下，全省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575.4亿元，仅次于广东，同比增长15%，创9年来新高。工业增加值4595.8亿元，同比增长26.5%；工业实现利税1585.7亿元，同比增长46.9%；外贸进出口总额438.8亿美元，同比增长37.7%；实际利用外资90.5亿美元，同比增长66.4%。预计山东省2004年的GDP总量可超过1.4万亿元，山东半岛城市群GDP总量可超过9600亿元。预计2004年山东省的经济总量仍同京津冀两市一省和东北三省经济板块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

三 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总体落后于京津唐城市群

京津唐城市群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将自主知识产权融入到产业中去，这对应了这一地区高质量的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和人力资源。据统计，北京地区有市级以上独立科研机构503个，另外，北京还有62所高校，天津有40所高校，而位于京津高速路沿线廊坊的东方大学城也已进驻了13所高校。可以说，这个地区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和科技精英。一条从西山山脉到海河、塘沽，从科技源头到产业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新干线被正式提出和初步建成。这条新干线以北京、天津“双子星座”为依托，以河北为腹地，具有强大的优势和潜力：各地的经济互补性强，北京地区以科技型现代第三产业为主，天津地区以制造业为主；北京原创技术多，天津外向型经济比重大；北京身处政治中心，而天津身处近海和出海口繁荣的贸易区。河北则是京津沿线各区产业转移低成本的腹地。京津塘科技新干线将成为代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干线，成为要素流通无障碍的新干线，成为科技合作紧密、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的新干线，成为差异化竞争优势明显的新干线，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干线。

相比之下，山东半岛地区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就相对较弱，这是山东半岛城市群崛起中需要向京津唐城市群学习的关键之处。但山东半岛城市群崛起的基本科技教育和产业创新的条件是具备的。

（1）人才技术力量雄厚。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集中了全省80%的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和大中型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人才荟萃，科研实力雄厚，并开辟有济南、青岛、威海、潍坊、淄博等五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和青岛、烟台、威海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海尔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名牌产品多，电子资讯业发达。2004年2月，世界品牌实验室、世界经理人周刊和世界经理人网站联合发布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产品，中国青岛的海尔惟一入选，排在第95位。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它使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本土品牌进入世界前100位品牌排行榜的历史结束，这不仅是海尔集团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除海尔品牌外，中国重汽的重型卡车、海信电器和计算机、浪潮计算机及其软件、青岛啤酒、烟台张裕葡萄酒、威海三角牌轮胎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也有较大影响。济南的齐鲁软件园、中创的软件产品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仅青岛市就拥有7个驰名商标、31种中国名牌产品、79种山东名牌产品，12家企业跻身全国500强。在青岛，企业家与品牌相生相伴，张瑞敏、常德传、周厚健、汪海、李桂荣、陈玉兰、王玉科、蒲强……2002年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经济风云人物评选，青岛占去了3席，被专家称为“青岛现象”。所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国内外名牌产品之集中是其能同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城市群竞争的重要标志。

（3）机械工业先进。拥有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济南第二机床集团、济南锅炉厂、潍坊柴油机集团、烟台的上海通用东岳公司经济型轿车厂、烟台大宇重工有限公司、四方机车车辆厂等大型企业和一大批国家级、省级大中型企业技术中心。

（4）石油与化学工业基础较好。拥有胜利油田、齐鲁石化、济南炼油、山东海化集团、烟台合成革、青岛和威海橡胶等大型企业及正在建设中的1000万吨级的青岛大炼油项目。

（5）有以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石油大学等为代表的几十所大学和众多的国家级和省级科研机构。

四　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协调和管理上优于京津唐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覆盖山东省8个行政区，在管理协调上存在一定困难。但不同于京津唐分属三个省市，又不同于大珠三角城市群由两个经济特区和小珠三角组成。山东半岛城市群8个市同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协调难度要小于京津唐、长三角和大珠三角。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可有效协调山东

半岛城市群体系的空间结构以及城市间的专业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在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以减少因管理体制不同而造成的城市间的相互封锁、排斥和内耗，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增强城市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城市群内部现有的优势企业、优势产品为龙头，建立跨行政区的企业群体、企业集团，以提高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整体效益。

相比之下，京津唐城市群或京津冀经济圈却因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辖市，相互之间为争“北方经济中心”，有很多问题难于协调，至今尚未形成类似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那样的协调机制。以至于出现北京市不愿使用塘沽港，而同唐山市合建京唐港等矛盾问题。两市都力图建成北方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也使一些大项目的布局不尽合理。但可喜的事，两市的基层单位已走在前面，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例如，2003 年 6 月 7 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协议正式签订，宣告了京津塘开发区联袂发展的新篇章开始谱写。根据协议规定，今后，北京市海淀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手推进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海淀区是我国著名的科教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规模成熟，科技创新实力雄厚，是科技成果孵化辐射基地和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因此，在合作中海淀区侧重于技术研发孵化。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全国发展最快，外商回报率最高的外向型开发区。但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才优势与区位优势比海淀区差，这成为开发区快速推进的瓶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合作中侧重于产业化，形成分工合理、完整统一的产业链条，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所产生的税收双方按比例统一分配。就开发园区建设问题，每年举行双边会谈，交换意见，确定政策。在信息交流上确定专门高层沟通热线，实现信息共享。组建招商引资联合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经贸活动，基金、技术、项目等要素流动实现两地无障碍，为对方企业来区发展提供“最惠国待遇”。在人才交流与教育培训的合作方面，海淀区发挥技术创新、大专院校密集优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招商引资、园区建设管理优势，通过考察、研修、挂职、实习、借用、调配等方式，加强相互之间的人才支持和教育培训援助。海淀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区域合作，是互惠互利的体现，也是共同繁荣的要求。双方共同打造研发—孵化—生产的良性链条，既能实现双赢目标，又能为京津两市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 5 月 17 日，作为全国三大经济圈之一的京津冀

都市圈发展研讨会召开，三方达成共识：2004年第三季度召开京津冀都市圈发改委主任联席会议。会上将共同编制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战略、重大项目和对策建议。这些将提交年底前召开的三省市长联席会议审定，并会同各方有关部门实施。这说明，京津冀城市圈协作机制正在建立中。

五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特大城市弱于京津，但大中小型城市组合优于京津唐城市群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群体经济竞争力较强，大中型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较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但其特大城市济南、青岛，不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无法同北京、天津相比。例如2003年济青两市GDP分别达到1367.8亿元和1780.3亿元，而北京和天津则分别达到3611.9亿元和2386.94亿元。所以，加快济、青两个特大城市的发展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崛起的重中之重。令人可喜的是，青岛市2004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完成1538亿元，同比增长16.7%；前三季度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5.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2%。预计2004年GDP总量可首次超过2000亿元，使其龙头地位不断上升。

由于山东半岛城市群有一批大中城市，如烟台、淄博、潍坊、威海、东营、日照都发展较快，其群体的城市素质和经济总量就可以同京津唐城市群相比。2003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八市中，已有青岛、济南、烟台、潍坊和淄博五个GDP过千亿元的城市，这五市的GDP总量达6497.48亿元。预计2004年威海的GDP也能超过1000亿元，使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不断提高。如表1所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22个县级市具有比京津唐城市群的县级市更大的发展活力，这也弥补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济南和青岛远远弱于京津唐城市群的北京和天津的弱点。例如，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荣成和文登这两个县级市2002年的GDP总量超过京津唐城市群的重要城市保定市，而GDP总量接近保定、高于廊坊的县级市还有莱州、即墨、胶南、寿光等。

另外，如表3所示，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组织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日前公布，200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有16个县或县级市入围百强县，其中列前10位的有一个市、列前40位的有10

个县级市；而京津唐城市群只有三个县或县级市入围百强县，其中北京一个、河北两个，名次都在第50名之后。

表3　200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京津唐城市群的百强县名称、个数及名次表

200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入围百强县的16个县或县级市名称及其名次	2004年京津唐城市群入围百强县的3个县或县级市名称及其名次
荣成（第10位）、文登（14位）、龙口（25位）、胶南（26位）、即墨（28位）、胶州（30位）、平度（35位）、寿光（38位）、章丘（39位）、莱州（40位）、诸城（54位）、兖州（56位）、招远（60位）、乳山（62位）、莱西（85位）、蓬莱（88位）。	河北迁安市（第53位）、河北遵化市（第61位）北京密云县（第71位）

资料来源：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组织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2004年11月12日《经济日报》。

这说明，建设较发达的中小城市群，是京津唐城市群需要高度注意的问题；而进一步加快济南、青岛两大核心城市的建设步伐，则是山东半岛城市群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六　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在区位上更靠近韩、日，近年来吸引外资已远远超过京津

2003年，天津合同利用外资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33亿美元；北京合同利用外资3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5亿美元。而2003年，山东省实际利用外资达110.3亿美元，其中，青岛合同利用外资8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0亿美元；烟台市合同利用外资4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0亿美元。这就是说，仅烟台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就超过天津3亿多美元，低于北京仅2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超过北京10亿美元，超过天津4亿美元。同青岛比，北京和天津的差距就更大。这说明，山东半岛城市群2003年在利用外资方面，已超过了京津唐城市群（详见表2）。山东省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也比京津冀三省市的总和53.43亿元多56.87亿元。只要这一势头能继续保持十多年，目前作为第四极的山东半岛城市群赶超京津唐城市群，打造中国沿海地区第三个增长极的可能性就很大。

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区位上更靠近韩、日两国，这是近年来吸引外资远远

超过京津的重要原因。到2004年6月，在山东注册的韩资企业已达8586家，占全省外商投资企业的24.2%。韩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山东第一大外资来源地。2003年韩国与山东的贸易额达96.4亿美元，成为山东省最大的贸易伙伴。截止到2003年底，韩国在山东的投资达102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占韩国对华总投资的四成左右。大约有7万韩国人长期在山东生活、工作。此外，韩国还是山东省最大的客源市场。2003年上半年，来山东旅游的韩国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近年来，山东与韩国在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加强，迅速发展。

七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门户港青岛港的集装箱运输量也已超过京津唐城市群的门户港天津港

由于青岛港的区位更靠近国际主航道，近几年其集装箱运输量和外贸运输量都已大大超过天津港。2002年，青岛港的集装箱运量达到341万标准箱，基本是天津港和大连港两大港的集装箱运量之和（2002年上述两港的集装箱运量分别为210万和121万标准箱）。青岛港在2002年外贸集装箱航线成功西移至前湾新港区和2003年中英荷三国四方合资签约建设青岛集装箱港的强力拉动下，集装箱生产实现了跳跃性发展。2003年青岛港吞吐量突破1.4亿吨，接近于2002年山东省的海港吞吐总量，其中，全年集装箱运量跨越420万标准箱，继续超过当年天津港的301.5万标准箱；到2004年10月28日，青岛港的集装箱运量已超过420万标箱，预计全年能突破500万标箱。天津港集装箱运量也于2004年10月29日超过311万标箱。

2004年1月9日，由青岛港集团联手世界三大航运巨头——英国铁行集团、中国中远集团、丹麦A P穆勒—马士基集团合资组建的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隆重开业。该合资项目总投资8.87亿美元，是中国大陆沿海港口迄今投资最大的码头合资项目，也是山东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合资项目。其中，青岛港集团占31%，铁行集团占29%，中远集团占20%，丹麦A P穆勒—马士基集团占20%。与青岛港合资的三方股东均是世界级航运巨头。三大航运巨子同时投资一个码头，这在国际航运市场也非常罕见。其中，丹麦马士基、英国铁行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船舶公司，其集团公司均属世界500强企业，中远集团是世界一流的航运企业和中国第一大船舶公司。此次四方签约共同经营的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拥有10个深水

集装箱船舶专用泊位，码头岸线长达3400米左右，堆场总面积约225万平方米，泊位水深17.5米，可以接纳载箱量达1万T EU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50万T EU以上，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国际集装箱深水码头。新合资公司也成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企业之一。截至2004年初，世界排名前20位的船运公司已经全部在青岛港开线，新增航线达22条之多。

青岛港在集装箱运输方面之所以能大大超过大连港和天津港，除了有港口自身区位和管理等优势外，其背靠迅速发展且总量巨大的山东经济板块的优势已越来越明显，而大连港背靠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板块最近几年就未为其提供如山东经济板块的迅速发展的货运需求。2002年大连港背靠的东北三省和天津港背靠的京津冀三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量都在1.1万亿元左右，同总量过1万亿元的山东经济板块大体相当。2003年东三省、京津冀和山东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总量又分别升至为12957.3、13094.24和12430亿元，山东与前两大经济板块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可以说，青岛港已同山东半岛城市群及整个山东经济初步形成了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和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也为青岛市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龙头城市和东北亚国际结点城市创造了良好条件。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解析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高新才　滕堂伟　郭爱君

西部大开发以来，在国家大规模投资拉动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加速。但是，与全国及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多维地明析这些差距，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一　生产总值[①]（GDP）增长率与人均生产总值差距

2001 年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 3 年均高于全国 GDP 增长速度。从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角度看，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逐年加快，经济发展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表 1 所示。

表 1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差距

单位：%

年　份	全　国	东部地区 11 省市	西部地区 12 省市区
2000	8.0	8.9	7.2
2001	7.5	8.6	8.8
2002	8.0	10.6	8.9
2003	9.3	10.2	12.1
2000～2003	8.2	9.6	9.3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按可比价格整理计算。

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尚存在一定差距。在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的 2000 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① 中国自 2004 年开始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改称生产总值。

差距为 1.7 个百分点，此后在 2001 年加速，略高出东部地区 0.2 个百分点，但在 2002 年则低于东部地区 1.7 个百分点。在 2003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出东部地区 1.9 个百分点。总体上看，在 2000～2003 年的 4 年内，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低于东部地区 0.3 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持续扩大。

从人均生产总值差距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显得比较明显。从 2000～2003 年，全国、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由 7078 元、11334 元、4691 元变为 9101 元、16313 元、6306 元，西部地区占全国人均 GDP、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 66.3%、41.4% 变为 69.3%、38.7%，西部地区与全国人均 GDP 的相对差距缩小了 3 个百分点，而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差距扩大了 2.7 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差距持续扩大。

从生产总值占全国与东部地区的比重来看，2000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与东部地区的比重分别是 18.6%、29.9%，到 2003 年，这两项指标分别变为 19.6%、28.9%，前者上升了 1 个百分点，而后者下降了 1 个百分点。

二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差距分析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自身的优化升级进程比较缓慢，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见表 2）。

表 2　西部地区三大产业结构状况

单位：%

地区 \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全　国	16.4:50.2:33.4	15.8:50.1:34.1	15.4:51.1:33.5	14.8:52.9:32.3
东部 11 省市	11.4:49.2:39.4	10.9:48.7:40.4	10.2:47.3:42.5	9.3:50.9:39.8
西部 12 省市区	22.3:41.5:36.2	21.0:40.7:38.3	20.0:41.3:38.7	19.4:42.8:37.8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 与全国的差距

与全国产业结构相比，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状态，即区

域产业结构呈两头偏大、中间偏小的哑铃形状。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均高于全国，最高时高出5.2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高于全国，而是一种在第一产业既发展又不发达、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的一种低级化表现，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结构畸形。这也可以从其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中得到印证。以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青海为例，2002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中，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共占37.2%，而全国是13.8%，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所占比重也高于全国，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所占比重则低于全国。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其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明显的早产型特征，第一产业比重仍然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且提高缓慢，第三产业比重接近第二产业，比重较高且有不断提高趋势，但主要以传统的流通和服务业、机关事业为主，为现代农业、工业服务的金融、通讯和信息产业比重较低，现代化水平不高。这种超前发展而现代化水平低下的第三产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将带来消极的影响。

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一直高于全国5个百分点左右，下降速度也较为缓慢，而且2003年受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影响，比重不降反升，这与其较低的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结合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看，由于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差距较大，因此，较低的第一产业比重并不能说明其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而是表明了第一产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从第二产业比重来看，西部地区与全国相比存在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且提高的速度非常缓慢，2001年甚至下降了0.8个百分点。有些省份如新疆自2000年以来第二产业比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特殊趋势，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分别落后于全国，低于全国7.2、7.7、9.0、10.2个百分点，2003年的比重反而低于2000年0.5个百分点。

从整体上看，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于全国，农业经济特征明显；而第二产业比重较低于全国，工业化水平低下；第三产业高于全国，但以传统的流通与服务业为主，新兴第三产业比重低，对经济发展的服务支撑功能较差。

2.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西部地区与其差距更大。2003年，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首次降低到10%以下，第二产业

比重首次高于50%，受SARS影响，第三产业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从产业结构上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三　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差距

1. 与全国就业结构的差距

受制于区域产业结构状况，西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见表3）。

表3　西部地区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状况

单位：%

地区 \ 年度	2000	2001	2002	2003
全　国	50.0:22.5:27.5	50.0:22.3:27.7	50.0:21.4:28.6	49.1:21.6:29.3
东部11省市	42.9:27.2:29.9	42.0:27.6:30.4	40.4:28.0:31.6	38.1:29.8:32.1
西部12省市区	61.7:12.9:25.4	61.1:12.9:26.0	59.9:13.3:26.8	58.1:13.9:28.0

资料来源：同表2。

从表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现出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特点，而全国在2003年已表现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就业特征。2000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出全国11.7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低于全国9.6个百分点；到2003年，前者仍高出全国9个百分点，后者仍低于全国7.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差距相对较小。

2. 与东部地区就业结构的差距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就业结构差距更大。2000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出东部地区18.8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低于东部地区14.3个百分点。到2003年，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出2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比东部地区低15.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差距由2000年低于东部地区4.5个百分点缩小到2003年的4.1个百分点，差距相对较小且呈逐年收敛趋势。

将就业结构与三大产业增加值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西部地区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存在着很大差距，第一产业比重偏高且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显著，直接导致了该地区人民收入水平的相对低下。

四　人民生活水平差距

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突出地表现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畸形，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下，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较高等方面。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1）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且不断扩大的趋势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而且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见表4）。2000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低794元，是全国的87.4%；2001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差距有所缩小，比全国低69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9.9%，相对差距比上年缩小了2.5个百分点。但从2002年开始，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的差距持续扩大，绝对差距分别达到1028元、1267元，绝对值分别是全国的86.7%与85.0%。

（2）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更大差距，差距扩大趋势更明显。2000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东部地区分别低2364元，是东部地区的69.9%；2001、2002年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绝对差距分别是2440元、268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东部地区的71.7%、71.3%；但在2003年，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迅速扩大，比东部地区低3834元，仅为东部地区的65.3%，尚低于2000年的比重（见表4）。

表4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差距

单位：元，%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全　国	6280	39.4	6860	38.2	7703	37.7	8472	37.1
东部11省市	7850	40.2	8610	39.0	9356	38.5	11039	38.0
西部12省市区	5486	39.2	6170	37.7	6675	37.4	7205	36.0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

在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方面，西部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其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2000年以来一直低于全国与东部地区。表面上看，似乎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水平较高，但结合其较为低下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结构分析，可以找出现象背后的实质。西部地区较低的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是在可支配收入较低的收入约束下，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其他消费性支出（特别是教育、住房、水电暖、医疗）快速增长而被动降低食品支出的结果。实际上，在食品消费总量与营养结构上，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见表5）。

表5　2003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差距

单位：元，%

项目	全国	东部11省市	西部12省市区	西部占全国比例	西部占东部比例
消费性支出	6510	7867	5859	90	74
食品	2417	2930	2228	92	76
粮食	194	201	197	102	98
肉禽及其制品	473	542	458	97	85
蛋类	61	65	49	80	75
水产品	170	314	72	42	23
奶及奶制品	125	151	126	101	83
衣着	638	644	656	103	102
服装	455	463	460	101	99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410	501	353	86	70
耐用消费品	213	262	174	82	66
医疗保健	476	585	414	87	71
交通通信	721	927	654	91	71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934	1150	781	84	68
文娱用品	264	337	218	83	65
居住	699	860	568	81	66
住房	256	340	190	74	56
杂项商品与服务	215	270	206	96	76

资料来源：《2004中国统计年鉴》。

2003年，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西部地区为全国

以及东部地区的90%、74%；仅粮食与奶及奶制品支出略高于全国，但在奶及奶制品支出中，西部地区仅重庆、四川、西藏高于全国；在各类食品支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方面，西部地区仅为全国与东部地区的86%、70%；医疗保健支出仅为全国与东部地区的87%、71%；交通通信仅为全国与东部地区的91%、71%；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仅为全国与东部地区的84%、68%；居住支出仅为全国与东部地区的81%、66%；杂项商品与服务支出仅为全国与东部地区的96%、76%。

3.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问题，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1）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根据表6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3.9%，西部地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8%。因此，西部地区与全国相比，相对差距有所缩小，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75%。但绝对差距仍然在扩大，2000～2003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的差距由621元扩大为656元。其中，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五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均未超过1700元，最低的贵州省仅为1565元，比全国低1017元，仅为全国的60%。

（2）与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增长速度缓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见表6）。

表6 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差距

单位：元，%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全国	2253	49.1	2366	47.7	2476	46.2	2622	45.6
东部11省市	3476	44.5	3687	43.1	3916	41.0	4314	40.3
西部12省市区	1632	54.3	1755	56.2	1854	50.2	1966	48.7

资料来源：同表5。

2000～2003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由1844元扩大为2348元；占东部地区的比重由47.0%降为45.6%，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2000～2003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比西部地

区高出0.7个百分点。因此，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东部地区相比，其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均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4.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

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看，根据表7中的数据，西部地区2000年以来连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高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低的速度来看，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呈快速下降趋势，在短短4年的时间内，恩格尔系数迅速从54.3%下降到48.7%，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而全国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0.9和1.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的速度远高于全国与东部地区。联系到西部地区很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结构状况，这种下降，并不是真正反映了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在市场化程度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由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的增加而被迫缩小食品支出比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真实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

表7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

单位：%

年度	全国	东部地区11省市	西部地区12省市区
2000	49.1	44.5	54.3
2001	47.7	43.1	56.2
2002	46.2	41.0	50.2
2003	45.6	40.3	48.7

资料来源：同上表。

五　城镇化水平差距

城镇人口比重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不仅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36.2%，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仅为26.1%，比全国低10.1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20个百分点；到2003年，全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0.5%，东部许多省

份已超过50%，而西部地区只有内蒙古、重庆两区市超过40%，分别为44.7%与41.9%，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仍不及东部地区2000年的平均水平；西部其他省份则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城镇化水平尚低于30%。

六 经济发展外向程度差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成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中国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这一规律表现得比较明显。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经济外向程度低下不仅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具体表现在经济外贸依存度低、一般外贸贡献率、吸引外资数量少等方面（见表8）。

表8 西部地区经济外向程度差距

单位：%，美元

	年度	全国	东部地区11省市	西部地区12省市区
外贸依存度	2000	43.9	64.7	8.5
	2001	43.3	63.2	7.6
	2002	49.6	69.3	8.5
	2003	60.2	82.4	10.0
外贸贡献率	2000	-0.5	1.5	0.5
	2001	-0.1	-0.4	-0.7
	2002	0.7	1.3	0.1
	2003	-2.2	-0.7	1.3
人均利用外资额	2000	46.8	71.0	5.2
	2001	38.9	87.8	5.3
	2002	42.8	98.5	5.5
	2003	41.4	159.9	10.0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1美元=8.28人民币。

1. 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差距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是衡量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

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距。

（1）与全国外贸依存度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得到了快速提高。1978～2003 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 16%，比国民经济增长快 7 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从 1978 年的 10% 提高到 1990 年的 30%，2003 年又进一步升至 60.2%。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表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而西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极其低下。2000 年低于全国 35.4 个百分点，到 2003 年则迅速扩大为 50.2 个百分点，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净扩大了 14.8 个百分点，仅为全国的 16.6%。

（2）与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的差距。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差距更加悬殊。东部地区在 2000 年外贸依存度即已高达 64.7%，到 2003 年一跃而提高至 82.4%。从而体现出与国际市场较高或较为紧密的相互联系程度，东部地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迅速提高。

2. 西部地区外贸贡献率差距

外贸贡献率是一国外贸净出口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衡量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主要指标[①]。对于西部地区，虽然其外贸净出口规模较小，但其外贸贡献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从全国方面来看，由于 2000 年、2001 年、2003 年的全国外贸净出口增加额是负数，所以由此计算出的外贸贡献率相应表现为负值，2002 年由于外贸净出口的较大幅度的增加，该年外贸贡献率为 0.7。2000 年，西部地区的外贸贡献率为 0.5%，比全国高出 1 个百分点。但在 2002 年，西部地区比全国低 1.2 个百分点。到 2003 年，西部地区外贸贡献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与东部地区相比，2000～2002 年，西部地区外贸贡献率存在较大差距，只有在 2003 年高出东部地区 2 个百分点。

3. 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差距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的高低，反映着地区投资环境的优劣与发展机会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甚至经济发展

---

① 林毅夫、李永军认为这种计算方法实际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 2001 年 8 月 23 日《经济参考报》。

水平。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与地方虽然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在经过2000年、2001年、2002年低位徘徊之后，在2003年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但西部地区人均利用外资额仍然很小，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相比，存在非常显著的差距。

（1）与全国的差距。2000～2002年，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仅5.2、5.3、5.5美元，而全国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其9倍、7.3倍与7.9倍。到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与全国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仍然非常悬殊。

（2）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差距表现得非常悬殊。2000年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利用外资是前者的7.3%，2001年、2002年则变为6.0%与5.6%，差距有所扩大。到2003年，该比例变为6.3%，仍未达到2000年的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在人均生产总值、区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水平以及经济外向度等方面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的差距状况不容乐观。

如何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尽快遏止与东部地区特别是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差距扩大的趋势，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西部地区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京津冀经济圈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 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Blue Book

2004~200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京津冀区域合作机制研究

京津冀区域合作课题组*

京津冀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极具增长潜力的第三大经济板块。历史地看，京津冀三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有着很高的依存度和关联度。近年来，京津冀在互动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联系松散，产业分工不合理，大型基础设施不能共享，生态环境治理缺乏整体安排，地方利益主体冲突不断等。每个行政区分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本位理性最终导致整体非理性。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创新合作机制，积极开展京津冀合作，对区域资源进行整合，以进一步发挥这一地区的各种优势，降低创新成本，释放经济潜能，是京津冀各市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　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两大难点

（一）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难点之一——产业合作的缺位

现实中“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质是产业部门的成长和推进过程。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产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不相同。一般而言，成长首先从在产业系统中处于主要支配地位的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开始，通过“扩散效应”影响产业相关链条上的各个产业，带动并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

* 课题组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和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合作组成的。课题负责人：肖金成、李岚，课题组成员：汪阳红、李娟、刘钊、高骥。

京津冀地区由于行政区划意识还比较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还比较高，加之该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等多方面的原因，跨行政区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机制尚未形成，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相对迟缓，区域产业竞争力低下。

京津冀地区的产业为什么会缺乏相对的竞争优势呢？从地区内部看，主要在于各地区间缺乏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产业合作。任何时候，比较优势都是竞争优势的源泉，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合作是整体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北京和天津作为该地区两个特大型中心城市，由于合作观念的缺乏、行政地位的对峙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定时期形成的财政、投资、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等，在争做区域经济发展“龙头老大”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主导产业趋同现象，两者已经形成了包括传统基础工业、高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在内的自成体系的工业体系。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虽然已经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但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地方财政和就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还比较强，因而与该地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差异性还没有完全形成。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同北京以外的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也比较突出，难以形成层次分明的产业聚集。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资源难以在该地区范围内的合理流动，限制了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

京津冀合作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分工居多，深层次的产业合作甚少，导致三地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明显降低。在第一产业内部，京津与河北之间的合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主要是围绕着京津两大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而动。农产品的低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第一产业合作的低收益使河北得利不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河北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北京、天津的第三产业又多是为当地服务，基本停留在地方化层面，所以能够对河北产生影响的只有第二产业。但北京、天津的第二产业整体层次却并不高，再加上各自都追求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而限制传统产业向外转移或产业链的向外延伸等诸多原因的存在，导致两大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对河北产生强拉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地区竞争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影响力和国际化方面均有了长足进展，但对于比较优势利用得不充分却是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前，各城市间攀比式、模仿式和趋同式竞争严重存在。虽然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但他们所选择的产业发展模式

却大体雷同。结果如何呢？在共同的求新、求大、求全中，区域居民不仅没有享受到共同繁荣的福祉，却遭遇恶性竞争的尴尬与困惑。基于对比较优势认识的缺乏，不仅使京津冀地区间丧失了必要的分工与合作，更使得各城市发展过程的起伏性加大。当前，京津冀各城市的发展均面临结构升级缓慢的陷阱，结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突破结构障碍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却又受到现实中彼此间结构趋同的制约。对于比较优势利用得不充分而导致的结构趋同构成城市间恶性竞争循环，既表现为恶性竞争的结果，又表现为恶性竞争的诱因。所以说，结构趋同和结构瓶颈的共生构成当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第一制约。

从长远看，京津冀各城市必须要注重保护和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进行相对的位置决策，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平台，以独特的比较优势造就产业竞争优势，以充足的自生能力在相互错位中谋求真正的发展，远离现实中为竞争而竞争的状态。

（二）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难点之二——京津合作的缺位

当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仅限于京冀合作、津冀合作，京津合作进展较为缓慢。作为京津冀区域客观存在的两大核心城市，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关系确实较难协调。解放前，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功能定位比较明确：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工商业中心，北京和天津之间基本没有矛盾发生。解放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北京逐渐由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了生产型城市，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变对天津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也正因如此，天津由历史上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渐渐变得平庸而无为了。

和天津相比，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北京又是全国公路、铁路枢纽，有全国最大的航空港；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达，有中国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北京资金雄厚……和北京相比，天津是国际性现代化港口城市；天津的滨海新区有着北京根本无法企及的土地资源；天津是老工业基地，轻工业比较发达……和北京比，天津的优势也很明显。于是乎，城市之间有了门户之见，北京、天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是齐心协力的合作效应，而是谁也不服谁的竞争态势。

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不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事实上北京又在承担着华北地区经济中心的职能。在这一情况下，天津是不是经济中心呢？在城市功能

没有错位的情况下，京津发展长期各自为政，出现了产业项目之争、港口基础设施之争等，京津经济结构趋同化严重（见表1）。长期以来，京津都以石油、化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相似的产业结构以及有限的水、矿产资源导致两城市都无法将这种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特征、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做大、做强。可以说，京津合作的缺位是导致京津冀区域与同样处于沿海开放地带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表1 京津工业总产值排名前5名行业（2001年）

序号	北　京	天　津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
5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2002》、《天津市统计年鉴2002》。

二 未来京津冀合作的主线——区域产业合作及产业集群化

京津冀区域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各地区要素禀赋互补性和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现实。未来，各成员可能都需要切实采取措施，进一步开展经济合作与交流，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协力创造资源整合一体化、经济分工合理化、要素配置层次化、产业培育有序化、利益分配规范化的良好局面。在加快改革推进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理想的京津冀区域建设重在创建“繁荣看京津，实力看河北”的区域联动型产业结构。为此，各地区均需明确自身的产业功能定位，而不能设计一套完全独立的产业体系。

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生产力要素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同一区域内的各城市产业结构必须实现差异化。未来，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关键是各城市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共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各方需要合理确定自己的产业定位和结构调整方向，沿着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实行垂直分工、中心城市之间实行水平分工、中心城市优势企业采用放牌制造和设

备参股等方式向周边地区转移传统产业项目的方向，探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子，在区域内打造相互依存、衔接紧密的产业链条，形成合理分工、互相促进的区域产业新格局。

（一）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对于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京津冀区域整体的产业发展和京、津、冀各自的产业发展。

1. 京津冀产业发展及其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1）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总量及其在全国的地位。2003 年，京津冀城市群 GDP 总值为 10313.4 亿元，占全国的 8.5%；人均 GDP 为 16132 元，是全国的 1.8 倍；地均 GDP 为 611 万元/平方公里，是全国的 4.35 倍（见表 2）。

表 2　京津冀地区基本经济指标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2003 年）

2003 年	GDP(亿元)	人均 GDP(元/人)	地均 GDP(万元/平方公里)
京津冀地区	10313.4	15071	611
占全国比重	8.5%	1.84 倍	4.35 倍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03 年 GDP 和人均 GDP 分别为 1978 年的 10.9 和 8.3 倍（见图 1），GDP 总量、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呈上升趋势，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上升趋势更加显著（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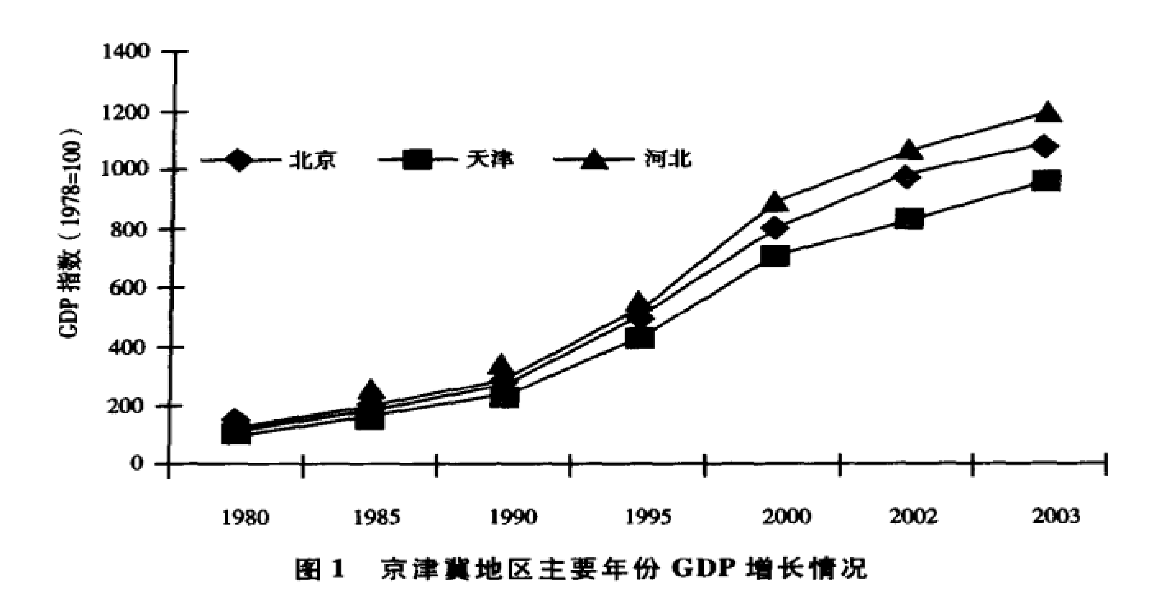


图 1　京津冀地区主要年份 GDP 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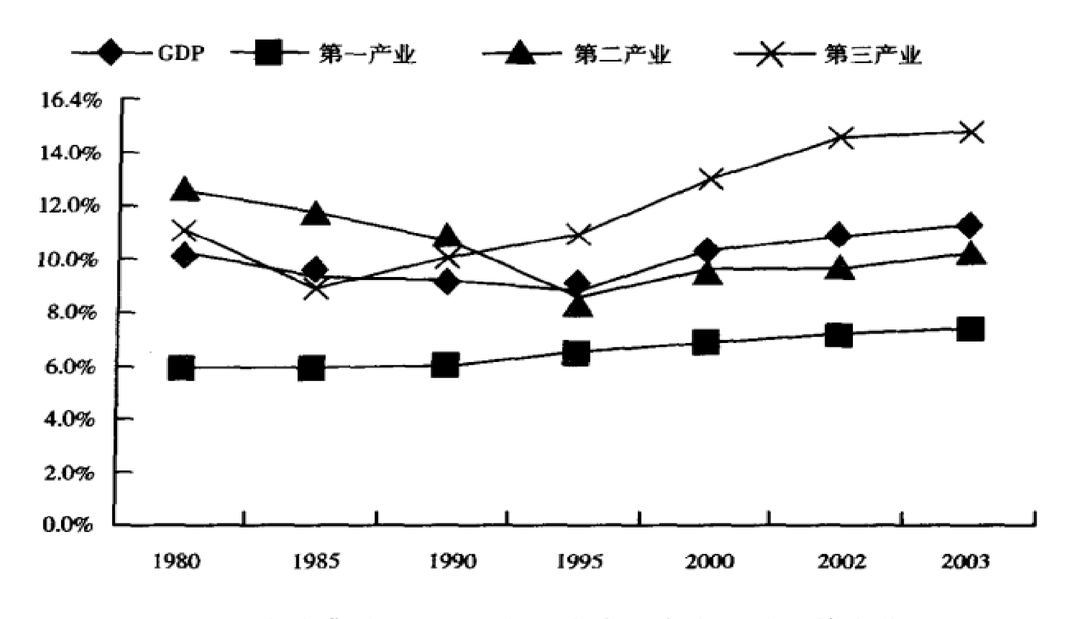


图2　京津冀地区GDP及三次产业在全国地位的变化

（2）京津冀地区按从业人员划分的产业结构。2002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以从业人员计为：38.1∶29.7∶32.2，相比于全国50.9∶26.2∶22.9的产业结构，三产比重较高。从各个城市来看，河北7市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均较低；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天津以第二产业为主，但二、三产业比重非常接近（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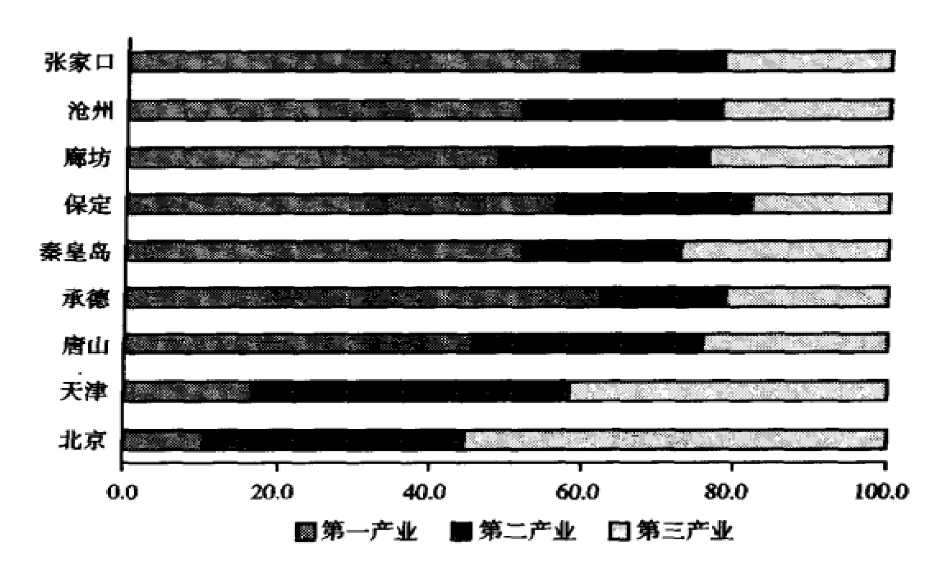


图3　京津冀地区按从业人员划分的产业结构

（3）京津冀地区按增加值划分的产业结构。2002 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以增加值计为：8.8:43.4:47.8，相比于全国 15.4:51.1:33.5 的产业结构，三产比重较高。从各个城市来看，北京、秦皇岛、张家口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第二产业，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其余城市以第二产业为主（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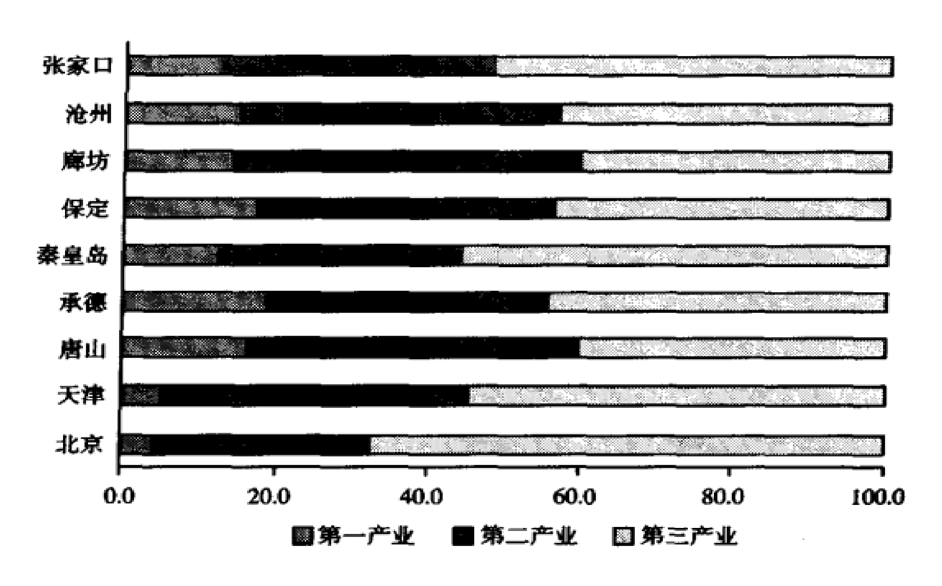


图 4　京津冀地区按增加值划分的产业结构

（4）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明显：第一、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2002 年京津冀地区的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分别比 1980 年时下降了 7.5 和 14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比 1980 年时上升了 21.5 个百分点（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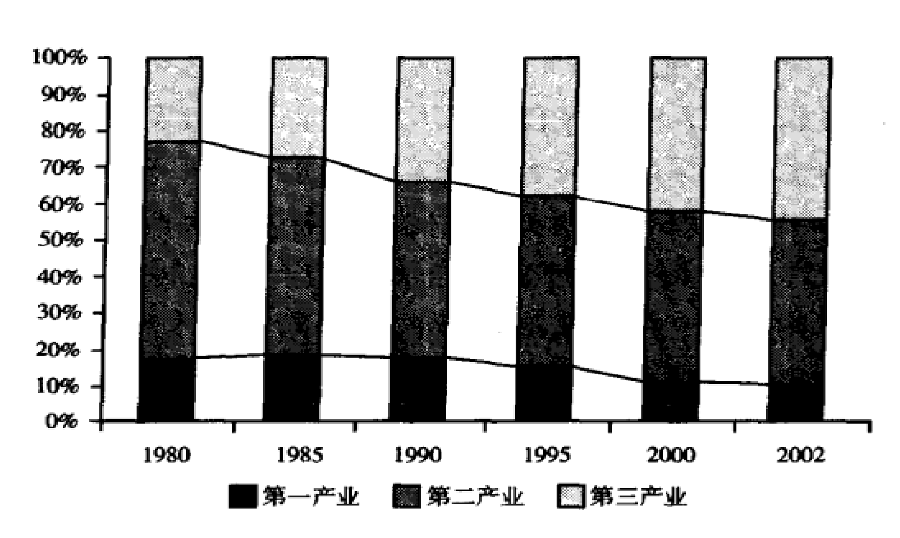


图 5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变动（1980～2002）

2. 北京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分析

北京的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663.1亿元，增长10.7%。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95.64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311.86亿元，增长11.9%。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实现1032.03亿元，增长12.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255.6亿元，增长10.3%（见表3）。2004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10.3亿元，增长15.4%，考虑到去年非典对基数的影响，可比增长13.3%。

表3 2003年与2002年北京市主要指标对比情况

主要指标		2003年	2002年	03年为02年的%（可比价）	构成（%）	
					2003年	2002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663.1	3212.71	110.7	100.0	100.0
第一产业增加值		95.64	98.05	103.3	2.6	3.1
第二产业增加值		1311.86	1116.53	111.9	35.8	34.7
其中	工业增加值	1032.03	874.15	112.2	28.2	27.1
	建筑业增加值	279.83	242.38	110.7	7.6	7.6
第三产业增加值		2255.6	1998.13	110.3	61.6	62.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32061	28449	109.4	—	

北京的产业结构升级明显。到90年代中期（1994年），第三产业已经在总量上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7%），成为北京第一大产业。199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超过50%的地区。目前，北京以大幅度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为目标，突出发挥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动力，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次产业全面升级，形成符合首都功能要求、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强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光机电、生物医药、汽车制造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重点发展金融、商贸物流、文化、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保持商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优势地位，适度发展服装、食品、印刷、包装等都市型工业，限制和转移钢铁等高消耗、重污染的产业（参见表4、图6）。

表 4　2004 年上半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产业分布

		增加值（现价，亿元）	增长（不变价，%）	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		1910.26	15.4	100.00
第一产业		38.40	-3.10	2.01
第二产业		703.74	18.70	36.84
其中	工　业	596.34	21.20	31.22
	建筑业	107.40	5.40	5.62
第三产业		1168.12	14.20	6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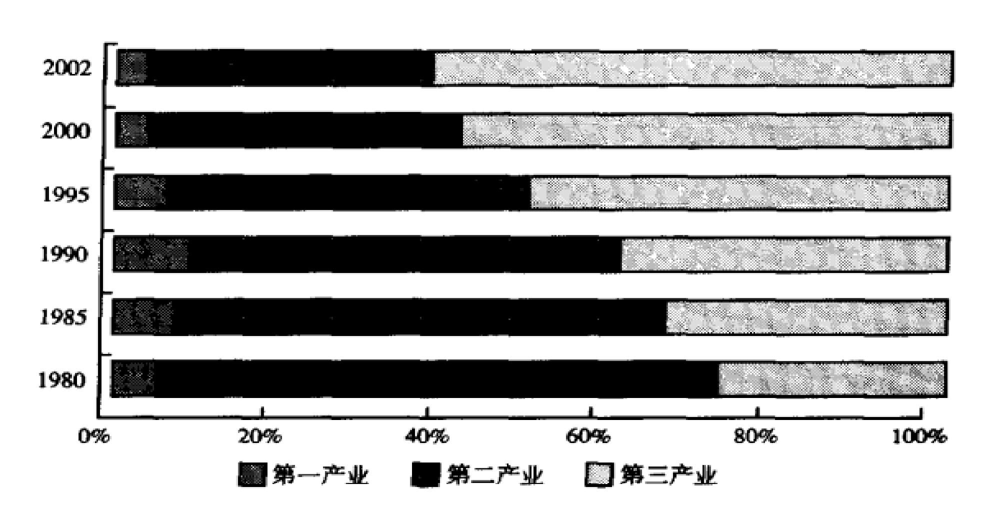


图 6　北京产业结构的变动

3. 天津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经济整体素质明显提升。2002 年天津的第一产业稳定发展，完成增加值 84 亿元，增长 6.1%；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1001.9 亿元，增长 14.3%，比上年增加 1.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965.26 亿元，增长 11.2%。三次产业结构为 4.1∶48.8∶47.1，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参见表 5）。

目前天津已经基本形成以电子信息和现代医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以石油、化工、冶金等装置型重化工业为主的临港产业，以汽车、造船为主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物流、社会服务、金融、房地产为主的先进服务业和以传统商贸服务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其中，电子通信、黑色冶金、化工原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和石油开采加工五大行业成为全市工业的主要支撑力量。2002 年这五大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877.63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的比重达56.5%。其中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成为本市工业的第一大行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829.36亿元，比上年增长35.6%，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25%（参见表6、图7）。

表5 天津地区生产总值产业分布（2002年）

单位：亿元，%

	增加值(现价)	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	2051.16	100.00
第一产业	84	4.1
第二产业	1001.9	48.8
第三产业	965.26	47.1

表6 天津三产各行业增加值一览表（2002年）

单位：亿元，%

项　　目	增加值	增长速度	占GDP比重
金融保险业	73.08	12.4	3.56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96.38	12.7	9.57
交通运输仓储业	181.76	12	11.26
邮电通信业	49.12	11.1	2.39
房地产业	97.66	13.3	4.76
社会服务业	135.59	8.9	6.61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38.08	9.6	1.86
教育文艺广播影视业	85.52	8.5	4.17
科学研究综合服务业	30.37	7.3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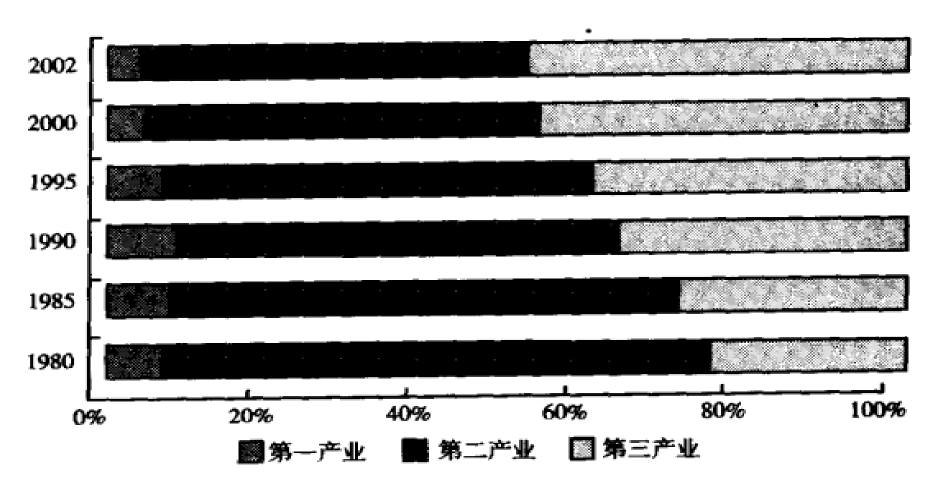


图7 天津产业结构的变动

4. 河北及各市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分析

2003年，河北全省生产总值达7098.56亿元，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5位，人均GDP突破万元，达到10513元。

第一产业稳定增长。2003年，第一产业共完成增加值1064.33亿元，分别比1952年和1978年扩大3.4和2.6倍，年均分别增长3%和5.3%。

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推动全省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第二产业占全省经济总量比重基本保持在40%～52%之间，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1979～2003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1.4%，高于全省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52%以上，其中有17年贡献份额超过50%，最高的1986年达到71.8%，2003年为51.8%。

第三产业增势强劲。商业、饮食、物资、外贸、运输、邮电等流通部门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由封闭式内向型向开放式外向型转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第三产业在过去较低的基数上迅速增长，1979～2003年，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2.7%，比全省经济的平均增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速分别高出7.4和1.3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和批零贸易餐饮业年均增长分别为10.4%和12.2%，成为发展较快的行业。第三产业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也逐年提高，2003年达到33.5%，分别比1952年和1978年提高14.6和12.5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经济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一三二”格局和改革开放后的“二一三”格局，演变为当前的“二三一”格局，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1990年至今，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保持上升势头，三次产业结构已从1990年的25.4∶43.2∶31.4调整为2003年的15∶51.5∶33.5，第一产业下降1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8.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2.1个百分点。1978年以来的25年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1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12.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提高1个百分点，全省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参见表7、表8）。

从上面对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发展分析可以看出，三地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逐年上升。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幅度超过第二产业，天津、河北的第二产业增加幅度超过第三产

业，说明在现阶段河北与天津发展二产的潜力更大一些。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较高，但绝对规模仍然偏小，其总量只有上海的75%，未来北京三产的重点在于如何扩大总量。并且，北京三产发展的相对数上升潜力空间还比较大，距离世界城市75%的平均水平尚有差距。

表7 河北省主要经济指标（2003年）

单位：亿元，%

	增加值	增 长	比 重
地区生产总值	7098.56	11.6	100
第一产业	1064.33	6.1	14.99
第二产业	3657.19	14.3	51.52
其中：工业	3212.96	—	45.26
建筑业	444.23	—	6.26
第三产业	2377.04	10	33.49

表8 河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2003年）

单位：亿元，%

行 业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总 计	578.99	174.38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10.14	9.68
电子信息	74.63	28.82
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	188.03	60.81
新材料	122.71	28.33
机电一体化	190.51	55.46
环 保	3.12	0.95

（二）未来京津冀产业合作的基本框架

未来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基本思路是：以启动京—津实质性合作和深化京—津三产分工为契机，以深化京—津—冀制造业分工为核心，以京—津—冀农业分工为基础，以区域制造业集群发展为支撑，突出北京的知识型、天津的加工型以及河北的资源型特色，促进上、中、下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区域产业体系。

北京作为首都，要发展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经济调控和管理以及国际

交往中心，同时作为知识型区域，北京应发展成为全国知识经济，教育、文化产业和信息服务、高技术研发以及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基地。天津属加工型区域，应努力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先进制造业基地，北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同时应成为北方重要的港口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河北属资源型区域，是华北地区重化工业及原材料、能源供应基地，同时也是华北地区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

上述产业分工只能是一个基本的构想，现实中，京津冀各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必须注重多层次的衔接。由于产业发展的动态性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所以城市产业结构的差异化也就呈现出一定的多层次性：可以是产业链条的差异化，也可以是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的差异化，也可以是某一环节中不同工艺的差异。基于产业结构相似性的存在，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间的合作不能过于追求产业链条的差异化，而要力求多层次，可以将分工深化到每一个环节和工艺。未来，北京和天津的汽车发展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二者如何加强分工与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地汽车产业的兴衰。

（三）未来京津冀产业合作的首要环节：京津合作的实质性启动及京津三大产业分工的深化

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现状，我们认为，为启动新一轮的区域合作，首要环节是要实质性启动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之间的合作，其中决定两者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便是要加强相互间的三大产业分工。

1. 加长短板：京津分工的实质性启动

在上海对于长三角，香港、广州对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应的情况下，京津对于本地区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却没有起到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地级市中，贫困县有32个，贫困人口达到1063万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北京和天津对于河北发展的辐射影响极为有限。相距130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各自为政的现代化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自身的发展，更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在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就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廊坊开发区、武清开发区、北辰开发区和天津开发区等。为了争夺客户，各开发区竞相在土地使用、税费、市场准入和环境保

护等方面降低门槛，在竞争中造成资源的流失和优势的相互抵消，开发区成为一个个装着良莠不齐的企业的口袋。为更好地活跃京津冀地区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京津冀自觉地互补协调，这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要加强两大城市——京津的统筹协调，启动京津实质性合作，加长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短板。

启动京津实质性合作的重要前提是要突出天津相对于北京的港口和外向型优势。从连续几年的数据看，天津的对外贸易发展基础强于北京，尽管北京的规模已经超过天津，但其波动性和起伏性太大，并且是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而天津在进出口产品的产品构成和供销渠道等方面则较为稳定（见表8）。并且，天津的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也高于北京，这为天津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个地区的对外经贸水平反映了它与国际经济结合的广度与深度。北京是外国商社和企业总部云集的首都，天津则是历史上传统的贸易口岸和北方大港，二者需要明确自身的优势，各自为战使双方受损颇多。

表8　京津对外贸易情况比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值		出口总值		进口总值		实际利用外资	
	京	津	京	津	京	津	京	津
1996	53.87	82.97	20.86	40.49	33.01	42.48	15.5	29.8
1997	57.75	100.23	24.65	50.18	33.1	50.05	15.9	34.2
1998	305.1	106.16	105.2	54.99	199.9	51.17	20.6	30.6
1999	343.4	126.05	98.9	63.32	244.5	62.73	22.3	27.5
2000	116.5	171.57	46.3	86.29	70.2	85.28	30.1	28.2
2001	134.0	181.86	48.7	95.02	85.3	86.84	40.1	33.0
2002	525.1	228.27	126.4	115.95	399.85	112.32	17.9	38.96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

2. 京津三产分工的深化

北京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金融、房地产、物流业及现代知识服务业为支柱，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体育、旅游、会展、社区服务、信息服务、商业和餐饮业为基础的三产格局。金融保险业在三产中处于第一的位置，未来发展前景看好（见表9）。

表 9　北京三产主要行业增加值一览表（2003 年）

单位：亿元，%

项　　目	增加值	增长速度	占服务业比重	占 GDP 比重
服务业合计	2255.6	10.7	100	61.6
其中：金融保险业	537.3	10.1	23.82	14.7
社会服务业	365.4	8.1	16.20	10.0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279.7	9.2	12.40	7.6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253.8	7.4	11.25	7.0
房地产业	190.6	12.1	8.45	5.2

作为传统的商贸中心，天津的服务业基础较为雄厚。近年来，天津的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02 年，天津交通邮电仓储业增加值完成 230.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成为服务业第一大支柱行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完成 196.38 亿元，增长 12.7%；房地产业增加值完成 97.66 亿元，增长 13.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完成 73.08 亿元，增长 12.4%。四大支柱行业占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达到 62%（见表 10）。

表 10　天津市主要服务行业发展情况（2002 年）

单位：亿元，%

	增加值	增长	占三产比重	占 GDP 比重
第三产业	965.26	11.2	100	47.1
交通邮电仓储业	230.88	11.8	24	11.26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196.38	12.7	20	9.57
房地产业	97.66	13.3	10	4.76
金融保险业	73.08	12.4	8	3.56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北京和天津的三产发展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依据 2002 年数据所计算的区位商数据也显示，京津两市的第三产业主导行业基本相同（见表 11）。

京津两市间在金融保险、仓储等主要面向企业经营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之间的竞争势必会影响到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深化，未来必须要各有侧重。现实中，北京第三产业的总体优势明显，发挥着全国性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天

津在第三产业的服务输出上，总体明显弱于北京，主要为大区服务。但北京以物流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三产行业处于绝对劣势，或处于显著相对劣势地位，如仓储业、批发业。天津则是以人流、知识为基础的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相对北京的劣势十分突出，如出版业、科教文、旅游业等，但一些物流行业相对北京处于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地位。比较而言，北京发挥了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中心的作用，天津则扮演了物流中心的角色。

表 11　京津冀第三产业主导行业

地　区	第三产业主导行业
京津冀地区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影视业。（4个）
北　京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影视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6个）
天　津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影视业。（4个）
河　北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影视业。（2个）

注：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标准为，区位商 > 1 的基本部门，同时满足行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或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工业） > 3% 的行业部门为主导行业（2002年数据）。

未来，京津两市联手发展第三产业应该遵循以下思路，进行分类分工。

绝对分工：只适合其中一市条件发展，另一方需要从对方进行单向服务输入的行业，如北京的医疗服务业和天津的水上运输业。

相对分工：两市都有发展条件，但存在差异的行业。如天津的仓储业和批发业，北京的出版业、计算机应用服务和银行业等。

宜区域化产业：对集聚经济、网络经济要求明显的行业，如旅游业、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业、科学研究行业。

（四）未来京津冀产业合作的核心环节：京—津—冀工业协作的深化

只有发展制造业，才能完成京津冀的工业化进程，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京津冀区域的工业发展意义重大。河北省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省份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势必会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如何疏导并消化这支劳动大军，将是京津冀区域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推进工业化。未来，京津冀要引导和鼓励区域内产业的分工、转移和调整，特别要进一步深化京—津—

冀之间的产业协作。要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通过政策鼓励和引导要素流动，促进区域内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业集群和品牌产品。

1. 京津冀各自的工业行业选择

京、津、冀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建立起了自身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拥有了一定产能的工业主导行业（见表12）。

表12　京津冀工业主导行业比较

地　区	工业主导行业
京津冀地区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医药制造业。（6个）
北　京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7个）
天　津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医药制造业。（6个）
河　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3个）

注：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标准为，区位商>1的基本部门，同时满足行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或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工业）>3%的行业部门为主导行业（2002年数据）。

从表12不难看出，京津与河北的工业合作深化方向比较明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垂直型分工趋势明显，京津与河北的工业合作大有前景。用2002年数据进行计算，京冀工业内部相似系数为0.4417，而同期上海与苏州内部相似系数为0.8309，上海与浙江内部相似系数为0.702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京冀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比较小，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未来，河北要加快后发节奏，打造都市腹地型实力经济体。河北要接受生产力的梯度转移，夯实传统制造业基础，发展煤化工、油化工等，建设大型钢铁、建材、化工等综合性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发展一部分不适合于大城市地区的新兴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家具制造、食品饮料制造等，以制造业的多元化发展做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结构。

从表12同样不难看出，京津的工业主导行业较为雷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同为两地的主导产业。并且，近两年北京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北京工业的主导行业之一（表12由于

2002年数据的限制而未能反映）。考虑到这一点，两地的工业结构相似性就更大。未来，京津进行工业领域协调的基本方向是，北京要突出自身的科技和研发优势，天津则要突出自身的港口运输便捷和海洋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

2. 工业化：北京不得已的选择

为早日成长为世界级城市，北京正在大力发展制造业。解放以前，北京是一个消费型城市。但是，解放后北京大力发展工业，一度成为在中国特大型城市里仅次于沈阳的重工业城市。尽管一直没有获得经济中心的定位，但经济建设在北京市却一直处于重要位置。作为首都，北京有着天然的资源集聚优势，一系列新的企业落户北京，特别是现代汽车、奔驰汽车等，成为北京发展制造业的标志。近年来北京现代制造业迅速崛起，已经成长为北京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

2003年，北京工业实现增加值1032.0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8.2%，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8%。2004年上半年，工业实现增加值596.3亿元，增长21.2%，电子信息、汽车、机电、生物医药、都市工业、石化等六大行业呈现较好发展态势，其中，电子信息、汽车、机电、生物医药四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15.9%、9.7%、18.8%和5.2%，四大产业对全市工业的贡献率达到54.7%，支撑作用日益明显（参见表13）。

表13　北京主要工业行业工业总产值一览表（2003年）

单位：亿元，%

项　　目	工业总产值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
全市工业总产值	3810.3	100
其中：电子信息业（不含软件）	929.2	25.0
汽车	434.8	11.7
机电	460.8	12.4
生物工程和新医药	145.6	3.9
都市工业	561.1	15.0
石化	479	12.9

2003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14.1亿元，比上年增长7.1%，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7.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8.7%，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0.9%。2004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69.8亿元，增长19.1%，同比高9.5个百分点，在高新技术产业的7大领域中，除航空航天外，其他行业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参见表14）。

表14　北京高新技术行业增加值一览表（2003年）

单位：亿元，%

项　　目	增加值	增长速度	占高新技术产业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合计	314.1	7.1	100
其中:电子信息业	204.17	2.9	65.0
光机电一体化	36.44	21.3	11.6
新材料	32.98	14.4	10.5
生物医药	29.84	13.2	9.5
航空航天	7.85	4.7	2.5
新能源	1.88	49.7	0.6
环境保护	0.94	8.6	0.3

未来，北京仍会占据技术型产业高地，实现技术型制造业的大发展。北京可利用其科教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成为占地少、能耗低、节水型、无污染的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现代制造业重要基地。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指基于北京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密集环节，如电子信息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等。技术密集型现代制造业是指基于北京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以及商务成本较高特点而发展的现代制造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环节，如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制造环节等。

3. 京津冀工业振兴的不二选择——工业集群化道路

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在有限增长的市场需求中争取更大的份额，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产品的不断创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分工的细密及协作范围的广阔，即产业素质的提高和生产体系的完善。随着区域竞争的加深，为降低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大量相关企业以主导产业链为基础，在特定的地理范围集中，形成有机的产业群落。这种产业集群以其地理集中、专业灵活、创新环境、合作竞争的优势，提升了整

个区域的竞争能力。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正在成为区域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源泉。

区域的产业竞争力最终要看能否形成产业集群。日本丰田轿车零储存的实现依靠的是它200公里范围内的4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每家配套企业在多少时间内将零部件运到哪个地点都有严格规定。目前京津冀的主要工业项目都要到外地去寻找配套，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竞争力实难提高。虽然京津冀区域具备了形成产业集群的要素优势，但一体化经济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内经济竞争的动机强烈，区域壁垒导致产业难以实现优势互补，没有形成在国内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关联程度高的产业链，阻碍了生产要素跨地区优化组合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着眼未来，区域内各省市应放弃单体竞争的思想，立足区域整体竞争，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1）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京津地区是华北经济区电子信息产业比较发达和集中的区域，电子信息产业在区域高新技术产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带动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2002年，北京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达到61%，计算机与通讯技术产品占全市出口总值的八成以上，其中移动电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1/4。北京还是国内最大的软件研发基地，软件产品出口位居全国第一。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全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科研、贸易、生产基地。天津是全国最具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上每10部手机中就有4部是天津生产的，90%的摩托罗拉手机出自天津的工厂，录像机占全国的近60%，显示器、电子元件、传真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天津还是韩国三星集团在中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和液晶显示器的生产基地。未来，北京要充分发挥其研发能力强的优势，确立研发中心的地位，着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同时成为电子信息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天津则应利用制造业基础好的优势，发展成为电子信息产品的制造基地，形成与北京配套良好的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协作配套关系向河北等周边地区延伸和扩展，奠定中国北方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的地位。

（2）汽车产业集群。京津冀地区是汽车工业比较密集的区域，初步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北京汽车工业正在构建一个基地（北京汽车生产基地）、三个板块（即轿车、越野车、商用车三大板块）。北京与现代、奔驰公司的合作进展顺利，汽车工业已经成为北京工业发展的龙头老大。天津是全国最大

的微型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其经济型轿车系列产品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汽车年生产能力为 23 万辆，发动机 27 万台。2001 年，主导产品“夏利”牌轿车的市场占有率为 9%，居全国第 4 位。2002 年，天津汽车集团与一汽集团重组成功，在产业配套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正在与日本丰田公司商谈合作生产新型轿车，将形成多品种、宽系列的产品格局，同时计划建设轿车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到 2005 年将形成年产汽车 40 万辆，其中轿车 30 万辆的生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型轿车生产基地。河北的汽车零部件和特种车生产也有一定的基础。在汽车制造业从过度分散走向高度集中的大趋势下，未来京津冀应谋求和加强彼此的分工与合作：北京着重轿车、越野车的整车制造，天津在发展经济型轿车的同时注重轿车零部件的发展，河北则应围绕京津的汽车整车制造发展零部件制造业和专用汽车制造。

（3）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是火车头产业。北京的机械装备制造业基础较好，其中印刷机械、工程机械和数控机床等具有相对优势，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目前，装备制造业正处于融入信息技术和高技术的巨大变革之中，北京实施了机床数控化和包装印刷装备升级改造工程，建立了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力争成为全国最大的数控机床研发和销售基地，同时保持北京数字化印刷机的产业优势。天津的机械装备产品门类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今后应重点发展环保机械、都市机械、汽车及家电、能源和农机等四大成套设备。目前，我国的装备制造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京津应利用已有的产业基础，在优势领域着力开展自主开发和创新方面的合作，成为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基地，并且将河北作为产业配套和协作基地，延伸产业链条，力争在全国装备制造业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4）冶金产业集群。北京、天津和河北均有着不错的冶金产业基础。首钢在北京地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为 600 万吨，钢材覆盖板、管、型、带、线、丝等类型，是国内最大的线材生产基地。天津有钢管公司、冶金公司和天冶集团。2001 年，天津钢材总量居全国第一，其中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二位，石油套管产量占全国的 60%，金属制品产量居全国第三位。目前，天津正在对冶金工业进行改造提升，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北京的首钢正在经受限产的压力，2012 年，其炼钢能力将全部搬迁到唐山。在河北，则分布着铁矿基地迁安以及唐钢、邯钢、天铁、邢钢、宣钢等中小型钢铁企业。今后，京津冀区域的冶金产业应考虑向唐山集聚，把唐

山打造成为钢铁生产基地，为京津两市和其他城市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提供原材料。形成产业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格局。

（5）石油化工产业集群。石油化学工业在北京和天津同构发展，成为各自的传统支柱产业。北京有燕山石化，原油加工能力为 950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为 45 万吨/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乙烯生产企业之一、最大的塑料与树脂生产商、最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商、最大的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生产商、最大的润滑脂生产商、最大的化纤地毯生产商。天津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全国最大的化工基地之一，目前正在建设世界级的大炼油、大乙烯项目，同时海洋化工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河北沧州的化工产业有一定基础，不仅靠近港口，毗邻天津滨海新区，而且有大片荒地可以利用。从区域整体角度出发，北京不应再扩大目前的石油化工产业发展，而应逐步向天津和沧州方向转移。

三　京津冀合作中主导性的市场力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协调。京津冀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低下是导致区域合作困难的主要原因。要形成顺畅的区域经济合作渠道，京津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要促进发达市场的生成。

要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经济利益为纽带，鼓励由行业协会牵头，建立灵活务实的经贸合作机制。要鼓励社会投资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区域合作中来。要通过市场作用，打破行政区划带来的体制性障碍，使人财物等要素能更加自由、更加快速、更加有效地流动。

1. 京津冀市场分割的现实及其地方性企业和行为

地方保护主义在京津冀地区仍较为盛行。为支持本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北京和天津对于本市出租车型的选择存在严格限制。这一现象不仅存在汽车行业，在电子信息等领域也分布甚广。如此形势下，北京和天津的大多数企业只能囿于本行政区的市场范围而动，规模再大也只能称其为地方性企业。既是地方性企业，其一系列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在当地进行：销售行为的地方化；劳动力使用的地方化；原材料采购的地方化；资金融通的地方化等等，严重束缚了企业的市场空间，制约了企业产品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高。

2. 京津冀合作中的市场一体化和资源配置的区域化

未来，京津冀区域需要统一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由此保障企业资源配置机制的区域化。第一步需要统一商品和服务市场。加入WTO的过渡期马上就要结束，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对内封锁，不经历市场风雨考验的产业永远不会有竞争力。在统一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应统一产权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科学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京津冀区域的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够，国有经济比重还比较大。未来，要加强人才等要素流动，促进产业合作，譬如京津两地在汽车产业技术方面可以联合攻关。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成功的资本运作。只有通过资本纽带的作用才能带动资源的整合和有效运转。为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未来，我们需要从金融一体化着手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产业一体化进程。京津冀地区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分割制约着产业资本的正常运转。从推进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角度，需要研究如何发挥资本在产业一体化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以促进该地区联动发展。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北京要考虑与天津联手建立“中国北方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北京金融中心的优势，以促进整个京津冀地区产业一体化的深化。

四　京津冀合作的机制设计

1. 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任务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京津冀地区集体、纪律、组织观念强。政治文明的相对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商贾文化的发育，导致市场缺乏竞争压力，影响本地区企业的创新动力和产业升级能力。京津冀地区亟待商文化和平等文化的创新。为此，对于京津冀区域政府而言，长期的任务是要培育精细商贾和需求文化，弘扬独立企业家价值，营造区域产业和创业氛围。

培育创业意识和文化。加强对居民特别是下岗和待岗人员进行创业教育和培训。鼓励各种媒体对创业者、创业现象和创业精神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开展对创业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大讨论。尊重包括个体户在内的各种创业者，培育对创业失败的宽容文化。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是促进北京经济和产业发展最稀缺的资源和最重要的力量。尽量减少“官本位”制度和意识对企业家的不利影响，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让企业家在社会生活

中有更多更大的发言权。根据企业家所付出脑力劳动、心理劳动（承担风险和责任）和体力劳动的多少，使他们得到应得的回报。

2. 一体化规划的制定

城市规划学家 L. 芒福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不同的城市等级、不同的行政主体以及不同的功能区域，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合体。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各等级城市制定一体化的、地区统筹发展的区域规划。要考虑城市性质、功能、目标、规模、布局等方面问题，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整体规划研究，提出整体的功能定位。要在统筹全局的原则下，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功能定位和产业重点，在规划中注意留出各城市发展的结合点和建设接口。要对区域内的城镇规模和数量、产业布局、路网建设、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等进行统一地科学地规划，并使该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成为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和经济社会规划的依据。对规划的修改要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对违反规划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惩罚。在此基础上，各地区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

3. 网络化基础设施的完善

要在京津冀区域内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共建、共享。区域经济合作首先要整合硬件，基础设施一体化是搞好区域合作的基础性条件。京津冀当前要加速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与协调，构筑一体化的交通体系，打破行政区划的阻隔，促进跨区域运输发展，提升区域交通网络的便捷程度。加强区域中航空港、海港的有机联系，尤其是天津港、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等渤海湾港口群之间的联系，促进分工与协作，提高经济效益。

4. 流动化人才库的建立和原创性技术的孵化与推广

促进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建立统一的人才库，统一人才市场、构筑人才信息平台。各地区人事部门应该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互认、异地人才服务、促进人才流动、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务员互派等制度层面展开合作。

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政府的力量，政府要带头重视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研发。未来，京津冀要在原创性技术的孵化与技术应用的推广方面联手，以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厚的科技资源优势，提升本地区的产

业技术能级。

5. 可持续性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整治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并保护好生态环境，尤其是保护、开发及合理利用好水资源。通过编制规划，对京津冀区域按照生态功能进行分区，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态保护政策，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共同制订京津冀区域《生态功能保护区条例》，规定对生态功能保护区尤其是水源保护区实行利益补偿机制。对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或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其受益地区应给予补偿。通过多种渠道，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和补贴，以及组建区域联合建设与保护基金等实现上下游地区间的利益补偿。所谓生态补偿，不是救济和施舍，而是生态受益地区的义务，这一点应予明确。对于跨行政区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防风固沙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建立省市级乃至国家级的生态保护区，制订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重点进行保护，并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与保护的监督。

（执笔：李娟　修改：肖金成）

参考文献

李国平等：《首都圈结构、分工与营建战略》，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
吴良镛等：《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胡序威等：《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肖金成等：《打造中心城市》，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李岚主编《河北经济宏观思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现状分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魏书华　凌　宁

京津冀地区同属一个经济圈，地缘、人缘、业缘具有天然联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迅猛发展，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目前，已经在产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一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的演化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京津冀地区的环渤海区域合作，拉开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帷幕。20多年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合作经历了一个：启动—发展—低谷—再发展的曲折演进过程，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为了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华北地区率先打破地区分割，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区域协作组织——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开展区域经济联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体制向市场取向转变，经济发展加速，区域合作向纵深拓展。1988年，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6地市组建了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了市长、专员联席会制度，设立了日常工作机构并建立了信息网络、科技网络、供销社联合会等行业协会组织。相继创办了农副产

品交易市场和工业品批发市场，通过投资入股、联合生产、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发展跨省市的企业联合与协作，涌现了一批北京与河北跨区域的联营企业及合作项目，北京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或在周边地区寻求加工配套。据统计，到1992年底，环京协作区共兴办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306家，技术协作联合体421个，融通资金5.1亿元，建立各种企业集团14个，各种人才交流1915人次，新增产值37亿元，利税1.5亿元。

与此同时，包括京津冀在内的环渤海更广大区域的合作也开始启动。1986年5月，由天津市发起，河北、辽宁、山东，山西等省共有15个地市参加了环渤海地区联合市长（专员）联席会，至2002年共召开了十次会议。联席会设有常设机构：环渤海地区联合市长（专员）联席会联络处（后改为联合办事处）。组建了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联合协作公司，进行了环保、人才交流、信息等网络建设，开展了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合作，对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

这一阶段的区域合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区域合作以政府为主导，实际上是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企业只是项目的执行者；第二，以地区间物资调剂为主，合作领域有限；第三，产业间的实质性合作很少。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股份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份额降低，同时，随着政府体制向着“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合作，与上述形势显然不能相适应。区域合作面临一个大的转折。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是合作的动力。但是由于面临体制、机制方方面面的不协调，区域合作曾一度陷入低谷。这一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合作逐渐淡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但地区间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流，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合作依然存在。

第三阶段：本世纪以来

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

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先发地区，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合作问题再一次受到政府、企业以及理论界等各个层面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京津冀地区在农业、工业、旅游、交通等产业方面，在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方面，在水、煤、电等资源方面，在防灾减灾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都在悄然进行并不断深化。当前，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打破行政界限，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区域合作，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京津冀三方对区域合作的认识不断提高，进行区域合作的愿望日益增强。进入2004年，区域合作步伐明显加快。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的负责同志，就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达成十点共识，决定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这一行动预示着京津冀区域合作进入新的阶段。此后，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环渤海七省市区领导同志参加的"环渤海经济圈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并达成三点共识：一是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二是召开五省二市副省级会议，正式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三是鉴于河北廊坊的区位优势，将合作机构的日常工作班子设在廊坊。6月26日，在廊坊市召开了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会议，重点围绕建立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磋商，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10月18日在廊坊第八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期间，同时召开第二届中国区域经济高层论坛。同时，京津冀三地高层领导频繁接触，以及日前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先后到天津、河北两地访问等一系列举措，预示着京津冀区域合作进程将加速进入更具实质意义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区域合作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区域合作开始由政府主导向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转化；第二，虽然区域合作领域较上一阶段有所扩大，但多为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产业合作仍然较少，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第三，经济生态链的协作方式开始出现，向以产业为支撑具有实质性合作的趋势转变。

二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现状

（一）产业发展方面

1. 第一产业

北京市与津冀地区在第一产业的合作由来已久，相互依存程度随着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比重在经济总量中逐步降低而不断提高。京津冀经济圈在第一产业的合作，以河北省为京津提供农副产品为主要形式。河北省已成为京津农副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蔬菜、生猪、活牛、活羊、果品在京津的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40%、50%、40%、25%和40%以上（见表1）。

表1 河北省蔬菜在京津市场的份额状况

单位：%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北 京	40	45	50
天 津	31	36	40

资料来源：河北省社科院根据对河北省农业厅、省发展改革委环京津专业市场座谈统计整理。

2003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根据《北京市肉菜放心工程实施方案》总体部署认定的第一批“场地挂钩”蔬菜生产基地共379个，分布在10个省市自治区，总面积892.7万亩。其中河北省72个，面积345.8万亩，占38.7%，年供应量约1118万吨；天津市11个，面积20.6万亩，占2.3%，年供应量约38万吨。同时认定的分别处于8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批44个“场厂挂钩”生猪屠宰生产基地中，天津6家，设计年屠宰量670万头，约占总设计年屠宰量的14.8%；河北8家，设计年屠宰量约830万头，约占总设计年屠宰量的18.3%。

以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华都和正大等）带动农户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合作，在京津冀经济圈已经显现。北京、天津的一些食品、饮料等企业，在河北省建立原材料生产基地。据统计，围绕北京、天津已兴建高产奶牛示范园区700个，发展规模奶牛户1100个，奶牛存栏28万头。兴建起了以三元集团、三鹿集团、天津中芬乳业和海河乳业公司等为龙头的一批奶制品基

地。围绕北京、天津地区的奶业圈初步形成。

以科技为纽带的联合成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如承德的露露集团与清华大学设立全国第一家饮料行业博士后流动站，为企业提升产品档次和新产品开发服务；唐山丰润依托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建立了中国唐山奶业科技园；2003年2月，中国农科院与河北廊坊市联手，利用农科院40多个研究所及相关科研院校在技术、人才、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科技优势和廊坊市良好的区位优势，在万庄镇创建国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总规划面积两万亩，预计总投资50.8亿元。

2. 第二产业

（1）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新经济产业带初现雏形。在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1984年以来已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科技园区和工业开发区，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一区五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空港工业区以及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条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产业带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形成了电子信息、通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绿色能源等六大高科技型支柱行业（见表2）。

表2　京津塘沿线产业带各类开发区情况表

序号	开发区名称	主导产业
1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及环保产业、生命科学及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
2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环保及新材料、新能源
3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
4	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科技园	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激光、光电子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5	北京顺义天竺出口加工区和空港工业区	电子信息、仓储物流、生物医药
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	电子及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
7	北京顺义林河工业开发区	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工程和医药
8	北京通州工业开发区	都市工业、机电产业、基础产业
9	北京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通州）	光机电产业
10	北京大兴采育镇工业园	环保建材、生物医药、都市型工业
11	河北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	信息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绿色食品、旅游休闲
12	河北香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型建材、服装加工、旅游业

续表 2

序号	开发区名称	主导产业
13	北京通州漷县新材料基地	新材料、生物医药、纺织机械
14	北京通州永乐经济开发区	电子、机械、物流
15	河北廊坊万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16	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机械电子、汽车零部件、食品、新型建材、轻工纺织、生物制药
17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武清)	电子工业、机械制造
18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宜兴埠工业园	机电制造、生物制药、汽车配件、食品饮料、新型建材、橡胶制品
19	天津西青开发区	电子、轻工、机械、精细化工、生物医药
2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子通讯、食品饮料、机械制造(汽车)、生物医药

(2) 跨行政区的产业梯度转移正在进行中。在北京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一些传统重工业，如钢铁业和传统制造业，已在进行梯度转移。“十五”期间，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北京焦化厂、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等一些大型企业，或整体或将部分生产环节迁移到河北省周边地区，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带动作用。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迁安，投产后将为迁安市每年增加税收7个多亿，从财政收入上来讲，等于再造了一个迁安。由于企业的乘数效应，必将对当地相关部门的发展以及就业产生积极影响（见表3）。

表 3 北京市企业迁移情况

企业名称	迁入地	迁出时间
北京第一机床厂铸造车间	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	
北京内燃机总厂铸造车间	河北省沧州市泊头	
北京白菊公司洗衣机生产基地	河北省霸州市	
北京量具刃具厂(部分工序)	河北省霸州市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	河北省唐山市迁安	2003 年 4 月
北京新型建材集团粒状棉生产线	河北省张家口市	2001 年 8 月
北京焦化厂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王滩京唐港	

按照计划，首钢将陆续把钢铁生产设备逐步迁至唐山，使唐山逐步发展为千万吨级钢铁基地，将集团总部和技术开发中心设在北京，利用北京的人

才优势和区位优势实行产学研结合。集团统一规划，统一销售，集中分散的资金推进技术进步和调整产品结构，按照最佳效益原则分配资源，实行专业化生产，体现产业集中度。

（3）跨行政区的产业链开始浮现。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产业价值链发生着重大变化，形成生产环节中的分工和产业交叉融合的新型分工模式。既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也有企业内部产业链上不同节点的垂直分工。企业之间的水平分工，是指产业价值链中成品加工环节的上下游产品的加工配套，通过产业配套从而形成产业集群；企业内部的垂直分工，是指企业内部产业链上从产品开发、品牌营销、成品加工、一直到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等。现代企业一般都采用“两头在外，中间在内”企业运作模式，即将研发、营销等产业链上的高能级生产要素放在高梯度地区，而将成品加工等低能级生产要素放在低梯度地区。目前，京津冀经济圈产业链分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产业配套方面。首先，围绕京津各自的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而发展的零部件供应、配套生产企业，并不仅仅只为各自的整车、整机和总装厂服务，也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展开一定的区域合作，为所在行政区内整机、整车或总装厂供应、配套的同时又为相邻行政区内同行业整机、整车或总装厂提供零部件。例如，入住北京顺义的德国奔驰指定生产配套供应商——北京海拉车灯有限公司，不仅为地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奔驰公司供应车灯，同时也面向其他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其次，京津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现代汽车整车厂刚刚入住北京顺义，21家供应、配套厂家紧接着跟随而至落户顺义，另有13家迁到附近的平谷，也有部分配套厂商落户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地区。随着德国奔驰入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奔驰配套的德资企业维倚特公司也落户河北省廊坊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香河港龙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底盘中，有近1/3是为北汽福田生产的五十菱商务和五十菱皮卡两种车型提供配套。

产业链衔接方面。京津冀地区已出现了优势企业联合、实现优势互补的现象。例如，我国印刷机制造龙头企业北人集团公司与河北省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联手主办的三河京东印刷装订机械城在2004年开业。三河市是我国的印刷装订之乡，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与三河印刷装订企业保持固定业务的就有300多家。三河市每年用于购买印刷装订设备的费用达几亿元。以制造中高档印刷机为主的北人集团则可以依托这一项目抢占市场。

在产业链空间布局方面，京津冀地区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总部在北京，生产基地在天津、河北的趋势。例如，2003 年 12 月，北汽福田企业及其旗下的福田环保动力有限公司与河北宣工集团，联合上柴股份等 50 家战略投资者共同发起设立的福田重工集团，将总部设在北京，生产基地分别设在北京昌平、河北和山东。构筑了跨区域的市场价值链。

在企业内部产业链延伸方面，京津冀地区存在着产业链双向延伸现象。既有北京企业将生产环节迁移津冀地区，也有津冀企业将研发、营销以及企业总部等环节落户在北京。例如，总部设在北京的国内最大、世界第三大永磁体制造企业——中科三环集团，其下属 6 家控股公司中地处北京的有 2 家，在天津的有 1 家。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白菊集团等都是采取将生产基地迁移周边地区的运作模式。投资 13 亿元的北新建材集团工业园、投资 5.6 亿元的北京运兴蓝晶浮法玻璃等项目也落户在河北省。投资 1 亿元的清华大学清华运达信息研发基地、总投资 20 亿元的中国农大涿州科技园区等项目设立在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而入户天津的“摩托罗拉”公司把北亚地区总部设在北京，河北海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制药集团公司等企业相继把研发机构设立在北京。河北的民营企业如恒利药业、建龙钢铁集团等也把总部或研发中心迁到了北京（见表 4）。

表 4　津冀大型企业在京设立研发机构情况

研发机构名称	母公司名称	设立时间	设立地点
海湾集团电子技术事业部	河北海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海淀区
北京金利普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北方电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海淀区
北京海波尔生物医药研究所	河北万岁制药集团		
基因工程与资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石家庄制药集团公司		海淀区
中药制药与新药开发关键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石家庄科迪药业有限公司	2002	海淀区
乐凯一化大联合实验室	中国乐凯胶片集团有限公司		朝阳区

资料来源：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研究·决策参考》（2002 年合订本）。

3. 第三产业

（1）旅游业。京津冀三地一直互为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据统计，河北省旅游业国内游客的 30% 来自京津。为了适应短途游客迅速上升的趋势，近年来，作为近邻的京津冀三省市旅游界，自发组织起来，针对春节等旅游黄

金周推出了一系列旅游新套餐。

北京的一些企业看中京津冀地区旅游资源和潜在的旅游市场，在津冀投资建设旅游项目。如北京地亚集团在京唐港投资2亿元建设旅游项目，北京瑞成工业集团投资3000万元建旅游乐园项目等。

在2004年召开的“三大经济圈旅游论坛”上，酝酿已久的京津冀“无障碍旅游共识”初步达成。“共识”的内容包括：在区域、政府、企业间建立无障碍旅游合作机制，力求资源共享；为发挥各自优势，不断加强合作，建立旅游磋商机制，就大家共同关注的旅游发展问题进行磋商；逐步打破旅游市场中的种种壁垒等。京津冀间的旅游合作已在悄然进行中。

（2）公共交通。为了便于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往来，北京隶属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9字头公交线路（原长途汽车公司）已经陆续延伸到河北省的涿州、廊坊、固安、三河等市县（其中，917路支线自天桥到涿州；930路主线到三河，支线到燕郊；938路主线自北京站到香河，支线分别到廊坊和安平；943路自永定门东站到固安）。

由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河北张家口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保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发起的北京长途客运法人联合体已经成立。该联合体目前有14家成员，全部为道路客运二级以上资质企业。联合体现有车辆13154部，经营进出京路线400条，2003年的年客运量达到1100万人次。今后，联合体还将陆续吸收天津、山东的长途客运公司加盟。目前，从北京出发的省际公路客运线路共有1028条，其中一半是来往于北京与河北省各县市之间的。

（3）商业贸易。商贸合作主要是以商业贸易企业通过连锁经营的形式，跨地区设立连锁店。如王府井百货进军石家庄；总部设在北京的国内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已经跨地区把直销店开设到包括天津、廊坊和石家庄在内的25个城市。其中在天津，就开有11家零售店。容城与北京建工集团合作的商贸城项目，合同引资1.5亿；唐山与天津克瑞思集团合作投资1亿元，建立三个连锁店等。

（4）房地产业。京津冀地区在房地产领域也多有合作。如北京阳光100集团进军天津，北京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天津有关部门达成了投资海河开发建设项目的意向。天津泰达集团进京后，将经营视线投向了高端房地产开发市场，在顺义启动了一级土地开发和二级旅游房地产开发，在“北京市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内建立泰达温泉

度假村项目，总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集酒店、别墅、会馆于一体，实现了集团对外扩张的战略创举，等等。

（5）其他行业如物流、通讯等新兴服务业也有良好的合作趋势和较大的合作潜力。如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在京唐港投资2亿元建设物流中心；自2004年10月1日起，中国移动正式启动京津冀“跨区服务”联盟，允许全球通用户在异地办理各种相关移动通信业务，异地查询、异地停机/开机、异地交费等。

（二）基础设施方面

基础设施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京津冀地区在机场、港口、跨行政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进行。2000年1月，首都机场和天津滨海机场率先实现了跨区域的联合；1990年，由北京市投资1.2亿元与河北共同开发建设了京唐港；2002年10月，北京与天津港口岸开始直通，两市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过去十年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中北京货源占12.4%，集装箱吞吐量中北京货源占23.7%。

（三）生产要素方面

（1）在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到2003年底，北京常住流动人口近400万，其中，来自河北的占19%，居全国各省市之首。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企业管理层的白领，80%来自北京。北京人在香河技术开发区创业的人数已经接近400人。

从河北省统计的情况看，2003年共引进人才38591人，来源于京津的18365人，占47.6%；其中来源于北京的占29.9%；来源于天津的占17.7%。京津冀地区人员联系十分紧密（见表5）。

表5 2003年河北省引进人才情况

单位：人，%

人员构成	全国		北京		天津		京津合计		其他地区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总数	比重
高级	8814	100	2715	30.8	1391	15.8	4106	46.6	4708	53.4
中级	17480	100	4949	28.3	3090	17.7	8039	46.0	9441	54.0
初级	12297	100	3869	31.5	2351	19.1	6220	50.6	6077	49.4
合计	38591	100	11533	29.9	6832	17.7	18365	47.6	20226	52.4

资料来源：河北省社科院根据河北省发改委经合办《经济合作成果统计表》（2003.1～12）整理。

（2）在资本流动方面，到北京投资的，来自河北的要多于天津，且多是民间资本。据统计，北京仅通州区引自于河北的项目就达16项，引资额19100万元。而从北京转向河北投资的主要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多数属于以某种工艺或生产环节为主的梯度转移。

据河北省统计，2003年河北省实际引资328.4亿元，其中京津两地占46.9%，北京所占比重为35.3%，天津所占比重为11.6%，其他地区占48.8%。2004年1～5月份，河北省从京津引进资金84.9亿元，占整个引进省外资金总额的49.9%，从东南沿海的山东、广东、浙江、福建、江苏、上海6省市引进资金43.1亿元，占整个引进省外资金数的25.3%。上述分析表明，京津冀经济圈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河北与京津合作项目的引资能力高于其他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关系非常紧密（见表6）。

表6 2003年河北实际引资情况

单位：亿元，%

地　区	本期实际引资					
	经济项目	比　重	技术项目	比　重	合　计	比　重
河北总计	194.5	100	133.9	100	328.4	100
北　京	74.7	38.5	41.3	30.9	116.0	35.3
天　津	20.7	10.6	17.5	13.0	38.2	11.6
上　海	6.3	3.2	7.7	5.8	14.0	4.3
其　他	92.8	47.7	67.4	50.3	160.2	48.8

资料来源：河北省社科院根据河北省发改委经合办《经济合作成果统计表》（2003.1～12）整理。

（3）在技术输出方面，北京正在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商品交易中心和集散地。2003年，北京技术合同流向天津的为4.04亿元，占全部技术合同交易的1.52%；流向河北的有7.02亿元，占全部技术合同交易的2.65%（流向上海的占8.01%，流向广东占4.77%，流向山东的占4.48%，流向江苏的占2.80%，流向浙江的占2.59%）；在技术合同交易构成中，以技术服务为主。相比之下从北京流向天津的技术合同偏少，在津、冀、晋、蒙、辽、鲁六省市中居于末尾；相反，2003年，从天津流向北京的技术合同交易额达3.7亿元，河北流向北京的技术合同交易额为0.8亿元（见表7、8）。

表 7　北京技术合同流向京津冀地区情况

单位：项，亿元，%

地区名称	2002 年			2003 年		
	项　数	成交总金额		项　数	成交总金额	
		总金额	占　比		总金额	占　比
北　京	13028	90. 13	40. 77	15976	120. 00	45. 22
天　津	529	3. 21	1. 45	651	4. 04	1. 52
河　北	1003	6. 25	2. 83	1156	7. 02	2. 65
京津冀合计	14560	99. 59	45. 05	17783	131. 06	49. 39
全　国	27038	221. 07	100. 00	32173	265. 36	100. 00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公报（2003）整理。

表 8　北京技术合同地区流向比较

单位：项，亿元，%

地区名称	2002 年			2003 年		
	项　数	成交总金额		项　数	成交总金额	
		总金额	占　比		总金额	占　比
天津、河北	1532	9. 46	4. 28	1807	11. 06	4. 17
珠三角（广东）	1278	7. 88	3. 56	1451	12. 66	4. 77
长三角（沪、苏、浙）	2496	21. 02	9. 52	3109	35. 56	13. 40
全　国	27038	221. 07	100. 00	32173	265. 36	100. 00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公报（2003）整理。

据统计，河北 1995 年高新技术产业的 52 个项目中，有近一半的项目是通过引进京津等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高新技术发展起来的。如邯郸荣药生物医学有限公司引进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白细胞介素和人体线细胞生长素等基因工程药品、石家庄西三庄引进液晶显示器件等。

（四）其他方面

在京津冀经济圈内，事实上已经形成一定程度区域合作的还有资源整合、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人工影响气象、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

京津冀区域整体上属于资源短缺地区，特别是水资源严重匮乏。资源的整合及合理利用，对于区域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在煤、电、水等资

源方面，得益于区域整体协调，依靠津冀，甚至山西、内蒙古等更大范围的区域支持。

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领域，京津冀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北京企业先后在河北投资了大唐发电厂、国华电厂等一批电力生产和供应实体。而北京对京津冀及至整个环渤海地区在煤、电、油等资源方面的需求十分巨大。据统计，2003年北京市从外省市引进成品油91.1万吨，金额282644.6万元；其中引自天津、河北的分别为19.5万吨，56537万元和26.3万吨，82463.5万元，占总数50%左右。从外省市引进煤炭2420万吨，87.12亿元，其中来自河北200万吨，7.2亿元；山西1150万吨，41.4亿元。北京市成品油对津冀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

北京水资源严重匮乏，其主要水源多半来自于河北省境内。为改善北京水资源紧缺状况，国家从2001年起实施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这一规划在河北省共安排城市污水处理、工业污染治理、工农业节水、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五类项目，总投资39.84亿元。据河北省水利部门介绍，到目前，178个项目的科研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完成，已开工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其中2001年国家下达投资的第一批7个水利项目已基本完工，2002年下达的18个水利项目已完成投资90%以上，2003年下达的32个项目将于2004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到目前为止，项目区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069平方公里，发展节水灌溉面积25.6万亩，有效保护了植被和生态环境，保障了向北京供水能力。虽然面临严重旱情，2004年河北仍将有6.7亿立方米清水流入北京，以满足首都用水。2004年10月山西、河北三座水库向北京集中输水9200万立方米，官厅水库、白和堡水库预计实收水超过5000万立方米，是2004年规模最大的向北京统一调水行动。

在环境保护方面，为了减少沙尘暴对北京的危害和提高北京的环境质量，地处上风上水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的部分县市实施了防沙治沙工程。为了增加降雨和防雹，京津冀联手人工影响气象。

北京还在森林保护方面与河北进行合作。怀柔区、河北省丰宁县、赤城县三区县签订了《喇叭沟门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护林联防公约》，共同保护北京市境内最大的天然林区——喇叭沟门原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为更好地保护方圆25万亩宝贵的天然林区，三区县将按照《公约》规定，采取联防联治措施，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在林区基本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上，三区县林业部门将严格审批制度，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旅游开发等项目审批上，三区县将协调配合，在规划和施工等方面做到统一安排。怀柔区政府还投资184万元，在该地区成立了由30人组成的森林消防第三中队。

在食品安全方面，京津冀联手创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为了让居民吃上“放心菜”，联合达成“华北护菜协议”，签署了“京津冀蔬菜农药残留监测协作网”，用现代科技为“华北菜园子”筑起安全屏障。护菜协议包括：为“华北菜园子”建立计算机检测信息协作网和40个检测站，配备先进的液相、气相色谱检测仪器，达到“分子级”检测水平，将蔬菜所用化肥、农药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建立“农药残留监控体系”，按国家法规标准，对出国菜进行统一检测、统一评价、统一标识，互相认可。与山东、海南等产菜大省联网，强化外来菜源头检测，实行“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互通卡制度”，对有“检测安全卡”的外来菜一律绿灯放行，优质优价。三地力争年内上市的“放心菜”占80%以上，五年内蔬菜全优面市。

三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的缺陷

（一）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缺陷

1. 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二元结构过于突出

京津冀三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上存在全面、巨大的落差。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在经济总量标准方面，目前常用的是世界银行和经济学家钱纳里的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低收入、中下、中上和高收入，其中，中上收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200美元。按通常理解，中上收入视同中等发达水平。

总结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学家钱纳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依据，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以下阶段（见表9）。

2003年，京津冀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31613元、25874元、10508元，三地比较，北京分别是天津、河北的1.2倍、3倍。按目前的汇

率水平换算，京津冀三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3822.6美元、3128.7美元、1270.6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总体上，京津冀目前处于中下收入的发展水平，离中等发达水平的6200美元水平尚有较远的距离，按钱纳里的标准，目前京津两地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级阶段、河北则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河北与京津两地存在一个发展阶段的巨大落差，就京津两地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有明显差异。此外在京津之间，在河北各局部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二元结构也比较明显。

表9　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均GDP指标

单位：美元

指　标	初级产品	工业化			发达经济	
	生产阶段	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	初级阶段	高级阶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30～1200	1200～2400	2400～4800	4800～9000	9000～16600	16600～25000

注：按1998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算。

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在上述经济总量中得到体现，也可以在经济结构上得到体现。

从京津冀产业结构的情况看，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同样遵循上述轨迹。到2003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北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800美元，第一产业比重是2.6%，第三产业比重是61.4%，三个产业呈“三二一”的构成，其与上面指标显示的北京已进入中等发达水平的情况相适应。天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100美元，第一产业比重3.8%，第三产业比重45.5%，第二产业比重50.8%，三个产业呈“二三一”，显示其接近中等发达的水平，而河北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270美元，第一产业比重是14.9%，第三产业比重是33.5%，第二产业比重51.5%，显示其离中等发达的水平有一段距离。

过于悬殊的区域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在区域内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较大的城镇与较小的城镇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造成非常明显的发展“代沟”，阻滞了他们经济的相互沟通、联系、互动和融合。

区域二元结构过于突出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它使区域中落后或边缘的地区没有能力引进、吸收、消化周边发达或中心地区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要素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另一方面，它又使发达或中心地区所出现的产

业集聚、所形成的产业规模、所造就的产业链条因找不到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没有兴趣向这些周边的落后地区推广或扩散。

2. 京津冀区域中经济联系与互动的市场推动力不足

京津冀传统产业和区域国有经济力量占有绝对主导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区域的行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看得很清楚（见表10）。

表10 京津冀工业5大支柱行业

单位：亿元

北京		天津		河北	
国内生产总值	3611.9	国内生产总值	2386.9	国内生产总值	7098.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98.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212.3	第二产业增加值	3657.2
通信设备计算机	198.6	通信设备计算机	171.8	黑色冶金	404.7
交通运输	108.6	油气开采	157.6	石油化工	130.9
黑色冶金	84.7	石油化工	114.8	油气开采	91.4
石油化工	91.3	黑色冶金	96.7	非金属矿采选	96.6
化学原料及制品	65.8	交通运输	73.08	纺织业	73.4

资料来源：2003统计资料。

京津冀的5个支柱行业可以划分为三个板块，以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代表的现代制造业，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代表的资源产业，以黑色冶金冶炼也和纺织业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其中，前一个板块是“现代改革开放”的产物，后两个板块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产物，所以京津两地的产业行业结构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现代制造业构成工业产业的主体。与北京和天津相比，河北的工业结构则基本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产物，其现代制造业非常薄弱。尽管京津冀三地工业行业结构有差别，但是以“传统发展模式”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行业在三地的工业行业结构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工业产值中，京津冀三地国有及控股工业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分别是54.2%、55.8%和47.2%。在工业企业数量中，北京“国企”和“非国企”的数量比重分别是33.9%和42.2%，天津的数量比重分别是30.4%和44.8%，河北的数量比重分别是21.4%和34.1%。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京津冀三地工业中，北京国有经济占有最高的比重，天津次之，河北国有经济比重最低。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中民营

企业的集聚、规模、产业链条的形成与扩展，人才、资金、物资及技术等经济要素的联系与流动上均处于较落后的状态。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以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所以，这一过程又是以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其功能得以最充分发挥为前提的，是在这一前提下，微观企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做出选择的自然结果。因为只有在一种充分市场化的前提下，微观企业才有可能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通过比较成本、互补与竞争、规模经济等途径，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形成一系列诸如企业集聚、区域分工、增长极、梯度转移等经济现象，进而推动区域经济联系步步推进。

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行为不可能是完全受市场导向的约束，其投资、布局、产供销等经济活动还要受到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左右，故其很难完全按照市场导向的约束向推进区域经济联系、互动所要求的产业集聚、规模经营、专业分工的方向发展。

区域中市场推动力不足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按传统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心城市或大型企业往往不过是一座座“大而全”的“孤岛”，很难对周边地区发挥“增长极”，实现“梯度转移”的作用，另一方面薄弱的市场推动力使形成区域经济联系与互动的基本力量——民营制造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使区域经济联系与互动发展的基本过程，如产业集聚、规模经营、产业链条的扩张与延伸等很难顺利推进。而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作用是无法替代这一市场过程的。

3. 明显缺乏“开放”与“包容”的传统

与“长三角”与“珠三角”所处的地缘及政治环境不同，京津冀区域属于北方内陆地区，又长期处于全国政治的核心地带，与这个大环境适应，其民间日常的思想意识、文化习俗，或开展经济活动思维定势力、管理方式都明显缺乏“开放”与“包容”的传统。

（二）京津冀经济圈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缺陷

京津冀经济圈虽然在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离区域一体化还有相当漫长的路程。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自然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体制、机

制尚未建立。尽管三地对当今形势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比较明确，具有区域合作的愿望，并为之进行了努力，特别是2004年以来，三地政府之间磋商不断，多次召开会议，就区域合作的若干问题初步达成一些共识，但尚未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2）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区域整体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北京首都和天津滨海机场已经实现了跨区域的联合，但是，2004年北京又在兴建首都机场第三条跑道和第三候机楼；北京与河北共同开发建设了京唐港，北京与天津港口口岸开始直通，实现了港口功能一体化，但河北唐山又计划在距王滩京唐港区几十公里的曹妃甸另外新建港口，此时京唐港吞吐能力仅利用了2/3，且地处沧州市的黄骅港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在交通建设方面，虽然都注意交通干线与周边地区的接轨，但对于对区域发展有意义，而对本行政区影响不大的线路不够重视。如：兴建京平（平谷）高速公路，进而与天津至蓟县高速公路相连这样地处行政区结合部边缘地带的公用基础设施项目，对于沟通天津与河北承德、发展同属边缘地区的京东平谷与津北蓟县经济，进而推进京津塘区域协调发展来讲，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平谷是北京的末端，修这样的高速路对于北京意义不大，尽管平谷和蓟县在积极奔走呼吁，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也有意列入规划，但一直没有列入近期建设议程。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南起三河北到密云的二级公路三密线，北起北京大兴采育镇南到河北大城留各庄镇、贯穿廊坊、沟通京津塘高速和津保高速的采留线和已列入规划的西六环路（门头沟到周口店）向西南延伸到河北涞水县和易县，并升级为贯串京西旅游景点的高速公路等。

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上，京西百花山、十渡风景区等景点，由于缺乏区域总体开发规划和有效的协调机制，与周边地区矛盾重重，既不利于旅游资源的充分发掘利用，也不利于自然资源保护。京津冀地区围绕水资源的矛盾则更加突出，例如，近年来京冀之间在拒马河水系和京津之间在流经天津蓟县杨庄水库和北京平谷金海湖的泃河水系水资源利用上出现争议。如果在水资源配置上难以协调，将给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带来严重困难。

（3）产业合作十分有限，区域之间没有形成产业分工，缺乏有效的产业价值链。京津塘高速路沿线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只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园区之间上下游产业联系很少，尚未构成产业链。产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只有产业方面具有实质性合作，才能说区域一体化进入实

质性阶段。而产业一体化，说到底是企业在市场力量推动下的自觉行为。目前，京津冀产业合作表现为，一方面，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最优生产价值，在市场配置下形成生产价值链，但由于民营经济的不发达，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产业链十分单薄；另一方面，由于国有经济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政府作用依然存在，在政府政绩指标考核制度驱使下，行政区政府一般是将产业梯度转移尽量安排在本行政区范围内，而不愿向外省市转移，从而影响产业集聚和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4）未能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如：资金异地存贷障碍，通讯跨地区分割，信息不能整合等。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在谈到异地建立生产基地的不利因素时认为，资金不能异地存贷以及缺乏信息平台等，给企业发展造成一定困难，如其生产手写版的一种零配件一直由南方配套，殊不知附近就有生产厂家，由于缺乏信息交流平台，使企业付出了多余生产成本。

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基础与“十一五”合作趋势判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陈孟平

一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产业合作基本条件

产业分工与合作是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性问题。下面我们分别按三大产业进行分析。

1. 第一产业

近年来，京津冀经济圈内，京津两大都市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处于加速阶段，越来越多的农地转用于发展非农产业和城市建设，可利用的农业资源逐年减少。因此，虽然第一产业增加值绝对量在增长，但第一产业对地区 GDP 的贡献率逐年降低，远低于河北。2002 年和 2003 年，京津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方 GDP 的比重分别为 3.0% 和 2.6%，4.1% 和 3.7%，15.6% 和 15.0%。再加之，京津两地在生产普通农产品方面，因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相对较高，与河北、山东等地相比不具有市场竞争力。据北京市农业局的统计，北京农产品生产成本与周边地区相比，粮食高出 0.38 元/千克，生猪高出 2.32 元/千克，鸡蛋高出 1.23 元/千克，牛奶高出 0.36 元/千克。因此，除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农业，如籽种农业以外，京津的第一产业都在向以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主的都市现代型农业转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功能在弱化，都市农业功能更多地体现在以农业为载体的观光、休闲和体验上。特别是北京，在本地农产品市场供应上很大程度要依靠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行政区。尤其在蔬菜、畜禽产品和海鲜产品供应方面，北京对包括津冀在内的其他行政区的依存

度很高。

另一方面，作为首都的北京，由于受到城市功能定位的制约，在环境保护和防范重大动物疾病与人畜共患病方面要比周边其他行政区有更高标准的要求。因此，常规养殖业的发展要受到很大限制，成本要比周边其他行政区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养殖业经历了由近郊区向远郊区的梯度转移，而且大有进一步向周边的河北省转移的趋势。例如，已经拥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北京几家大型畜禽和乳类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像大发和三元，已开始实施"异地发展"战略，着手安排将原料生产基地由本地郊区向周边拓展，发挥辐射作用，把产业链延伸到河北等省区。

总的来讲，和周边的河北等其他行政区相比，北京发展一般传统农产品生产已不具有比较优势；只是在能借助首都科技和人才资源强势来发展的高新现代农业方面还能稍领风骚，例如，能借助组织胚胎学研发强势来发展的种业。因此，北京在利用农业高科技优势来带动河北现代农业发展方面潜力很大，存在许多合作的机会。

2. 第二产业

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加速阶段，第二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第一，区域内不同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第二，存在适时、有序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机制。只有在动态结构优化中，才能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带。

(1) 量化指标[①]

产业高梯度的形成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本地区的该产业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上升阶段，创新推动了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的诞生和产品成本的下降；二是空间的集聚，生产要素通过极化效应在本地区集聚，提高了本地区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使该产业在本地区具有较高的区位商。所以对于产业梯度可以用两个指标进行量化描述：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反映在本地区的某个产业其生产者在生产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既涵盖了劳动者整体素质，也体现了本地区该产业的技术水平。其公式为：

$$\text{该地区某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 \frac{\text{该地区某行业增加值在全国全行业增加值中的比重}}{\text{该地区某行业从业人员在全国同行业总从业人员中的比重}}$$

① 戴宏伟、田学斌、陈永国：《区域产业转移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第126～128页。

公式说明：地区某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就是以全国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准对地区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评价。如果地区该行业劳动生产率大于1，则说明该地此行业存在比较优势，数值越大，表明优势越强。

该地区某行业的区位商反映的是该地区某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其公式为：

$$该地区某行业的区位商 = \frac{该地区某行业的增加值占本地区\ GDP\ 的比重}{全国相应行业增加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

公式说明：地区某行业的区位商，就是以全国该行业的平均专业化水平为基准对地区该行业的集聚与专业化水平的评价。如果地区该行业区位商大于1，则说明该地此行业存在集聚优势，数值越大，表明优势越强。

行业梯度系数是比较劳动生产率和行业区位商的综合，其公式为：

$$\begin{aligned}该地区某行业的行业梯度系数 &= 该地区某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 &\times 该地区相应行业的区位商\end{aligned}$$

行业梯度系数虽然综合了该地区某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但是如此综合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有的行业虽然没能在两个指标上同时表现优势，行业梯度系数难有好的表现，但或在比较劳动生产率，或在区位商上出现明显优势，有时也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向上的信号。为了区别，我们把单项优势特别算作一类。

（2）测算结果

我们以定量为基础，将行业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均大于1的行业。这类行业是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顶端产业，极化效应正在起作用，使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不断向该地区聚集。第二类是其中一个指标大于1的行业。从比较优势上说，该产业正处于产业梯度的中间层，在适当的条件下，既可能向第一梯队升进，也可能已经进入转移期。第三类是两个指标均小于1的行业。位于该层的产业，多数已经失去竞争优势，成为包袱行业，是理应淘汰或转移的产业。

下面分别对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行业进行评价。

北京市行业梯度分析。对北京市行业梯度的测算，请见表1。

表1显示：

——北京市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

表 1　北京市行业梯度分析：三类行业

项　目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　位　商	综　合
第一类行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7	2.01	5.5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58	1.97	3.1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44	1.97	2.83
医药制造业	1.47	1.58	2.32
饮料制造业	1.37	1.16	1.59
食品制造业	1.19	1.30	1.54
第二类行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80	0.83	1.4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2	0.96	1.4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38	0.57	1.35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0.78	1.50	1.1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97	1.10	1.08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66	0.59	0.9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14	0.68	0.7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94	0.38	0.73
造纸及纸制品业	1.54	0.47	0.72
普通机械制造业	1.06	0.62	0.65
烟草加工业	1.83	0.20	0.37
第三类行业			
金属制品业	0.97	0.84	0.8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68	0.70	0.48
食品加工业	0.97	0.37	0.35
纺织业	0.95	0.28	0.2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49	0.13	0.06
化学纤维制造业	-0.19	-0.02	0.00

注：数据来源于《2003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业，即高梯度行业有 6 个：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在京津冀区域中，高梯度行业一共有 13 个，北京占 1/2 弱。

——北京市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单项指标大于 1 的行业有 11 个，约占区域中这类行业的 1/3 强。

——北京市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处于劣势的行业有 6 个，占区域这类行业的 1/4 弱。

——表 1 使用的是 2002 年的统计数据。如果和以 2001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做出的以上三个指标对比的话，可以看到，各行业数值变化较大，有升有降。这说明在北京市三大产业格局基本已定的情况下，第二产业仍处于结构优化过程中。

——虽然“十一五”期间北京的第二产业不是梯度转移的重点产业，但是在表 1 的后两类行业中，很多行业都存在转移的潜力。这一点值得注意。

对天津市行业梯度的测算，请见表 2。

表 2　天津市行业梯度分析：三类行业

项　　目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　位　商	综　　合
第一类行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33	4.74	11.02
普通机械制造业	1.37	1.37	1.8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1	1.59	1.76
第二类行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7.84	0.08	4.40
医药制造业	0.98	1.69	1.66
金属制品业	0.87	1.77	1.5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50	2.53	1.2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08	0.93	1.0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72	1.37	0.9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3	0.76	0.9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79	1.16	0.92
饮料制造业	1.06	0.83	0.8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68	1.09	0.7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27	0.50	0.63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0	0.56	0.62
第三类行业			
食品制造业	0.52	0.75	0.3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95	0.38	0.36
纺织业	0.65	0.52	0.33
造纸及纸制品业	0.54	0.47	0.25
化学纤维制造业	0.51	0.33	0.17
烟草加工业	0.46	0.18	0.08
食品加工业	0.16	0.14	0.02

注：数据来源于《2003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表 2 显示：

——天津市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

业，即高梯度行业有3个：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京津冀区域高梯度行业中，天津占1/4弱，低于北京市。

——天津市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单项指标大于1的行业有12个，约占区域中这类行业的1/3强。

——天津市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处于劣势的行业有7个，占区域这类行业的1/4弱。

——表2使用的是2002年的统计数据。如果和以2001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做出的以上三个指标对比的话，可以看到，各行业数值变化较大，有升有降，不亚于北京。天津市的三大产业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都还处于大变化之中。

——天津市第二产业中具有转移潜力的行业也是比较多的。

对河北省行业梯度的测算，请见表3。

表3　河北省行业梯度分析：三类行业

项　目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　位　商	综　合
第一类行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46	5.45	7.9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8	2.16	2.55
食品制造业	1.08	1.28	1.38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8	1.05	1.24
第二类行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37	0.96	1.3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90	1.04	0.9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87	1.03	0.90
医药制造业	0.87	1.01	0.88
金属制品业	1.00	0.81	0.81
食品加工业	1.03	0.51	0.5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6	0.44	0.5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01	0.46	0.47
第三类行业			
纺织业	0.85	0.70	0.59
造纸及纸制品业	0.74	0.80	0.59

续表 3

项　目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位商	综合
饮料制造业	0.81	0.68	0.5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75	0.67	0.50
化学纤维制造业	0.75	0.60	0.45
专用设备制造业	0.70	0.64	0.4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92	0.38	0.35
普通机械制造业	0.63	0.49	0.3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79	0.32	0.2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67	0.34	0.23
烟草加工业	0.64	0.30	0.1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68	0.20	0.14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95	0.13	0.12

注：数据来源于《2003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河北省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业，即高梯度行业有 4 个：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京津冀区域高梯度行业中，河北省占 1/3 弱，而且优势集中在黑色金属矿采选与冶炼及压延加工方面。

——河北省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单项指标大于 1 的行业有 8 个，约占区域中这类行业的 1/4 强。

——河北省分行业在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区位商上处于劣势的行业有 13 个，比较多，占区域这类行业的 1/2 弱。

——表 3 使用的是 2002 年的统计数据。如果和以 2000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测算出的以上三个指标对比的话，可以看到，各行业数值变化虽然有升有降，但是最有优势的行业，即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仍然在第一梯队，而且强化趋势十分明显；第二梯队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上升之势突出，大有进入第一梯队之势。总之，河北省的三大产业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都还处于大变化之中。

——河北省第二产业中的劣势行业比较多。河北省处于京津冀产业梯度低端，劣势行业差距比较大，不利于高梯度地区行业转移的引进和吸收。这一点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

几点结论性意见：

——京津冀三地还都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变动时期。三地的第一类行业在全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第二类行业虽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不同的行业走向并非一致：有的是从一般地显示比较优势到逐渐强化，甚至很快就会进入第一类行业；有的则是正处于待转移或转移状态；第三类行业也并非都是包袱行业，有的实际上是正在调整的行业。以定量为基础对三类行业的定性是科学的，但是在京津冀的结构变化状态下，必须认真调查研究，观察每个行业的实际变化，在调研基础上认真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京津冀整体的行业比较优势已经形成：河北作为全国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重化工业基地；京津则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制造业产业带的北方双核城市。

——从目前三地三类行业的地区分布来看，梯度差异已经明朗，除了个别行业，基本不存在区域性的同构。

——上文所说的个别行业主要指北京和天津都具有比较优势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从上面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天津该行业体现比较优势的综合行业梯度系数为11.02，大大高于北京该行业综合行业梯度系数3.11。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国目前发展最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也正在大力地建设中，第一批推出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苏州、杭州、深圳、福厦沿海地区、广东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和地区作为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其意义是深远的[①]，已经考虑了京津的强强联合与产业带的形成。北京将以掌握核心技术为途径，实现做大做强；发展的重点行业是：计算机及网络产业、数字高清晰电视、第三代移动通讯、半导体照明材料及汽车电子及智能交通。天津在产业价值链中则定位于依托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研发优势，与北京形成互补，发挥两城市产业带的集聚效应，将天津市打造成世界级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和重要的研发中心。

汽车业也是京津都在发展的行业。从目前已经形成的态势看，错位竞争对于形成京津冀汽车制造产业带并不是不可能的。

——京津冀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产业梯度。但是并不是只要存在产业梯度，产业的合理转移就可以水到渠成。京津与河北省产业梯度过大不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① 《首批九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推出》，2004年9月29日《经济日报》。

3. 第三产业

京津冀在先天资源禀赋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发展首都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引起了各自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而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又使得三省市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差异，由高到低呈北京—天津—河北的格局。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第三产业占地方 GDP 的比重已超过 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在津冀，第三产业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在地方 GDP 中的比重还不及第二产业。不过和河北相比，天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还是较大的。

从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和交通通信业发达阶段；第二阶段是金融保险业和产业服务业发达阶段；第三阶段是科技教育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崛起阶段。根据这种区分标准判断，北京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的时期，天津和河北正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

第三产业既包括历史悠久的古老产业，如商业，又包括近些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异军突起的行业，如计算机软件业。由于受统计资料所限，一般将运输、邮电和仓储业等归为传统第三产业，将金融、保险、咨询、房地产、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归为新兴第三产业。分行业的研究表明：京津冀经济圈中，河北与北京相比，在发展传统第三产业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天津近几年发展比较缓慢。在发展新兴第三产业的基础方面，京津明显强于河北。在科教方面，北京的国家重点院校占全国的近 1/4，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的 1/3，中科院院士占全国的 56%，工程院院士占全国的 52%；2000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北京是河北的 14.9 倍，天津是河北的 2.8 倍，三种专利申请中，北京是河北的 2.7 倍；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北京为 5.5%，天津为 2.3%，河北仅为 1.9%。在北京的第三产业中，金融业是比重最大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全国之首。房地产业也是吸引投资、拉动首都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从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其他城市发展的经验看，以新兴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北京第三产业对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第三产业的影响将越来越强。但具体而言，近期处在由传统第三产业向新兴第三产业升级时期的北京，一方面回报率较高的新兴第三产业正在吸引来自国内外的相关要素向北京集聚，例如，北京金融保险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会吸引包括河北、天津在内的各地金融业高素质人才到北京加盟，旺盛需求拉动的北

京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吸引包括津冀在内的各地房地产开发商把大量资金投向北京。另一方面，投资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渐低的传统第三产业正在向包括津冀在内的外地转移和辐射，例如，零售批发业纷纷到京外发展连锁和特许经营。

二　对“十一五”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趋势判断

驱动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京津冀经济圈内各产业的市场竞争，这种大趋势促使企业本身的发展战略向产业集群战略演化。目前，国家已经启动了京津冀的区域发展规划，预计这将统筹优化生产力布局。如果能够把现有的工业园区整合为产业功能区的话，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企业将把产业链锻造成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脉。在产业集群化的过程中，京津的一些产业链将逐步延伸到京津周边的河北省地区，如廊坊、保定、唐山、张家口和沧州；京津塘沿线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将通过分别整合为产业功能区而逐渐实现有序分工和错位发展。当然，形成这种理想状态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

从“十一五”时期来看，我们预计：合作的重点领域将出现在生态环境保护、公用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在产业方面，区域合作将主要出现在农业、旅游业方面；工业上的合作仍将更多地出现在正在进行技术改造的成熟传统制造业方面。具体如下所述。

1. *产业*

（1）农业。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北京的农业资源如耕地在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在变化，粮食消费在减少，而肉类、禽蛋、蔬菜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在增加（据统计，1989～2001年间，城市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从18.7公斤增长到26.4公斤，人均禽蛋消费量从5.9公斤增长到11.2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是难以满足北京城市居民的农产品消费需求的（据北京市农业局的统计，2002年北京粮食作物年产量为82.3万吨，占本市年需求量的14%左右；猪肉年产量33.4万吨，占需求量的60%；牛肉年产量4.9万吨，占需求量的40%；羊肉年产量4.2万吨，占需求量的30%；鲜蛋年产量15.2万吨，占需求量的50%），而且，由于随城市功能定位而来的较高环境保护要求和畜禽防疫要求对养殖业发展的制约（北京已经根据郊

区不同地区的区位功能和新的城市发展规划，将郊区划分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适度养殖区），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种供求差距今后将呈扩大趋势。因此，对于北京来讲，农产品供应对行政区外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高。京津冀经济圈在农业方面的合作，主要是建立稳定的粮食及蔬菜、畜禽等其他农产品购销关系，建立农副产品检测、检疫、互认制度和龙头企业+中介组织+生产基地对接机制，开通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渠道，推进农业产业化。具体来讲，北京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可以出资帮助认定的对接北京市场的津冀蔬菜、畜禽等生产及加工基地建立或强化食品安全检测、监管体系（设备及设施等）；三地可以携手制定统一的京津冀经济圈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预防控制规划，并根据环境保护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的需要调整经济圈内养殖业发展布局；北京的一些与首都功能和要求不相适应的农业生产项目将向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地区梯度转移，如环境保护成本较高和生物安全风险较大的肉猪、肉鸡等畜禽养殖业。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合作，将更多地表现为农产品加工龙头公司所带动生产基地的外移，例如，大发畜产总公司、华都集团和三元集团近年内将在目前带动养殖专业户的基础上分别到河北任丘和张家口投资建设饲料厂和加工厂，进而拓展养殖基地。

（2）工业。尽管京津工业目前已经凸现以开发区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化趋势，但京津冀经济圈内京津的产业，能否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化进一步把产业集群化的范围从行政区内扩大到经济圈内的河北，还不好说。因为，对于北京来说，尽管像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行业因具有比较优势而成长性较强，并因技术方面的特点有可能通过专业化分工而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到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地区；尽管因构成这些行业的多是自主性较强的外资、合资和民营企业，进而可较大程度地跨行政区自由选择供应商、配套企业和安排生产基地；但是，这些产业尚不成熟，并且，河北除紧邻北京东部发展带的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的发展环境和产业基础距离承接产业链延伸或作为生产基地的要求相差甚远，因而北京现有支柱工业在近几年内很难与河北实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区域合作。京津冀经济圈内工业的区域合作，近期的重点领域还是十分成熟的传统制造业。区域合作的实现方式，有可能表现为集团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分工组织结构的跨行政区分布，如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公司分别在京津建设芯片工厂；也有可能表现为分属京津冀的各类投资主体在经济

圈内以控股或参股等形式跨行政区异地投资发展；还有可能表现为北京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在津冀选择供应商，或将部分受都市功能限制、不适合在京津安排的工序、工艺转移到河北生产。另一方面，京津一些其他的传统工业和都市工业，如食品加工、印刷包装、木材加工和服装加工业等，在未来的几年里与河北的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像印刷包装业和家具制造业等在河北三河、香河和廊坊等地已成为支柱产业，不仅成规模，而且技术在升级换代，相对低廉的成本使其比北京的同类企业更有竞争力，有可能吸引北京的同类企业与其整合。此外，穆斯林相对集中的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有望成为北京清真食品加工基地，如北京桂香村清真食品公司就将加工基地设在大厂，大厂也是主要定位北京市场的肥牛生产加工基地。

（3）服务业。由于目前北京的产业结构是“三二一”的格局，第三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对第三产业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又是以信息业、金融业和中介业为主的新型服务业，所以北京的新型服务业是否具有辐射或扩散能力，以及是否能向河北和天津辐射或扩散，将对“十一五”时期京津冀经济圈产业区域合作的发展程度起较大的影响。京津冀经济圈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合作，有可能出现在金融业的区域整合上，例如，按照股份制方式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银行，实行京津冀经济圈内银行储蓄的跨行政区通存通兑，将过去的京津冀互为异地存取变为经济圈内的同地存取；也有可能表现为保险业业务的进一步跨行政区拓展；更有可能是信息业（通信、网络、传媒和咨询等）和中介服务业（会计、审计、评估和法律服务等）的企业跨行政区并购和业务融合，例如移动通讯业中的跨行政区手机异地交费、停/开机、备卡激活等。此外，在物流、房地产、会展等新兴服务业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较大的合作潜力。

随着第三产业中商业业态的提升，京津商业中一些业绩颇佳的老字号和专卖店将进一步通过特许经营或连锁等形式向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地区扩展。而一些与北京城市功能不相适应的低端商品批发零售业，将逐步由城市中心向外围转移，有些将落户环北京的河北地区。例如，原来扎根北京南城大红门的主要由浙江人经营的服装批发零售市场将有可能随着加工基地南迁河北固安而南移。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十一五”时期京津冀经济圈旅游业的区域合作将会有较大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此间经济圈内交通条件的较大改观，以及此前圈内旅游业企业之间较好的合作基础，例如近年来“黄金周”期间合作带

来的共赢局面。旅游方面的合作，首先可以由北京市旅游局牵头，与环北京周边津冀两地有旅游景点和项目的旅游主管部门联手研究，制定京津冀经济圈旅游资源开发总体规划，力图从区域的角度出发统筹考虑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其次，可以由三地政府旅游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京津冀经济圈旅游行业协会，推动京津冀旅游线路设计和项目开发上的进一步合作，协调、调解三地之间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矛盾及不和谐事宜，例如联手建立省级旅游质量监督协作体系，以协调解决游客跨行政区投诉问题。

在影视业方面，可以抓住电影市场院线制改革走向纵深的大好时机，将北京成熟、成功的品牌电影院线向天津、河北延伸，经过慎重的考查、协商之后，吸收天津、河北的强势影院加盟，实现强强联合。

2. 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

按照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统一制定经济圈公用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三方共同争取中央财力支持，同时充分挖掘地方政府财力和借助社会财力，加快构建综合交通网络，逐步实现区域内交通一体化，统筹省级高速公路和各行政区道路，完善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加快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京承城际高速铁路建设，构建区域铁路运输网络，加强区域内机场间的合作和分工，优化港口布局与功能，加强港口共建与共享，建设区域内快速出海通道。

进一步优化、完善京津冀经济圈交通网络系统。首先要在加快京承高速公路和京津塘高速公路南北复线建设的同时，强化、完善京唐、京保、京张高速公路交通体系。在强化、拓展以北京为起点的放射线状高速公路网络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的难得机遇，力争完善、优化经济圈内贯穿南北和东西的网络化高等级公路网和旅游路网，三方联手恳请国家交通部出面组织筹资立项新建或改建经过北京东部、北部、西部通往河北和天津的山区快速干、支线公路。例如将北京西六环路（门头沟—周口店）南延与张坊—西陵—紫荆关—涞源公路相连，成为开发京西旅游资源的干线公路；从京津塘高速公路大兴采育出口修建经廊坊市向南连接河北大城县留各庄的干线公路，进而南与津保高速公路相连，东北面穿过京沈、京哈高速与河北的香河、大厂、三河相通；在两条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基础上，东延修建京平（谷）高速公路，与津蓟（县）高速公路连接，并将津蓟高速公路北延至河北兴隆、承德。

京津冀经济圈在跨省市交通，特别是公共交通方面的合作还有很大潜

力。只要各地地方政府努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坚持维护有序竞争原则的前提下，加强由行业协会出面的协调和管理，就会有更多的类似于现有的“9”字头跨行政区公交路线开通。而且，可以实现城市公交IC卡跨行政区通用。“十一五”期间，京津冀经济圈有望实现经济圈高速公路“一卡通”联网收费，进而取消收费。

在轨道交通方面，“十一五”期间力争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完成立项、设计、征地拆迁并开始施工。同时完成北京—廊坊—天津快速轨道交通体系的可行性研究和立项工作，并开始初步设计和征地拆迁准备。

在航空运输方面，在完成北京首都机场3号候机楼和第三条跑道建设的同时，实现天津滨海机场升级改造。随着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现代企业制度，随着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两个机场的优势都将得到充分发挥和更有效的互补。

在海运方面，京津冀三方应尽快就经济圈内港口开发利用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协商，力求在充分挖掘现有港口潜力的基础上，使北京能够依托天津新港升级改造、河北乐亭京唐港改造和新建曹妃甸港，以及修建京津塘货运高速公路复线，进一步加强、拓展北京的出海通道。

京津冀经济圈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主要是完善、巩固京津冀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共同谋划开发建设，重大能源项目，进一步加强省级电力、煤炭、天然气的产销合作，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

在廊坊、涿州、固安、高碑店、三河、香河、蓟县、宝坻、滦平、丰宁、宣化、涞水、涿鹿、怀来等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实行京津冀电话（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号码资源共享。

“十一五”期间，京津冀经济圈内部各行政区之间，在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有望实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相互承认。

3. 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资源利用

在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京津冀三方的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为了维持和保障北京的水资源供给，首先，京津冀各地政府应在国家水利部的主持下明确河流、水库的水权归属，理顺水资源权属管理体制，协调解决京津冀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例如，协调解决京冀和京津分别在拒马河与洵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其次，除了中央财政从确保首都功能的角度对流域上游河北省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给予适当补贴支持，进一步改进

官厅和密云水库涞水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水污染治理和兴修节水工程以外，京津也应在明确界定水权归属的基础上按照水权有偿转让的原则继续妥善处理好与河北省之间的水资源配置问题，并对河北省为维护水源水质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做出的牺牲给予适当的生态补偿。此外，为了能尽快将河北中部黄壁庄、岗南、西大洋、王快等水库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引入北京，除了做好市内的接口工程以外，北京应协助河北搞好沿线污染源治理，以此来保障来水的质量。在污水和垃圾处理方面，北京应加快和加强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临近津冀地区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并将运行与维护开支费用列入预算，例如大兴黄村东南方向的凤河流域，力争流入津冀的水质达标，而不让北京的垃圾危害津冀。在风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北京与河北在延庆、怀来交界地区有着极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在已经进行的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力发电的产业化。在风沙治理和大气质量保障方面，北京与河北的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例如，继续完善和强化首都周围绿化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将张家口和承德的产业经济彻底转化为低耗水、低耗能、无污染或低污染的产业结构，以及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等。为此，除了中央之外，北京也必须不断加大京北生态建设的投入。为了确保“新北京，新奥运”战略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消除汽车尾气排放对首都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京津冀经济圈各行政区应加强在汽车尾气治理方面的合作，例如将实行欧Ⅱ或欧Ⅲ标准的范围由首都地区扩大到整个经济圈。

4. 社会发展

在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方面，京津冀经济圈跨行政区的区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为了确保 2008 年奥运会的顺利举行，要求环北京的津冀地区一定要与北京联手做好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包括防范恐怖活动、防止暴乱、流动人口管理、安全生产管理、交通安全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和社会救助等。可以开展京津冀区域警务协作，在警务信息、办案、道路交通管理、警务指挥和行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可以在侦查破案方面形成程式化的相互支持运行方式，其中包括建立办案无偿协作制度、有查必复制度、卡点堵截制度；加强缉毒、反偷渡协作；在打击制假、贩假，办理经济诈骗案件中，共同防止地方保护主义。

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方面，京津冀经济圈各行政区可以在充分借鉴防控 SARS 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区域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协调机制。特别是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加强与河北霸州等高发地区的合作。

在防灾减灾方面，京津冀经济圈各行政区之间的区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无论是为了做好2008年奥运气象服务，还是为了缓解水资源紧缺、防御冰雹灾害、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功能，北京都需不断完善与津冀在人工影响天气上的合作。要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的基础上，改进、强化信息共享平台；改进和加强在雨水气象资源利用和人工影响天气决策、指挥上的协调；在不断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提高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和器材的共享程度，以此来推进人工影响天气上的区域协同作战。

在应对事故等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方面，京津冀经济圈各行政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域合作空间，特别是在京津冀的边界一带。无论是像120、999等生命救护，还是像119等消防救援，甚至是危险化学品事故等的紧急处理，如果能建立起跨行政区的区域紧急救援合作体系，在信息、灾害监测和救援设备及人力资源整合与共享方面进行合作，将会大大提高紧急救援的效率和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科研和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与教育资源应用方面的合作。京津在科教方面的人才和资源优势，为与河北进行科教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有助于弥补河北科教资源的不足。在教育方面，充分利用京津高校的人才和装备优势，通过校与校之间的协作、沟通等方式，聘请京津像北大、清华、南开和天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师到河北定期讲学；通过访问学者、定向代培研究生和客座教授等形式帮助河北省高校培育优秀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积极推广清华大学组织青年教师、博士等高素质人才到河北省中小城市基层挂职锻炼的先进经验，鼓励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高素质人才到河北省基层部门挂职交流。鼓励北京的中小学与河北省的学校，特别是贫困地区中小学建立固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接受河北的教师到北京进修，组织北京优秀教师到河北中小学进行教学辅导，把闲置或淘汰的教学设备检修后支援河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在科研方面，可通过课题、项目的联合攻关，来培养河北的学术研究梯队。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趋势及重点领域判断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　卢　卫　沈艳兵

一　京津冀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现状

（一）京、津、冀城市群定位和分工现状

京津冀经济圈是指地处中国北部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市及河北省区域，该区域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均高于全国及环渤海地区的平均水平。经济圈所处的环渤海地区位居中国沿海开放地带的北段，是我国沿海地带对外开放的三大主要区域之一，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具有促进全国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延伸的枢纽作用。特别是由京津和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沧州、承德和张家口等城市组成的首都经济圈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这一地区主体产业的集聚地和主要商品集散地，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在全国也具领先地位，是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

1. 京津冀经济建设各具特色

多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客观上已形成相互联系的城市经济综合体雏形。随着“十一五”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形成，北京新近编制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两个“发展极轴”，明显地表现出寻求和回应与津冀合作的意向。天津提出“京津冀联合，共建京津大经济圈”的构想，得到了各方的响应；河北较早地提出了“服务京津，利用京津”和“环京津发展”战

略。但目前京津冀间的经济依存度较低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北京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而且经济技术发达，产业基础雄厚，商业服务业发达，集中了全国几乎各大银行的总行、中国主要的信托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及外国银行办事机构，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上海。天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综合性的港口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历史悠久，加工工业门类齐全，钢铁、轻工、化工、汽车、机械设备、纺织、电子、医药建材等行业发展迅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京津两市组成了全国最大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的核心区。河北环京津城市经济地带，既有相当实力的中小城市，也具有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与京津的城市分工和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成为以京津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综合体的条件。

2. 经济联合的优势突出、趋势明显

由京津唐（冀北）地区组成的首都经济圈，是我国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又一发展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在历史上就有着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现代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为该地区城镇间经济的进一步联系奠定了基础，形成目前以京津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是中国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京津冀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诸多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北京是中国工业基础雄厚、门类较多、配套能力较强的现代化工业基地之一，汽车、电子为其支柱产业，冶金、化工、纺织、机电等行业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电子计算机、光机电一体化、航天、新型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电子工业构成了天津四大支柱产业，轻纺工业也有相当实力，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发展迅速；微型轿车、高速电梯、数控机床、锻压设备、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压缩机等产品行销国内市场，并已向海外扩展。河北环京津七市培育建设了纺织出口基地、钢铁基地、建材出口基地和化工基地，发展了以优势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在整体上，九城市现已形成相当的经济规模和良好的产业基础。

——综合科技实力全国第一密集区。按照全国科技进步地区评价体系综合排名，京、津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三。京津地区在全国高校、知识和人才的密集程度远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能够提供基础科学研究、高科技研发、经济管理、职业技工等所需的各类高级人才和专门人才。京津工业的高

速持续发展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支撑，且随着全球性新经济的恢复，表现出巨大的潜力。

——中国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北京是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和通讯枢纽，以北京为中心的陆空交通和通信干线连接世界各地，已基本形成综合运输网和通信网。天津是国际性港口城市，起步较早的开发区和保税区建成区总面积达到33平方公里，正在扩容的两区开发面积近50平方公里。天津有以货运为主、客货兼容的国际航空港，将连同现有的京沈高速、京沪高速、京珠高速、唐津高速共同构建出天津市的国家干线网“大三角”结构，使天津市成为联系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公路交通枢纽；同时新建的津蓟高速、武宁高速、津宁高速、津芦高速，增强了与近郊、远郊卫星城、滨海城区与中心城区便捷快速的联系。通过联结北京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港已形成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第四代集装箱港和第一散货大港，较早形成了联结海内外的以港口为中心，海、陆、空一体的交通体系。秦皇岛港、京唐港目前年实际输煤、输油能力已达全国领先水平，成为沟通欧洲大陆和东北亚的主要海陆干道之一。

——工业基础实力雄厚。京津冀地区大中型企业相对集中，基础工业实力雄厚，发展潜力巨大。这里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大中重化工企业，如北京首钢、北京燕山石化、天津石化、大沽化工、天津无缝钢管和唐山的钢铁、煤炭等在全国工业及所在行业中均居领先地位；煤炭工业、煤化工工业、盐化工工业、冶金工业、石油化工、海洋化工、机械电子工业、建材工业和纺织工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为本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高速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旅游资源丰富。京津冀拥有极富吸引力的旅游热点区域，从秦皇岛、山海关向京津地区伸展的“长城游”，由北京、承德、遵化、易县组成的“皇室寻踪”等以北京首都人文景观和津冀山，海自然景观为主要特色的旅游资源，是国内著名的集旅游、观光、访古、度假为一体的理想胜地，有条件发展成为最具有中国北方特色的旅游度假地。

——跨国区域经济合作在不断加强。在全球经济缓步回升、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京津冀地区以逐步成为包括日、韩、俄在内的东北亚跨国区域合作与产业分工的最佳投资地区。与传统的东三省老工业基地和辽南城市圈比较，京津冀在资本融通、投资体制、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京津冀目前也不存在商务成

本过高和技工资源短缺的问题。因此，除了东北亚地区较为固定的投资伙伴，京津冀的经济崛起也受到港台和东南亚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成为他们“北上西进”的重点考察区域。台湾某权威机构把京津地区首次列入“最值得投资推荐”的地区之一。在综合发挥这些优势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必将促进这一地区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二）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正逐步成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第三极，而京津冀在环渤海经济区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目前，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投入上看，京津冀地区都与长三角、珠三角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尤其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可以说，京津冀地区在联合实力上处于较低水平层次，在发展上也处于后发层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市布局不够合理

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比较散乱。核心城市作为所在地区的发展中心，与周边地区相对独立的小城市群在发展上相互脱节、自我封闭、各自为政，彼此间的空间联系松散且薄弱。如中心城市北京，政治、科教、文化等首都职能大大高于一般城市的城市职能，城市职能和产业定位往往面向全国，结果削弱了作为中心城市经济向周围城市扩散的职能，与周边城市及区域联系远不如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那样密切。

2. 三地重复建设严重

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尤其是在港口、机场等重大交通设施方面，重复建设问题比较严重，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如各地的港口建设、机场建设等。北京机场高利用率使得机场建设一再扩大，而高标准建成的石家庄机场和天津机场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航班少，客流小。

3. 三地经济水平落差较大

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河北经济实力较差是一个主要障碍。北京、天津的综合实力最强，成为区域发展的“飞地”，而河北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两大直辖市形成巨大的落差。2003年，北京、天津两市人均生产总值分别超过或接近3万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河北人均生产总值刚刚突破10000元大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239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 8472 元低 14.6%，比北京市低近一半；从三大产业结构看，北京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三二一”的结构调整，天津与河北都还是“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模式；从市场开放度看，京津两市由于享受开放城市、沿海城市、开放区、开发区等优惠政策较早，在引进资金、扩大出口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相比之下，河北省的对外开放步伐虽然也在不断加快，但在利用外资、外贸出口等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参见表 1）。

表 1　2003 年京津冀的经济实力比较

单位：元，%

地　　区	人均 GDP	经济增长率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大产业结构比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进出口增长率
北京市	36613	10.5	13883	2.60:36.0:61.4	18.9	30.4
天津市	28574	14.5	10313	3.70:50.8:45.5	20.9	28.7
河北省	10513	11.6	7239	15.0:51.5:33.5	22.9	34.7

二　“十一五”时期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第一，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已经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我国今后 1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由此可见，对京津冀经济区来说，“十一五”时期是该区域协调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候，如何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第二，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格局中，要加快京津冀的对外开放和经济联合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城市群，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经济核心区，中国北部的最大经济中心和重要的进出口门户，将有助于发挥和发展中国科技实力，推进全国重化工业现代化，进一步促进“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和华东地区经济的腾飞。

第三，三地经济水平处于梯级形态格局的必然要求。目前京津冀经济圈处于知识经济和传统工业经济交替之际，北京知识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而河北还处在以工业经济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阶段，因此，资金在三省市中的作用并不一样。对河北来说，资金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北京来说，相对于其土地面积和人口，资金的密集

度已非常高，由于新经济尚未形成，在传统经济资金要素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值能力较低。这一经济转型时期，给资本的流动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机会，只要有较好的项目，即使是传统型经济项目，在现有三省市经济发展约束条件下，北京的资金也会流向河北或天津，以获得比北京本地区更高的收益。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如果北京的新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项目也多起来，那么河北和天津的资金会流向北京。

第四，从世界经济发展看，一方面竞争在加剧，另一方面竞争愈激烈，联合愈迫切。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是国际大趋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形势也要求加快北方开发开放的步伐。在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处在中心，只有京津冀联合了，发挥各自区位、资源优势，形成北方经济发展中心，才能形成北方开发开放的重点，气势、力量才能和广东、上海成鼎足之势，共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出发，从全国开放的总体格局出发，在环渤海地区开发上要有大的作为。因此，不仅从各省市发展需要考虑，而且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京津冀的联合非常迫切。

三　“十一五”时期京津冀经济圈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

1. 以科技合作为先导，发展科研与生产的联合

与河北相比，京津两市都具有较大的科技优势，两市聚集了全国大部分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实验设施和专家、学者及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这就决定了京津在国内的科技中心地位。科技如何转化为成果，是共同开展合作的利益结合点，虽然三地之间一直有一些科技合作，但合作的领域和深度都不大，当前，需要把科技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发展更多新的领域，使京津冀的科技合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开发利用好京津的巨大科技资源，不仅是京津两市发展的需要，也是河北科技发展的需要。利用京津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现有科技实力，可以强化京津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周围地区的联合与辐射。

——建立完整的京津冀科技信息系统，全面掌握京津冀科技状况及发展动态，可以联合建立京津冀科技档案数据库，对区内重点院校、科研院所的应用型或高科技型专业或方面中的每个课题组、每个学术带头人建立起详细

的科技档案，对他们进行调查跟踪，进而，将他们与可能相关的部门，特别是企业，建立起对应关系，最终达到科研、开发、生产一体化的目的。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详细补充京津冀的相关数据，这将大量节约财力、物力，避免项目闲置和企业乱跑项目的现象，从根本上形成科技资源系统地、规模高效地开发利用的趋势。

——提倡科研机构与企业互派人员。名地区可从相关的部门、企业抽调人员，有针对性地逐批派往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参与他们的研究，带回技术，培养人员，提高素质。这是企业收集科技信息的需要，更是造就一批能够理解掌握最新科研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的技术人员的需要。科研机构也可以了解生产对科研开发的真正需要，或参与企业开发实用性生产技术和新产品。京津冀也可以采取自愿结合、自主组合方式进行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之间、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实现更深层次的科技经济的联合发展。

——鼓励开辟试验基地。京津许多续用型技术开发需要试验性生产场所，河北的地区已成功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实现了优先利用京津科技新成果的目的。三地都需制定明确的优惠政策，吸引科技开发新成果进行试生产。

——培养具有市场洞察力的企业家。科学技术只有与生产资本紧密结合起来才会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结合的最关键性因素就是企业家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创办生产实体，这是培养科技型企业家的直接有效途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运用他们的技能特长办实体，进入市场，积累经验，只要他们能够经受市场的考验进入流动发展阶段，其前景将是十分乐观的。企业将会不断发展、壮大，朝着规模经济迈进，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具有科技意识、对市场十分敏感的企业家自然形成。

——政府为企业组织科技信息服务。企业家大多为计划、资金和人事等因素考虑过多，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主动涉足科技，政府为企业做好科技信息服务是十分必要的。在对内、对外开放过程中，企业习惯于项目发布会、科技洽谈会等形式，但这只是在告诉外界企业想做什么，因此效果不尽如人意。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摸清科研单位有什么、想做什么，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的需要，有的放矢地去利用，为此就必须建立完好的信息服务系统。

2. 加强三地政策上的联合统一

一直以来，京津两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和政策上的优惠得到较多实惠，但是因为三地自身发展的差距和各自为政的观念，各地在地方政策上都本着自

身得利的原则，使得一些政策法规的制定缺乏合作的理念。在体制上，三地都缺乏像珠三角源于同一个省份的共同的制度环境，也没有长江三角洲地区三省市共同建立并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三地政府也没有实现经济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意愿。三地都强调自身的优势条件，都没有考虑联合发展或共同发展的问题，也没有把三地的优势变成京津冀地区共同优势的愿望。

总之，“十一五”时期，面对新契机，各省市必须冲破条块分割、画地为牢的旧体制，置城市于大区域中，联结环渤海地区，联结北方地区，在竞争中合作，在联合中求发展，发挥整体优势，把京津冀的发展与环渤海地区、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联系起来，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京津冀地区缺乏一个高于地方政府的、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为导向的高层次的经济协调机构，缺乏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基础。三地在制定城市规划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向有利于完整的区域经济的形成的方向努力。

3.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一体化建设

京津冀经济圈形成的基础是京津冀生产要素禀赋的互补性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因此京津冀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应是三方合作的序曲，产业转移也应当成为经济圈成员间的协作重点。

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应以能否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为准则，扬长避短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和调整自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加强同国内外、区域间的相互联合、协作和配套，逐步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自身产业特点，又能同周围区域相协调的产业结构体系。具体做法是：

（1）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产业集约化发展。在“十一五”时期，高新技术产业应该成为京津冀地区未来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和在国内外市场经济中增强竞争力的先导产业，这就要求该区域在发展高效益、易运输、污染少、能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不仅要对高科技开发区、科技园区和高科技产业带进行合理布局、统一规划，而且还应注重对与高科技产业相配套的基地建设统筹谋划、全盘考虑，以基地建设带动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科技产业群体的形成，使其成为实现该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资源配置合理化和推进现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巨大动力。

（2）要利用现有工业优势，突出重点，积极发展支柱产业，形成区域基

地特色产业。京津冀地区的石油、化工、冶金、建材和轻纺等支柱产业仍存在着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层次低、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要实现该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地位的主导产业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各地区应在选定支柱产业的同时，突出发展一批重点行业和拳头产品，利用传统的机械工业发展和完善其产业结构。

（3）要利用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北京已经完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津冀两地的第三产业增长还相对较慢，且所占份额较小，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抓住机遇，利用优势，推动第三产业实现较快发展。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应突出开发投资环境的基础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引导功能以及直接获得高额产出效益的产业功能。

4. 加快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我国航空、海运、铁路、公路和管道网络的枢纽地带。在整个区域的交通配置中，构成了以港口为中心、海陆空于一体的大交通网络体系。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加了各国经济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使生产和流通过程更加规范化，从而引起了多方式联运与综合物流服务需求的增加。这种变化将意味着京津冀地区要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必须建立一个以联合运输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运输网络，才能适应国内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潮流。综合运输网络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综合枢纽布局，它不仅是各种运输干线的汇集点，而且也是联运生产的主要基地。它决定了不同运输方式间联运换装地点的分布，而且还会对主要客货流的运输、路径、运输效率和物资运转速度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缘由，在京津冀区域运输布局中，应首先确立综合枢纽的重心或核心地位。只有综合枢纽地位的确立，才能加速区域内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网络的形成，京津冀之间的商贸往来与经济联系才能得以巩固与加强。目前，从京津冀交通运输的构成与层次看，天津港应可能成为这一区域综合枢纽布局的所在地。这是因为，天津港是我国环渤海乃至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该港口内靠东北、华北、西北辽阔腹地，外联五洲四海，目前已开设班轮航线 30 多条，同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保持通航业务往来而成为国际性的港口。该地不仅为京津冀地区实行海陆联运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而且还初步形成了联结海内外以港口为中心、海陆空于一体的交通运输网络。天津港口具有起步较早并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的港口

保税区，而且是北京和华北地区重要的出海门户，特别是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建成，克服了京津的时空障碍，不仅使天津港80%的出口货物来自北京，而且为实现京津港航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北京虽然是一座现代化航空港，是中国最大的航空运营中心和通信中心，以北京为中心的陆空交通和通信干线连接了世界各地，但考虑到运输布局要服从于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特别是要与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和对外贸易基地相适应这一基本原则，北京并不适合成为京津冀地区甚至全国的综合枢纽或航运中心。而天津无论从流量指标、技术指标，还是从多种不同的运输方式来看，均具备综合枢纽功能的地位与条件，即港口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并能提供与周边腹地联结的高效集疏运网络体系。

在实现京津冀交通运输一体化，完善各种交通运输网结构的同时，该地区还应加强区内铁路干线的建设。比如，保定通往霸州的铁路应尽快建成，它不仅是打通西北地区的关节点，同时也是跨过北京，连接石家庄与冀东及其以南地区的关键所在。而滨海铁路的建设也应尽快纳入城市发展规划，这是因为滨海铁路的建成，将促使秦皇岛、王滩、大港区和黄桦连为一体，成为分担京津铁路货运量的主要结点。这样，对滨海开发区的建设，特别是进出口运输都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港口建设方面，天津港应侧重集装箱码头建设，煤炭、能源的泊位建设应让位于对矿石、原油需求量大的秦皇岛地区，因为该地区是渤海湾内惟一的可建20万吨以上泊位的深水大港，可以说是建立临港重化工业区的最佳位置。鉴于上述情况，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网络的规划目标或大致思路应该是：在改善运输网结构、加大运输网密度、提高运输网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京津城市为中心，以天津综合枢纽港为龙头的面向海内外，覆盖整个京津冀地区的集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通信于一体的综合型、多功能、四通八达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

5. 建立三方磋商协调机制

尽快考虑建立磋商协调议事机构，成员由京津冀的高层领导组成。定期或不定期的由该机构的成员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参与协调发展会谈，对一定时间内所出现的有关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磋商解决，这既保证了三方发展的联系性，也达到了交换信息、协调发展，避免各自为政、重复盲目建设等不协调问题出现的目的。会谈的职能是从京津冀区域整体利益出发，研究和解决三方合作的高层次问题：①负责制定合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当前应抓

紧制定税费减免和利润分成等利益方面的合作政策，创造统一的政策环境，促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规划应突出合作的特点，确定合作的方向和重点项目。规划的主要内容应是重点地带的开放开发、产业结构调整、资产重组、重大项目建设、产学研联合、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等。②确定需联合向国家申请的合作项目和争取的政策。③根据合作的需要，协调京津冀与经济合作相关的政策法规，优化合作的软环境，当前需要制定和完善各种生产要素流通和交换、鼓励相互投资、相互保护投资利益、合理解决合作中发生的经济纠纷等政策法规。④完善区域内的产权、资本等市场体系，建立市场化的经济合作体制。以资本经营为主要经营形式，推动企业实行跨行政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合作。⑤协调区域内各行政主体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四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重点领域判断

1. 以梯度转移为重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无论是在三大产业比重上还是在三大产业对 GDP 的贡献上，京津冀之间都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京津冀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遵循产业梯度转移规律进行产业结构的跨地区调整与转移，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在国家间或地区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京津冀经济区中，同样存在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规律。河北与京津的协作基础是三省市之间在技术、产业上存在的梯度性以及生产要素禀赋存在的互补性。首先，从京津冀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程度来看，京津冀三省市在技术上存在梯度差距，进而形成了产业的梯度差距，京津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都高于河北，并且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都需要向外转移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京津冀在产业上的梯度差，北京、天津与河北在产业结构上具备了梯度转移的条件；其次，从京津冀的地理位置来看，京津冀地域相连，三地间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可以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降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成本，这就使京津冀具备了产业转移的地利条件；再次，从京津冀之间的经济联系来看，京津冀在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性和生产要素禀赋的互补性，使京津冀具备了相互合作的条件，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因此，河北与京津的合作应该以三者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梯度转移为重点，充分利用京津冀经济区内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技术和产业的

梯度性、要素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性，实现京津冀经济的共同发展与河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 缩小京津冀第三产业差距，形成互补格局

京津冀第三产业整体上也存在差距，但具体到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则各有优劣，通过京津冀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合作，将会产生“1 + 1 +1 >3”的整体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效应。京津冀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较大差异，由高到低呈北京—天津—河北的格局。

今后京津冀第三产业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尤其是北京）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河北高许多，按照梯度转移理论，只要处理得当，三省市都可从这种“梯度”上获益。

——把京津冀第三产业的整体优化放在世界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上。“十五”期间，“大北京”发展进程加快，对其周围分布城市第三产业的带动也越来越强，而这种世界城市的带动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天津和河北今后要密切注意“大北京”规划的实施情况，要未雨绸缪，改善投资环境，严格治理环境污染，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发挥传统第三产业的优势。

——积极推进旅游业的融合和可持续发展。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就业覆盖面与乘数效应居各行业之首，河北与京津旅游业的融合，将会带动其他产业的融合。

——利用京津新兴第三产业的优势来带动河北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河北发展新兴第三产业的基础与京津相比明显较弱，河北可通过与京津的合作、学习等方式来取得较快发展。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应将过去非正式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转化为正式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协作的方式。

3. 旅游资源联合开发，共同获利

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资源密不可分，京津客源市场有利于河北地区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而河北地区的旅游资源也是京津旅游向高层次发展，疏解京津旅游点游人过度拥挤的最直接场地。只有将京津冀北旅游资源统一规划、统一调配，才能培育世界级旅游品牌，发展都市郊野一体化的旅游产业，把京津冀北地区建成国际商务、国内购物、国内外会议展览、文化体育、休闲度假等专项旅游基地。

（1）共享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京津冀旅游资源丰富，且分布面

广、数量多，主要有山岳型旅游区、海滨旅游区、历史文物古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湖泊景观和草原景观等。“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将是该区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强化城镇旅游功能，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布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2）加大旅游线路的开发是旅游的依托。要努力建成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龙头，省级风景名胜区为基础，功能齐全、设施一流、服务国内、面向世界的旅游区域。以高速公路、铁路和公路为客运通道，充分发挥京津区位优势，三地密切合作，共同创建京津冀一体化的大旅游格局，重点培育好旅游主线路。

（3）完善旅游产品结构，培育精品。观光旅游产品是这一区域旅游产品的主体，要加快其改造和升级。改造、提高观光产品，大力开发度假和专项产品，使京津冀区域的旅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体系更加完备、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要将京津冀北区域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 4A 景区培育为名牌产品。在抓紧产品升级改造的同时，谋划建设一批起点高、有特色、规模大、能带动当地旅游发展的重点项目。一是要深挖内涵，提高现有内容的品位和档次；二是策划与主题协调的参与性、娱乐性、知识性强的新内容；三是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水准。

加快度假旅游产品开发，建设特色浓、品位高的新型度假项目。要强化度假产品的娱乐、休闲、健身功能；完善接待设施，建设和推出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接待服务设施；大力美化环境，创造优美、高质量的度假空间。

（4）建立快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京津冀北区域要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旅游主线路为重点，加快建设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

公路——主要是加快建设中心城市、主干公路至景区（点）和景区间的道路。

铁路——主要是增加旅游列车和提高时速。

航空——河北省环京津区域航空交通相对落后，要加快发展。

海运——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利用海运通道把环渤海地区旅游有机地联为一体，对加快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区域旅游意义重大。

（5）滨海旅游业发展构想与对策。滨海旅游是重复旅游率较高的旅游，必须充分重视。要树立现代滨海旅游意识，面向 21 世纪，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潜力，突出海洋特色，提高旅游质量，统筹兼顾，协调、快速、持续发展，建设全国滨海旅游基地。

京津冀经济协作与产业转移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　戴宏伟

一　京津冀经济圈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区域协作的差距

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经济圈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并已成为推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经济区中相比较来看，京津冀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区内部地区间还远未实现深层次、实质性的经济合作与融合。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缺乏带动这一地区经济起飞与协作的龙头。一般来说，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要素，即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来看，这两大区域都有一个或几个起带动作用的经济中心城市，如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首形成了几个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龙头城市，并围绕这些中心城市形成了专业分工合理、产业层次明显的次级经济区域。而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明显缺乏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中心或“龙头”城市，这是制约京津冀经济圈经济起飞的根本性因素。在京津冀经济圈中，北京在经济规模、产业层次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理应成为这一地区的龙头或经济中心。但事实上北京并未起到龙头的作用，其原因主要与北京过去的产业发展定位有关。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北京在建国后 50 多年的经济建设中，逐步发展起资源、能源消耗高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并在北京市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重化工业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符合首都资源和环境特点，对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

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不但使北京市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形成了“路径依赖”，为以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巨大困难；而且导致京津冀产业结构趋同和恶性竞争，如：在相当一段时期中，京津冀争资源（水资源、土地、矿产资源等）、争项目、争人才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在这一地区不能形成一两个特色鲜明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次级经济区域，京津冀经济圈的长远发展就无从谈起。

二是京津冀缺乏深层次产业分工与协作。区域经济协作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二是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三是产业在地区间的转移。其中，商品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协作的初级形式；生产要素流动开始涉及地区间利用生产要素的互补性进行生产协作；产业转移是地区间协作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地区间通过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合理分工与实质性、深层次协作。京津冀经济区中各省市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真正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严重，相互间的竞争大于协作，导致地区间协作困难重重。随着北京、天津二市尤其是北京市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京津冀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产业梯度日趋明显，三方正在由竞争型关系向协作型关系转变，这一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三是京津冀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共享还远远不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是促进区域经济协作与融合的重要途径。而从京津冀来看，三地间无论是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劳动力、资金等传统要素方面还是在技术、信息、管理方面都存在着共享与流动的巨大障碍。目前京津冀在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供求信息沟通、政策支持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二 产业转移是京津冀协作的重点和突破口

在区域经济一体浪潮的推动下，近年来，京津冀逐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协作、合理分工，其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北京市近年来提出了“首都圈”和京津冀的思路，将其与天津和河北北部地区的协作也纳入北京的发展规划；天津市也提出了一些战略性措施，甚至有专家提出将北京、天津两市合并，以实现京津在本质上的一体化；河北省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省内有关方面也就如何发挥环京津优势、促进京津冀的经济协作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京津冀的

经济协作尚处于摸索阶段，总的来看尚有待实质性、整体性突破。笔者认为，京津冀协作的实质性突破在于三方在产业协作上的进一步加深。

京津冀协作的根本基础是三省市之间在技术、产业上存在的梯度性以及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产业转移与协作将是京津冀进行深入合作的突破口。根据产业梯度转移规律，由于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产业在地区之间是梯度转移的，一个地区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其他与该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成为其他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提高吸收方的产业结构层次与水平。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使先进地区加快了产业升级，摆脱了产业包袱，从而可以轻装上阵，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后进地区则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引进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以“后发优势”尽快提高产业层次与水平，从而实现产业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

从京津冀三方来看，京津冀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并存在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首先，京津冀在技术和产业上存在明显的梯度差距，京津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都高于河北，并且都正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需要向外转移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京津与冀北地区在产业上的梯度差，京津冀在产业结构上具备了梯度转移的“天时”条件。其次，京津冀地域相连，三地间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可以大大降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成本，这就使京津冀具备了产业转移的“地利”条件。再次，京津冀都是环渤海经济区的成员，在区域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也会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大北京”经济圈把京津冀北地区都包括在内，京津对加强与河北经济合作有着内在的需求，河北也早就提出了以充分利用环渤海、环京津优势为目的的“两环开放带动战略”，京津冀对相互协作的共识使三方具备了相互合作的“人和”条件。最后，京津冀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极化、扩散效应。总的来看，目前在京津冀经济区的发展中，还主要是京津的极化效应在起作用，其对河北这一经济腹地的扩散效应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要素还在不断向京津集中，而河北想从京津吸引资金、技术尤其是人才则遇到很大困难。这是因为生产要素流动的价格机制在起作用——京津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要素所获报酬也高。但京津的生产要素集聚在达到一定的合理经济规模后，也会出现“规模不经济”，之后扩散效应的出现是必然的。因此，京津冀的合作应该以三者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梯度转移为重点，充分利用京津冀经济区内生产要素的互补性、技术

和产业的梯度性、要素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性，实现京津冀经济的共同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们在对京津冀三大产业进行数量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京津在第一产业上与河北相比处于劣势，第二产业对于京津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相对弱化，第三产业比重及其对 GDP 的贡献度却稳定上升，这与经济发展规律及京津城市经济的地位相符合。而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产业对于河北 GDP 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并将在长期内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但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在产业技术层次上都与京津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京津冀之间在产业结构上不但存在梯度差距，也存在梯度转移的广阔空间。

三　产业转移也是发挥首都比较优势、优化北京产业结构的要求

所谓“首都经济”，就是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其实质是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产业结构。首都作为特大城市，其产业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集聚了发展高层次产业结构所需要的人才、技术、信息和资金等先进生产要素，高级人才集中，在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处于前列，信息传递渠道便捷，资金较为充裕，具有发达、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二是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高，对周围地区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辐射和带动功能，理应成为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中心；三是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口数量巨大，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土地数量相对紧张，对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压力日益增大，不宜发展高能耗、高污染、高耗水、大运输量的制造业；四是首都经济的特点使其对第三产业有着特殊的要求，需要有发达的服务业和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交通、通讯设施先进，市场体系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水平较高。

首都经济的特点要求北京的产业结构应符合“立足首都、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首都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结构优化、布局合理、技术密集、高度开放、资源节约、环境洁净”的经济。但从北京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总体状况来看，北京市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还并不完全符合首都经济的特点，并且将会对以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巨大困难。一方面，它不但使北京的财政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

化工业的继续增长，从而给资源、环境带来重要影响；而且使这些产业的投入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惯性”，有可能挤占其他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并且“刹车”较难。另一方面，要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发展新兴产业，必须使这些重化工业转移出去或对其进行改造，否则就难以取得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土地等资源，也不可能使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效果；而对其进行转移或改造的基础首先是降低这些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其比重的降低又不可避免地会对北京的就业、财政收入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但从根本上来看，无论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存在多大困难，其调整成本有多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势在必行，这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总体要求，逐步形成适应首都经济需要的、以高新技术为主导、资源节约、效益和素质较高的产业结构，就必须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结构水平的同时，加快向外转移不再适合首都比较优势的传统、落后产业。而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应当属环抱京津的河北省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这是因为：从北京来看，向外转移部分传统产业必然要考虑转移成本，以及从这些产业分流出来的大批工人的安置问题，而由于河北北部地区与北京距离较近，向这些邻近地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的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作成本等较低，而且存在进行合资、合营以及安置工人就业的可能；从冀北地区来看，接收这些产业也有一定基础，如唐山具备钢铁工业、秦皇岛具备建材工业的基础，其接收这些产业的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作成本也较为低廉，更易取得“双赢”效益。因此，北京向外进行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应与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和京津冀的经济协作结合起来，把自身的发展与周围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对京津冀经济圈产业转移的对策思考

1. 京津冀应根据三省市产业结构的梯度性和互补性实施产业的双向转移

从京津冀经济圈总的产业梯度来看，京津在其中处于高梯度地位，河北相对处于低梯度地位，并存在由京津向河北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京津应利用这种产业梯度逐步向外转移一些自身已不存在明显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或一些具有明显优势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现代工业。河北应充分利用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吸收先进技术，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同时根据河北比较优势积极地、有选择地接收北京转移出的部分产业，并通过对这些产业进行吸收、改造、提高，达到提升产业结构层次的目的。另外，河北北部地区还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向京津提供畜牧、大棚蔬菜、果品、花卉等农产品以满足京津市场需求，向京津进行第一产业农产品转移。

2. 加快北京向冀北地区的产业转移，优化北京产业结构

一般来说，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一个基本途径；二是改造传统产业，即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三是进行产业转移，即通过转移、淘汰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相对落后产业，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层次。这三个途径并不是绝对孤立、毫无关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总的来说，培育新产业是进行产业转移的前提，只有培育出一批能替代传统产业的新产业，向外进行产业转移才具有了可能性；改造传统产业是培育新产业的必要补充，也是产业转移前的必要环节；产业转移是前两种途径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为培育新产业解除了包袱，从而可以节省出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发展新兴产业，对改造成本较低、改造后能适应和发挥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改造。

目前北京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尚未形成对传统产业起替代作用的大批新兴产业；二是没有成功转移出去部分已不再适应北京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北京市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进行产业转移，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进一步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汽车等现代制造业，坚定不移地走“技术立市”、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子，这既符合北京最基本的比较优势，也是首都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要求。第二，要进一步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力度。对产业进行改造之前，首先应确定该产业被改造后的市场发展前景，其判断标准是改造后是否能适应并发挥北京新的比较优势。如果不符合这一标准，就应果断下决心淘汰或转移；如果符合这一标准，则在明确该产业新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对其技术、设备、生产工序等进行改造，而其淘汰的技术或设备，同样可视情况进行产业转

移。第三，进一步加快进行产业转移。重点是把不再适应首都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附近的河北北部的唐山、保定等地区。产业转移的短期目标，是将一些对北京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钢铁等产业转移到唐山等地，解决首都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如首钢集团已在河北迁安建设新的200万吨钢铁生产基地，以实现近日关闭的首钢第一炼钢厂的生产能力转移。产业转移的长期目标，是将部分冶金、化工、重型机械等产业转移到保定、秦皇岛等地，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来说，产业转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产业某一环节的转移，如将零部件生产或原材料初加工转移出去，而最终成品仍然留在原地组装；二是某一产业的核心部件仍在原地生产，而将少部分零配件及装配线外线转移出去；三是将该产业整体转移出去。北京市产业转移可根据各产业的不同情况，灵活进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3. 突出京津冀各自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合理进行区域分工

京津冀应根据本地比较优势确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逐步形成区域特色经济，避免产业结构严重趋同与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导致企业间和地区间竞争加剧、关系紧张、难于协作，不利于京津冀经济区的长期共同发展。因此京津冀必须真正把发展特色经济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原则，重点发展其他地方没有基础和优势的行业，以特色为基础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和产业群体，带动京津冀经济圈及其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如北京把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天津把现代物流、金融等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努力建成北方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以及现代化工业基地；河北则把发展绿色优质农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振兴装备制造业列为产业发展重点。这基本符合京津冀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是京津冀以特色为基础的产业合理定位。

4. 统一规划京津冀城市布局和城市群发展

从京津冀整体城市体系布局的角度出发，合理构筑以京津为中心的城市群，把京津冀经济圈建成一个大中小城市结合、空间布局与功能结构合理、产业分工协作的城市群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产业群与城市群的关系，重点抓好京津保、京津唐、京津廊、京张承城市—产业群，结合京津冀规划对这几个地区功能的划分及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本地优势培育重点产业或产业群，以产业群推动城市群，以城市群带动产业群，做到重点产业群和中小城

市群的同步发展。通过京津冀城镇群体的合理规划、布局，“大北京”城市群的发展对于三省市的产业转移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5. 建立京津冀统一开放的生产要素市场

加快培育和发展京津冀生产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以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产业转移。京津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高平台，加快向周围地区的要素辐射，推动产业顺利转移；河北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大力引进本省稀缺的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利用京津先进、充裕的生产要素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

6.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引导作用，逐步消除地区经济封锁

进一步消除地区间各种不利于区域经济协作的封锁，清理并废除不适应市场经济和区域协作需要的地方政策，鼓励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资与合作。在产业转移中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京津冀政府间协商机制，推动跨地区产业转移与协作。目前京津冀政府间已逐步建立起相互协调和磋商的关系框架。尽管这种关系仍然是初步的和不尽如人意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京津冀经济圈的整体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宝贵的。无论是对于高梯度地区的政府还是低梯度地区的政府，能否与对方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是对其市场意识、管理观念、协调能力的一项考验。

7. 加快形成跨地区的技术协作机制

以技术协作机制的建立促进科技人才和成果在京津冀经济圈的跨地区流动，以科技流动促进产业转移，提高京津冀经济圈整体产业层次与水平。应立足于京津冀之间客观存在的技术梯度，进一步加强跨地区的科技协作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协作，彻底转变观念，打破地域界限，加快技术成果和技术人才跨地区流动，实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8. 充分发挥企业在产业梯度转移中的主体性作用

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企业跨地区的协作、兼并、技术转移与生产分工是产业转移的多种实现形式。京津冀经济圈有关方面也应采取措施，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跨地区产业转移的积极性，大力促进企业进行跨地区产业转移、融合与协作。

9.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经济圈重大基础设施合作

协调基础设施的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经济圈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的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

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10. 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京津冀经济圈产业转移与经济协作的基本原则

产业转移双方既不能为摆脱污染、减轻负担而盲目“甩包袱”，也不能不顾长远、只注重短期利益而“抢桃子”。产业转移和产业吸收都必须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考察，慎重决策，使产业转移发挥出“共赢”的带动效应，真正推动这一地区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李京文主编《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景体华主编《中国首都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马野主编《环渤海经济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
谭维克、高起详主编《首都经济研究》，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
王辉、万新平主编《环渤海经济圈：天津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王力丁主编《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中提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景体华

一　经济全球化驱动区域经济突起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全球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复杂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加入 WTO 的各国都必须按照 WTO 的章程、制度，即按照全球经济"游戏规则"行事。在各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制定或修正本国的规章制度时，实际上各国政府已经削弱了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力。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控制力的弱化，首先推出的是由产业带聚集而成的区域经济。企业不得不以产业链的集成直接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总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将使区域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突起。

在区域经济走上国际竞争前沿的形势下，产业集群，继而形成产业带，其战略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所表现出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行业化在空间上的集聚，不仅要打破原来意义上的行业分割、区域分割，甚至正在打破国界。产业带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大发展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竞争的新格局。

所谓产业集群，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企业集中，而是一种以生态链形式组成的产业空间的集聚，即产业的上、下游之间，整体与零部件之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衔接与空间上的合理组合，进而共享知识、顾客和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紧密型的产业带。也可以说，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在这样的产业

带中，主导产业的选择，以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合理结构与布局，将直接构成该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它所展示的生命力，主要得力于这种以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形成的产业带。打破国家和行政区划的限制所形成的这种产业带，是经济全球化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过程。而驱动这种进程的，是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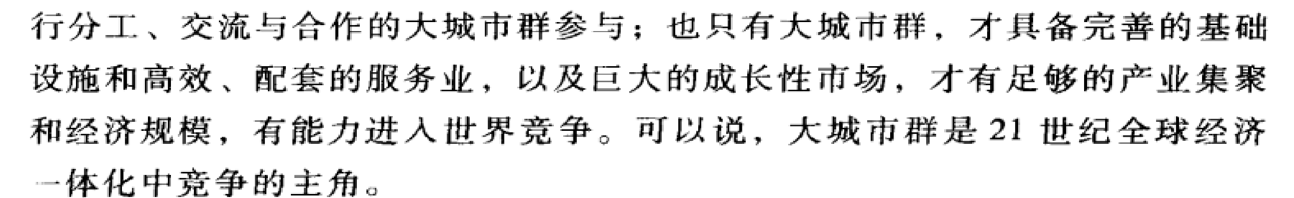
二 以产业集聚为依托的大城市群是区域发展的引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区域经济的骨干。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城市的功能与建设活动的内涵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区域经济网络的结点，是作为区域经济骨干的城市。同时，应当清楚：这种骨干地位，是与一组高增长的产业群所带动的产业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城市的竞争力就是产业的竞争力。这里，我们所以提出产业带，是因为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带，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控制力的弱化，国际竞争已经通过各个城市结点，直接转向产业活动。之所以要通过城市结点，是因为城市是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结合部。

从世界近年来发展的趋势看，新的产业集聚驱动大城市群的形成。大城市群可以定义为：由产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带把多个大城市圈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的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世界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大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欧洲西北部超级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已经成为最具世界竞争力的五大增长极。可以预言：有能力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舞台的真正参与者，是由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支撑的大城市群。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引擎。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现在所做的，是要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先发国几百年走过的路。从我国目前的步伐看，正在进行的工业化是跳跃式的，因为我们从工业化先发国一下子引进了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在产业集聚效应催化下，大城市群的形成也将是跳跃式的。这种过程同时也是全球竞争的必然。因为全球产业链的竞争性配置，要求具备与世界进



行分工、交流与合作的大城市群参与；也只有大城市群，才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配套的服务业，以及巨大的成长性市场，才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有能力进入世界竞争。可以说，大城市群是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竞争的主角。

因此，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就不能立足于一个城市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单打独斗，而应该把自己的城市圈放在由产业集聚经济带支撑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或者说要依托于区域性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在我国，大城市是区域经济的龙头，而支撑大城市群的基础则是中小城市或县域经济。只有中小城市或县域经济与大城市形成互动，才能实现区域的全面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竞争力的整合，既包括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也包括空间的社会经济机制的调整。

区域经济和城市群的发展滞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三　北京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

1. 北京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就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调整效果也比较明显。1990年，北京一、二、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8%、53%、39%，第二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在工业中仍然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1990年，冶金、化工、机械等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2003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1.41%。在20年中北京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完成了以下重要过程。

（1）原主导产业进行了有序的梯度转移。原重要性居前列的金属冶炼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已经从综合重要程度的前几位中退出；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和高新技术产业则位居要位，已经成为北京目前主导产业群的龙头产业。

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步伐显示出如下的历史经验：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一个加速期。加速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结构全面、迅速地转换。北京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应当说，就是以快速、高效的结构

性大调整为背景的。

（2）城市建设正在培育新的产业链，形成具有带动力的产业群。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市建设活动的生产性日益突出[①]。从事“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的行业越来越受到城市决策者的重视。原来视为“消费活动”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氛围，已经越来越作为软、硬环境的先期投入，嵌入到生产活动中，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因素。城市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文化氛围的优化越来越具有生产性或对生产的服务性，其不仅成为吸引多方投资，增强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同时也在快速成长中集聚了自己的产业链，形成极具优势的产业群。在北京的产业结构变动中这种变动因素正在受到关注。

（3）技术要素的贡献率在递增。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2003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314.1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15.7%增加到32.4%，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5.7%增加到8.7%。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在进化中不断地演变：从自然资源、劳动，到资本，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则逐渐转向科学技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在世界各国取得重大进展，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引发了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技术进步的主导作用在明显提高，并以强劲的态势推动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资本、劳动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也将向更高层次演进。

虽然科学技术对北京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仅仅是初露端倪，但是，这一点对北京的经济转型是十分重要的。

（4）出现了明显的产业服务业化趋势。第三产业的四个行业排到了前十位，产业服务业化是令人瞩目的。表1进一步明确了产业服务业化的大趋势。

产业服务业化是国际大城市发展的明显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第三产业在城市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或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都在六七成以上。北京的这一趋势不

① 张庭伟主持《城市化作为生产手段及引起城市规划功能转变》，《海外快递》2002年第26卷第4期。

仅大大超前于全国一般城市，也快于上海、广州和天津（见表1）。

表1　北京产业服务业化的大趋势

单位：亿元，%

年份＼项目	GDP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1978年	108.84	5.63	5.17	77.43	71.14	25.78	23.69
1990年	500.82	43.88	8.76	262.39	52.39	194.55	38.85
2000年	2478.76	89.97	3.63	943.51	38.06	1445.28	58.30
2002年	3130	95.47	3.05	1114.28	35.6	1918.69	61.30
2003年	3611.9	95.3	2.64	1298.5	35.95	2218.2	61.41

（5）进入逆工业化过程。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制造业中心逐步衰退，部分制造业城市向服务业转型困难，出现萧条。但是，也有的制造业中心由于总部集中，对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都有充分的需求，所以产业的服务业化转型顺利，城市经济在转型中避免了大起大落，呈现出持续地繁荣。对于这一现象，美国研究者提出了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概念。80年代中期，诺叶里和斯坦贝克把这一过程也称为逆城市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生产自动化、劳动力结构变化、国外竞争、老旧工厂关闭、企业再组织等因素造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工业城市发展的关键是总部化和发展第三产业。J. O. 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工人减少时，由于总部化和服务业化，城市转型顺利，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①。

北京在我国的各大城市中，已经率先进入了这一过程。不仅第三产业已达GDP的60%以上，总部化现象也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我国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正在成为国际制造业梯度转移的目标地。北京显然不是这一类地区。

北京依靠在科学技术、教育上的先发优势，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已露先行之势，所以通讯、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开始聚集京城。到2003年底，由商务部认定的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总部已达24家（仅次于上海）。另外，具有跨国公司部分地区总部职能的投资公司性公司，如英特尔（中国）公司、微软（中国）公司等落户北京的头脑性公

① 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09～210页。

司，总数已达137家，占全国这类公司数量的60%以上，高居全国首位[①]。

特别需要提出注意的是：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数量，不及上海，后者为41家。但是，设在上海的主要以制造业、金融、商业等传统产业为主。北京和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上已经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需要注意的还不仅这一点。北京正在进行的逆工业化或逆城市化过程，显然要早于上海。因此，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以及总部化现象，对于北京经济的转型和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显然就不一样了。

总之，在20年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基础上，北京第二产业已经站到了倚重高新技术的新型工业化的基点上。北京的第三产业则正在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和新型工业化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平台。从发达国家以传统工业支撑的大城市的发展来看，以上过程是规律性的趋势，也可以说这是北京走向国际化大都市所经历的必然过程。

北京从一个重化工业基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国际化大都市转型，抓住了历史性机遇，没有经历国际上多数转型城市所经历的显著的衰退与萧条。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北京的这一大转变是以产业的空间调整为前提的。

2. 北京20世纪最后十年的产业布局郊区化

北京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是与空间布局的调整同步进行的。预计北京今后的发展将以空间布局更大的调整为有力支撑。

表2通过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三大产业的构成，展示了北京20世纪最后十年从内向外三层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情况。

表2 2001年城市空间功能的状况

单位：%

项 目	一 产	二 产	三 产	三产中主要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运输邮电	批零餐饮	金融保险	房地产
中心四城区	—	18.56	81.44	10.74	15.25	19.02	3.02
近郊四城区	0.33	31.50	68.17	4.30	6.46	9.15	2.77
远郊十区县	13.26	46.88	39.86	6.19	7.92	4.32	5.18
全 市	3.62	35.41	60.98	6.36	8.99	10.34	3.44

注：该表数据来源于2002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① 《京沪争夺战》，2002年9月2日《经济日报》。

可以看出：

(1) 中心四城区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占到81.44%，其服务功能显著强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中心区的金融保险业已经成了所占比重最大的行业。其不仅在第三产业中比重位居第一，单个行业的比重也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所以，可以说，金融保险业已经成长为中心四城区的龙头产业。

(2) 近郊四城区虽然有的城区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比如石景山区，二产所占比重为73.16%，但是整体近郊四区的第二产业比重仅为31.5%，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68.17%，发展很快，大大超过了第二产业。这些数字可以充分说明，城区和近郊区服务功能已经是主导性功能。

(3) 随着第二产业的郊区化，也有一部分第三产业随之转移。也就是说，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到远郊区生根的第二产业，也随之带走了一部分第三产业，主要是那些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理念的变化，郊区的房地产业成了一个发展速度很快的产业。从表2可以看出，在城中心区、近郊和远郊区中，房地产业在远郊区的比重最大。显然随着居民的入住，相应配套的第三产业也要纷至沓来。从表2看，远郊区县的第二产业突飞猛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基本同步。

(4) 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伴随着产业布局的郊区化趋势，从空间布局上说，环状摊大饼的态势仍然是主导趋势。

应该说，20世纪最后十年北京产业布局的上述调整，为21世纪抓住机遇、迎接全球化竞争奠定了基础。激烈的国际竞争引发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将要求以空间结构更大范围调整为契机。这一点在前瞻大趋势的走向后，已经越来越清晰。

四　北京城市空间将从摊大饼走向轴向伸展的快速扩展期

城市空间增长规律，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地理学者和规划学者对城市外部空间、形态以及内部空间演变动力、特征和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提出了城市空间增长的周期性、轴向发展和功能结构互动的三大规律。

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是经济发展、城市化推进过程的具体表现，是城市

核心区接受城市化活动后所必然凸显出的扩散反应。从一些大城市的发展来看，城市空间扩展遵循着环状—星状或多轴状—环状的类似年轮形的增长方式，在扩展程度上表现出周期性规律，在扩展方向上表现出轴向规律。这种演变，与城市交通紧密相关，表现出如下规律。

在城市的形态演变与道路交通网络的互动中，城市发展表现出以下的形态变化：点状形成、轴向伸展、伸展轴稳定、内向填充、再次轴向伸展。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形态呈周期性变化，而且形态的稳定和快速扩展交替进行。

稳定期：当城市形态呈同心环状后，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时，城市各方向上接受中心区辐射的距离大致相同，且不规则程度大致不变。

快速扩展期：随着交通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新型交通线的轴状延伸，引起城市地域沿交通线逐渐向外扩展，牵引人口、工业、商业向远离中心的方向发展，随着发展轴的集中及其不均匀分布，原有的环状格局被打破，代之以星形或扇形模式。这是城市形态变动较大的阶段。

北京正处在突破摊大饼，通过轴状延伸，进入快速扩展期的新阶段。产业与人口的进一步空间转移，不仅向郊区，还要向区域产业带集聚。区域中的产业聚集点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这种轴状延伸不仅是“十一五”时期的基本战略取向，而且还将成为21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

五　预计：21世纪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是北京经济与城市发展的主动力

21世纪前20年，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大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主旋律中区域经济的突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或者说，以产业集聚为支撑的大产业带，才能够具有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而产业带中生成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则是竞争的主角。

京津冀是我国正在形成的具有世界级潜力的产业带。北京今后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只有抓住机遇，融入产业带，在若干新的增长极的支撑下，以这一区域城市群的龙头地位参与国际竞争，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北京的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正在形成以东北方向的顺义天竺和东南方向的大兴亦庄为主轴的产业集聚区。应该说，这是产业在更大区域进行空间调整的起步点。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大趋势，可以预言，区域的产业延伸，将给北京工业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钱纳里的模型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经济结构的演变通常是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向工业化阶段，再向发达经济阶段逐步提升。对于工业化阶段，霍夫曼等学者又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品工业居主导阶段；资本品工业逐步赶上消费品工业的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的阶段。我国学者认为，我国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从北京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判断，北京已经提前出现了工业化第三阶段后期的特征。与全国步伐的不尽一致，也必然出现与先发国不同的特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以下两点是重要的。

首先，我国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正在成为国际重化工、低端制造业梯度转移的目标地。北京显然不是这一类地区。北京不可能回头再把自己重塑为一个以基础产业为主导的重化工基地。

其次，北京也不可能脱离全国向资本品工业占主导阶段过渡的大背景。

我们认为，在区域的发展中，北京快行的脚步将在这里与全国向资本品工业占主导阶段过渡相融合，并将以高新技术和知识型服务业的优势，成为全国向资本品工业占主导阶段过渡的先导。

随着城际高速交通的启动，辐射轴状布局将逐渐浮出，一个符合北京功能定位、适应首都经济特点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将进一步形成。

六 结 论

北京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布局郊区化，在新世纪里将以区域化继续下去，其深远意义恐怕不能仅仅用产业结构调整来完整概括。在北京的城市发展中，城市中心或次中心区出现的“不经济”，生态、环境恶化，必须通过区域经济的整合与发展再造首都城市的持续发展。

在北京未来发展中，所有重要趋势无不与京津冀区域发展密切相关：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城市的轴向扩展、城市化加速、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带与连绵城市群的形成，都将在区域经济的突起中聚焦。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将成为新世纪北京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北京产业辐射与京津冀经济圈的产业协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邓丽姝

一　充分发挥北京产业辐射作用是促进京津冀经济圈产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

产业协调发展是经济圈实现协调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核心城市对经济圈其他地区的产业辐射在经济圈产业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经济圈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由于拥有十分丰富的科技资源，北京成为京津冀经济圈和全国的创新源。研发能力赋予北京较强的产业辐射和带动能力。科技水平是一个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具有强有力的技术创新中心，使得京津冀经济圈有潜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群。研发与制造环节的脱节是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制约因素，在通过研发能力进行产业辐射的过程中，这一矛盾会逐步得到解决，从而推动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科技成果在周边地区的转化也会有效实现北京科技开发能力的价值，促进北京科技开发水平的提升。在接收北京技术创新能力扩散的过程中，天津、河北的产业技术层次会逐步提高，产业结构由此得以优化。

根据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需要，北京要振兴现代制造业，发展具有较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环节。这必将带动周边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兴起，形成垂直分工，实现北京与周边地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产业运行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天津具有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北京的现代制造业在崛起的过程中，会与天津产生竞争，从而促使两地进行水平分工，共同进步。

由此，京津冀经济圈有望形成相关产业集群，并产生产业集群效应，有力地推动三地现代制造业的发展。

北京的产业结构正由传统产业居主导地位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居主导地位转变。一些不符合首都生产要素禀赋特点和环境要求的产业或生产环节面临着向外转移，河北则成为主要目的地。这一方面促进了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河北相关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二　有利于北京产业辐射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1. 北京具有一定的产业辐射能力

北京的产业辐射能力源于研发能力、战略资源优势等方面。

（1）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首先，北京的科技资源丰富，科研能力强大，这使得北京对产业的研发环节有很重要的影响能力。北京是全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地区，集聚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在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占全国的60%，中国工程院院士占全国的近50%；在北京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数目占全国的1/3强；各类专业技术和科技活动人员数位居全国前列，集聚着全国一流的人才。北京科技成果的数量和水平在全国居领先地位。2002年北京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061件，占全国的18%，在全国各省市居第一位，是位居第二位的辽宁省的近3倍，优势明显。北京还拥有较完善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包括技术市场、高技术实验室、中试基地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孵化器体系等。

其次，北京具有较强的市场辐射能力。“首都”北京，本身就是巨大的品牌象征，巨大的无形资产。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旗帜。北京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商务中心，也是一个高水平、高容量的市场。北京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有较高标准，并具有千亿元生产资料和千亿元消费品的市场容量。这都赋予产业发展以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市场优势。

中关村越来越明显的“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空心化发展趋势，显示了北京对相关产业越来越强的控制能力。

（2）战略资源。除了高度密集的人才资源外，北京也具有较丰富的管理、技术、资本、信息等战略资源。以信息资源为例，北京拥有全国信息库总量的1/3，我国连接因特网的四大网络中心均设在北京。这些战略资源不

仅是北京产业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也是北京进行产业辐射的战略要素和载体。

（3）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北京有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依托，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已具规模，并培育了联想、用友等知名企业。现代制造业正在崛起，移动通信、汽车等产业以开发区为载体形成集群，并具有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除新兴产业之外，在传统上北京也形成了基础雄厚、门类较多、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化工、机电等行业在国内有一定影响。这些产业和企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对其他地区的产业扩散，是北京进行产业辐射的主体。

（4）产业发展的制度和文化示范。北京促进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较明确的规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的财税、金融、人才等扶持政策。中关村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祥地，以“创新，创业，人本，竞争与合作，鼓励冒险，容许失败”为主要特征的产业文化与产业实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先进制度和文化使北京形成产业辐射的“场效应”，对周边地区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最根本的影响。

2. 津冀地区具有一定的接受辐射的能力

（1）产业发展水平。津冀地区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水平，成为接受北京的产业辐射、与北京进行产业互动的基础。天津是传统的工业城市，人均工业产值在全国名列前茅。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也迅速发展并形成一定竞争力。河北已形成钢铁、化工和医药、建材、机械、食品、纺织等为支柱产业的轻、重工业齐发展的产业体系。其环京津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同时，津冀地区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发展层次与北京存在差距，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远不及北京。一定的产业梯度是产业辐射的基本条件。

（2）生产要素禀赋。北京虽然具有战略资源优势，但自然资源不足，生态系统脆弱，缺乏产业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天津则拥有丰富且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河北的矿产、煤炭、石油、土地等自然资源较丰富，一般劳动力的数量多、成本低。三地在生产要素禀赋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为进行产业整合和分工协作奠定了基础。

三 不利于北京产业辐射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1. 北京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

北京虽然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水平，但总体来说实力不强，影响到北京对周边地区的产业带动力。北京的工业竞争力与天津相比并不具有优势，与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相比则差距明显。2003 年，北京的工业总产值为 3810 亿元，不及天津的 4371 亿元。2003 年北京产值超过 300 亿元的产业只有电子信息、汽车和石化，支柱产业单一。而上海的电子信息、汽车、石化及精细化工、钢铁及成套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产值均超过 500 亿元。2003 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1521 亿元，只相当于上海的 51%。北京很多研究成果只停留在发表论文阶段，没有对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也导致了北京高新技术的扩散性弱，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低。源于北京本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比较少，北京也没有自发形成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

从资金来源看，北京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近 80% 由外资（跨国公司）控制。移动通信、汽车等主导产业均以外企或合资企业为龙头，缺少自身的品牌，内源型高技术产业明显不强，外资主导是北京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一些主要的跨国公司掌握着核心技术，并没有在本地被模仿和扩散，“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北京本地企业的参与程度较低。接受跨国公司的产业辐射成为北京产业发展努力的方向，因此也无暇顾及对周边的产业辐射。

北京尚未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增长潜力的高附加值、高关联度的新兴产业，在此之前转移传统产业或进行异地配套，必然会影响北京的就业和财政收入。因此北京对产业转移进行行政干预、实施“把本地企业消化掉”的产业配套政策就不难理解了。同时，北京地区自身发展很不平衡，郊区特别是一些远郊区相对落后，郊区如何更好地接受市区的产业辐射是北京最关注的问题。这都影响到北京对周边辐射的积极性。

2. 北京与天津的合作共赢意识较差

由于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地位，京、津构成了区域的“双子星座”。产业发展重点均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这本无可非议，但两市没有因此形成紧密的产业联系、互动和良性竞争，而是产生了利益冲突和对有限资源的竞争。通过分工合作和有效竞争，促进两市

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进步，达到共赢，是京津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共赢意识的缺乏使现实与这一理想状态相差较远。

3. 北京与河北的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河北能与北京进行产业衔接的中等城市数量很少，小型城市的产业水平低下，北京与周边中小城市的产业传递落差很大，甚至形成了产业断层。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河北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刚起步，两地的产业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距。在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占据十分明显的优势地位，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但这一产业在河北发育程度较低，难以自然形成垂直分工、产业衔接。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首要依托的是区域的创新能力，而这正是河北的弱势，先天不足使河北处于新经济发展水平的低谷。作为新经济策源地的北京自然无法很好地带动河北的发展并促进经济一体化，强弱难以联合。

四 北京产业辐射作用发挥的途径、现状及评价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论对周边地区还是全国都发挥着一定的产业辐射作用。具体来说，其对津冀地区的产业辐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技成果产业化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作为科技中心的北京进行产业辐射的重要途径。北京的院校、院所每年产生大量的科研成果，如何把这些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其真正创造价值，已逐渐成为最被关注的问题。因为土地、人力的成本高昂等原因，北京不易成为一些成果转化的首选地。而河北则拥有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从而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再加上毗邻北京的“地利”优势和一定的产业基础，使得河北有能力接收北京的一部分成果转化项目。事实上，在河北的霸州等地已经有这方面的成功案例。这多是政府主导的成绩，也是个别的现象。与“地利”相比，河北所接收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还远远不够。这是由河北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创新能力和氛围、人员知识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决定了河北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不足。北京有相当数量的科技成果在长三角、珠三角得以产业化，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产业化能力远超过了成本劣势。

河北正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比较典型的如在廊坊开发区创建的科

技企业孵化器，为北京的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开发区正逐步成为北京的研究成果在河北转化的有效载体，从而有望“星火燎原”，促进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2. 北京作为研发、营销中心，津冀作为生产基地的产业链配置

“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和企业布局是北京进行产业辐射的重要形式之一。这是北京通过对研发、营销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的共同发展。

北京“总店”、天津“后厂”成为大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成功的运营模式。他们看重的是：北京具有良好的亚太区域性商务中心职能，是中国教育、科技最发达和人才最集中的地区。因此选择在北京设立总部和研发中心，将天津作为生产基地。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0多家在中国开办各级办事处、代表处、中国总公司，其中一半以上设在北京。摩托罗拉、三星集团等大型跨国公司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将其在华最大的生产基地设在天津。一汽丰田公司则将销售总部设在北京海淀区，将生产基地设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的一些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将生产基地建在北京以外的地区，从而使北京表现出明显的总部、研发机构和销售总部密集的特征。如联想将生产基地设在惠州，方正将生产基地设在东莞等地。据1994年统计资料分析，北京试验区64%的产值是在广东省创造的。河北特别是环京津地区也逐渐成为京津产业的生产基地。因为距离较近、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政府服务到位等原因，北京汉王科技公司将生产基地建在廊坊的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还聚集了信息产业部39所、45所、数字技术研究所等一批科研院所，正在积极构筑北京高科技产业辐射的接收线，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电子信息、新医药、新材料等产业加工基地。在涿州，投资1亿元的清华大学清华运达信息研发基地、投资13亿元的北新建材集团工业园、投资5.6亿元的北京运兴蓝晶浮法玻璃项目、总投资20亿元的中国农大涿州科技园区等项目先后启动。在张家口，北新建材和星牌建材建立了生产基地，就地取材，实现了企业和地方的共赢。

津冀的一些企业也开始将总部或研发中心迁到北京，如河北的恒利药业、建龙钢铁集团、海湾集团等，以充分利用北京的战略资源优势。

3. 产业集群内的产业配套

优势产业集群是区域竞争力的具体表现。京津地区的信息产业、汽车产

业等均在全国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产业配套不完善，分工协作不紧密，没有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在这一地区还没有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京津地区的产业链配套以把本地企业消化掉为主要目的，没有形成由“专、精、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集群。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大企业在选择配件供应商时，面对的不是单个的企业而是企业群。联想集团将笔记本制造部分由北京搬到上海，就是因为上海周边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具有完善的配套产业。缺乏配套产业，使北京的产业发展失去了依托，制约了北京产业辐射能力的发挥。目前，在天津、河北廊坊设立了专门的汽车配件园区，有望成为实现京津冀产业分工协作的有益实践。

4. 技术产权交易

通过技术输出进行技术扩散，从而实现间接的产业辐射，是作为全国科技中心的北京进行产业辐射十分重要的途径。北京的技术流向全国各省市及国外。2003 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265.36 亿元。其中流向上海 21.26 亿元，占 8.01%，居第一位；流向广东 12.66 亿元，占 4.77%，居第二位；流向江苏和浙江的分别居第四和第六位。由此可见长三角、珠三角接受技术扩散的能力和主动性较强。而与河北的技术成交额为 7.02 亿元，占 2.65%，居第五位；与天津的成交额为 4.04 亿元，仅占 1.52%，居第 11 位。与其他地区相比，津冀并没有因为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而在接受技术辐射上显示出优势，这是由津冀自身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进行技术升级的要求、接受技术扩散的能力决定的。上海往往将从北京吸收来的原创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再转卖给周边地区，以巩固自身的龙头地位。北京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带动能力则受到了周边自身技术接收能力的制约。

5. 人才共享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北京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使其获得了产业腾飞的基础，而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津冀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人才输出是北京对周边地区进行产业带动的有效途径，但现阶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北京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津冀地区。人才共享可以成为北京进行人力资源辐射行之有效的方式，即“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区域合作的成功渠道之一，如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在促进上海对周边地区的产业带动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人才共享在京津冀地区初现端倪。如廊坊正积极拓宽高层次人才引进的

“绿色通道”，鼓励“户口不迁，关系不转，来去自由”的人才“柔性流动”和智力交流，吸引国内外尤其是京津地区的高级专业人才采取技术入股、创办企业、开展学术交流及在企事业单位中临时或长期兼职等各种方式创业和发展。

6. 产业竞争

北京具有相对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电子信息、汽车、医药等产业能与天津、河北形成高水平的竞争。竞争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有序、激烈的产业竞争能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协作、达到较高层次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竞争也是北京进行产业辐射的重要途径。

北京和天津都将移动通讯、汽车等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由于同样面对京津等市场，必将产生竞争。京津在这些产业上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平分工，这是竞争和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

7. 产业转移

新形势下，在北京发展一些产业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受市场力量的驱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必将进行产业转移。河北则由于毗邻北京、具有相应的产业基础、产业运行成本低等优势成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这共同促进了北京和河北的产业结构升级。

一些产业不再符合北京的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环境要求，搬迁到河北具有较强产业基础的地区，从而实现强强联合。冶金产业即是典型，如首钢已逐步向冶金业实力较雄厚的河北进行转移，200 万吨钢铁项目迁至唐山迁安，投产后迁安将每年增加税收 7 个多亿，这只是首钢庞大搬迁计划的第一步。

机械制造、纺织等产业因为成本劣势而搬离北京。保定高碑店市原来为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初加工，地处长安街的一机床铸造分厂要迁出市区，高碑店与一机床合资建起了北京第一机床（高碑店）铸造公司。北京的知名制造企业白菊电器也将部分生产线迁至霸州。

为了建设清洁生产城市，北京与河北曾一次签订工业合作项目 90 个，投资 38 亿元，其中包括 11 家企业整体或部分搬迁到河北。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如考虑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北京地方政府给企业外迁施加阻力；由于相关监督管理机制缺位和地方政府过分追求短期利益，一些污染项目也迁到了河北。这都影响到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五　促进北京产业辐射作用的充分发挥，实现京津冀经济圈产业协调发展

京津冀经济圈具有较为扎实的传统工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只要京津冀三地能实现有效的产业整合，北京的产业辐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这一地区必将形成传统产业不断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实现长足发展，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齐头并进的产业格局。

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天津主要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河北则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产业分工来看，北京主要侧重于研发、营销中心的功能，一定程度地发展“高、精、尖”的制造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并以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促进三地的产业协作。与北京的产业功能相对应，天津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主，成为重要的制造基地，并依托港口优势发挥相应的服务业功能。河北应成为先进制造业发展基地和北京、天津相关产业的配套基地。这样的产业发展方向符合三地的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北京产业辐射作用的发挥。

充分发挥北京的产业带动作用，实现京津冀经济圈产业协调发展，“政府推动，市场主导”是基本路径。政府从宏观的产业定位等方面把准方向，实践的繁荣程度则要由市场规律决定。关键在于北京的产业辐射能力和天津、河北接受辐射能力的提高。北京应积极培育适合自身定位和特点、具有较高附加值和知识含量的新兴产业特别是新兴第三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发挥研发优势，进行源头创新，并转化成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具有较强带动力的龙头产业和企业；树立“发展周边就是发展自己”的观念，推动与周边地区的产业联系。京津联合对京津冀经济圈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天津发达的第二产业正好配合北京发达的第三产业，并促进首都功能更好地发挥。天津应强化与北京的共赢意识，实现优势互补，与北京共同大力推进制造在天津，研发和营销在北京的产业共赢模式，并在一些与北京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产业上达到水平分工、共同进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京津对河北经济辐射作用的发挥直接取决于河北自身的发展水平。河北首先应立足自身实际，借助京津的科技力量，实现具有

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积累财力、人才和管理经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可以积极引进京津的产业化项目，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应与京津的相关产业进行产业配套和垂直分工，吸引直接投资是有效途径。津冀也应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与自身的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并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与北京的现代服务业实现错位发展，分工协作。

受经济辐射内在作用的影响，将来北京、天津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新兴第三产业为主。河北则会拥有较为发达的传统工业，并与京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形成产业配套。在京津冀经济圈，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旅游业等会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也会获得较快发展。

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包括组建产业联盟等如下几个方面。

（1）以产业联盟整合京津冀相关产业资源。产业联盟对加强相关领域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增强企业间的交流与沟通等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区域产业资源的整合和产业发展。产业联盟是培育产业集群的有效组织形式。京津的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京津冀的医药产业等都有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首先考虑由北京牵头成立跨区域的产业联盟，从而将三地的产业一体化发展落到实处。

（2）津冀应充分利用北京的人才资源。人才是关系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北京是津冀产业发展的重要人才辐射源，虽然津冀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及北京，但只要秉承“以人为本”的观念，提供真正让人施展才华的平台，照样会吸引北京的高层次人才来创业和工作。同时，聘请北京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到津冀的企业兼职是另一条重要途径，交通、通讯条件的完善保证这种形式能实现较为充分的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为我所用”，与北京达到人才共享。

（3）积极推动三地产学研的合作。建立与技术创新源的直接联系是提高区域技术扩散效益、培养企业二次创新能力的关键措施。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界应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特别是北京和天津的高校、科研院所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通过与这些研发力量的直接合作，了解特定行业最新技术研发动态，获得创新技术产业化的优先权，从而保证企业拥有同行业先进的技术，处于行业技术的高地；而院校也可以由此实现与市场的接轨，从而推动科研的市场导向。京津冀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进步均

离不开产学研的合作。

（4）以园区为点、以交通干线为主干进行产业联合和产业扩散

在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载体，已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地带。只要加快各园区之间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差异化竞争战略，这一科技新干线就会成为京津联合、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主干线。

园区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也是产业集群的载体。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祥地，承载了北京最关键、最核心的产业辐射能力。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功能定位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中心、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和销售中心以及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中心。这一功能定位更应成为中关村在京津冀经济圈的功能定位和进行产业辐射的方式。

对河北来说，园区也是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接受产业辐射和技术扩散，进行产业配套的有效组织形式。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已粗具规模。河北应进一步发扬这一形式，与京津实现有效对接和错位发展，并以园区为增长极，带动区域相关产业和其他地区的发展，达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5）促进京津冀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

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建设区域创新网络应从以下层次努力：第一，从业人员联系的网络化。包括有利于技术和管理人员交流与协作环境的形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学生、研究人员等身份的灵活转换和多元化。第二，企业层次的网络化。以企业为框架，通过推动企业间交流学习、提供信息、分工合作、相互转包、建立供货关系、进行资本运营等方式，使企业在区域范围内实现网络化的联系和组织，保证企业和行业能够全面参与技术与管理的创新。第三，区域层次的网络化。包括推动业界、高校、科研机构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网络化，鼓励形成研究为商业活动服务、商业活动为研究提供基础的良性循环，发挥政府等公共部门在学区和园区建设、产品订购等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曾刚：《技术扩散与区域经济发展》，《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 年第 3 期。

崔大树：《长江三角洲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3 年第 3 期。

京津冀一体化：基于河北的分析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颜廷标　崔　巍

一　京津冀经济圈中河北省的基本特征

河北的基本特征主要可以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发展、城市功能布局和区域资源分布等五方面来概括。

1. 经济增长特征

如表1所示，自1998年以来，河北经济发展的速度呈波动性上升，到2003年GDP的增长达到了15.9%，进入经济繁荣期。整体来说，河北的经济发展呈周期性波动，且表现出上升期加长、衰退期缩短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升。

表1　近年来河北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年　份	GDP总值	GDP增长速度	投资贡献率	消费贡献率	净出口贡献度
1998	4271.79	7.6	63.41	35.74	0.86
1999	4586.1	7.4	49.11	43.1	7.6
2000	5107.69	11.4	34.64	49.54	15.93
2001	5597.34	9.6	30.18	54.95	14.86
2002	6143.91	9.8	27.42	56.97	15.62
2003	7122.01	15.9	47.9	45.1	7.0

资料来源：《河北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具体来说，目前河北经济增长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①以投资驱动为主，如表1所示，虽然自1998年以来有些年份消费贡献率持续提高，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的保持靠消费，而提高依然要靠投资拉动。②河北省经济

增长依然依靠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河北省经济增速较快的时期往往是冶金、建材、煤炭行业增长快的时期，2003年的快速增长正是如此。③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国有资本拉动，只有国有经济速度、效益的提高才会带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虽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推动民间资本作用的发挥，但其作用尚不明显。

2. 产业结构特征

河北省产业结构演变如图1所示。河北目前的结构优化度还较低，第一产业占15%，第二产业依旧发挥主导作用，且在2003年呈现出略微上扬的趋势，服务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34%左右。整体来看，河北产业结构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向优化的方向演进，但转换速度过慢。工业产业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行业，竞争力较强的多为初级产品，而服务业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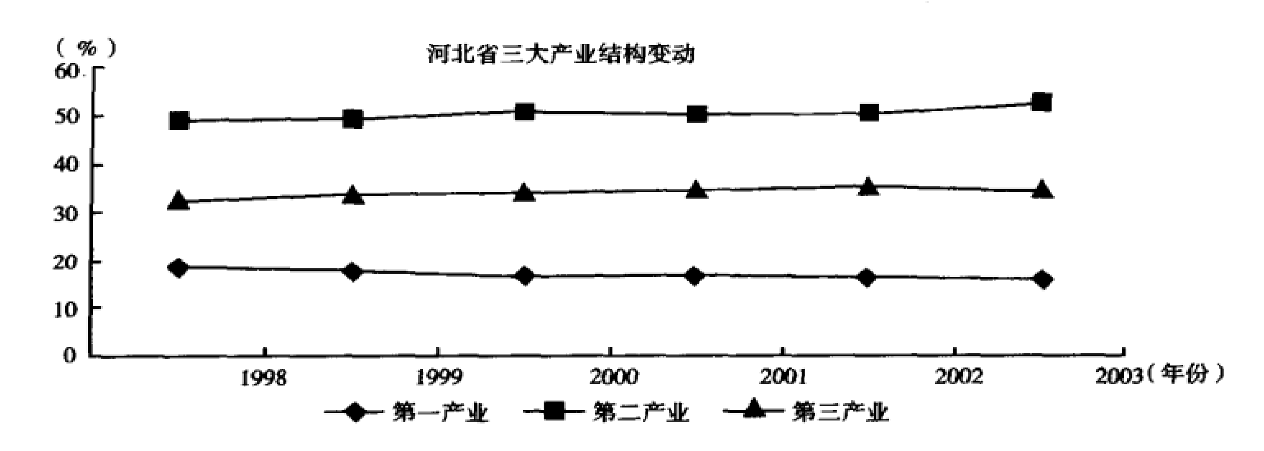


图1 河北省三大产业结构变动

表2 河北省三大产业结构变动

单位：%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第一产业	18.6	17.6	16.2	16.4	15.6	15.0
第二产业	49	49.1	50.3	49.6	49.8	51.5
第三产业	32.5	33.3	33.5	34	34.6	33.5

资料来源：《河北省经济统计年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目前河北省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冶金、化工、医药、机械、建材、食品等，这些产业占据了工业增加值的前几位，但与外部比较而言优势并不突

出，尤其与京津的支柱产业存在趋同现象，更降低了这些产业在河北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拉动作用。

目前河北的结构特征对区域发展有着积极的含义：①河北与京津在三大产业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态势，北京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而天津的服务业比重也与第二产业持平，只有河北的产业结构依旧保持“二、三、一”的格局；②河北传统制造业基础较好，有利于京津传统制造业的外迁与合作，随着“奥运经济”的发展，这一态势将会得到持续增强。

3. 科技发展特征

如表3所示，河北省的科技发展主要有三个特点：①科技对河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呈波动态势，“八五”时期最高，随后不断下滑，反映出目前科技尚未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②与京津相比，河北省的优势在于产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应用，在知识创新、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方面与京津有一定差距；③与京津相比，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差距较大，虽然河北省的两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15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加快了发展与升级，但整体水平差距较大。

表3　河北省不同时期的科技贡献率

单位：%

时　　期	GDP增长	科技贡献率
“八五”期间	8.37	68.89
“九五”期间	14.6	54.19
“十五”期间	11.05	32.96
1998～2002年	9.52	27.77
1986～2002年平均	10.41	47.94

资料来源：薛维君、颜廷标：《河北省经济增长相关因素分析》，《河北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河北的科技发展对区域一体化有着较大的需求：①河北急需充分借助京津科技资源来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②河北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知识创新能力薄弱，京津冀三省市在科技市场上有较好的互补性；③河北已经加快了园区再造的步伐，这进一步提升了河北承接京津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外迁的能力，同时也必将有利于河北成果应用和产业转化能力的提高。

4. 城市功能布局特征

从环京津城市布局来看，河北省的城市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功能区：①京津北部城市如张家口、承德等城市主要定位于资源保护区、生态屏障、休闲旅游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劳务基地；②京津南部城市如保定、廊坊、沧州等城市主要定位于制造业基地、京津科研和产业转移扩散接受基地、生态农业、后花园、城郊型经济；③京津东部城市如唐山、秦皇岛等城市主要定位于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旅游观光基地、商贸物流中心。这一功能布局的深入实施将会很大程度上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5. 区域资源分布特征

①河北劳动力资源丰富，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在京津务工。相对而言，京津则是全国的人才高地，但缺乏有一定水平且成本较低的劳务人员，两者在人力资源的问题上形成了良性的互补；②河北省生态和旅游资源丰富，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承德区域保持了较好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可为京津的发展提供绿色的屏障，另一方面拥有大量的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等待开发；③河北省有秦皇岛、京唐港、黄骅港等港口资源，还有正在建设的曹妃甸矿石码头和原油码头，为区域与外地的资源流动等提供了良好的通道；④河北省煤矿、黄金等能源原材料资源，在全国占有一定优势。

二　基于河北角度的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现状与趋势

河北省特征分析表明京津冀在经济合作领域蕴涵了较大的潜力，而就目前的合作情况来看，则主要可以从合作项目、人力资源、产业合作和资源开发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河北与京津经济技术合作的项目分析

（1）项目的种类与来源分析。如表4所示，河北省在2003年与外地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已经执行的项目共计7339项，其中来自北京的占29%，来自天津的占14%，来自上海的占3%，而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占54%。京津两地共占了43%的项目份额，应该说这反映出了京津冀区域内部日趋紧密的合作态势。再从合同的类型看，在经济合同中京津两地共占了38.1%的份额，在技术合同中京津两地占了46.4%。总体来说，在河北与京津的技术合作中，河北与北京的联系强于天津，而三地市的合作方式则是技术类型多于经济类型。

表4 2003年河北经济技术合同项目统计

单位：个，%

地区	执行合同					
	经济	比重	技术	比重	总计	比重
河北总计	3066	100	4273	100	7339	100
北京	779	25.4	1348	31.5	2127	29
天津	389	12.7	635	14.9	1024	14
上海	86	2.8	131	3.1	217	3
其他	1812	59.1	2159	50.5	3971	54

资料来源：河北省发改委经合办，《经济合作成果统计表》，2003年1～12月。

（2）项目的资金分析。如表5所示，2003年河北省实际引资328.4亿元，其中北京所占比重为35.3%，天津所占比重为11.6%，其他地区占48.8%。京津两地共占了46.9%的份额，相对于执行合同个数的情况略有提升，反映出河北与京津合作项目的引资能力高于外地。就经济项目而言，北京的投资比重为38.4%，天津的投资比重为10.6%，共占了49%的份额，而技术项目则共占了43.9%的份额，这一点与前面的数量分析存在差异，反映出经济项目的引资力度大于技术项目。

表5 2003年河北实际引资统计

单位：万元，%

地区	本期实际引资					
	经济项目	比重	技术项目	比重	合计	比重
河北总计	1945498	100	1338906	100	3284404	100
北京	747061	38.4	413214	30.9	1160275	35.3
天津	206960	10.6	174693	13.0	381653	11.6
上海	63136	3.2	77183	5.8	140319	4.3
其他	928341	47.7	673816	50.3	1602157	48.8

资料来源：河北省发改委经合办：《经济合作成果统计表》，2003年1～12月。

总体而言，无论是项目个数还是实际的引资，河北对京津的依赖度都在40%以上，综合体现出三省市趋于紧密的发展关系。以沧州为例，其引进的

京津资金2002年比2001年增长了52%，而2003年比2002年又增长了75%。另一方面，对比上海与河北的项目合作关系，可以看出河北与外部先进省份、区域的合作相对比较分散，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这也反衬出河北经济外向度低的问题。

2. 河北与京津的人力资源流动分析

表6　2003河北引进人才统计

单位：人，%

引入方式		北京	比重	天津	比重	上海	比重	其他	比重	类型合计
人才级别	高级	2715	30.8	1391	15.8	517	5.9	4191	47.5	8814
	中级	4949	28.3	3090	17.7	706	4.0	8735	50.0	17480
	初级	3869	31.5	2351	19.1	533	4.3	5544	45.1	12297
引进方式	调人	1586	39.4	512	12.7	129	3.2	1794	44.6	4021
	聘用	5387	29.4	3053	16.6	725	4.0	9180	50.0	18345
	技服	4560	28.1	3267	20.1	902	5.6	7496	46.2	16225
各地区合计		11533	29.9	6832	17.7	1756	4.6	18470	47.9	38591

资料来源：河北省发改委经合办：《经济合作成果统计表》，2003年1～12月。

（1）引入人才的级别分析。如表6所示，2003年河北共引入人才38591人，其中高级占22.8%，中级占45.3%，初级占31.9%。从人才的来源看：来自于北京的初、中、高级人才所占其类别的比重，都基本维持在30%左右；来自于天津的初、中、高级人才所占其类别的比重则分别为19.1%、17.7%和15.8%。整体来说，来自京津的初、中、高级人才分别达到同类的49.6%、46%和46.6%，从数额到比重上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2）引入人才的方式分析。2003年以调入、聘用和技服三种方式进入河北的人才，分别达到了10.4%、47.5%和42%。从北京的情况看，调入方式在引进人才中所占比重达到了39.4%，而聘用和技服两类方式所占比重均为29%左右。从天津的情况看，调入、聘用和技服三种方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2.7%、16.6%和20.1%。从京津自身的角度来看，选择调入、聘用和技服方式流动的人分别占两市总额的11.4%、46%和42.6%，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京津冀的人才流动市场呈现出流动性较强的特点。

3. 河北与京津间的产业合作分析

（1）近年京津与河北间产业合作的基本状况。如表7所示，依据

2003、2004两年环京津市县上报政府材料统计，河北在与京津的主要引资项目的产业分布中，农业占4%，工业占67%，而服务业占20%，其他如基础建设行业占9%。一方面反映出工业合作仍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合作呈不断上升态势，其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农业和基础设施共建而处于第二位。

表7　引资项目的产业分布

单位：个，%

行　　业	基础建设	农　　业	工　　业	服 务 业
数　　量	7	3	51	15
比　　重	9	4	67	20

资料来源：依据2003、2004两年环京津市县上报政府材料整理计算得出。

（2）农业合作分析。在农业方面河北与京津的合作主要集中于产销市场的两端：①侧重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开发领域，通过联合攻关充分发挥京津的技术创新的优势，实现河北农业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承德的露露集团与清华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家饮料行业博士后流动站，为企业提升产品档次和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提供服务；唐山丰润依托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建立了中国唐山奶业科技园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河北省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②侧重于满足京津农产品的需求领域，河北目前已经成为了京津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市场。以蔬菜为例，如表8所示：2000～2003年河北在北京蔬菜市场的占有额由原来的36%上升到了50%，而在天津市场上的占有额也从24%提高到了40%。

表8　河北蔬菜在京津市场的份额状况

单位：%

年　　份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北　　京	36	40	45	50
天　　津	24	31	36	40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对河北省农业厅、省发展改革委环京津专业市场座谈统计整理。

（3）工业合作分析。依据2003、2004两年环京津市县上报政府材料统计，如表9所示，在河北主要引资的51个工业项目中，医药制造业排第一

位，往后依次是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纺织业和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等，这些合作基本上是在河北省支柱产业的框架范围内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河北在电力、医药制造和纺织业等方面与京津的支柱产业重构程度较小，这三类产业占有20%的比重，显现出目前的互补式发展的特点。

表9　主要引资项目分布

单位：个，%

	黑色冶金	医药制造	电力供应	化学原料	纺织业	煤炭业	食品制造	石油加工	其　他
个数	7	13	4	8	3	2	2	2	10
比重	13.7%	25.5%	7.8%	15.7%	5.9%	3.9%	3.9%	3.9%	19.6%

资料来源：依据2003、2004两年环京津市县上报政府材料统计整理。

（4）服务业合作分析。在近年来的合作发展中，京津冀在服务业的合作逐步增多，其中商贸项目所占份额较高，如容城与北京建工集团合作的商贸城项目，合同引资1.5亿；唐山与天津克瑞思集团的商业项目，合作投资1亿等，特别是以连锁方式为主的商业合作，使得北京多个较大的商业企业落户石家庄、唐山等城市。旅游业的合作也发展较快，其中包括北京地亚集团在京唐港投资2亿元建设旅游项目，北京瑞成工业集团投资3000万建旅游乐园项目等。而其他行业如物流、房地产等新兴服务业也有良好的合作趋势和较大的合作潜力，如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在京唐港投资2亿建设物流中心；北京东方依水源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2亿元建设国际会展中心等。总体来说，随着三省市在旅游、交通等领域中合作力度的不断加大，服务业的合作显现出较大的增长空间。

4. 在资源开发、能源利用和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合作进展

利用河北省的资源特点是目前京津冀在合作开发中把握较好的一环。①京津在用水及环保等方面与张家口、承德地区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承德市不仅控制密云水库56.7%、潘家口水库93.4%的水资源，还是阻挡内蒙古风沙的生态屏障，因此三省市在水利资源和生态保护的环节上有较为密切的合作。②在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领域，北京企业先后在河北投资了大唐发电厂、国华电厂等一批电力生产和供应实体。③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三省市的合作也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如唐山与北京联合建设的京唐港，2002年货物

吞吐量突破1400万吨，首钢参与的曹妃甸20万吨矿石码头项目也已开工建设，这些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京津冀经济圈的协调发展。

三 京津冀经济圈协调发展的评价及进程判断

总体来说，目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水平较低，但力度呈不断加大的趋势，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因此针对目前的合作状况可以进一步纳入一体化的总体进程来分析评价。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遵循两个规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由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提出，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主要包括：①自给自足阶段；②乡村工业阶段；③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二是空间一体化规律，由弗里德曼提出，包括四个阶段：①多个地方中心的低度均衡阶段；②极化效应加强，强中心出现；③强中心的扩散效应加强，中心—外围特点显著；④形成功能互相依存的城市体系，处于高度均衡阶段。依据上述规律，我们分别从经济社会和空间一体化两个方面进行概括评价。

1. 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与阶段判定

（1）经济实力评价：经济技术合作趋于密切，但综合实力尚存在较大差距。

表10 2002我国三个经济圈的发展比较

单位：元，亿元，%

区　域	人均GDP	GDP	经济增长率	三大产业结构比	城市化水平
长三角	17459	23837	11.02	7.98:50.75:41.3	55
珠三角	14976	11770	9.53	8.78:50.43:40.8	49.6
京津冀	12424	11386	13.02	10:45.36:44.64	38.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因城市化指标缺少，城市化水平为2000年调查数字。

在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和人力资源的流动等方面，河北方面显示出了与京津合作趋于密切的特征，然而这一表现是基于河北自身经济外向度不高的情况下产生的，在各项指标的横向比较中则总体反映出了河北乃至京津冀整体实力上的缺欠。

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为12424元，其中北京人均GDP为28449元，而河北部分地区则是近两年才突破1000美元的，这意味着京津冀经济圈总体发展极不平衡且平均水平较低。相对而言，长江三角洲为17459元，珠江三角洲为14976元，京津冀与其的距离正在逐步拉大。

从城市化水平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城市化率仅为38.9%，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则分别接近和超过了50%。据预测，长三角将在今后的几年中成长为人口达到3亿的经济圈。相对而言，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38.9%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区域的经济发展将更多地面对就业压力，实现高度的工业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2）产业合作评价：梯度明显，但对接点低。如表10所示，从宏观的三大产业结构上看，河北与京津在三大产业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态势，北京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而天津的服务业比重也与第二产业持平，只有河北的产业结构依旧保持于“二三一”的格局。总体来说，京津冀区域内部的梯度是明显的，并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随着京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回流效应依旧会大于扩散效应，产业梯度还会呈增大趋势。

但明显的梯度并不能深入地推动产业合作的全方位展开。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北京往河北搬迁的主要是一些能源开发或污染较重的企业，如钢材、煤炭等从事资源的开发和后续生产，整体制造业的合作范围多局限于产业链的前端，从而导致附加值低，河北产业资本积累慢。就目前产业梯度所产生的效果而言，由于合作的科技含量较低，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就业方面而非经济实力的提升上。

（3）资源开发评价：合作潜力较大，但缺乏“龙型”企业进行市场整合。在前面的合作进展中已经看到，京津冀在用水及环保等方面有着较为广阔的前景，北京在改善环境、发展休闲娱乐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都需要河北的支持，尤其是奥运的到来将大大提升京津冀在生态、环保上的合作力度。河北在基础设施、能源、后备空间等方面都将为京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拓展平台。

但在看到合作潜力的同时，京津冀区域却反映出缺少战略规划、没有“龙型”企业带动等问题。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合作项目均较为分散，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统一的区域资源整合，从而导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能发挥最大效用。比如说，虽然河北旅游资源丰富，但多年来与京津联手合力开发的项目却不多见，许多游客参观完京津后直接赶往其他景点，并未转化成河北的



顾客市场。

（4）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判定：相比较而言，在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和资源合作开发等多个方面，京津冀区域都与另外两个区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虽然河北在传统制造业的部分行业中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近十年来，在与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竞争中正逐步减弱，并且没有跟上制造业电子化、信息化的外部节奏。

可以说，京津冀经济圈的整体经济社会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其中北京的发展水平较高，但其他地区则相对偏低。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比，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2. 空间一体化发展评价与阶段判定

衡量经济圈空间一体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考核区域内城市体系，因此在一体化进程的判断中，我们主要从城市等级分布、中心城市能量级和城市功能分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中心城市的能量级评价：尚处于不断调整和增强阶段。如表 11 所示，在五个中心城市中，上海的 GDP 总量最高，北京、广州次之，深圳、天津最后。从发展的速度来看，广州、深圳超过了北京、天津。整体来说，上海的能量级最高，其中心城市的地位也极为突出，在核心城市的比较中处于第一层次；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能量级与京津持平，但随着大珠三角的推行，香港将与广州、深圳联手形成新的经济中心区，其拉动能量将大幅提升，因此处于第二层次；京津“双核”则处于第三层次，其能量级要想迎头赶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表 11　中心城市能量级比较

单位：亿元，%

	北　京	天　津	上　海	广　州	深　圳
GDP	3212.7	2051.16	5408.76	3001.48	2256.82
增长速度	10.4	12.5	10.9	13.2	15

（2）京津冀经济圈的城市能量级分布：梯度层次较为单一，且总体能量局限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如表 12 所示，京津冀经济圈主要以环京津七市为主进行衡量比较，人均 GDP 超过 20000 元的有三个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和秦皇岛。圈内的九座城市没有出现人均 GDP 在 30000 元以上能量级

的城市。相比较而言，珠三角的城市能量级分布就显得较为均匀且能量级超过30000元的城市占到了总体的67%；而长三角则梯度较大，其主要城市集中于20000～30000元的区间上。这一情况表明：京津冀经济圈尚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正逐渐向强中心的特征发展；长三角的强中心已经形成；而珠三角已经逐步走向更高的均衡。

表12 各经济圈内城市能量级分布

单位：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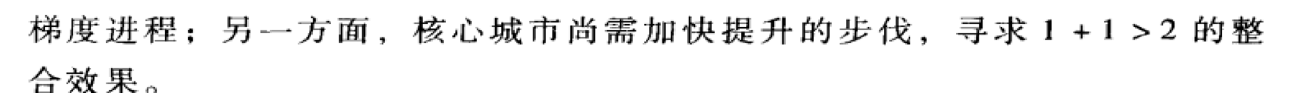
人均GDP	京津冀	比重	珠三角	比重	长三角	比重
经济圈城市总数	9	—	9	—	15	—
10000～20000(元)	6	66.7	3	33.3	5	33.3
20000～30000(元)	3	33.3	0	0.0	8	53.3
30000～40000(元)	0	0.0	3	33.3	2	13.3
40000～(元)	0	0.0	3	33.3	1	6.7

资料来源：《2003年北京统计年鉴》、《2003年上海统计年鉴》、《2003年天津统计年鉴》、《2003年浙江统计年鉴》、《2003年江苏统计年鉴》、《2003年广东统计年鉴》、《2003年河北统计年鉴》。

（3）城市功能体系评价：城市定位趋于明晰，但竞合关系尚未有实质转变。从城市体系布局来看，京津冀经济圈的功能定位日趋明确，如张家口、承德两市在区域合作中主要侧重于特色行业、生态旅游等行业发展；而保定、唐山、沧州则主要侧重于制造业发展等。从空间构成上看，京津都市圈的空间构架已逐步形成，如涿州已经具备了卫星城的特征，保定、唐山、廊坊等市县也已经发展成为京津经济活动的扩展和流动区。

可以说环京津市县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打京牌、唱京戏”等依靠京津进行发展的思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效果，但尚未能积极地从竞合的角度进行战略转型。反观长三角区域内部的关系变动，其核心城市上海的产业转型很大原因在于江苏、浙江等城市在传统产业上的迅速发展使上海失去了竞争优势。可以这样说，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河北尤其是环京津市县来说是一个机遇和平台，能否利用这一平台逐步形成具有河北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产业，是利用这一机遇的关键所在。

（4）空间一体化阶段判定：京津冀经济圈的空间一体化进程尚处于中心城市能量级不断提升，极化进程不断加强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经济圈内部的城市等级还未完全展开，梯度层次单一，尚未进入类似长三角的多



梯度进程；另一方面，核心城市尚需加快提升的步伐，寻求 1 + 1 > 2 的整合效果。

总体来说，空间一体化进程的判断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判断是相一致的，因此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京津冀经济圈尚处于极化效应加强、区域内部梯度逐步增大、中心城市加快调整提升的初步发展期。

四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河北的方向与路径

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分析较为清楚地显示了京津冀区域的阶段性状况，其与外部的期望尚存在较大的落差。问题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京津冀区域在方向及实现的路径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单就河北自身而言，一体化的方向是较为明确的：就是要推动京、津、石等都市区域的形成，从而更大地提高区域内部的资源效率，更好地实现经济转型及快速发展；但在实现路径上则应更多地考虑到实力状况和总体一体化进程等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由“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向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相结合的协作模式转变，实现产业合作过程中对接点的提升。在具体的产业调整及合作中走改善产业关联——加强梯度扩散——形成产业集聚的分阶段发展路径

在与京津的经济技术合作中，由于自身科技水平偏低等原因，河北更多的是倚重于垂直分工，而水平分工的合作方式始终无法得到发展，这一方面进一步促成了河北产业承接点低的现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更多合作项目流向外部区域的事实。基于这一认识，河北在今后的产业合作与发展中应分三个阶段重塑：

第一步：加快产业的改造升级，实现与京津产业关联模式的改良，逐步提高与京津产业链条的对接点。要把京津冀一体化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河北就必须加快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改变目前制造业合作中偏重初级产品生产的现状，寻求深加工及合作开发等更高层次的对接。

第二步：培育龙头企业，强化由产业对接点提升给河北相关产业链条带来的整体拉动效应，实现经济增长绩效的倍增。河北在与京津的产业合作中应充分发挥产业合作模式转变所带来的扩散效应，加快河北自身的资本积累

进程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步伐。

第三步：巩固和加强相关产业市场，培育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河北面临世界制造业转移的良好机遇，如果通过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形成对区域外部的良好的承接能力，并由此形成不同特点的产业集聚，将会为京津冀一体化带来持续发展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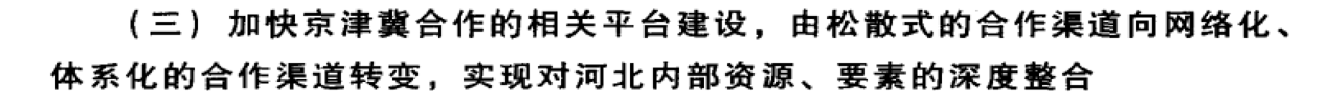
（二）整合空间布局的发展战略，推动空间一体化格局由京津唐内闭式的结构向京津唐、京石、京秦等多条轴线式发展的结构演变，在一体化进程中走中心城市强化——多条轴线发展——网络化都市区域的发展路径

从京津冀区域协作的发展进程来看，都市圈理论对于河北而言，更多地停留在一个发展方向的水平上。因为都市圈本身就意味着区域产业关联的互动和网络化，而就目前的空间构架而言，京津冀内部尚处于中心城市强化、核心轴线形成的发展过程，离真正发挥都市圈的整体作用尚有较远的距离。因此现阶段在空间的布局上，京津冀应充分鼓励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的发挥，并更多地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整合。

首先，应进一步推动京津作为核心城市的强化进程。河北应积极地配合京津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北京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但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远未完成，而天津也正处于第三产业不断上升的历史时期，两个核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优势互补的实现关系到河北与京津的产业合作进程，也关系到整体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打造区域内部的多条发展轴线。近期，河北已经提出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一线两厢”战略，即形成以“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为“一线”、以南北为“两厢”的空间构架。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应通过这一战略，围绕京津的核心城市地位，进一步打造两至三条发展轴线如京石、京秦等，学习长江三角洲三条轴线协同发展的经验与思路，向内依据各城市的功能特点，形成相应的轴线带动，向外与其他省份乃至整个环渤海区域相连接。

最终，以产业集聚为基础，形成网络化的都市连绵区。都市圈的建立是以产业集聚式发展为背景的，否则都市圈的实践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对于京津冀整体的协调发展而言，都市圈建设还需要依托良好的产业合作。河北的发展有利于形成首都圈的大都市景观，而首都圈的发展也必然推动河北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三）加快京津冀合作的相关平台建设，由松散式的合作渠道向网络化、体系化的合作渠道转变，实现对河北内部资源、要素的深度整合

传统上，在河北与京津的合作过程中，没有形成固定有效的渠道，缺乏相应的平台建设，从而导致合作的渠道较为松散，后续性不强。以科技创新为例，河北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借助京津的科技资源来增强创新能力。河北省自身缺乏国家著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重要问题没有通过内环京津的地缘优势得到弥补，更没有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借助香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浙借助上海那样建立开放的区域创新体系，没有主动接受京津强力辐射，提高创新能力。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河北应注重通过公共平台建设实现与京津协作发展在方式和渠道上的转变。其一，要通过重点协作工程，加快平台的网络化建设步伐。要针对河北目前现有资源的特点，尤其是科技资源的配置特点，通过三省市重点合作工程的带动，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平台。其二，通过平台建设，发挥窗口效应，以稳定的合作渠道为支撑，冲破河北旧有的经济循环模式，进而介入到更高层的科技体系与循环模式中。

（四）转变政府现有的推动模式，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基础上，积极通过经济实力的内在提升，综合解决一体化进程的相关问题，最终实现河北经济发展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活动的协调统一

从政府层面看，河北在一体化进程中推力较大，从京津唐到京津冀，再从京津冀到环渤海等多个层面都给予了较大的扶持力度。如政府每年都固定召开环京津市县长座谈会，出台了《廊坊共识》等一些合作意向书，加大了争取京津产业转移的力度等，都充分说明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但政府现有的推动模式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推动绩效，这与河北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其一，在与京津的经济技术合作中，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从而使微观的企业行为与宏观的发展战略缺乏呼应；其二，由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不良，河北近年来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慢，这不仅降低了河北的综合竞争力，影响了经济实力的提升，也无法有效地冲破京津冀三省市的行政藩篱。

在今后的发展中，河北应更多地练好“内功”，通过改善官员考核机

制、问责制等，为企业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政府应注重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依托科技的进步，实现竞争力的稳固提升，从而更加主动地推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协调发展。

消除环京津贫困带 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区域合作课题组*

区域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矛盾等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指针。2003年，我们对京津冀北的贫困带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这一贫困带是贫困、生态脆弱和城市水源地三重耦合的区域，它的存在对京津冀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统筹考虑协调解决这类地区的贫困和生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统筹解决京津冀现代化面临的地区差距问题，实现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一　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及特点

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廊坊、唐山、保定、秦皇岛六市与京津接壤地区共有贫困人口280万，其中，与京津存在较强的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且集中连片的贫困区域是张家口、承德的全部及保定的易县、涞水和涞源，共24个县区。

环京津贫困带多数距京津两大城市不到100公里，该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遭受人为破坏后很难恢复。不断提高的水源保护标准限制了该地区的

---

* 课题组系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和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合作组成。课题负责人：肖金成、李岚，课题组成员：宋树恩、汪阳红、李娟、高智、刘钊、王月霄、罗静。

经济发展。因此，目前该地区生态性贫困问题仍很突出，还有近200万的贫困人口，八万多平方公里的生态恶化区。贫困带人口分别占河北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和贫困人口总数的38％和36％；其中坝上地区788个村、54.6万人，燕山及其丘陵区1561个村，95.3万人，太行山区381个村、30.5万人。

环京津贫困带与邻近的京津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从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三项指标——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县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20年后的今天，二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

环京津贫困带基本上与我国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和“三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95元和7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04元和1060元，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环京津贫困带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01年，我国东部沿海的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贫困人口发生率均小于1%，辽宁省也只有2%，河北省则接近5%，而河北省的贫困人口中超过一半分布在环京津地区，1/3分布在环京津24县。与沿海地区广东的山区县、浙江丽水、江苏连云港、山东聊城、辽宁辽阳等几个比较贫困的地区比较，2001年24县的人均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其中最高地区的19%、最低地区的66%，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分别相当于上述最高地区的43%、最低地区的91%。24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上述地区，成为我国东部沿海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二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一）贫困带形成原因

形成环京津贫困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但从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敏感的区位、脆弱的自然条件、资源超强开发和决策管理失控是决定性的因素。

1. 敏感的区位条件

环京津贫困带地处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为保护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水源和防止风沙危害，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因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宣化老工业基地的萎缩、矿产采选业的滑坡和城市发展的迟缓，显然都与敏感的区位直接相关。

环京津贫困带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属农牧交错地带，脆弱的自然环境条件导致这一地区成为多种自然灾害的多发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多发的自然灾害，直接影响这一地区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牧业的发展。

环京津贫困带地处内蒙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带，区内明显划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类型，并被永定河、潮白河、滦河、拒马河切割得支离破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特点，使该地区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规模经济。

2. 恶劣的自然条件

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极易遭受人为破坏并且难以得到恢复的地区。区内广泛分布移动及半移动沙丘、沙滩、坡蚀和沟蚀严重的黄土区，超强垦殖形成的退化草场和林地，难以开发利用的石质山地和岗坡、遍布全区的风口和风道，干枯断流的河床和山泉，适应人类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退化的生态环境，导致全区有限的人口承载力难以适应现有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绝大多数劣质耕地处于中度危机和重度危机状态。

3. 自然资源严重超采和退化

长期的超强开发和垦殖，导致区内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自然资源全部动用，并呈持续退化状态。区内的水资源主要是永定河、潮白河、滦河、拒马河四条河流的地表水。由于本区属资源型缺水区，四条河流的地表水资源几乎全部得到开发利用，开发利用程度高达95%以上，即使是丰水年也无河水入海。不仅平原河段全部干枯断流，桑干河册田水库以下已经干枯断流十余年。由于地表水资源超强度开发，区内已经到了无水可采、上下游严重争水的局面，并且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呈现出有水皆污的状态。

环京津贫困带24县人口平均密度达到97.5人/平方公里，为维系区内众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土地资源开发呈现出严重超强垦殖状态。区内的全

部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全部得到开发利用。现有耕地中，绝大部分是旱涝难保收的中低产田，水浇地和基本旱作农田只占耕地面积的25%；现有草场中，绝大部分是严重退化草场，人工草场和得到人工保护利用的草场只占草场总面积的8%。土地资源超强垦殖，导致区内大部分县区土地可持续纯收益下降。

4. 历史上多次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

环京津贫困带的持续贫困和生态破坏，源于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开荒和林草资源破坏，这又导致了人口的超常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明朝时期的大规模毁林建城、清朝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民国时期的大规模屯兵和解放后"以粮为纲"，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最为严重。这一地区的人口过密、草畜失衡和林粮矛盾及其超强的开发活动，显然与历史上多次的重大决策失误有直接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遇到破坏，就很难得到恢复。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承担巨大的人口压力。

5. 扶贫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管理工作不能形成合力

现行的发展决策管理体制和机制难以适应消除地带性贫困和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的需要，区域发展的决策、管理和服务滞后于当地统筹协调发展的需要。自成体系的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管理方式，导致众多的扶贫开发工程和生态建设工程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方式，难以满足流域性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的需要。环京津贫困带涉及潮白河流域、拒马河流域、滦河流域、永定河流域和坝上内陆河流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一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应该统筹考虑，但是，由于目前环京津贫困带隶属于河北省承德市、张家口市两个地级行政区和24个县（区）级行政区，众多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实行的是从省级、市级到县级的分散管理方式，再加上区域与京津密切的资源环境关系，国家和京津两市也在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如此层次众多的生态环境建设方式，导致对整个流域的生态建设不能统筹考虑，生态工程的安排、建设和维护关系难以协调，不能满足流域性整体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的需要，而且在一些重大生态工程安排上，存在着重工程建设安排、轻工程维护和管理的问题，难以保证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后效。

6. 非市场化的资源环境分配方式

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环京津贫困带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不断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关停众多效益可观而耗

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了保护京津的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目前处理京津与环京津贫困带资源环境关系的办法，仍是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资源是无偿提供的，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得不到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动议，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而且根本不能弥补地方所蒙受的损失。这种行政调控式的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仅使得贫困带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根本无法调动起区域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使得区域贫困和生态恶化的趋势始终得不到根本缓解。

（二）贫困带的影响分析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产生了一系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

1. 威胁着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造成了区域环境恶化、河湖干枯断流、湿地山泉消失、水土流失加剧、地表水源污染、土地沙化、草场退化、森林破坏和沙尘暴的频繁发生，导致京津冀北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威胁环京津冀北地区城市供水安全和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天津、唐山频繁出现供水水荒，首都北京多次供水危机和应急调水、官厅水库失去饮用水质功能、强沙尘暴天气的增多，都是环京津贫困带贫困性生态问题产生的直接结果。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局部的生态危机必将发展成为全局的生态危机，出现更为严重的水荒、水资源和风沙扬尘危害，直接影响京津冀北地区的安全。作为中国北方经济核心地区的京津冀城市群，如果失去了当地稳定的水源供应，将供水安全保证寄希望于2010年南水北调工程，将是十分危险的。

2. 影响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北和东西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落差增大。作为南部地区经济核心的珠三角和中部地区的长三角，其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明显超过作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核心的京津冀。这种状况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我国三步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3. 直接影响北京国际大都市形象

理论和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城市与周边的腹地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

有中心城市及所在区域协调发展，才能保持中心城市的持续稳定和繁荣。目前，世界范围的国际大都市尚没有一座国际性城市周边存在如此大范围的贫困区。为保证2008年如期举办29届奥运会，北京正在进行奥运工程建设，并提出了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文化奥运的办奥宗旨。由于首都北京空间的局限性，实现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的办奥目标，必须依赖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而环京津贫困带的持续贫困，直接影响首都办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目标的实现。同时，首都周边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难以保证社会安全和稳定。

三 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设想

为消除环京津贫困带，促进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我们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总体的战略思路是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方案的具体构想和框架设计如下：

（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含义

所谓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是国家为解决贫困与生态问题交织的突出矛盾而在典型的跨省级生态敏感区域建立的一个旨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通过制订并组织实施区域特殊的财政、投资、技术、经济、教育、就业、资源和环境政策，建立保证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体系、城镇体系、就业体系、资源开发管理体系、环境保护体系和生态工程体系，实现区域发展的科学决策和区域政策的有效整合，达到消除区域贫困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双重目的，为全国解决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贫困与生态问题，保证生态安全提供经验和树立样板。

（二）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范围

特殊示范区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北部全部生态敏感区，具体范围界定为：河北省张家口市全部县区、承德市全部县区、保定市3个县（易县、涞水、涞源）、唐山市两个县区（遵化市和迁西县）、北京市6个县区（延庆县、怀柔县、密云县、房山区、平谷区、门头沟区）、天津市两个

县区（蓟县、宝坻区），总土地面积99798.9平方公里，2001年区内总人口1268.47万人。

本区除环京津24县外，将唐山遵化、迁西，天津蓟县、宝坻，北京延庆、怀柔、密云、房山、平谷、门头沟共10个县（市、区）包括在内，因为这10个县（市、区）对京津水源和生态安全有着重要影响，从区域协调性和政策一致性角度考虑，将其纳入生态经济特区范围，与环京津24县进行一体化管理，实行同样的特殊区域政策，有利于从整体上协调资源环境关系，确保京津生态和用水安全。

（三）建立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的思路和目标

1. 基本思路

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为指导，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全新发展观，以消除环京津贫困带，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落差，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京津冀生态安全为目标，遵循生态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综合运用市场、法律和行政手段，通过体制与机制创新、产业升级、城镇改造、人口分布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源优势再造、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转变，建立生态型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体系，形成区域一体化的资源共享、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与保护机制，实现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2. 战略目标

消除环京津贫困带，缩小城乡和区域经济落差，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高标准建成京津冀绿色生态屏障和地表水源保护区，实现全区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四个流域清洁生产，保证京津冀地区生态安全；建立结构布局合理的生态经济体系，创造工业化时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现形式，树立协调贫困地区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样板。

（四）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框架设计

1. 产业框架

第一是第一产业发展框架。

（1）建立不追求粮食自给的节水型绿色种植业。鉴于耕地和水资源条件的制约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区域种植业的发展以不追求粮食自给为基本目标，成为商品粮基地的可能性则更小，但是区域种植业发展并不排斥错季

菜、小杂粮、玉米种、食用菌、马铃薯等特色种植业为提高其商品性而进行的品种调剂。

（2）建立天然牧草和人工饲草依赖型的商品性畜牧业。区域要依托丰富的草场和山场资源，积极探索草场、山场经营制度改革（明晰产权、实现合理流转），增加投入，改良退化草场，建设人工草场；进一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步伐，扩大草地面积，提高饲料林的比重，推进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变；以夯实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畜牧业的商品化。

（3）建立以生态功能为主的生态林和经济林相结合的防护性林果业。结合三北防护林建设，调整林种结构，集中连片发展灌草结合型林业；进一步发展防护类林种（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草场防护林）；有选择地发展经济林、饲料林、薪碳林（重点支持鼓励发展杏扁、山楂、板栗等干果）；在适宜区域发展、建设速生用材林；有步骤推进林业用地产权制度改革，增加林业投入。

第二是第二产业发展框架。

（1）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控制结构性环境问题的发展；滚动性地制定工业发展指导目录；分期分批明确每个时段重点支持鼓励、改造提升、限制发展、逐步淘汰的产业。近期支持鼓励的产业有先进加工制造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生物制药业、服装加工业；改造提升的产业有黑色冶金业、矿产采选业、传统建材；限制发展的产业有化学工业、造纸业、皮毛制革工业；逐步淘汰的产业有电镀工业等“老十五小”和“新五小”工业。

（2）优化工业布局，控制布局性环境问题的发展。推动工业企业向水源保护区外的中心城市和县城集中，一、二级水源保护区内的县城以下原则上不再布局工业项目；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县城的县域特色工业园、生态工业园、清洁工业园，依靠改善园区投资环境吸引县乡工业向园区集聚。

（3）普及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将清洁生产技术作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重要内容，优先安排清洁生产技术创新、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和新产品开发项目。

（4）完善加工制造业产业链，实现工业废弃物资源化，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区域内资源综合利用的重点是能源、矿产、工业“三废”、农业废弃物、水资源、土地资源和废旧物资七个领域；推广成熟适用的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工业清洁生产技术、工业“三废”回收利用技术、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技术等关键技术及产品，研究开发新能源、

劣质资源、资源替代、新型材料和新产品开发等高新技术及产品。

第三是第三产业发展框架。

（1）加快发展生态工程管理服务业。为满足区域内生态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各项生态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发展壮大包括城市园林绿化、防护林管理、森林防火防疫、林草苗种培育繁殖、生态人工培养等在内的生态工程管理服务业。到2020年，力争把生态工程管理服务业发展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性的第三产业。

（2）发展壮大生态和文化旅游产业。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和皇家园林旅游；完善坝上草原风情游、冬季滑雪游、皇家园林文化游、绿色森林游等精品旅游线路，搞好与北京的旅游对接。建设以水利风景区开发建设为龙头，集水利、旅游、林业、农业为一体的水资源综合开发区，形成以生态旅游为主，民俗观光、休闲度假、生态教育为一体的旅游产业。

（3）巩固提高商贸流通业的支柱地位。发挥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用流通的现代化促进生产的现代化，采用现代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商业，实现体制、业态、管理和技术的全面创新，构建以大型连锁集团为主导、经营布局合理、供应网络完善、业态结构优化、企业管理先进、居民购物方便的新型商业流通体系。

2. 人口和劳动力就业框架

首先是人口控制框架。

（1）建立“两增一减”、三级转移的城乡人口配置结构。“两增”是增加城镇人口和向区外转移的人口；“一减”是减少农村人口；三级转移是深山区和生态极度脆弱区人口向坝下和山间盆地地区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特殊示范区人口向区外转移。有计划地压缩农村人口，减轻人口对自然生态的压力，鼓励农村人口通过各种方式向区外和城镇流动。

（2）建立与生态功能分区相适应的流域性人口分布结构。根据流域生态功能地位进行流域性人口控制的顺序：潮白河流域、滦河流域、永定河流域、拒马河流域、内陆河流域。按流域生态敏感程度进行人口控制的顺序是：京津冀地表一级水源保护区、二级水源保护区、三级水源保护区、非地表水源保护区。根据流域生态经济功能进行人口控制的顺序：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生态农业示范区、其他区域。通过分区、分级、分类进行人口控制，建立起与特殊示范区生态功能相适应的人口分布结构。

（3）合理控制人口密度，逐步推进生态移民，减轻生态压力。积极探索和完善生态移民的方式，解决生存空间不足问题。采取深山区向丘陵区转移、坝上向坝下转移、条件差的向条件好的地区转移的办法，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生态环境恶劣地方的居民实行生态移民。

其次是劳动力就业结构。

（1）建立农村劳动力四分开发就业结构（劳务输出、城镇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和生态服务业）。为了配合特殊示范区生态林草的建设和保护，确保生态林草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生态林草管护队伍，主要从事生态林草种植、养护和管理。农村从事农牧业的人口，一方面因为退耕还林还草而导致耕地大面积减少，一方面技术设施进步，提高劳动效率，这一产业人员会降低。随着经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也会相应增加。鉴于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压力，本区劳务输出将成为今后农村人口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

（2）建立面向劳务输出和生态服务为主的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特殊示范区的特色技术和技能教育，适应劳务输出的技术和技能教育，包括建筑技术和技能培训、社区和家政服务技术技能培训、商务服务技术和技能培训等；加强生态服务技术和技能教育，包括林草管护技术培训、舍饲养殖技术培训、无公害农业技术培训等。

（3）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分流的劳务市场环境。建立健全城市和农村劳务市场，培育服务于劳动力流动的劳务中介机构。

3. 城镇发展框架

（1）建立区域中心城市和县城两头沉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特殊示范区生态化的城市发展应以膨胀中心城市为重点，布局上以中心城市和县城为核心，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扩大中心城市和县城的规模，减小农村的生态压力。

（2）建立经济功能分工合理的城镇职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张家口、承德两个中心城市的职能，突出产业发展特色，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巩固和提高张家口和承德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突出特区城镇的文化、旅游、物流、教育职能，分级、分批建立一批特色城镇，发展壮大生态和文化旅游城镇，增建一批教育和物流职能突出的城镇，扩大、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城镇，因地发展一批矿业城镇，逐步增强各城镇间联合互动、优势互补，提高小城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

（3）建立点轴分布的城镇地域结构。重点发展京张（含铁路和公路）、

京锦（含铁路和公路）、宣大高速公路、张石高速公路、承唐高速公路等骨干交通沿线的城镇。

（4）建立文明高效的生态城镇。推进中心城市和县城的生态化进程，高标准建设城市污水治理系统，使全部城镇污水都能高标准处理；按城市规划的高标准建设城市园林体系，保证建成区的绿地覆盖率达到30%；全部实现市区及以下河段还清。所有中心城市和组团城市之间高标准建设绿色廊道；提高城市清洁能源的比重；加强旧城改造力度，搬迁改造市区的产业，实施退二进园。

4. 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框架

加速退耕还林还草，建立林牧为主、林草结合的用地结构，实施限牧轮牧，有序推进舍饲禁牧，建立草畜平衡的生物资源利用结构；压缩农业用水，稳定工业用水，提高生活和生态用水，建立水资源调出型的分水结构。压缩非商品能源，提高商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结构比重，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建立清洁无污染型的能源利用结构；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工的技术水平，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五）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建立符合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建设和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保证特殊示范区建设顺利进行和有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组织保障。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横跨京、津、冀三个省级行政区，涉及11个地市级行政区，共24个县区，彼此间的行政和发展关系复杂，协调难度大；同时，特殊示范区建设涉及产业发展、人口控制、城镇建设、资源开发和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由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和发展关系的机构做出决策并贯彻实施，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特殊示范区决策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

1. 特殊示范区决策管理体制

为保证特殊示范区建设顺利进行和有序发展，成立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主持，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林业部、建设部、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环保总局和扶贫主管部门领导参加的京津冀北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特殊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制定特殊示范区建设方针和发展战略；协调有关各方利益和重大发展关系；对涉及特殊示范区建设

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设立由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特殊示范区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领导小组下设由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三省市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研究、起草特殊示范区中长期发展总体规划和优惠政策，经特殊示范区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地方对特殊示范区发展规划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局性重大工程建设规划和投资计划。

有关市县区根据特殊示范区总体规划的要求，研究制定本行政区的建设和发展总体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经特殊示范区建设领导机构批准和本级人大审议通过后实施。

2. 特殊示范区区域管理体制

为保证特殊示范区建设与国家和京津冀三省市区域发展规划及政策的协调性，将特殊示范区建设中长期总体发展规划纳入国家区域发展规划体系，将涉及有关市县的规划内容分别纳入京津冀三省市区域发展规划，原则上不再要求特殊示范区范围内的市县在特殊示范区建设规划外制定新的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三省市涉及特殊示范区范围内市县的政策应与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如与特殊示范区政策相冲突，应以特殊示范区政策为准，确保特殊示范区必要的政策优势。

3. 特殊示范区部门管理体制

为保证特殊示范区建设和发展的部门协调性，将特殊示范区建设和发展总体规划的相关内容纳入国家、省、市扶贫开发、产业发展、人口控制和劳动力就业、城镇化、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有关专项规划和政策体系。特殊示范区范围内的所有市县均应设立相应的建设领导和办事机构，负责协调本行政区范围内特殊示范区建设有关事项，组织实施重大工程建设，对上级特殊示范区领导和办事机构负责。各级政府应按照有利于实现特殊示范区建设总体目标、精干高效、事权与物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设置和归并专业管理部门，充分整合管理资源，提高各级专业部门的管理和运行效率。

四　消除环京津贫困带的政策建议

1. 实行特殊的财政支持政策

参照发达国家对受援区、国内发达省市对贫困地区和京津二市对欠发达

县区的财政支持政策，制定并实行包括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由省以上政府投资、不要求市县资金配套的政策，所有大中型生态建设和非点源环境保护工程由省以上投资、适当提高对工程管护补偿标准的政策，区域内固定资产投资高于非特区县的保障政策，区域内市县财政收入上缴部分由国家和省级财政加倍返还政策，科技教育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农牧业税限期免收政策，风险投资和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政策等特殊财政支持政策。

2. 实行特殊的资源环境补偿政策

加大对特殊示范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强度和力度，必然会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约束和影响，必须由浅入深逐步实行特区为保护资源环境所受损失的补偿政策，主要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生态林业用地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高耗水农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提高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方经济损失补偿政策、提高生态功能区域标准地方经济损失补偿政策、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政策、自然保护区管护费用补偿政策等特殊的资源环境保护损失补偿政策。

3. 特殊的人力资源开发支持政策

主要包括实行特殊的九年义务教育和三年职业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特殊示范区高中毕业生进入京津冀高校定向培养政策、京津冀专设特殊示范区劳务市场和定期定量安排使用特殊示范区劳动力政策、特殊示范区专设生态建设和管护职业学校政策、特殊的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实行特殊的技术经济政策

包括鼓励和支持生态型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建立生态工业园和生态农牧业园区支持政策、限制非生态产业进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支持政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支持政策、清洁生产技术普及推广支持政策、传统能源替代支持政策、生态城镇和区域建设支持政策、扶贫开发支持政策等。

5. 制订特殊的资源环境法规

授权特殊示范区制订并实行特殊的资源环境法规，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水资源、土地资源、草场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等对国计民生起重大支撑作用的自然资源在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分配、转让、价格、权益保护等环节上的地方法律和行政规章，以促进资源环境的法制化管理。

（执笔：李　岚　宋树恩　高　智）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京津冀经济圈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 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Blue Book

2004~200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着眼于长三角区域的整体发展和提升

——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思路探讨

上海市综合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一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目的和意义

（一）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把解决当前现实发展问题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1.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将加快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

综观全球，所谓的国际化中心城市无不立足服务，以服务为本，国际中心城市几乎就是国际服务中心的代名词，没有强大的服务功能，所谓的国际中心城市是很难站住脚的。

从国内来说，上海构建“四个中心”，实质上就是要建设强大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提供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服务，通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上海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这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的紧迫性所在。

从区域发展角度看，长三角地区正从全球制造业基地走向全球制造业中心，而如何加快提升长三角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协作水平、管理水平、结构效率、竞争能力是摆在长三角各城市面前的当务之急，特别对于作为长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来说，必须对这一难题做出正确的选择。通过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速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于提高长三角制造

业整体的竞争力、附加值，增强长三角区域先进制造业的根植性，从区域范围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并实施对国外现代服务业进口替代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对上海这一区域中心城市所提出的强烈客观要求，也是上海城市功能彻底转型的依据之一。

2.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上海实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和城市转型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将有力推进上海的产业升级，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从制造为主向服务为主发展。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也将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服务化，持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增强和丰富城市对内服务功能和对外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手段，创新服务方式，构建起完善的长三角区域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体系，以全国性、全球化的服务网络。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将从基础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跨越式变迁。伴随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和功能转换，城市转型的显著特征从主要依靠物质生产为主转向主要依靠精神产品和知识（服务）产品生产，从主要依赖物质资源向主要依赖知识资源、知识积累、知识发展转变，从以实体经济为主向以虚拟经济为主转变。

3.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

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目标在于促进城市全面发展，优势凸现，而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则将展现上海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既迫切需要科教兴市战略的支持，也使得科教兴市战略具有清晰的工作方向和实际目标。围绕着城市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手段创新、服务路径创新和服务水平创新，对科教兴市战略提出高度的要求及期望。这种要求和期望将成为上海加快深化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强大动力。

（二）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把自身发展与服务全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3年8月，中央领导来沪考察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上海的发展要着眼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着眼于完善综合服务功能、着眼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增强持续创新能力。“五个着眼于”系统表达了对上海未来发展基本方向的阐述，成为上海下一轮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而以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主线，将有机地

把这“五个着眼于”串联起来，形成系统推进和带动的良好态势。

1.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

“十一五”期间，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具有多重任务，如实现“四个中心”的基本框架体系、实现从人均5000美元向人均8000美元的重大阶段性跨越、实现向世界城市的大步迈进等，而主要目标就是中央领导所提出的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但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支撑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是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国际竞争力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的结果。

首先，从全球视角看，城市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弱，即城市服务半径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只有具备强大综合服务功能的城市，才真正有可能通过吸引人才集聚、知识集聚和创新能力集聚，占据竞争优势，体现国际竞争力。其次，从国家角度看，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全国对上海寄予厚望，上海也只有通过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才能不断提高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能力，并快速提升参与全球性服务的能力，体现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第三，从区域层面看，在国际制造业的分工格局中，目前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末端，而且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分流现象的日益加剧，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大幅度提高长三角区域制造业的发展环境，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将明显提高长三角制造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第四，从上海自身层面看，在未来的发展中，上海一方面承受着资源与环境的严重约束，另一方面要应对亚洲各国和地区争夺东北亚区域中心城市的严峻挑战。上海只有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快推进城市转型，才能够在多重因素约束下凸现城市服务功能优势，提升在新的环境中的城市国际竞争力。

2.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区域城市综合服务体系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是一个系统概念，它不仅包括现代服务业，也包括制造业服务，不仅包括产业层面的服务，也涉及社会层面的服务，不仅服务于区域内部，更服务于区域外部，并强烈追求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在这一要求下，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必须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级。

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上海现代服务业规模小、能级低、辐射范围相当窄，对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缺乏支撑力，在服务全国过程中缺乏有力的手段，并与具备强劲国际竞争力的要求有非常大的差距。从制造业看，全面

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就是要使上海制造业达到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高水平。因此，上海制造业的发展要聚焦在高端材料、关键零部件、先进装备业以及生产技术和产品研发等领域，并在国际营销网络的布置上有所掌控，在国际品牌的建设上有所建树，增强上海在制造业领域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综合功能。在社会服务方面，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就是要在教育、医疗、文化、传媒、体育等重要领域进一步发挥传统优势，提高服务全国、服务长三角的能力。

3.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在新的国内外背景和条件下，上海将进入功能关联型对外开放阶段，即按照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要求，以培育综合服务功能为目标，进行关联型的对外开放。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一方面需要大力引进国际服务业主体，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营和做法，充分利用其业已形成的国际服务网络，迅速提升上海服务功能的能级和水平。另一方面需要积极走出去，设立节点，构建网络，为国内产业在全球获取资源、扩大市场份额，为国内产业走向世界服务，借此以迅速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过程必然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

4.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增强城市持续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区域和城市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核心就是创新功能，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就是要强调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创造出新的城市服务功能、服务手段、服务途径和服务水平。同时，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也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充分发挥上海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集中的比较优势，吸引国外创新机构和创新团队的集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奠定了深厚的发展基础。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还必须坚持文化创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加快城市文化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增强上海城市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构建与“四个中心”相匹配的城市文化发展新格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为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5.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征性表现就是必须从宏观背景和

客观环境出发，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出发，两者紧密结合，遵循客观发展规律，从而确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战略思路，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要求对上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正是适应宏观背景和客观环境的变化、顺应上海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的正确的发展路径和发展主线。首先，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必须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成为一个区域性、全球性的服务高地；其次，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上海必须对全国和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带动；第三，面对越来越严厉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上海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轻型化、知识化发展道路；第四，上海目前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也要求上海未来的发展必须在经济结构方面大幅调整、优化，特别在第三产业突进中开拓发展空间，提升发展层次。因此，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将是上海遵循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注解。

二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内涵与重点

（一）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内涵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是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对所服务区域在服务广度、服务深度和服务水平方面的能力体现。城市对所服务区域的综合服务，主要通过城市自身高度的创新系统而形成强大的集聚辐射功能，并通过有目的的辐射而对所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示范和带动效应。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具有高层次、外向性、协调性、服务性、带动性的特征，其含义主要体现为：

1. 高层次

只有形成高层次的综合服务功能，城市才具备强大的辐射功能，并体现出高质量的服务广度、服务深度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影响、示范和带动的综合服务效应。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高层次是相对于其所服务区域而言的，如作为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在这一区域内应该体现出高层次，在发展方面处于领先水平。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朝着世界城市的方向大步迈进，因此，它的城市功能在中国应该具有高层次和高水平的显著特征，并从全球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角度来提升城市功能，这样才能对全国及区域发挥综合服务效应。

2. 外向性

只有具备外向性特征，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才能真正表现其强大的对外辐射功能和影响效应，这也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区别于一般城市功能的关键。一般城市功能的特征基本上是内向的，关注和服务于城市自身的发展，而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仅应高层次，而且必须是外向性，即城市功能的核心作用是对外辐射和对外服务。一个城市的实力再强大，如无法发挥对外辐射和对外服务功能，城市将在区域范围内缺乏辐射和带动能力，导致城市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不但与全球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也有相当的差距。

3. 协调性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还应体现出内在的协调性，从而推动城市的服务广度、服务深度和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协调性取决于内外两个层面：就城市内部来说，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培育有一个协调性要求，即各服务功能——综合创新功能、要素集聚功能、对外辐射功能、发展引领功能之间的有机协调，使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形成良性互动结构。就区域整体来说，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建设必须强烈针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对服务的紧迫需求，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充分融入区域整体结构之中，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通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分工和发挥，确立城市的地位和影响。

4. 服务性

服务性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一个显著特征，包括几方面的含义。第一，这是一种高端的服务，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必须始终瞄准着提升区域整体的发展层次和水平，对区域发展产生导向、助推、引领作用，大大提升这种服务的价值；第二，这是一种主动的服务，中心城市应该充分明确其对区域整体发展引领角色的定位，深刻认识到这种服务对区域整体利益增进的意义，从而增强服务的主动性；第三，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方利益的强化，因此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发挥效用的特点应该是高举“服务”牌，寓辐射于服务之中、寓引领于服务之中。

5. 带动性

中心城市地位的决定性取决于其对所服务区域的发展带动能力，对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弱的最终衡量，就是看其对服务区域的发展带动能量的强弱。对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而言，对外辐射和对外服务仅仅是一种手段，更重

要的是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有目的的服务而产生强大的发展引领功能——对发展的示范、影响和带动效应，这是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所必须体现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目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城市自身的跨越式领先发展，带动区域全局快速健康发展，并推进区域整体发展层次的提高，应作为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中的考虑焦点。

（二）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现实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必须从全球经济体系重构和全球资源整合的角度来定位上海，走出一条以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确立上海发展，以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确立上海地位，以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率求上海影响的新路。牢固确立在为区域一体化服务，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为经济全球化服务中求得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因此，上海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思路要从这一战略高度来把握，并明确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服务能力的建设。

（1）聚焦于为中国及长三角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服务。主要从提高工业化发展水平、培育新型产业、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强化产业分工协作深度、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推进产业组织规模化、加快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推进品牌效应、提高生产者服务水平等方面建设产业高端服务的抓手，提升服务能力。

（2）聚焦于为中国及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服务。主要从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区域性城市群建设、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城市功能分工、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和优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有机联结等方面，创造经验，优化自身，提供示范，提升服务能力。

（3）聚焦于为中国及长三角区域的市场化发展服务。主要从市场体系完善规范、市场平台建设、市场通道开拓、市场机制国际化建设和市场服务效率提高等方面着手，特别重要的是加强与世界市场的全面连接，进一步发挥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效应，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市场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市场服务高地，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联结世界的重要基地，真正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平台。

（4）聚焦于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服务。主要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区域利益一体化、区域制度一体化等方面确立服务策略，实践表率作用，加强引导功能，提升服务能力。

（5）聚焦于为长三角区域乃至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发展服务。主要通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发挥文、教、卫、体、现代商贸、国际商务等部门的辐射、联结、服务、示范、影响和引领作用，推动我国及长三角区域的社会事业现代化，提升服务能力。

要有效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必须从以上高度来认识和要求。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困难和障碍，但这是上海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确定不移的服务指向。只有如此，才能凸现上海城市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能量。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和阶段性跃进的过程。

（三）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重点

正确认识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重点，需要从上海城市服务功能演进的角度去深刻把握，明确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与上海传统的服务功能之间的重大差异。

1. 在服务方向上，要从服务国内为主跃升到通过服务全球来服务全国、服务长三角

在各种因素制约下，上海传统的城市功能服务方向主要面向国内。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开放的浪潮中，在中国向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下，上海城市功能的服务方向必须从国内拓展到全球，依托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巨大吸引力的背景，在向世界全面开放、与世界全面接轨、为全球服务的格局中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在这基础上寻求上海的地位，成为全球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只有具备全球视角、世界水平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上海才能更好地服务全国。因此，在服务方向的战略考虑上，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首先必须服务全球，从全球的视角服务全国，从全国的视角服务长三角，这样才能真正确立上海成为全球性服务高地的地位。

2. 在服务内容上，要从以产品服务为主跃升到以功能服务为主

上海城市功能的服务内容传统上是以产品服务为主，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主要以日常工业品和工业设备来为全国服务，曾经辉煌一时。但在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过程中，上海城市功能的服务内容要有根本性的转变，要从产品服务跃升到以功能服务为主。原因在于：一方面，全国的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各地大规模引进外资及工业化发展中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大削弱了上海的传统优势，这一重大结构性变化要求上海必须建立新的

优势来为全国服务。另一方面，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上海经济发展朝着高级化、国际化、轻型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结合以上要求，上海为全国服务的内容要从产品服务转变到功能服务，即从传统的仅仅提供产品转变为提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上海应该在市场联结、金融服务、技术支持、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物流体系、国际商贸等方面建立起服务全国的新优势。

3. 在服务能级上，要从低端服务跃升到高端服务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但要体现在服务内容上，而且要体现在服务能级上，站在发展高端和产业高端来辐射全国，服务全国。所谓高端服务，就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出发，以国际水平作为上海各方面发展的努力标准，在国内具有明显的领先地位——工业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体系国际化、整体创新能力、城市发展模式、社会现代化等，从而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辐射、互动和牵引作用。同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要求下，高端服务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为我国走向世界、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服务，为我国目前比较低端的生产制造体系整体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服务。

4. 在服务目的上，要从一般辐射跃升到发展引领

更好地服务全国，必须明确服务目的。普通城市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开拓市场空间的一般辐射上，辐射的目的明显是为城市自身发展服务。而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上海服务全国的目的，在于寓服务于辐射之中，寓引领于服务之中。服务全国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通过服务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引领作用，以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来加强上海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上海必须充分认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所具有的特征性内涵，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强调通过服务区域、服务全国、服务世界、引领发展来积极促进上海“四个中心”框架的建立。

三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方向和抓手

（一）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方向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要求，

上海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目标主要是力求形成以下六大具有国际水准的服务体系。

1. 国际航运服务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并不仅仅是优越的岸线条件和先进的港口设施所能涵盖的，更重要的是有强大的现代国际航运服务体系的支撑。上海要迅速提升现代国际航运服务功能，构建国际化的航运服务体系，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具体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以洋山深水港和浦东空港为主体的国际港口服务枢纽；二是以大吞吐和高效率为特征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三是以标准制定、交易中介和会展论坛为特色的国际航运服务平台。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建设，逐步提升上海在国际航运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2. 国际金融服务体系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其特殊性，由于缺乏对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决策权和调控权，决定了上海必须突破传统的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上海要加快建设包括以下三大特色的国际化金融服务体系：一是以资本市场为重点的国际资金配置中心。重点建设内外资共同参与、具有国际影响的资本市场，扩大资金配置范围和规模，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逐步形成对国际资本有较大吸引力和集散力的国际资金配置中心；二是以金融控股集团为核心的跨国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引进更多的中外金融机构，逐步形成以金融控股集团为核心、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一定影响的跨国金融机构体系；三是以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为基础的金融发展环境。

3. 国际商务服务体系

商务服务是生产服务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长三角制造业发展中的迫切需要，更是上海在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建设中所应承担的重要功能。上海要着力建设国际化的商务服务体系，重点形成以下三大平台：一是国际性的采购与订单平台，为国内外的政府、企业等各类机构从事跨国或跨地区采购及订单业务创造有利的商务服务环境；二是国际性的交易与中介平台，大力发展管理咨询、法律财会、信息通讯、系统支持、广告策划、市场推广等专业性强、知识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商务服务，强化上海商务服务的高端性、国际性和针对性，为贸易发展和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商务服务环境；三是国际性的会议与展示平台，提高为会展提供包括组织、筹备、协调、通讯、住宿、餐饮、娱乐等全方位服务的水平，建立能够为国际性的会展活动提供相



应商务服务的综合平台。

4. 高端制造业服务体系

在长三角共同推进世界制造业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上海除了要提供高层次的生产服务，本身也需要继续推进制造业的发展，强化和凸显上海制造业的服务功能。上海要形成包括以下三大功能的高端制造业服务体系：一是高端材料、关键装备与核心零部件的制造中心，迅速提升高端材料的生产能力、关键装备的供应能力与核心零部件的配套能力，提高上海制造业的整体层次，同时也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形成适当分工，为长三角制造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制造业领域内的服务；二是制造业的研发设计与市场营销中心，上海应当在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所欠缺的研发设计与市场营销领域率先突破，依托科技基础雄厚、科研机构集聚、市场开放度高、国际融合度深的优势，为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提供研发设计服务与市场营销服务；三是制造业的品牌培育和推广中心，上海有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有连接国内外市场的窗口效应，有强大的信息网络，应当在培育和推广制造业的中国品牌上发挥主导的作用，加强行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建设，以品牌为纽带，增强长三角制造业的整体凝聚力和综合实力，提升长三角制造业在世界产业格局和国际市场上的总体地位。

5. 国际社会环境服务体系

上海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社会的窗口城市，作为以世界级城市为长远目标的特大城市，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应当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和高品质的综合环境。上海要致力于建设包括以下三大重点的国际化社会环境服务体系：一是国际化的教育医疗服务高地，上海要利用既有优势，扩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交流，大力引进国际一流的知名院校与医院在上海开办分校和分院，进一步提高本地教育医疗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扩大本地教育医疗服务的规模和范围，提升本地教育医疗服务的能力和影响，形成国际化的教育医疗服务高地；二是国际性的文化体育市场与交易组织中心，上海要抓住自身特点，大力推进文化体育市场的发展，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文化体育消费者，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层次，同时，发挥上海促进文体产业发展的中介作用，把握文化体育领域的世界潮流，突出对高档次文体产品的交易功能、高级别文体活动的组织功能、高层次文体市场的经纪功能，形成国际化的文化体育消费市场和交易组织中心；三是国际大都市的生态人文环境，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达到人的发展需求与城市发展要求的有机结

合，营造亲近自然、与自然相友好的生态环境，构筑便捷化、人性化的交通环境，提供舒适、方便、安全、优美的居住环境，创建多样化、时尚化、国际化的消费环境，培育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兼备、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融合的人文环境，充分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宗旨，使本地居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享受到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生态人文环境。

6. 国际创新服务体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区域和城市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上海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的核心所在和上海今后发展的动力之源。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不断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是上海需要长期努力的方向，上海加快构筑国际创新服务体系的重点：一是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包括搭建创新成果交易平台，以知识产权交易所为基础，寻求与国外著名技术交易机构、公司及技术交易中介机构的合作，面向国际提供版权交易、技术租赁、技术评估、科技项目招投标代理等方面的服务；兴建创新力量集聚园区，制定和实施促进政策，面向全球吸纳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者，激励更广范围的科技创新力量集聚上海；构建创新资本运作机制，积极吸引和组织国内外风险投资资本落户上海，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对风险投资运作及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规范的法律支持和保护；营建创新活动服务环境，不断提高政府服务与市场服务水平，优化创新氛围，提高创新意识。二是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保障环境。制度制约是上海发展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上海要建设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保障环境，首先要求具备现代化的观念，即迎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形成鼓励创新、接纳创新的共识，保障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与持续性；其次要求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即变单一的行政手段为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保障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三是多元化的文化创新孕育基地。上海应依托上海国际化、开放度高的优势，结合各地人流、各方资讯汇聚的特点，顺应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主动担任我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前卫角色，积极引入多样化的文化元素，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传统文化和时尚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创造有利的环境，从而衍生文化形态，丰富文化内涵，打造有利于孕育文化创新的摇篮和基地。

（二）全面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突破口

在“十一五”期间，上海要从以下几个层面选择突破口，实实在在地推

进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抓历史性战略机遇，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国内外发展形势与趋势都已表明，“十一五”时期是上海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上海需要牢牢抓住机遇，特别是影响面广、带动性强的重大机遇，以之为突破口，增强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这些战略性机遇主要包括：一是充分利用世博会筹办机遇，全面提高上海国际化水平；二是主动迎接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进一步提高上海工业水平；三是积极适应 WTO 承诺兑现机遇，加快提高上海服务业水平。

2. 抓独占性政策资源，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当前，上海在某些领域已经获得了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应当根据功能提升的要求优化利用这些政策资源，不仅包括用好用足现有的政策资源，即盘活政策资源存量，也包括政策扩容和制度建设，即扩大政策资源的增量。上海要着眼于加快综合服务功能提升，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必须突破政策瓶颈，强化政策聚焦，放大政策效应。主要为：一是发挥浦东对外开放的龙头作用，以资本市场为重点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二是用好区港联动政策，以自由港为重点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三是依托文化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政策，以产业化为重点推进国际文化高地建设；四是凭借教育改革试验区政策，以国际化为重点推进国际教育高地建设。

3. 抓阶段性市场特点，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上海综合服务功能的完善要紧紧围绕市场来展开，一方面，要抓支撑服务功能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抓体现服务功能的市场网络，以市场为突破口，推动上海综合服务功能快速提升。这些阶段性市场特点包括：一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促进生活服务业发展；二是适应制造业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促进生产服务业发展；三是迎合对制造业服务功能的需求，促进制造业调整升级。

4. 抓功能性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设施基础是承载上海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实体，上海的城市建设要结合城市功能提升的要求，从有利于夯实服务功能和发挥服务功能的角度出发，加快推进重大功能性项目与交通设施网络的建设步伐。这些方面包括：一是加快两港（洋山深水港、浦东国际空港二期工程）项目建设，为“四个中心”建设的目标服务；二是加快城际交通网络建设，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服务；三是加快市内轨道交通建设，为城市空间拓展服务。

5. 抓内外部环境，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适宜的环境既是烘托和优化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必要条件，也是构成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重要部分。今后一段时期，上海要围绕优化综合服务功能的要求，以生活环境、创业环境和市场环境为重点，不断优化上海城市环境：一是以人为本，塑造舒适化生活环境；二是与国际接轨，营造国际化创业环境；三是内外兼修，打造网络化市场环境。

6. 抓长效性人才高地，突破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推动上海城市发展、提升上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关键要素，上海应以人才建设与人才使用为重点，按照功能培育与发挥的要求，推进上海人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人才素质的不断提升，建设长效性的人才高地：一是健全人才储备制度，加强人才自主培育与外部引进；二是完善人才管理制度，促进人才有效使用与有序流动。

注：本文内容主要摘选自上海市综合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课题组长：朱金海；课题组成员包括：汪胜洋、唐亿文、汤建中、陈维、巫志南、陈国权等）所做的《上海“十一五”发展思路研究》研究报告。

长三角15城市吸引FDI业绩与潜力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徐　冰　周珺萍

一　引　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采用了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来评估世界各国吸引FDI的业绩与未来增长的潜力[①]。但由于中国各地在吸引FDI总量上的严重不平衡，这导致了反映在国家层面上吸引FDI平均业绩和潜力水平的这两个指数，对于中国来说评价效果较差。2002年的数据显示，仅广东和江苏两省吸引FDI的总量就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②]，而西部十二省区市[③]只有7.6%[④]。因此，要在中国运用这两个指标对吸引FDI的业绩和潜力进行评估，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应当缩小。有学者已把这两个指标运用到了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吸引FDI业绩与潜力的比较中[⑤]，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比较误差仍然较大。这主要在于中国同一个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在吸引FDI上仍存在巨大差异[⑥]。本文把研究对象放在"长三角"这块区域，不仅因为这里已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重

---

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http：//www.unctad.org/ch/docs//wir2002overview_ ch.pdf，2004－06－22。

② 广东、江苏吸引的FDI分别占全国总量的31.48%和20.55%，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2）》、《广东省统计公报（2002）》、《江苏省统计公报（2002）》汇总测算。

③ 指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

④ 根据西部十二省区市2002年统计公报及当年国家统计公报汇总测算。

⑤ 葛顺奇、郑小洁：《中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比较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

⑥ 仅以浙江省为例，2001年杭州、宁波吸引FDI的总量就占到了全省的62.89%，其他9个市加起来只有37.11%。

心，受关注最多，更重要的是其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小，测算出的结果可信度比较高。

“长三角”是包括上海、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通、扬州、泰州15个城市在内的区域，总面积99688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04.78万[①]，占全国总人口的5.8%，然而2001年却创造了占全国总量18.7%的GDP，19.2%的地方财政收入，28.3%的外贸出口[②]。在吸引FDI方面，“长三角”更是在全国遥遥领先。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60.67亿美元，占到全国的1/3，人均利用外资是全国平均的5倍以上[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长三角”的各个城市，在吸引FDI中既存在合作也有竞争，吸引的FDI在总量和行业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客观合理地评估“长三角”各城市在吸引FDI方面的业绩和潜力，对于帮助区域内各城市准确定位、相互协调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引资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利用FDI业绩指数比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把业绩指数评价的对象放在国家这个层面中[④]，笔者经过一定的改造把其放到城市一级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我们定义，一个城市在一定区域内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该市FDI的流入量占整个区域内FDI流入量的比重除以该市GDP占整个区域GDP的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FDI\text{业绩指数} = \frac{FDI_i/FDI_d}{GDP_i/GDP_d}$$

其中FDI_i = 第i城市FDI的流入量，FDI_d = 区域内FDI的流入量，GDP_i = 第i城市GDP的总量，GDP_d = 区域内GDP的总量。

如果业绩指数值等于1，则表明该市占区域内FDI的比重与其占区域

① 2000年的数据。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上海市统计年鉴（2002）》、《江苏省统计年鉴（2002）》、《浙江省统计年鉴（2002）》汇总计算得到。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计算得到。

④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02）》，http：//www.unctad.org/ch/docs//wir2002overview_ ch.pdf，2004-06-22。

GDP比重相等；指数值大于1，表明该市吸收了比其GDP规模更多的FDI；指数值小于1，说明该市FDI流入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这就改进了过去以FDI流入的绝对量作为评价标准中，各市经济规模不同所造成的影响。

根据以上计算公式，我们分别计算出1996和2001年“长三角”各城市吸引FDI的业绩指数（见表1）。

表1　1996、2001年“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利用FDI的业绩指数

城　市	1996年		2001年	
	业绩指数值	排　名	业绩指数值	排　名
杭　州	0.450	8	0.339	10
宁　波	0.481	6	0.704	6
嘉　兴	0.244	10	0.472	9
湖　州	0.135	15	0.577	8
绍　兴	0.199	13	0.203	14
舟　山	0.188	14	0.093	15
苏　州	1.717	2	1.814	1
无　锡	0.801	3	1.055	3
常　州	0.480	7	0.975	4
南　京	0.533	5	0.829	5
南　通	0.581	4	0.229	12
扬　州	0.218	11	0.221	13
镇　江	0.432	9	0.686	7
泰　州	0.218	11	0.283	11
上　海	1.972	1	1.582	2
平均值	0.577		0.671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1997、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江苏统计年鉴》（1997、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浙江统计年鉴》（1997、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我们可以从表1中看到，1996年“长三角”15市中，吸引FDI业绩优秀的只有两个，分别是上海和苏州。2001年业绩指数大于1的增加到了3个，按数值高低依次为苏州、上海和无锡。由于苏州吸引FDI指数的上升和上海指数值的大幅度下降，苏州在2001年已取代上海成为“长三角”所有城市中吸引FDI业绩最好的城市。从业绩的排名来看，上升的有嘉兴、湖州、苏州、常州和镇江，其中湖州的上升幅度最大，从1996年的末位上升到2001年的第8位；下降的是杭州、绍兴、舟山、南通、扬州和上海，南通从1996年的排名第4，下降到了2001年的第12位，成为降幅最大的城市。从“长三角”各城市吸

引FDI业绩的平均值来看，由于各城市对吸引FDI工作的重视，平均业绩指数值有较大上升，从1996年的0.557上升到2001年的0.671。

三 "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利用FDI的潜力指数比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选择了人均GDP、过去十年实际GDP的增长、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人均商业能源消耗量、R&D支出占总国民收入的比重、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国家风险八个指标来测算一个国家未来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和潜力①。

笔者选择了相同或相近的七个指标来反映一个城市吸引FDI的潜力②：①人均GDP，该变量代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体现该市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模与层次；②过去五年实际GDP的增长，这一变量代表该市的未来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较高的增长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并引致其他导向性的FDI；③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该变量代表该市参与国际化的程度，国际贸易为FDI的流动以及国际生产奠定了基础，FDI流动所导致的国际生产对贸易也具有替代或补充作用；④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包括固定和移动电话，该变量代表该市的通讯水平，体现物质基础设施的状况，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不同区位间的整合与协调活动非常重要，因此，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影响FDI的关键因素；⑤人均电力消耗量，该变量代表能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这是影响FDI，特别是效率导向性FDI的重要因素；⑥R&D支出占GDP的比重，它表明了该市的技术能力，它是吸引创新资产寻求型FDI的关键因素；⑦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该变量是衡量一个城市劳动力所具备的素质和技能的状况，高素质劳动力的质量与成本，是目前全球和地区竞争性吸引FDI的核心优势。

---

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2）》，http://www.unctad.org/ch/docs//wir2002overview_ ch.pdf，2004-06-22。

② "过去十年实际GDP的增长"这一指标由于泰州在1990年之前没有数据，故而改为"过去五年实际GDP的增长"；"R&D支出占总国民收入的比重"改为"R&D支出占GDP的比重"更能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是吸引FDI的大国，一部分GDP由外资企业创造，而外资企业的R&D支出也在全国总量中占有一定比例；"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由于"长三角"各市在1996年没有数据故改为相近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家风险"这一指标对于城市来说无法测算，故取消了这一指标。

每个变量值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取一个城市一个变量的值，然后减去参与排名的15个城市中该变量的最小值，然后将得到的结果再除以15个城市中该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一个城市的潜力指数就是这7个变量的平均值。数学表达式如下：

$$FDI\text{潜力指数} = \frac{V_i - V_{min}}{V_{max} - V_{min}}$$

其中 V_i = 城市 i 的一个变量，V_{min} = 该变量的最小值，V_{max} = 该变量的最大值。

按照以上计算方法，本文分别计算出了1996和2001年"长三角"各城市吸引FDI的潜力指数值（见表2和表3）。从1996年的数据看，各城市吸引FDI的潜力可以相对被分为三个等级：上海为第一等级，潜力最大；无锡、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常州、镇江为第二等级；绍兴、舟山、嘉兴、湖州、南通、泰州、扬州则排在最后。而从2001年的数据看，各城市间吸引FDI潜力上的差距在扩大，在潜力指数值上反映为数据方差的增大[①]和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距的增长[②]。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相比较业绩指数排名的变动，潜力指数的排名在1996和2001年之间的变动相对较小，最大的也不超过两个名次[③]，上升较大的有嘉兴、舟山、南京和扬州。

表2　1996年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吸引FDI潜力指数及各构成要素值

		人均GDP		过去5年实际GDP的增长		出口占GDP的比重		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		人均电力消耗		R&D支出占GDP的比重		专业技术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潜力排名	城市	分值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排名	分值	排名	平均值
1	上海	1.000	1	0.504	13	0.916	3	1.000	1	1.000	1	1.000	1	1.000	1	0.917
2	无锡	0.874	2	0.876	2	0.382	8	0.522	4	0.716	2	0.102	8	0.467	3	0.563
3	苏州	0.706	3	0.761	8	0.768	4	0.565	3	0.540	4	0.054	12	0.359	6	0.536
4	杭州	0.558	4	0.784	7	1.000	1	0.348	6	0.433	5	0.124	5	0.447	4	0.528
5	南京	0.424	6	0.584	12	0.257	10	0.609	2	0.548	3	0.368	3	0.806	2	0.514

① 方差由1996年数值之间的0.57扩大到2001年数值之间的0.83。

② 1996年最大的上海是最小的扬州的6.03倍，而2001年排在第一的上海却把与排在最后的泰州的差距扩大到了10.9倍。

③ 同一城市业绩指数在不同年份最大的差距有8个名次。

续表 2

潜力排名	城市	人均GDP 分值	人均GDP 排名	过去5年实际GDP的增长 分值	过去5年实际GDP的增长 排名	出口占GDP的比重 分值	出口占GDP的比重 排名	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 分值	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 排名	人均电力消耗 分值	人均电力消耗 排名	R&D支出占GDP的比重 分值	R&D支出占GDP的比重 排名	专业技术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分值	专业技术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排名	平均值
6	宁波	0.557	5	0.870	3	0.921	2	0.304	7	0.259	10	0.119	6	0.301	7	0.476
7	常州	0.420	7	0.750	9	0.450	7	0.304	7	0.414	6	0.119	6	0.407	5	0.409
8	镇江	0.413	8	0.861	4	0.333	9	0.435	5	0.327	7	0.085	10	0.282	9	0.391
9	绍兴	0.375	9	1.000	1	0.226	11	0.130	12	0.213	11	0.000	15	0.019	11	0.280
10	舟山	0.151	12	0.322	14	0.539	6	0.174	11	0.000	15	0.617	2	0.027	13	0.261
11	嘉兴	0.350	10	0.740	10	0.000	15	0.261	9	0.295	8	0.049	13	0.074	12	0.253
12	湖州	0.282	11	0.804	6	0.226	11	0.000	14	0.276	9	0.128	4	0.000	15	0.245
13	南通	0.051	14	0.617	11	0.629	5	0.000	14	0.047	13	0.059	11	0.086	11	0.213
14	泰州	0.000	15	0.850	5	0.122	14	0.043	13	0.001	14	0.010	14	0.253	10	0.183
15	扬州	0.121	13	0.000	15	0.206	13	0.217	10	0.121	12	0.096	9	0.301	7	0.152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年鉴》（1992、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上海统计年鉴》（1992、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江苏统计年鉴》（1992、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浙江统计年鉴》（1992、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3　2001 年"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吸引 FDI 潜力指数及各构成要素值

潜力排名	城市	人均GDP 分值	人均GDP 排名	过去5年实际GDP的增长 分值	过去5年实际GDP的增长 排名	出口占GDP的比重 分值	出口占GDP的比重 排名	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 分值	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 排名	人均电力消耗 分值	人均电力消耗 排名	R&D支出占GDP的比重 分值	R&D支出占GDP的比重 排名	专业技术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分值	专业技术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排名	平均值
1	上海	1.000	1	0.850	3	1.000	1	1.000	1	1.000	1	1.000	1	0.937	2	0.970
2	苏州	0.754	3	1.000	1	0.476	2	0.596	2	0.840	2	0.046	11	0.757	5	0.638
3	南京	0.418	6	0.846	4	0.322	3	0.375	8	0.506	4	0.404	3	0.778	4	0.521
4	无锡	0.785	2	0.415	8	0.139	9	0.484	5	0.769	3	0.149	6	0.837	3	0.511
5	杭州	0.563	4	0.921	2	0.294	5	0.524	4	0.506	4	0.245	4	0.408	8	0.494
6	宁波	0.536	5	0.683	5	0.303	4	0.570	3	0.408	7	0.156	5	0.647	6	0.472
7	常州	0.379	7	0.406	9	0.184	7	0.383	7	0.422	6	0.069	9	1.000	1	0.406
8	舟山	0.140	12	0.322	10	0.184	7	0.454	6	0.040	13	0.748	2	0.090	12	0.283
9	嘉兴	0.327	10	0.476	7	0.218	6	0.268	9	0.380	8	0.047	10	0.037	13	0.250
10	镇江	0.350	9	0.211	13	0.049	13	0.210	12	0.315	10	0.046	11	0.541	7	0.246
11	绍兴	0.354	8	0.533	6	0.111	11	0.217	11	0.338	9	0.000	15	0.002	14	0.222
12	湖州	0.214	11	0.000	15	0.050	12	0.218	10	0.255	11	0.144	7	0.000	15	0.126
13	扬州	0.079	13	0.009	14	0.036	14	0.110	13	0.067	12	0.137	8	0.382	9	0.117
14	南通	0.049	14	0.295	12	0.133	10	0.000	15	0.021	14	0.008	14	0.206	11	0.102
15	泰州	0.000	15	0.315	11	0.000	15	0.015	14	0.000	15	0.038	13	0.255	10	0.089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年鉴》（199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上海统计年鉴》（199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江苏统计年鉴》（199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浙江统计年鉴》（199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　FDI业绩与潜力指数分布格局

我们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划分标准[①]，依据“长三角”各市利用FDI的业绩和潜力指数值将15个城市划分为以下四类：

（1）领先城市：具有较高FDI业绩（即业绩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上）和较高潜力（即潜力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上）的城市；

（2）高于潜力城市：具有较高FDI业绩（即业绩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上）和较低潜力（即潜力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下）的城市；

（3）低于潜力城市：具有较低FDI业绩（即业绩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下）和较高潜力（即潜力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上）的城市；

（4）落后城市：具有较低FDI业绩（即业绩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下）和较低潜力（即潜力排名在所有城市的中点以下）的城市。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建立了1996和2001年“长三角”各地利用FDI业绩与潜力分布图（见图1和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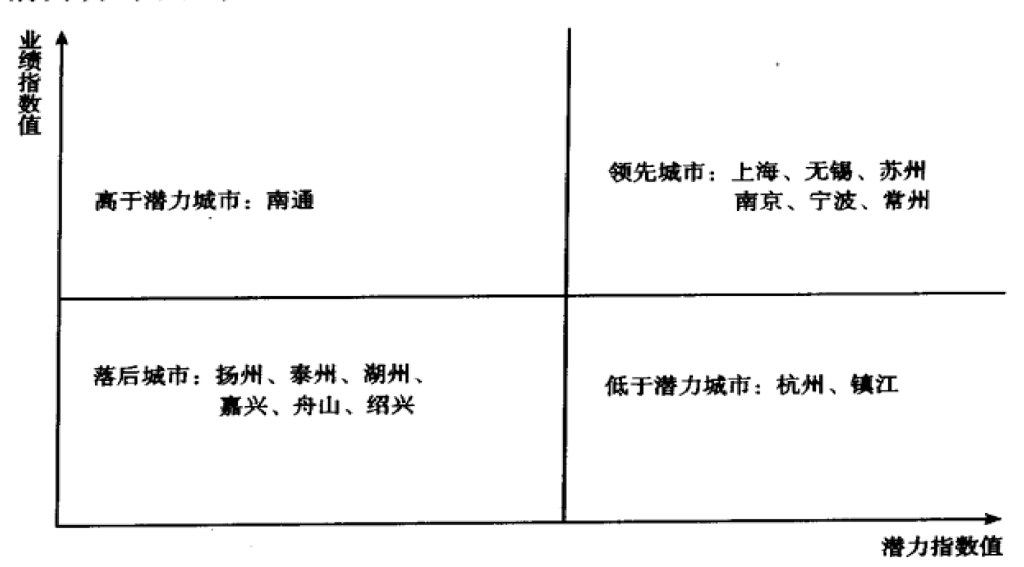


图1　1996年“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利用FDI业绩与潜力分布图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1996年领先和落后的城市各为6个。南通的实际

---

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http://www.unctad.org/ch/docs//wir2002overview_ch.pdf，2004-0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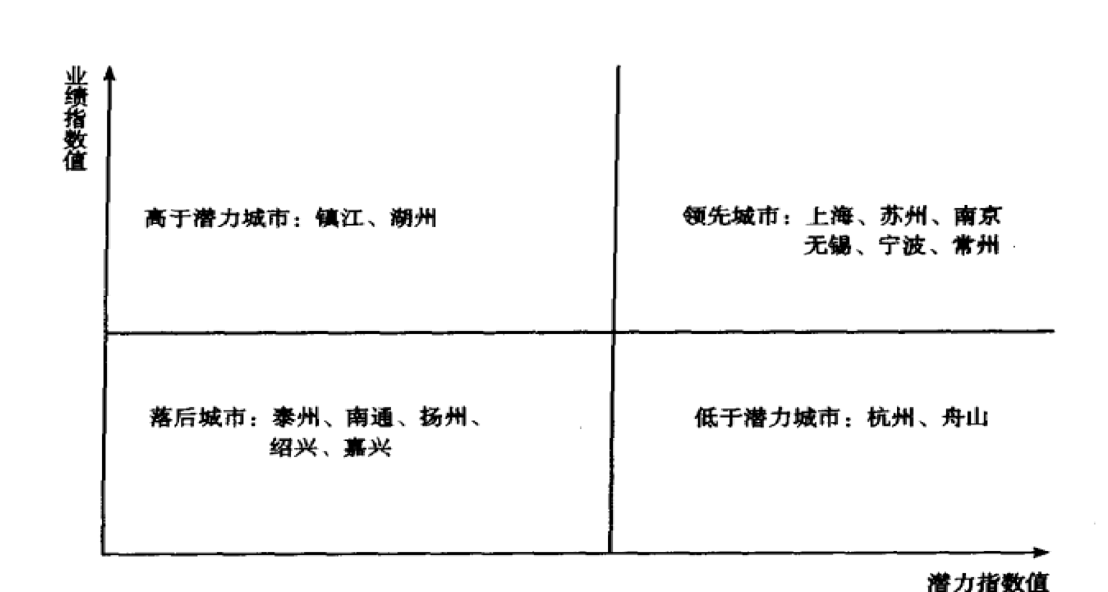


图 2　2001 年“长三角”区域内各市利用 FDI 业绩与潜力分布图

值高于其潜力值，表明该市在当年吸引 FDI 中业绩优秀，但应关注并改善制约当地竞争潜力的各子要素的状况。杭州和镇江属于低于潜力城市，实际吸引 FDI 的数量少于应该吸引到的数量，可能由于两地对吸引 FDI 工作的重视不够或其他政策性因素所致。

图 2 表明，2001 年领先和落后的城市分别有 6 个和 5 个，落后城市比 1996 年减少了 1 个。湖州由落后城市变为了高于潜力城市，但潜力指数的变化不大，说明当地在积极提升投资业绩的同时必须注意改善自身潜力各构成要素的状况。舟山由落后城市转变为低于潜力城市，表明该市在过去五年中挖掘、提升当地潜力的工作已见到实效。变化最大要属镇江，从 1996 年的低于潜力城市变为 2001 年的高于潜力城市。杭州一直位于低于潜力城市的行列，如何提升当地的业绩，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显得尤为重要。其余各市在 1996 和 2001 年象限的分布并没有发生变化。

五　结论与建议

首先，一个城市吸引 FDI 的业绩与其潜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吸引 FDI 业绩优秀的城市，往往其潜力也比较大；而潜力指数较高的城市，其吸引 FDI 的业绩也相对较为优秀。外资的流入有利于提高潜力指数，而潜力的大小又决定了该市的业绩水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长三角”各市

要在努力提高吸引FDI业绩的同时，致力于改善潜力指数中各构成要素的状况。但我们发现，少数城市也存在业绩与潜力相背离的现象。有些城市拥有较大的潜力值，但吸引FDI的业绩却始终低于其潜力（杭州），这就要求当地找到阻碍自身吸引FDI的关键因素，做出相应的努力，将潜力优势转化为现实成果。对于那些实际吸引FDI水平高于潜力的城市（镇江、湖州），则应该关注并提升构成其潜力指数中各子要素的状况，使得高业绩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

其次，"长三角"任何一个城市不可能对所有行业和项目的FDI具有完全相同的吸引力，应把吸引FDI的重点放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项目上。比如上海和南京两地潜力指数的构成要素中R&D支出占GDP的比重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比重比较高，说明两地的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劳动者素质较高，利用FDI的重点应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上。苏州、无锡在人均电力消耗上较大，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地适合吸引效率导向型FDI，应充分发挥两地交通便利、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泰州和扬州在"长三角"所有城市中潜力指数与各构成子要素的排名都比较低，但两地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方面有优势，应把吸引FDI的重点放在旅游、生态保护和绿色产品的生产等方面，当好"后花园"的角色。总之，各城市之间在吸引外资上应当加强协调、有所侧重，不然各城市之间的盲目竞争，不仅会损害整个"长三角"区域的共同利益，还会使自身的发展多走弯路。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FDI的引进对加快经济发展来说作用很大，但它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因素。用足用好国内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同样能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且它比单纯依靠外资来说更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①。我们知道，浙江是一个民间资本相对充裕的省份，而江苏则是利用外资的大省，然而通过对表1、表2、表3有关数据的计算，我们惊奇地发现，在1991～1996年的5年中，"长三角"南翼浙江6市吸引FDI的业绩指数平均是0.283，而同期的江苏8市则高达0.623，平均指数值是浙江的2.2倍，但同期GDP的增长却比浙江慢了3.79个百分点；而在1996～2001年的5年中，浙江6市吸引FDI的业绩指数值只达到江苏的一半②，但平均GDP增长却比江苏8市高出了0.35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反映了吸引

① FDI的引进易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② 浙江6市平均值为0.398，江苏8市平均值为0.762。

FDI的增长并不完全与GDP的增长同步。因此，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方面的资金，并使之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发展之本。

参考文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http：//www.unctad.org/ch/docs//wir 2002overview_ ch.pdf，2004－06－22。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003。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2。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2。

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02。

葛顺奇、郑小洁：《中国31个省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

葛顺奇：《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潜力评价》，《世界经济》2003年第6期。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现状分析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赵　旭

一　产业集群的界定指标

在产业集群的研究中，首先必须对产业集群进行界定。界定产业集群的方法很多。在这些方法中，区位商和投入产出分析（Rosenfeld，1997）是其中较为常用的界定方法。此外，在集群的定量分析工具中，还有图表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有助于精确地识别区域内相对集中的产业以及不同产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但这些定量分析工具也存在着不足，它们并不能解释集群企业之间的联系、特性及集群所带来的好处（Doringer，Terkla 1995），而这种网络联系是产业集群存在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鉴于此，在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时，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引入定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对产业集群进行界定。这一点在研究集群的众多学者中已达成共识。定性分析不仅能对定量分析的结果予以确认和证实，而且还能识别出为传统数据分析所忽略的处于潜在发展阶段的产业集群。

本文就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产业集群。限于资料的可获得性，在定量分析方法中，用区位商指标来对产业集群进行界定。区位商是指某地某产业比重与整体区域的该产业产值的比重之比。下面介绍一下区位商的计算方法。区位商 $Q=\frac{e_{ij}/e_{it}}{E_{nj}/E_{nt}}$，式中 e_{ij} 是 i 地区 j 部门的职工人数或产值，e_{it} 是 i 地区的职工总数或总产值，E_{nj} 是全国或区域 j 部门的职工人数或产值，E_{nt} 是全国职工总数或总产值，而本文选择工业产值作为计算的指标。

二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群现状分析

本文只是对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的主要产业集群进行研究，选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研究的样本，同样可以达到研究的目的。

长三角地区是指在长江入海而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上，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和江苏15个城市所组成的一个扇形区域，或称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该区域是由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两个次级中心及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镇江、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等城市一起组成。人口7000多万，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2003年，长三角GDP占全国的19.5%。长三角经济圈目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大中小城市共有55座，城镇更达1479个。在近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平均每1813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市，每6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建制镇。

下面来分析长三角的产业集群状况。本研究根据各市2003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资料，对工业中37个行业计算区位商以确定是否具有集群的可能性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实际进行经验判断，从而做出定性分析。在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是否为产业集群。表1为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绍兴、嘉兴及湖州等9个主要城市工业中各行业的区位商。区位商大于1说明产业存在聚集现象，而本文把判别标准定为1.4，凡区位商大于1.4的产业可以初步判断为具有产业集群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业的企业数、是否为垄断性行业等因素，删除部分行业，最终确定各市工业中存在的产业集群，见表2。

表1　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市工业行业的区位商

编号	行　业	上海	苏州	南京	无锡	杭州	宁波	绍兴	嘉兴	湖州
1	煤炭采选业	0.10	0	0	0	0	0	0	0	0.72
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8	0	0	0	0	0	0	0	0
3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	1.79	0	0.04	0	0.40	0	0
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	0.02	0.24	0	0.13	0	0.35	0	0
5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01	0.15	1.03	0.10	0.54	0.07	0.15	1.24	4.95
6	食品加工业	0.26	0.46	0.49	0.14	0.17	0.59	0.14	0.76	0.54
7	食品制造业	1.11	0.73	0.53	0.24	1.04	0.31	0.09	0.19	0.40
8	饮料制造业	0.53	0.15	0.48	0.09	2.55	0.27	0.87	0.25	0.41

续表 1

编号	行　　业	上海	苏州	南京	无锡	杭州	宁波	绍兴	嘉兴	湖州
9	烟草加工业	1.04	0.002	1.11	0	1.30	1.35	0	0.01	0
10	纺织业	0.53	1.99	0.32	2.48	2.35	1.20	6.44	2.89	4.09
11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1.23	1.57	1.09	1.39	1.21	3.13	2.32	4.33	1.74
12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52	0.85	0.88	0.29	2.37	0.17	0.89	6.73	1.20
13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15	0.81	0.58	0.13	0.75	0.37	0.14	7.54	7.51
14	家具制造业	0.96	0.94	0.81	0.05	1.61	0.60	1.33	0.64	6.18
15	造纸及纸制品业	0.53	1.48	0.46	0.47	2.19	1.25	0.58	2.08	0.71
1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1.28	0.43	0.61	1.11	1.40	0.52	0.12	1.40	0.73
1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83	1.25	1.66	0.24	0.77	4.75	0.56	0.86	0.45
18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14	0.17	1.75	0.14	0.11	2.62	0.004	0.18	0
1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97	1.01	2.59	1.32	0.94	0.44	0.89	0.65	0.68
20	医药制造业	0.89	0.66	0.59	0.61	1.00	0.14	1.13	0.12	2.36
21	化学纤维制造业	0.69	1.93	0.34	4.29	1.74	0.97	6.08	8.48	0.31
22	橡胶制品业	0.9	1.10	0.90	0.61	1.54	0.44	0.48	1.71	1.51
23	塑料制品业	1.08	0.94	0.86	1.83	0.94	1.76	1.38	0.64	0.03
2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55	0.95	0.82	0.60	0.69	0.34	0.68	1.25	2.08
2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28	1.13	1.20	1.67	0.48	0.28	0.16	0.17	0.29
2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57	1.02	0.40	1.32	0.19	1.22	1.70	0.32	1.04
27	金属制品业	1.36	0.95	0.99	1.77	1.51	1.64	0.88	0.75	1.23
28	普通机械制造业	1.53	1.14	1.02	2.33	1.40	1.86	1.79	0.95	0.46
2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2	0.97	0.89	1.60	0.91	1.14	1.66	0.37	0.28
3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91	0.48	1.33	0.76	1.05	0.66	0.23	0.07	0.09
3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13	1.33	0.87	1.28	1.49	2.18	0.69	0.89	1.31
3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46	2.04	1.40	0.85	0.97	0.60	0.11	0.32	0.06
3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55	2.47	0.73	0.66	1.37	1.45	0.33	0.30	0.08
34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53	0.42	0.51	0.48	0.33	0.95	0.48	0.85	0.96
35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1.30	0.40	2.30	0.15	0.46	1.26	0.05	0	0
36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76	0.36	0.66	0.36	0.69	0.60	0.56	0.42	0.47

朱英明（2002）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空间集群现象。他把表 1 中的 36 个部门归纳为 14 个部门集群，利用因子分析识别部门集群用做回归增长模型中的自变量，因变量是城市 1996～2000 年间总的 GDP 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用职工工资代替）增长的速度，从而说明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其得出的长三角各市外商投资企业部门集群的得分情况，如表 3。

表2 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市工业中存在的产业集群

地区	产业集群
上海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苏州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南京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无锡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杭州	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
宁波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绍兴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嘉兴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湖州	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表3 长江三角洲地区14个部门集群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城市

集群	得分最高的城市	得分最低的城市
1 家具制造、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与建筑集群	湖州	绍兴
2 医药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集群	泰州	绍兴
3 企业与专业服务	绍兴	舟山
4 橡胶制品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集群	嘉兴	镇江
5 金融保险与石油加工及炼焦集群	宁波	绍兴
6 农产品与化学纤维制造集群	南通	南京
7 其他行业和房地产集群，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部门	上海	扬州
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与普通机械制造集群	扬州	南京
9 电子工业及通信设备制造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集群	南京	绍兴
10 其他制造业集群，包括专用设备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部门	苏州	南京
11 纺织集群	绍兴	镇江
12 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集群，包括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制品、交通运输、作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无锡	扬州
13 食品制造集群，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和饮料制造部门	杭州	苏州
1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集群	苏州	常州

资料来源：朱英明：《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空间集群与地区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期。

此外，本文还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存在的专业化产业区（专业化产业区基本上都是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的），这些专业化产业区见表4。

表4　长三角各地市专业化产业区的部门结构及典型专业化产业区

地区		产业部门	典型专业化产业区
江苏	苏州	纺织、服装、电子通讯等	高新区IT业、盛泽丝绸、苏州市胥口镇文化产业、常熟服装服饰业、吴江菀坪缝纫机产业、吴江横扇羊毛衫产业、吴江金家坝彩钢板产业、吴江盛泽丝绸纺织产业、吴江光电缆产业
	无锡	纺织、机械设备	锡山摩托车业、宜兴环保产业、
	常州		武进灯具产业
	南通	纺织、服装	海门绣品
	镇江	电器、眼镜	句容自行车业、扬中低压电器、丹阳眼镜业、丹阳包装印刷产业
浙江	杭州	大型机械及成套设备、电子通讯、家用电器、医药、服装业等	杭州旅游汽配城；萧山衙前化纤业；新塘羽绒业；南阳制伞业；女装业
	宁波	服装、机械、石化	鄞县服装产业、蔺草加工、横街水表及配件、姜山燃气灶具、咸祥金融箱柜；余姚模具城、玩具城、塑料城、汽车配件、水暖设备、电动工具
	绍兴	纺织、印染、机械、医药、化工（如纺织印染助剂）、化纤等	绍兴县中国轻纺城；诸暨市衬衫、五金、袜业；嵊州领带城；新昌轴承、胶丸业；上虞劳保用品、伞件业；越城区家具业
	嘉兴	纺织、皮革、机械仪表等	海宁皮革、经编；平湖服装、箱包；秀洲区丝织品；海盐紧固件、玩具；桐乡羊毛衫业
	湖州	纺织（丝绸、毛纺、印染）、服装（童装）、建材等	纺织（丝绸、毛纺、印染）、服装（童装）、建材、竹编等
	舟山	水产品加工、海洋药物、机械等	舟山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产品精深加工、海洋药物、船舶修造、机械制造、电器电子、玩具等，同时已经形成了螺杆、微电机、小五金和水产品加工等

资料来源：浙江部分引自北京大学朱华晟博士论文，2002年，其他部分笔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从朱英明对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产业集群的研究结果及长三角地区存在的专业化产业区来看，本文用区位商来分析产业集群现象，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可以说明本文对长三角产业集群的分析具有可靠性。

结合长三角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的来源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

（1）在大型工业的辐射作用下，衍生出众多相关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如上海的汽车产业集群；宁波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产业集群；南京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产业集群。

（2）以科技园区、开发区为载体，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形成的产业集群。从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高新区以来，高新区发展迅速，在一些地方经济中高新区占据较大的份额，形成了相当规模。如苏州高新区的信息产业集群。

（3）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产业集群。例如上海的金融业、杭州的旅游休闲度假业。

（4）在地方传统的特色经济基础上，经过扩展、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如：苏州丝绸刺绣、杭州的龙井茶叶、绍兴黄酒等都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从2001年开始，我国开始对产品的属地进行保护。绍兴黄酒、西湖龙井被注册保护，更有利于产业朝集群方向发展。

（5）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产业集群。例如绍兴的纺织业、嵊州的领带业、宁波的服装业、慈溪的家电产业等。这些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是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优胜劣汰，保留下来的竞争胜利者。它们成功地占有了市场，形成强大的销售、信息网络和规模经济，区域内的企业具有了低成本优势，在外来投资和内部扩张等方面的作用下，成为产业集群。

从以上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中，我们可以将它们简单地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生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依靠本地的企业发展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大部分产业集群的形成属于这种形式，如前文所介绍的五种产业形成方式中，除了第二种“由跨国公司投资形成的产业集群”外，其余属于内生型的产业集群；另一种是外生形成的产业集群。内生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由同内在因素衍生形成的，构成集群主体的企业属于当地企业，并随集群的形成而形成，随集群的发展而发展，因而这种集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相反，外生型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主要是外来企业（很多集群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受到集群地区某种比较优势要素或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吸引，迁移到该地区发展；一旦这种比较优势不再，这些企业由于没有根植于本地，会继续迁移，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因而，外生型集群稳定性相对较差，必须使其集群主体根植于本地，即需要一个内生化的过程，方能使集群稳定。

参考文献

Porter, M. "Clusters &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11) . vol. 76 (6), pp. 77 ~ 90.

朱英明:《产业集聚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黄勇:《浙江 "块状经济" 现象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第 5 期, 第58 ~ 60 页。

徐维祥:《浙江 "块状经济" 地理空间分布及成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 年第 12 期, 第 55 ~ 60 页。

《上海统计年鉴 2003》、《南京统计年鉴 2003》、《苏州统计年鉴 2003》、《杭州统计年鉴 2003》、《宁波统计年鉴 2003》、《绍兴统计年鉴 2003》、《嘉兴统计年鉴 2003》,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长三角共同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的区域合作新思路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刘志彪

把长江三角洲打造成世界制造中心，在区域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最重要。因为只有强调江浙沪三地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才能获取长三角经济区域内产业发展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才能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才能打造出世界制造中心所要求的投资环境。

现在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按目前这样的分割式格局发展，长三角地区顶多只能形成一个“三雄”割据的诸侯局面。严重的、无序的竞争和过度的盲目重复建设，无法在动态博弈中实现三方共赢的良好结局，只会消耗彼此的发展实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盲目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将会削弱三地政府的公共资源，并给企业发送各种错误的资源配置信号，使长三角地区丧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因此，在区域竞争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三地的紧密合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战略意义。

以下从区域合作的角度，谈一谈对打造长三角世界制造中心问题的认识。主要强调四个词：“分工”、“融合”、“项目”、“规则”。这样选择完全是因为论述问题方便，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不重要。

一　国际制造中心建设中的产业分工合作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并不意味着某种产业的特定的事先安排和某种计划指定，更不意

味着某些地区只能搞什么和不搞什么。计划经济的行政安排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和企业自主选择的原则。我们所讲的分工合作，是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的企业的自发选择和自我决策，是在竞争的协同效应下，企业因利益考虑而选择某种特定的发展区域所出现的产业集中和集聚格局，是政府适应产业发展的区位规律的内在要求所做的主动性调节。

在上述表述的限制下，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关系，作者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浙江目前特别是未来的经济功能应该是成为降低商品制造成本的地区，而上海则应该成为降低长三角地区商品和服务产出的交易成本的中心。因为，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基本充分必要条件和前提在于，该区域不仅要成为世界制造成本的"洼地"，而且要通过一个特大城市为该中心的周边地区的制造业降低交易成本。只有"制造成本 + 交易成本"最低，或具有世界竞争优势，才能吸引世界各国制造业投资者。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世界制造中心的布局是这样的：即把服务业和制造业混合配置在一个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的内部。一般的配置格局是：在整个世界制造中心的区域范围内，大城市或者特大城市内部主要配置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以及某些对制造成本不敏感的现代高科技制造业；大量的一般性制造业因为对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环境处理成本高度敏感，往往配置在特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和卫星城市，这些周边地区与特大城市之间除了有发达的交通和通信联系外，特大城市还要为广大的周边地区的制造业提供非常紧密的生产或生活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技术研发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流通服务、航运服务等各种现代生产性服务。

我国珠三角地区在特殊政策的激励下，之所以可以形成中国制造业的新的增长中心，是因为珠三角地区广泛利用了香港这个特大城市所提供的生产者服务，同时努力降低广东南部地区的制造成本。其著名的"前店后厂"模式，就是对珠三角区域生产力配置理论的精彩说明。反过来看，我国渤海湾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之所以目前还缺乏形成制造中心的条件，是因为目前的北京、武汉、重庆和西安等大城市还不具备可以与香港、上海媲美的条件，目前还难以成为提供生产性服务、降低周边地区交易成本的经济中心。因此未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要千方百计地与制造业同步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

据此看来，上海应该大力发展各种服务业和某些先进的高科技制造业，

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而江苏和浙江应该充分利用发展制造业的历史传统和市场优势，大力发展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各种制造业。现在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上海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会使上海产业“空心化”，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要不得的。

第一，我们并不否认上海具有发展某些制造业的条件，上海在发展某些新兴高技术产业方面具有强烈的竞争优势，因此上海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不能放弃那些对制造成本低敏感度的高新技术产业。因为，不仅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而且高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都不能在空间距离上离开大城市过远。高技术产业所需要的投资环境，如融资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企业技术开发和管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都需要像上海这种特大城市就近提供。

第二，上海这些年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是顺应产业转移规律所做的聪明举措。放弃了某些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同时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不意味着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意味着上海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目前，某些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因涉及传统产业的生存问题和大量的摩擦性失业问题，某些政党和学界的利益代言人对所谓的产业“空心化”现象颇有微词。实际上，产业“空心化”现象所产生的效应，对特大城市来说是福还是祸，理论上并没用真正的结论。如果我们把看不见商品的实物生产过程就叫做“空心化”，那未免有些小农生产的眼光。应该看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国际外包”现象：跨国公司把管理、品牌经营、核心技术研发、系统集成能力等无形的、软性的生产能力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上，总部留在本国，而把大量有形的、硬件的、低端的生产制造过程用 OEM 或者 ODM 的方式发包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实现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了全球生产、全球制造和全球营销的高增殖战略目标。这一过程虽然也遭遇到了发达国家内部某些传统产业代言人的反对，但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第三，体现为当代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务业，既是现代制造业的最重要的投入，也是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成本、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最重要的投入，也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的收入。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性的投入，是当代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也是其竞争力所在。因此，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从产业特性来

说，是最具增值性的产业。上海在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最大的产业增值效应，同时给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支持。

二 国际制造中心建设中的发展机制融合

通过区域合作打造长三角世界制造中心，需要加快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机制一体化的步伐。因为只有发展机制的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长三角大范围内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现在有人提出，发展机制一体化就是要适当地撤并行政区域，或者在现行的省级政府之上，建立一个凌驾于中央和省级政府之上的区域行政管理机构，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是错误的，不仅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和反对，也会增加新的管理层次和管理难度，使长三角区域管理复杂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仅仅通过行政关系调整的办法就能解决中国复杂的区域管理问题，那么当年计划经济体系也不至于土崩瓦解。

说远一点，美国有那么多的州，在搞统一市场的过程中，我们也没看到他们不停地调整洲际的行政版图和界限；欧共体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版图一点也没有变，结果不是连货币也统一了吗？因此，一体化并不意味着行政版图的调整，而仅仅是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发展机制的一体化和融合。通过行政关系调整解决区域管理问题的思路，离开了我国市场化取向和改革20多年的实践背景，说到底是一种旧思想和旧方法在作怪。

我们提倡在区域竞争的基础上推行长三角地区发展机制的一体化和融合，其基本出发点是要在保持现有行政边界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我们不排除必要的合理的区域调整），在形成市场同一竞争规则的基础上，大力鼓励微观经济领域中的以下各种经济活动：①长三角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活动；②长三角企业跨地区发展；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长三角企业联合起来收购国外的企业；④各种形式的企业联合、合作和合营。这样才能实现企业产权的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企业联合、合作、合营、兼并收购等形式，是长三角经济发展机制一体化的微观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企业集中、市场集中和产业集聚。

大力鼓励在长三角共同市场中进行跨地区的企业兼并活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机制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中，最需要学习欧共体的地方。跨地

区的企业兼并活动，可以在本区域内产生以市场为导向的自我联合效应，加速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发展一体化机制的形成。例如，如果长三角的汽车产业经过这种整合，企业就会在内部“管理的手”的指挥下，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自动把汽车生产的研发、销售、管理等总部放在上海，而把零部件生产放在长三角的其他地方。这不就自动产生了一体化效应了吗？正是因为看中这一兼并的一体化效应，1957年3月25日欧共体成员国签订的《罗马协议》中，就没有包含一个西方国家通常所重视的具体的兼并控制方法。这不是一种轻率的做法或失误，而是欧共体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本来的愿望是要利用兼并许可政策，克服市场容量狭窄的弊端，形成规模经济与美国、日本经济竞争，加速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三　国际制造中心建设中的项目合作

现在普遍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搞的问题。要学习欧洲人务实的经验和做法，区域合作应该从具体的项目出发，从具体的产业做起。想当年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所提出的重新整合欧洲的方案，在众多方案中之所以显得比别人高明，是因为他避开了在广泛领域中讨论欧洲未来的统一问题，而是抓住煤炭、钢铁工业和原子能利用等这种具体的领域，制定统一欧洲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欧洲六国内部建立没有关税、没有配额、没有其他进入壁垒，从而可以实现煤炭、钢铁产品生产流通自由化的共同市场。与此相同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也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行政会议和宣言就可以一下子全面联合起来的，而必须通过某些具体的行动进行实实在在的联合，在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中，逐步产生出各地区企业主体的自我联合、自我协调和自我发展机制。

我们认为，某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联合战略构想和战略措施应该从以下内容做起，具体包括：

（1）建设统一的、具体门类的专业市场体系。为发挥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以及江苏的制造优势和浙江的销售优势，三地要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引导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间资本联手共同投资发起培育、建设并竞相开放面向本区、全国和全球的大型商品、生产要素市场。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绍兴、宁波等中心城市，建立、完善由跨地区的企业集团

负责运作的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发展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运用国际统一标准规范市场行为，重构统一的商业信誉体系，促进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完善和发展。

（2）建立统一的农业产业化基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都要以各地大城市市场和国际市场为导向，设法使第一产业向都市型农业转型，发挥上海的市场容量和市场信息优势，以及苏浙两地农业科技水平较高和资源及加工能力强的优势，重点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种子、种畜、种苗基地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或者贸工农一体化龙头企业，采取多种灵活的微观企业组织形式，扶持建设绿色的、无污染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及创汇农业、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以及面向全国和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体系。

（3）建立大的工业技术创新项目的联合体。要集中三地的资源优势和管理优势，以股份制投入为基本着眼点，重点对以电子信息、生命生化科学和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合作创新和攻关，建设这些产业的优秀品牌并给予重点支持，使这些名牌产品成为国内外著名品牌；在技术创新上，要以企业特别是三地上市公司为主体，对国际上成熟的产业实施“动态跟随式引进”战略，改造传统产业，以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同时瞄准国际尖端的先进技术领域进行自主创新。三地政府要通过制定一体化的配套政策，确保研究和发展基金和财政金融部门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特别是在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环保产业上要重点实现技术创新的突破，从而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

（4）综合性旅游金三角项目建设。发挥上海国际大都市与江、浙三地旅游景点多、文化内涵深、地方特色强和都市、山水风光互补的优势，进一步开展多方位合作，建设形成苏、浙、沪、皖大旅游圈。一是利用宁杭沪甬沿线快速、便利的交通条件，在上海及江、浙两省各大城市建立旅游散客服务中心，并开通旅游热线和散客班线。二是相互允许大的旅行社在对方设立业务代办销售点，并可合作建立旅行社。三是共同探索实施跨地区旅游连锁经营。四是联合各地积极筹办各种综合品牌的旅游活动，构造大旅游购物气氛，形成新一轮旅游消费热点。五是苏浙沪，甚至联合安徽共同协调和参与泛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突出各地的发展重点和特色，形成旅游消费“套餐”。

（5）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在沪宁、沪杭高速公路通车、铁路列车提速的

基础上，完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并向运输网络优化发展。建设完善特大城市、大中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在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深水港的同时，发挥浙江沿海、江苏沿江港口群体的副中心作用，把一些国际上大的船运公司适当引进长江内河，缓解上海港日益增长的运输压力。为此要改造提升沿江港口的运转功能，协调好三省市沿海沿江岸线资源的合理开发及科学管理。

（6）某些制造业项目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发挥优势和共同发展的指导思想，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统筹规划和积极提高本区的制造业，重点实现汽车、电站和精密机械设备、家电和现代通信设备等制造行业的合理分工和优势的有效互补。其中，汽车工业要实现企业和地区的分工，以上海通用和大众的轿车、南京跃进的轻型车、扬州亚星的大客车、浙江的重要零部件等为分工与协作的基础，组建若干大型的汽车企业，增强汽车系列产品和重要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电站和精密机械设备制造要增强地区协作和提高技术水平，使部分重点产品的质量达到国际优质标准，家电和现代通信设备要实现各企业的产品主导方向合理分工，进行必要的资产兼并和重组，集中攻关重要家电和通信设备的关键零部件技术，积极生产程控交换机、移动通信设备等。

四　建设国际制造中心建设需要完善竞争规则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难以建立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目前的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格局中，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的有效竞争规则。一个统一协调的有效竞争规则，对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机制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根据欧共体创建和欧盟运行的实际经验，如果没有它的支撑，就无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市场范围内，协调各地区政府的行为，就无法使区域内的市场主体进行充分的、有效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无法防止市场竞争被各地区行政权力和垄断势力扭曲以及实现大市场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

应该说，改革20多年来，我们一方面在地方分散主义的体制格局中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业绩，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分散主义的竞争格局付出了重大的发展成本。官方和学术界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统一指导下，建立一个区域共同市场和逐步

协调成员地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区域共同市场内部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推动一个持续的和平衡的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准，推动在区域共同市场联合基础上的地区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欧共体建立的经验，避免高发展成本和发挥区域共同市场的优越性，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推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市场范围内实现有效的竞争。

除了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过程中有效地限制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和能力之外，还必须通过某些具体的协议和条约，达成对各地区竞争规则的协调，最终达成全面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的协议或条约。从 1951 年 4 月 18 日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 1957 年 3 月 25 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再到 1993 年 11 月 1 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以及世纪初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联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当然欧洲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不能拿来与长江三角洲区域共同市场的创建进行简单的类比，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对现行的行政关系和地方政府权力结构的做一定的调整，那么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在现有行政格局中它可能并不比欧盟的经济整合容易多少。

根据欧盟创建的经验，一个重要的具体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和统一市场的建立，要在签署共同条约的基础上，将这项国家主权交给一个跨国机构行使，使这个跨国机构拥有自己的主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和执行共同体市场的政策和法律，及时解决涉及共同体市场的法律争议。为此还要建立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与此相反的是，主权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行政和法律程序，不需要付出如此高的管理成本，而只要在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通过协调各地方法规和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制定以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为基础的、适合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需要的统一协议或条约，就可以顺利地得到实现。在制定和执行统一协议或条约的必要的协调组织机构方面，既可以设置在中央政府的综合机构内部，也可以由中央政府授权、各地主要领导参与，把协调机构设置在龙头地区，如上海。为此要在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指导下，逐步修正和统一各成员地区的地区性法规和政策，废除与一体化有冲突的地区性政策和法规，协调各地既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有意识地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该协议或者条约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一种以市场竞争为基础、非行

政扭曲和垄断势力扭曲的竞争体系，逐步限制地方政府参与市场运作的市场主体功能，充分发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各种市场垄断力量，特别是中国目前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垄断，也应该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制定统一竞争规则的具体目标之一。因为根据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竞争政策是保持市场统一的基本方法，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企业沿着竞争的路线去经营，消减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垄断利润，就可以保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和激励企业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创新。

之所以要校正竞争秩序，是因为对竞争的扭曲会阻碍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如果各个地区所有商品的供给者都想方设法以不同的条件留住自己的客户，特别是其成员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按其所在地区为边界制定市场竞争规则，那么一体化的市场将根本不可能自动产生具有经济理性的利益边界，相反会导致大量的经济歧视和进入市场的障碍问题。因此实施统一竞争规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阻止单个企业、企业群体或者成员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一体化市场内部创造那种有损于经济一体化的行为和壁垒，如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政策等。

参考文献

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洪银兴、刘志彪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长三角苏、浙、沪三地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朱海就

长三角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工业基础较好，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大批高素质人才，科研开发能力较强，民营经济比较活跃，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长三角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共同构成了我国 3 大区域经济中心。位于长三角的浙江、上海、江苏制造业都比较发达，但各有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 3 地制造业竞争力的分析，来说明 3 地制造业各自的特点。

一　制造业竞争力的计算方法

这里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 克雷默 1942 年提出的偏离份额分析法来研究长三角浙江、上海、江苏制造业的竞争力。偏离份额分析法从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两个方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如果一个地区各个产业的增长速度与全国同一产业的增长速度完全相同，即排除了由于各个地区同一产业竞争力不同造成的增长速度上的差异，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则是由结构因素引起的。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完全相同，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只能由地区竞争力来解释。因此，偏离份额分析法既是一种能说明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结构因素与竞争力因素所起的作用程度的计算方法，同时又是进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结构决定因素差异的比较方法。

假设 F_i（T）表示 T 时期长三角（浙江、上海、江苏制造业）i 产业的

产值，则

$$Fi(T) = \sum_{j=1}^{n} F_{ij}(T) \quad (1)$$

其中 F_{ij}（T）表示 T 时期 j 区域 i 产业的产值

用 F（T）表示 T 时期长三角所有产业的总产值，则 $F(T) = \sum_{i=1}^{n} F_i(T)$，其中 $T = t_o$ 为基期，$T = t$ 为报告期，在本文中，报告期是 2002 年，基期是 1998 年。将（1）式的定义分离出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

$$\begin{aligned} \triangle F_{ij} &= F_{ij}(t) - F_{ij}(t_o) \\ &= F_{ij}(t_o)\left[\frac{F(t)}{F(t_o)} - 1\right] + F_{ij}(t_o)\left[\frac{F_{ij}(t)}{F_{ij}(t_o)} - \frac{F_i(t)}{F_i(t_o)}\right] + F_{ij}(t_o)\left[\frac{F_{ij}(t)}{F_{ij}(t_o)} - \frac{F_i(t)}{F_i(t_o)}\right] \quad (2) \\ &= N_{ij} + P_{ij} + D_{ij} \end{aligned}$$

$\triangle F_{ij}$为 j 区域 i 产业产值的增加额，F_{ij}（t_o）为 j 区域 i 产业的基期产值，F_{ij}（t）为 j 区域 i 产业的即期产值。根据上述模型，j 区域 i 产业产值的增加额由三部分构成。

①$N_{ij} = F_{ij}(t_o)\left[\frac{F(t)}{F(t_o)} - 1\right]$为长三角增长分量，即 j 区域 i 产业产值增长速度而应有的增长额。其中$\frac{F(t)}{F(t_o)} - 1$ 为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率。

②$P_{ij} = F_{ij}(t_o)\left[\frac{F_i(t)}{F_i(t_o)} - \frac{F(t)}{F(t_o)}\right]$为产业结构分量，即 j 区域 i 产业产值增长偏离长三角 i 产业平均增长的部分，它的增长是由于 j 区域 i 产业相对于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差异引起的，它反映了 j 区域以长三角为标准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其中$\frac{F_i(t)}{F_i(t_o)} - \frac{F(t)}{F(t_o)}$表示长三角第 i 产业产值增长率和全国总产值的增长率的差异，它对于所有的地区都是不变的，只取决于 F_{ij}的结构。

③$D_{ij} = F_{ij}(t_o)\left[\frac{F_{ij}(t)}{F_{ij}(t_o)} - \frac{F_i(t)}{F_i(t_o)}\right]$为 j 区域 i 产业增长额分解的剩余成分，即扣除长三角经济增长和部门结构变动的因素之后的增长额。由于剩余成分的正负和大小体现该部门在长三角同行业中的相对增长水平，因而也叫做竞争分量，它反映区位条件或地区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用竞争分量既可以判断区域 i 产业在长三角同行业所占有的竞争地位，又可以了

解在长三角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的相对扩张和收缩发生在哪些地区。其中 $\frac{F_{ij}\ (t)}{F_{ij}\ (t_o)}-\frac{F_i\ (t)}{F_i\ (t_o)}$表示 j 区域 i 产业产值的增长率与长三角 i 产业产值的增长率的差值。当$\frac{F_{ij}\ (t)}{F_{ij}\ (t_o)}-\frac{F_i\ (t)}{F_i\ (t_o)}\ \phi\ 0$ 时，j 区域 i 产业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基期的实力；当$\frac{F_{ij}\ (t)}{F_{ij}\ (t_o)}-\frac{F_i\ (t)}{F_i\ (t_o)}\ \pi\ 0$ 时，$F_{ij}\ (t_o)$ 越大 j 区域 i 产业竞争能力越处于劣势。其中 $P_{ij}+D_{ij}$为 j 区域 i 产业与长三角的总偏离量。

将（2）式的两端同时除以 $F_{ij}\ (t_o)$，便得到了以增长率形式表示的偏离份额方程，它与（2）式所不同的就在于（2）式是以增长量形式表示的。

二　计算的结果及分析

（一）浙江、上海、江苏 3 地制造业增长速度的比较

在计算 3 地各自的竞争力之前，我们首先比较 3 地主要制造行业的增长速度。我们统计了浙江、上海、江苏 13 个主要行业报告期（2002 年）与基期（1998 年）的产量以及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的增长，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浙江、上海、江苏制造业报告期（2002 年）与基期（1998 年）产值

单位：亿元

产　业	1998			2002		
	浙　江	上　海	江　苏	浙江省	上　海	江　苏
纺织业	685.89	242.08	1039.79	1348.17	249.66	1539.75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272.64	224.81	334.96	595.75	242.13	564.9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17.09	116.66	154.42	245.13	382.4	232.88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302.84	354.77	776.3	546.17	490.87	1359.74
塑料制品业	169.56	123.41	235.21	365.72	182.8	354.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85.63	504.89	312.46	162.09	579.04	748.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3.01	136.56	314.25	300.69	176.09	492.96
金属制品业	174.28	288.56	329.2	420.92	290.56	538.65
普通机械制造业	264.4	337.43	567.76	614.93	463.36	949.7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88.43	635.05	447.62	520.86	1107.9	749.1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89.1	402.93	537.85	840.6	502.91	928.2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16.09	496.51	543.98	443.71	1142.6	1418.97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1.97	166.74	305.43	351.99	259.15	486.86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175.19	50.9	112.22	446.28	69317	170.09
合　计	4702.43	5503.52	8053.03	9779.04	7740.6	13865.9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1999 年与 2003 年版。

表2　不同地区不同制造业报告期（2002年）相对于基期（1998年）的增长

产　　业	区域整体	上海产业	江苏产业	浙江产业
纺织业	1.594	1.031	1.481	1.966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1.685	1.077	1.686	2.185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217	3.278	1.508	2.094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1.671	1.384	1.752	1.803
塑料制品业	1.710	1.481	1.507	2.15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650	1.147	2.396	1.89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530	1.289	1.569	1.643
金属制品业	1.578	1.007	1.636	2.415
普通机械制造业	1.734	1.373	1.673	2.32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871	1.745	1.674	2.76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708	1.248	1.726	2.16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392	2.301	2.608	2.053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653	1.554	1.594	1.834

注：表中数据为2002年产值与1998年产值的比值。

从表2中可以看出，报告期（2002年）相对于基期（1998年）区域整体增长最快的3个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上海增长最快的3个行业排序与区域整体是一致的；江苏增长最快的3个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浙江增长最快的3个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在所计算的13个行业中，上海只有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区域整体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区域整体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江苏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区域整体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的行业有7个，其中服装行业的增长速度与区域整体的增长速度基本接近；浙江有11个行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区域整体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低于区域整体相应行业增长速度的行业只有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另外，从表中也可以发现，浙江同样也有11个行业的增长速度高于江苏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从中不难看出，报告期（2002年）相对于基期（1998年），上海、浙江、江苏3地，浙江制造业总体的增长速度最快，江苏次之。

（二）浙江、上海、江苏3地制造业的竞争力及结果分析

1. 上海制造业的竞争力

我们利用上面给出的方法计算了上海、江苏、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计算的对象是产值占当地工业总产值前10位的行业。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前10位的行业的竞争力见表3。我们发现上海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两大行业的比重很高，都超过14%，从结构分量上看，上海这两大行业的优势非常明显，其中比重最大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结构分量也最大。在10大行业中，有4个行业的结构分量为正，其他6个行业的结构分量为负，这些结构分量为负的行业，意味着其增长速度低于长三角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而上海10大行业中有一半以上的行业是这类增长为负的行业，这说明上海的制造业结构不容乐观；竞争力分量更说明了这一点，在这10大行业中，除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这一个行业外，其他9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都为负值，竞争力分量为负说明上海这10大主要行业中，除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外，其他行业相对于基期的增长速度低于长三角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包括产值比重在前两位的行业在内，从其增长速度反映出的竞争力并不高。在10大行业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其结构分量与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说明这一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表3 上海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及其竞争力（2002年）

单位：%，亿元

排名	行业	产值百分比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4.76	334.01	-44.88
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4.31	96.44	-80.10
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48	-34.78	-254.04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50	-4.29	-185.40
5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6.34	-16.82	-102.13
6	普通机械制造业	5.99	5.08	-121.73
7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4.94	58.06	123.81
8	金属制品业	3.75	-40.55	-164.89
9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35	-10.94	-16.52
10	纺织业	3.23	-30.12	-136.33

对比其他学者以1995为基期，2000年为报告期所做的研究，我们发现，上海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长三角其他地区有下降的趋势，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见表4）。

表4 上海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及其竞争力（2000年）

单位：%，亿元

排 名	行 业	产值百分比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2.58	368.85	44.19
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2.17	35.55	32.59
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9.44	-120.26	-76.61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88	47.60	-11.90
5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6.68	36.34	-34.66
6	普通机械制造业	5.08	-3.09	-21.43
7	金属制品业	4.23	10.80	30.88
8	化学纤维制造业	3.78	1.50	9.18
9	纺织业	3.68	-146.54	-86.67
10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3.27	0.14	-34.54

资料来源：洪银兴、刘志彪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216页。

我们发现，2000年与2003年比较，首先是前10位的行业已经发生了变化，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与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成为进入新的10大行业，而化学纤维制造业与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退出了10大行业之列，这说明服装等传统产业在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退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优势仍然比较明显，甚至进一步提高的同时，其他行业的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这从其结构分量与竞争力分量的变化就能反映出来。2000年，上海10大行业中，只有3个行业的结构分量为负，而到2002年增加到6个，这说明上海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比较缓慢。另外，在竞争力分量中，2000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正值，但2002年，这些行业的竞争力分量都变为负值，说明随着这些行业规模的扩大，上述行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落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相应行业的增长速度。

2. 江苏制造业的竞争力

再看江苏制造业竞争力的情况，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江苏制造业的

特点是纺织业比重很高，在10大行业中排在第一位，与2000年纺织业比重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84%比较（2000年数据见表4），其比重只是略微下降。其次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比较高，这与江苏这些行业集中了大量的外资有关，2000年，该行业在10大行业中的比重是第3位，这说明，江苏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一直比较明显。与2000年比较，江苏制造业的竞争力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这与上海相反，我们发现2000年与2002年，10大行业的名称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排名顺序上发生了变化，另外从竞争力分量可以看出，原来有5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负，现在减少到3个。与2000年比较，江苏省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的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表5　江苏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及其竞争力（2002年）

单位：%，亿元

排　　名	行　　业	产业百分比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1	纺织业	11.10	-129.36	-118.19
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0.23	365.94	117.98
3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9.81	-36.80	62.15
4	普通机械制造业	6.85	8.54	-34.75
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69	-5.73	9.48
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40	67.98	-88.25
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40	-21.53	233.24
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4.07	-11.29	0.42
9	金属制品业	3.88	-46.27	19.05
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56	-59.37	12.16

3. 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

再来看浙江制造业的情况，见表6。浙江与江苏同为制造业大省，制造业有相似的地方。比较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可以发现，有8大行业是相同的，比较也可以发现，浙江的制造业明显地偏向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比如浙江在前10大行业中有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与塑料制品业，而这两大行业都不在江苏的前10大行业之内，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江苏的排名第二，在浙江的排名第八。与江苏一样，纺织业也是浙江产值比重最大的行业，但是从该产业的竞争力分量看出，浙江纺织业的竞争力

比江苏强。与江苏、上海等地比较，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较高，这主要体现在竞争力分量上，浙江的竞争力分量除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正，江苏有3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负，而上海竞争力分量为正的只有一个行业。这也表明浙江省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中，多数行业在长三角地区具有竞争力。

表6 浙江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及其竞争力（2002年）

单位：%，亿元

排名	行业	产业百分比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1	纺织业	13.79	-85.33	254.52
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60	-4.14	175.92
3	普通机械制造业	6.29	3.98	156.47
4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6.09	-9.19	136.30
5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5.59	-14.36	39.97
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33	28.61	168.35
7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4.56	-11.50	156.64
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4.54	145.37	-73.09
9	金属制品业	4.30	-24.49	145.84
10	塑料制品业	3.74	-1.56	75.83

三 结论

以上的分析说明，从总体上看，在江苏、浙江、上海3地中，浙江制造业的竞争力最强，江苏次之，这与近年来3地制造业增长速度高低的排序是一致的。除此以外，还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

1. 长三角江、浙、沪3地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同构”的现象比较明显

从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可以看出，纺织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6个行业都是江、浙、沪3地产值比重在前10位的行业，也就是说3地产值比重在前10位的行业中，有6个行业是相同的。但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不能说明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同一产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很大的，以纺织为例，江苏在中高档面料的生产

上有优势，浙江在化学纤维、普通化纤布、印染布、丝织品等的生产上有较大的优势，这种差异的存在为不同地区之间展开合作创造了条件。

2. 3地制造业各有特色和优势

尽管存在同构，但3地制造业发展的差异也明显存在。浙江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在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的行业中，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纺织业还是浙江制造业竞争力最强的行业；江苏制造业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上有优势，这是与浙江明显不同的，如江苏竞争力最强的行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都属于资本密集行业；上海制造业的竞争力与浙江、江苏比较相对较弱，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重化工业的优势比较明显，这类行业属于临港型工业，与上海的港口有直接的关系。

3. 制造业竞争力的差异反映了江、浙、沪3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或战略

浙江的经济起步于民营经济或者说是“草根经济”，民营经济起初进入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江苏经济的特点是“开放经济”与“园区经济”，利用外资比浙江、上海都多，从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加工制造业起步，起点比较高；上海制造业的发展体现了“有退有进”的战略，主动退出传统加工制造业，重点发展有资金、技术、人才实力，基础较好的现代制造业，在退出部分制造业的同时，积极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使上海成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因此，上海制造业竞争力从整体上看不如江苏、浙江，部分原因是上海自身发展战略调整的结果。这并非一定是坏事，制造业竞争力的强弱并不能说明经济的优劣，但这意味着上海为周边地区的制造业提供现代服务的功能必须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洪银兴、刘志彪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

魏后凯：《长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战略》，《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曾骅、朱敏彦等主编《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长三角龙头城市上海服务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殷　凤　陈　宪

一　上海服务业发展情况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的比较

（一）总体发展情况比较

为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特点有一个基本认识，综合评价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地位，我们选取了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成都、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济南、青岛、深圳、厦门、杭州、宁波、西安、武汉 19 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进行数据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以上 19 个城市的服务业经过“八五”时期高速增长后，速度逐步减缓，增幅也趋于稳定。“八五”时期，19 个城市年均增速均在两位数以上，除沈阳、大连和西安外，上海年均增速低于其他城市；“九五”时期，大多数城市增速减缓，而上海的年均增速却由“八五”时期的 12.5% 增长到 15.1%，位列“九五”时期 19 城市服务业年均增速的第三位（年均增速最高的是济南，为 17.7%，其次是武汉，为 15.2%）。2001～2002 年上海服务业增速明显趋缓，年均增速仅为 9.4%，而其他城市（重庆除外）均达到两位数的增长。2001 年和 2002 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提高了 2.2 个和 0.8 个百分点，广州分别提高了 1.9 个和 1.2 个百分点，而上海仅提高了 0.1 个和 0.3 个百分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多数城市服务业在经济和就业方面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但就业比重提高慢于产业比重的提高，服务业对增加就业的作用并不

显著。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和200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城市中居第三位，低于北京和广州，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居第二位，仅次于北京，服务业发展层次相对较高。

表1　19城市各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幅和增速极差

单位：%，百分点

	"八五"时期		"九五"时期		2001～2002年	
	年均增幅	增速极差	年均增幅	增速极差	年均增幅	增速极差
上　海	12.5	7.3	15.1	4.9	9.4	1.3
北　京	14.5	8.4	11.0	3.2	12.4	0.8
天　津	13.4	10.4	11.5	9.8	11.5	0.5
重　庆	18.2	13.9	12.2	6.8	9.2	0.1
广　州	15.7	12.0	13.7	5.8	14.6	1.0
南　京	18.4	16.2	13.0	1.5	13.9	0.2
成　都	17.2	13.2	11.6	1.2	12.9	0.2
沈　阳	10.2	8.8	9.5	4.9	11.5	2.0
青　岛	20.4	34.0	12.7	10.7	14.4	0.7
济　南	21.2	15.1	17.7	11.4	14.9	2.0
深　圳	28.2	19.7	12.6	7.8	12.6	1.3
厦　门	25.4	23.4	13.0	11.5	10.7	1.3
大　连	11.7	16.2	10.2	4.8	13.7	2.2
长　春	21.6	21.2	14.3	3.9	13.6	0.8
哈尔滨	12.9	4.9	12.4	1.7	12.1	0.2
杭　州	22.3	8.9	12.2	7.2	13.6	2.2
宁　波	24.0	36.6	14.3	5.8	12.4	0.0
西　安	11.5	5.7	11.8	3.2	12.7	0.4
武　汉	21.3	24.2	15.2	6.2	12.3	0.3

资料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

表2　19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

单位：%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	
	2000年	2002年	2000年	2002年
上　海	50.6	51.0	44.9	48.8
北　京	58.3	62.2	54.6	55.4
天　津	45.5	47.1	36.9	41.6
重　庆	40.8	42.0	29.3	30.1
广　州	52.6	55.7	40.9	43.0
南　京	46.2	47.9	39.1	44.2

续表 2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	
	2000 年	2002 年	2000 年	2002 年
成　都	45.7	46.1	30.1	35.2
沈　阳	49.4	50.1	41.2	46.5
青　岛	39.1	40.0	29.7	33.4
济　南	46.1	49.4	36.4	38.4
深　圳	46.5	44.4	41.8	43.1
厦　门	43.0	40.7	33.8	33.7
大　连	44.0	44.6	42.5	42.4
长　春	42.5	41.8	32.0	36.4
哈尔滨	47.4	48.6	32.6	33.7
杭　州	41.2	43.0	36.1	37.2
宁　波	35.8	37.7	25.9	23.9
西　安	45.8	49.0	34.6	35.9
武　汉	49.1	49.8	42.4	43.7

资料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

（二）上海服务业各行业的比较优势

下面再来看一下上海服务业各行业的比较优势。出于可比性的考虑，我们选取了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 5 个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与上海进行比较。

从绝对数来看，上海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位列 6 城市第二，其余行业均位列第一（见表 3）。

再从服务业内部构成来看，在 6 大城市中，上海房地产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最高，达到 13.56%；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占比仅次于重庆，居第二位；金融保险业占比略低于深圳和北京，居第三位；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仅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3.42%，分别低于北京和重庆 5.14 个和 1.88 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占比低于北京、重庆和天津，居第四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以及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占比仅高于北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占比仅低于深圳，居第五位；社会服务业占比在 6 城市中位居最末（参见表 4）。

表 3　上海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与 5 城市比较（2002 年）

单位：亿元

	服务业增加值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上　海	2755.83	51	382.82	602.29	584.67	373.63	328.86	88.96	196.5	94.34	88.92
北　京	1998.13	62.2	235.56	256.32	469.44	163.12	322.6	55.45	212.16	171.00	84.26
天　津	965.26	47.1	230.88	196.38	73.08	97.66	135.59	38.08	85.52	30.37	57.98
广　州	1671.27	55.7	470.62	301.39	173.05	112.59	290.84	66.02	103.45	32.21	106.67
深　圳	1003.08	44.4	192.27	196.62	236.24	124.96	126.31	32.61	42.08	9.41	24.69
重　庆	827.97	42	123.97	182.51	78.25	70.9	133.89	30.37	83.79	43.87	80.42
上海位次	1	3	2	1	1	1	1	1	2	2	2

资料来源：各城市 2003 年统计年鉴。

表 4　上海服务业内部结构与 5 城市比较（2002 年）

单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上　海	13.89	21.86	21.22	13.56	11.93	3.23	7.13	3.42	3.23
北　京	11.79	12.83	23.49	8.16	16.15	2.78	10.62	8.56	4.22
天　津	23.92	20.34	7.57	10.12	14.05	3.95	8.86	3.15	6.01
广　州	28.16	18.03	10.35	6.74	17.40	3.95	6.19	1.93	6.38
深　圳	19.17	19.60	23.55	12.46	12.59	3.25	4.20	0.94	2.46
重　庆	14.97	22.04	9.45	8.56	16.17	3.67	10.12	5.30	9.71
上海位次	5	2	3	1	6	5	4	3	5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 2003 年统计年鉴计算。

下面我们以 6 城市为总体，采用“区位商”的方法衡量上海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公式为：

$$Q_i = P_i / N_i$$

Q_i 为某地区 i 行业的区位商，$Q_i > 1$，表明该行业具有优势，且值越大优势越大；$Q_i < 1$，则该行业不具备比较优势。

P_i 为某地区服务业增加值中 i 行业所占比重。

N_i 为6城市服务业增加值中 i 行业所占比重。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出上海服务业内部行业区位商（见表5）。

表5　2002年上海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区位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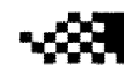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上　海	0.783	1.162	1.212	1.327	0.822	0.956	0.908	0.828	0.673

由表5可知，与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和深圳相比，在服务业9个行业门类中，上海只有3个门类具有比较优势，其中，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具有较强优势，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也具有比较优势，但优势并不十分明显；而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等6个行业均低于其他5个城市的平均水平，不具有比较优势。其中，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以及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低于其余5城市平均水平较多。科技、教育产业均不具备优势，可见，“科教兴市”任重而道远。

二　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与若干国际大都市的比较

由表6可以看出，上海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如服务业占GDP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外汇日交易额、证券年交易额、外国银行数、500家最大跨国公司总部、政务电子化比例等，均与世界其他国际大都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在这些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上海服务业在规模提升、结构优化等方面很难有更快的发展。

与国际大都市纽约相比，上海服务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纽约早在1989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达到了86.8%，而上海最高是2002年的51%；纽约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1993年即为88.7%，而上海这一比重到2003年才仅达到51.9%；从产值结构上看（参见图1和图2），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1990～2000年纽约从26%上升为37%，上海从10%增加到21%，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0年批发零售贸易和交通通信公用事业占比两地基本相同；因统计口径的不同，上海没有纽约称之为“服务业”的统计



资料，纽约2000年这一比例为21%，上海这一部分包含在“其他”中，即使全部算做“服务业”，其所占比例也仅有12%。由于该部分多为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可见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层次还很低，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表6　上海与世界城市部分经济指标比较

指　　标	纽　约	伦　敦	东　京	香　港	新加坡	上　海
GDP(亿美元)	1601 (1988)	1900 (1992)	5593 (1990)	1121 (1993)	553 (1993)	598 (2001)
人均GDP(亿美元)	22041 (1988)	27500 (1992)	47177 (1990)	18683 (1993)	19750 (1993)	4515 (2001)
服务业占GDP比重(%)	86.8 (1989)	86.5 (1987)	80.7 (1990)	78.8 (1992)	72.3 (1990)	50.7 (2001)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88.7 (1993)	86.2 (1995)	76.2 (1991)	78.5 (1994)	65.8 (1993)	47.21 (2001)
外汇日交易额(亿美元)	2440 (1994)	4640 (1994)	1610 (1995)	910 (1994)	1050 (1995)	2.46 (1999)
证券年交易额(亿美元)	89452 (1999)	33993 (1999)	16756 (1999)	2300 (1999)	1074 (1999)	3789 (2000)
离岸金融月交易额(亿美元)	4690 (1986)	11569 (1994)	7262 (1994)	7061 (1994)	—	0
外国银行数(家)	374 (1994)	429 (1994)	90 (1993)	303 (1994)	169 (1994)	69 (2000)
500家最大跨国公司总部(家)	38 (1996)	27 (1996)	92 (1996)	—	—	0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000 (1986)	—	—	2716 (1993)	1590 (1993)	1205 (2001)
港口年吞吐量(万标准箱)	213 (1992)	—	335 (1992)	797 (1992)	1590 (1993)	1205 (2001)
空港年人流量(万人次)	7479 (1990)	6423 (1990)	6185 (1990)	1868 (1990)	1440 (1990)	1042 (2001)
政务电子化程度	50% (2000)	40% (2001)到 2004年 实现100%	2003年 3000多 项网上 政府业务	—	130多项 网上 公共服务	10% (估计数)
家庭上网率(%)	70 (2000)	30 (2000)	25 (2000)	—	42 (1999)	19 (2000)

资料来源：周振华、陈向明、黄建富：《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朱庆芳、莫家豪、麦法新：《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http：//news. homeway. com. 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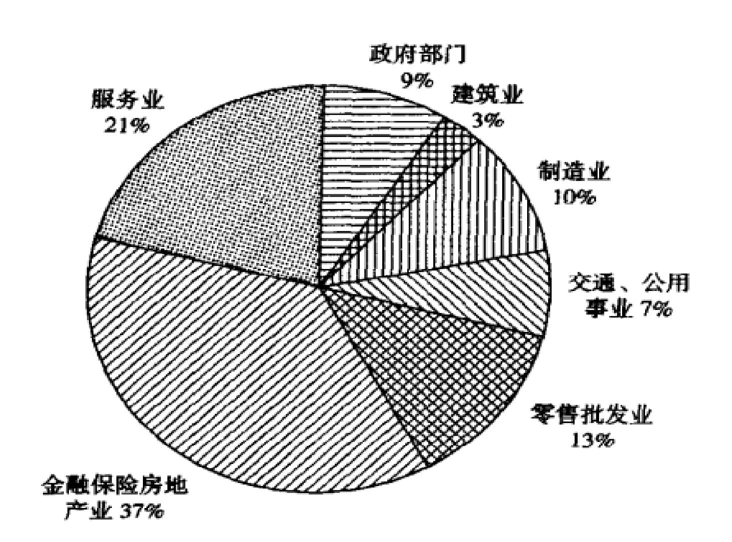


图1　2000年纽约产值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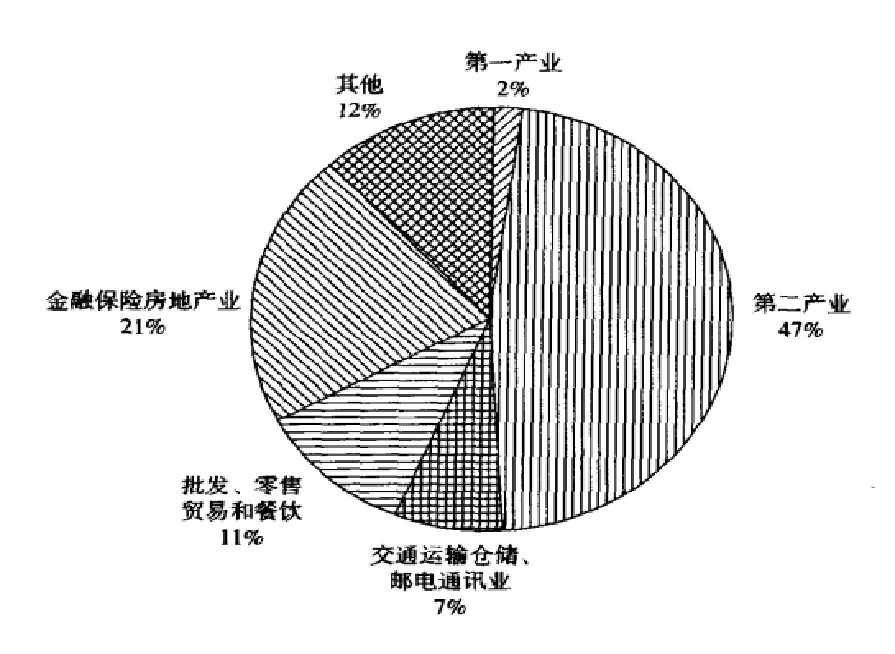


图2　2000年上海产值结构

资料来源：确立“世界城市”目标，开拓“创新城市”路径课题组，《建设世界城市——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下面再将上海服务业的情况与亚洲其他大城市做一比较，可以发现，上海服务业无论在发展阶段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距（见表7）。具体表现为：①产业结构差距，2000年东京服务业占其国民经济的比重为81.7%；2001年香港服务业比重达到86.5%，而早在80年初，香港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服务业比重就已达到 67% 以上，高于 2003 年上海服务业比重 18 个百分点以上；2002 年新加坡服务业比重为 72.5%，高于上海 24.1 个百分点。②总量差距。2000 年东京服务业增加值约为 6200 亿美元，是当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的 22 倍，2002 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约为 1405 亿美元，是当年上海的 4.2 倍，2002 年新加坡服务业增加值约为 631 亿美元，接近上海的 2 倍。

表 7　上海与东京、香港和新加坡三城市服务业比较

		1983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上　海	服务业比重(%)	23.6	50.6	50.7	51
	服务业增加值(亿美元)	179.8	278.6	303	333.2
	人均 GDP(美元)	1514	3725	4520	4914
香　港	服务业比重(%)	67.3	85.7	86.5	87.4
	服务业增加值(亿美元)	175	1350	1349	1405
	人均 GDP(美元)	5120	24782	24211	23797
新加坡	服务业比重(%)	62	71	74.2	72.5
	服务业增加值(亿美元)	107.8	649.6	630.1	630.8
	人均 GDP(美元)	6484	22769	20544	20877
东　京	服务业比重(%)	—	81.7	—	—
	服务业增加值(亿美元)	—	6200	—	—
	人均 GDP(美元)	—	38903	—	—

资料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香港、东京及新加坡政府统计网站（http://www.info.gov.hk，http://www.metro.tokyo.jp，http://www.singstat.gov.sg）。

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看，上海与香港、东京、新加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除了商业、交通邮电业及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之外的其他服务行业的地位上，这些行业主要分布于社会服务、医疗、教育、文化、信息咨询等广泛的领域，以知识型服务、生产型服务为其主要特征。上海这些行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明显低于香港和东京，表现为发展层次偏低、服务空间有限，尤其是体现国际大都市特色的贸易服务、信息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务、设计咨询等服务业比重仍然较低，服务贸易还远未如货物贸易那样成为带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参见表 8）。

表8　上海、香港、东京、新加坡服务业的结构比较

单位：美元，%

地　区		上　海	香　港	东　京	新加坡
年　份		2002	2001	1998	2001
人均GDP		4914	24211	32350	20544
服务业增加值结构	服务业	100.0	100.0	100.0	100.0
	商　业	21.8	30.8	22.2	20.6
	交通邮电	13.9	11.8	12.1	15.9
	金融房地产	34.7	26.1	22.2	18.5
	社会服务及其他服务业	29.6	31.3	43.5	45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51.0	86.5	81.0	70.9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第三产业增长趋缓问题研究，《2003年上海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报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服务业总体而言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尚未进入以知识型、生产型等高级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上海新一轮发展的目标是加快国际性大都市建设，努力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城市。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上海要全面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样离不开大力发展服务业。可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是上海当前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各城市相关年度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第三产业增长趋缓问题研究》，《2003年上海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报告》。

程大中、陈宪：《上海服务业发展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确立‘世界城市’目标，开拓‘创新城市’路径”课题组：《建设世界城市——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周振华、陈向明、黄建富：《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朱庆芳、莫家豪、麦法新：《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京津冀经济圈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 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Blue Book

2004~200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珠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地区环境和生态问题总是与地区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相联系。珠三角地区虽然在地理区划上包括香港和澳门，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基本集中在三角洲的内地地区，内地地区作为更大的区域系统，其生态与环境控制与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本研究的基本着眼点是三角洲的内地地区，主要是城市群。

珠三角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东、北、西三面有山岭包围，南临南海，西江、北江、东江等珠江水系横贯其中，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长盛不衰的自然地理基底，创造了富有岭南特色的生存环境。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得到空前发展。

为了实现珠三角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人口规模及城市群的继续扩大和扩张，加速的工业化进程将给地区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

一　珠三角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点问题

1．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与保护

随着珠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与城镇规模随之膨胀，在土地利用上，非农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协调好两者之间关系，既要保证第二、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建设的需求，又要保证一定规模的农

用地，是珠三角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保障土地资源供给，在土地利用上必须处理好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统筹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要坚持以土地供给引导与制约需求的原则，各项非农建设要高效集约利用土地，城镇建设不应单纯走外延扩大的道路，要充分重视对原有用地的再利用，严把“易地开发补充耕地”的审批关，总结“村镇经济发展用地”政策的得失，集中紧凑发展乡村居民点（村庄），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用地，严格执行各项用地标准。区内各市要坚决按省的统一要求确保一定规模的耕地和农田保护区。

2. 水源地保护与协调

珠三角主要有五大水源保护区：广州市西、北部饮用水源保护区，广州市东部及东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香港、深圳饮用水源保护区，网河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及珠三角外围饮用水源保护区。这些水源保护区范围有的涉及几个市，有的涉及区外地区；一些城市的水源地也不一定在本市行政区内。保水与取水之间，上游与下游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利益关系。要协调好各市及河流上下游的利益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力与义务，共同保护好水源地。

3. 城镇水气污染治理

珠三角城镇虽然污水处理率逐年提高，但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也逐年增加，加之原有污染的叠加效应，水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城镇水污染形势从工业型污染转向生活型污染，由于城镇大都临江临水，城镇内的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导致珠三角面临水质性缺水的威胁。2002年珠三角城市污水处理率为41.69%，广东省城市污水处理率为30.26%，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为39.9%，珠三角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不到2个百分点，这与珠三角发达的经济水平极不相称，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能力迫在眉睫。

同时随着机动化的发展，汽车尾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要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区域内发电厂、水泥厂以及需要烧燃油的工业，是珠三角大气污染的重要源头，要加强控制和监督。

4. 城镇（群）生态绿化隔离带建设

改变当前珠三角城镇（群）蔓延发展局面，是提高珠三角城镇（群）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要采用“集中后的分散”策略，在城镇密集区，城与城、城与镇、镇与镇之间要建立一定宽度的绿化隔离带；重整城镇群空间结构，以保护各个城镇外部的自然生态环境。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区域绿地建设来建立不同类型的生态绿化隔离带。如在有山丘的地区可利用地形通过

绿化造林建立以森林为主导的隔离带，在平原区除林网建设外，可结合农田保护，建立林业与种植业相结合的绿色隔离带；也可结合郊野公园，建立休闲为主的生态绿化隔离带。

5. 珠江口生态环境保护

珠江口海域东起惠东县西至台山市，海岸线长1000多公里。海洋污染物主要源于陆地，由于珠江口沿岸的三角洲地区城镇的持续发展建设，入海排污量与日俱增，珠江口海洋生态环境前景堪忧。而珠江的八大口门有七个在西岸，尤其要重视有相对丰富发展空间的西岸城市群的开发建设对珠江口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珠江口海域生态环境问题应引起重视，有效地控制住污染加剧的苗头，处理好保护海洋环境与利用海洋环境容量进行污染物自然稀释净化的关系，并协调好海陆关系。

6.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规划管理

当前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不容乐观，控制农业源污染与水土流失，加强对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药、化肥、农膜、畜牧业废弃物污染的控制，推进区域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是提高珠三角整体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

珠三角地区村庄规划编制滞后和规划管理力量缺乏，应该探讨适合珠三角农村特点的规划管理模式，并推广优秀的村庄建设范例，全面提高农村环境质量。

二　珠三角地区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行动建议

（一）制度与法规建设

1. 建立以高品质环境为目标的规划体系

（1）完善环境保护和建设综合决策机制。改变各个部门封闭、分隔地分别制订和实施部门政策的做法；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规划、区域开发计划时，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建设要求，将环保规划、生态建设规划与城市规划、国土规划、人口计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有机结合起来，互相衔接、互相补充。

（2）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在开发建设活动中，对生态环境

有较大影响、不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在项目前期工作阶段予以一票否决。

(3)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国土整治与资源开发、流域开发、开发区建设、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等重大决策事项，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4) 建立以3S技术（MIS，GIS，GPS）、环境实时监测和遥感技术为支撑的珠三角数字地理系统，为科学规划、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保障。

(5) 科学制定规划与建设标准。从地区、城镇资源环境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城镇规划建设标准。

2. 完善区域协调机制

珠三角区域以不足0.5%的国土，承载了全国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1%的年产值。大量的污染源集中在这个区域，相互传输，重叠污染，特别是酸雨、臭氧、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与跨境污染关系密切。

目前，珠三角各城市孤立地采取污染治理措施已经不能有效地改善城市和区域环境质量；珠三角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一项跨市县、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须在中央和省政府的支持协调下，建立起区域环境冲突协调机制，协调区域、流域、城际环境保护建设问题和制定有关政策，各城市相互配合共同行动，才能解决珠三角区域环境质量问题。

3. 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

(1) 金融、财政和环保部门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资金投入，健全环境投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投入。

(2) 建立自然资源与环境补偿机制。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对主要自然资源征收资源开发补偿税费，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实行按排污量进行收费，所征收的税费统一作为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3) 建立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运用产业政策引导社会生产力要素流动，鼓励利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的建设项目，改变政策普惠方式，对生态环境有不良影响的项目，要取消优惠政策待遇。

(4) 探索“绿色GDP”等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克服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不能较好反映经济活动对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影响的不足，要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有关统计指标能够充分体现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引导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上来。

4. 完善人居环境建设法规制定

（1）按照中央政府“五统筹”的要求，完善法规制定。针对珠三角实际情况，完善与国家和省相配套的区域环境法规。

（2）加大执法力度。将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落实执法责任制，实行环境稽查制度。

（3）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对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与发展决策，要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5. 推行清洁生产，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1）推进生态环境技术研发，开发适应珠三角特点的环境治理技术和生态建设技术。

（2）合理规划，有序推进环境治理工程和生态建设工程。

（3）引进推广先进适宜技术。通过新技术、新工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与废弃物资源化，实现清洁生产。

（4）各城市要依据自身产业机构特点，探索实施循环经济等新型工业化模式。

（二）行动领域

1. 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珠三角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少，在城乡建设中必须加强区域自然资源开发建设的管理力度，合理高效利用资源。

（1）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①根据土地的生态适宜性合理利用土地、发展生产力。要严格控制珠三角地区土地利用，按土地内在的适宜方向进行开发，实施土地用途管制，避免因不恰当地利用土地，而对某种土地用途产生不利影响。②以土地供给引导与制约需求，严格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区，确保地区的耕地保有量，控制城镇建设规模，严格审批易地开发，补充耕地指标。③实行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城镇要集约、紧凑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土地供应做到有计划，相对集中地开发使用土地，开发一片、建设一片、配套一片。④农村居民点要逐步进行迁村并点，积极推进农民公寓建设，并向城镇集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制定合理的农村居民点建设标准。同时农业要走现代化、集约化、机

械化的道路，改变分散的生产模式，提高土地生产力，促进农村合理而高效的利用土地。⑤加强闲置废弃地的生态恢复、未开发利用土地的整理复垦，开发后备土地资源。通过生态恢复盘活珠三角地区这些闲置废弃土地。把它们转变为积极的空间，尽量少辟新地，以节约土地资源。如采石场，通过重新修整、复垦等手段，种植绿化或雕饰被破坏的山体、将挖掘的石坑改变为水面，可创造山、湖、岛构成的新景观。

（2）水资源可持续利用。①加强区域、城镇和跨地区、城镇间的水资源管理与协调。从珠三角全局整体和长远发展考虑水资源的调配、利用与保护，加强东江、北江、西江流域跨地区、城镇间上下游水源保护与协调，对珠三角地区水资源实行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实现区域防洪、排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和水土资源保护的协调与统一。②全面划定水源保护区和主要河段饮用水源保护区，这是保障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不受污染的关键，保证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达到国家地面水环境Ⅱ类水质标准，二级保护区达到Ⅲ类，流经城市河段达到Ⅲ—Ⅳ类水质标准。③各市要优先保护饮用水源，在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安排有污染的工业和集约型畜、禽等养殖项目，凡是污染水源的项目一定要清理，凡是把有毒有害物质向饮用水源排放的企业一律要关闭，对威胁饮用水源的重点污染源要坚持进行整治、搬迁或关闭，加强水源地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避免出现水质性缺水。④加强用水管理，制定合理的水价政策，通过经济杠杆，减少用水量，提高节水意识。⑤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节流优先的原则，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建设节水型城镇，大力实行节约用水，加强水的循环利用，如将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即“中水”作为低质水再利用，用于农业、城市绿化灌溉用水及城市景观用水等。⑥加强蓄水工程、跨流域（行政区）调水工程建设，提高供水能力。截留过境客水、雨水，是调蓄和提高供水能力的重要措施，在新建、扩建和除险、加固建设好现有大、中、小型水库的基础上，结合江河防洪建设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跨流域（行政区）的调水工程，除搞好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澳门供水工程、深圳东部供水工程、大亚湾调水等工程建设的基础上，新建广州南部调水工程（顺德水道黄涌取水）、西部调水工程（北江三水河口镇上游取水）、惠东稔平半岛调水工程（西枝江取水）等水资源调配工程。⑦实施水资源利用设施新建、改建工程。完善城镇供水设施，改造老化供水管网，随城镇发展要适时新建、扩建水厂，扩大供水能力，消除工程性缺水。⑧统筹规划，按区域

水资源特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应把保护水环境的要求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逐步形成以水环境容量和水资源总量确定经济结构和发展规模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压缩耗水量大、用水效率低、水污染严重的产业，严格限制高耗水型工业项目的发展，发展节水型产业，积极推广节水技术，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对于电力、造纸等用水大户，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经济措施，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使用率。

2. 区域自然生态建设

（1）自然（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①对城乡特殊的自然景观生态区域或人工建立的模拟自然景观生态区域进行有意识地保留和建设，形成城乡景观中特有的生态功能区。②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最终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目的，从抢救保护角度出发，对各种典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植被集中分布的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加强就地保护体系建设。③建成类型齐全、分布合理、建设和管理科学、效益良好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目标为形成一个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以省级自然保护区为网络，以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为通道的保护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明显的自然保护区体系。

（2）森林建设。①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生态公益林体系，加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和扩大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范围。加强山区森林覆盖率，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东、北、西外围山体，实施封山育林工程，对优良阔叶树林进行全封，对一般阔叶树林实行轮封或半封，对生态功能等级低的实行套种补种优良阔叶树、营造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和防护林，以保护、恢复和发展森林植被的方式，顺应森林演替规律，提高森林质量，充分发挥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效能，增强森林植被的蓄水保立功能，降低流入珠江的泥沙量，减少各类型水库的泥水淤积，提高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建成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同时加强东江、北江、西江“三江”流域生态公益林建设，将珠三角地区建设成一个多林种、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多效益、森林生态功能较为完善的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为核心，以沿江、沿海防护林带及公路、铁路、农田、水库等防护林为主体的生态公益林体系。②实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农田林网化工程和城市林业建设工程，珠三角地区是沿海防护林、农田林网、城市生态风景林建设的重点地区。因地制宜，在丘陵和山地，建设以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为主的防护林；在平原、沿海，建设

以防风和护田护堤为主的堤岸防风林、农田防护林、沿海防护林以及沿海滩涂红树林体系；在城乡居民区，建设具有防护、游效、观赏功能的自然保护区；把适宜绿化的公路、铁路、江河三类"通道"两侧全面绿化，保护路基和堤面，形成绿色通道；在地带性森林植被保存较好、有代表性的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使之成为物种保护和科普教育的基地，有条件的可建成旅游、观光、度假胜地。旅游开发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定生态保护规划，解决好旅游开发项目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关系，提出切实可行的旅游活动中污染物排放与治理措施。③在城市上风向一定区域范围内，加强林地建设，提高绿化覆盖率，从区域氧平衡角度作为城市（群）主要氧气库来维护，保证新鲜洁净的空气能输送到各城市，促进城市良性的气流循环，控制空气污染。④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加强水土流失治理，治理自然侵蚀，对未治理地区进行分期分批治理，使其提高防御标准。

（3）水系整治与建设。①加强珠江水系的保护与疏导，提高行洪、航运能力，保持岭南水乡特色。由于珠江干支流河道淤积日趋严重，河道及出海口门泄洪不畅，使三角洲局部地区洪水位壅高，加大了珠三角和西、北江沿岸地区的防洪压力。为提高珠江主要行洪河道及口门的泄洪、纳潮能力，加强对以珠江八大出海口门（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及其河道和澳门附近水域河道进行综合整治。②湖泊、水库既有蓄水、滞洪、灌溉的作用，又是区域的后备水源，还有较好的景观美学价值。珠三角多暴雨，洪涝威胁大，湖泊、水库可以滞蓄一部分洪水，起到分洪的作用。防洪和供水的骨干大、中型水库、湖泊（如三水云东悔即大朗窝和四会大旺草塘）及周围的水源林关系到地区的洪涝安全和供水水质，必须进行保护。同时控制和改善肇庆星湖、惠州西湖等。

（4）海洋生态建设。珠三角南临大海，海滨、海湾、湿地和岛屿是珠三角的门户，为海陆生态系统的过渡带，是维护海陆生态平衡的关键。同时，滨海地区还具有丰富的生物、港口和旅游资源。加强海洋资源保护与管理，防止海洋资源进一步衰退，促进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①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抢救一批珍稀物种和珍贵的渔业资源，加强现有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管理工作。控制乱围垦、乱填海、破坏浅海滩涂自然湿地，控制掠夺性捕捞，为使海洋渔业资源免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破坏，划定禁渔区和增殖区，以保护海洋水产资源的生态平衡。另外，海防林、生态脆弱带和特种动、植物资源分布区应加强保护与建设。②合理开发海岛。海岛建设包括海岛渔业建

设、运输、港口、旅游等。同时，要加强海岛生态环境保护，使海岛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③加大区域内湿地、河口滩涂保护区的建设力度。对于珠江口滩涂湿地的围垦，从水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考虑是非常不利的，而且还阻滞洪水宣泄和潮流上溯，导致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为此要严格控制珠江口的围垦，保留珠江口广阔的水面与滩涂面积。④沿海防护林带建设。在各个市、县沿海地区建立人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多林种、多树种、多功能、多效益的防护林体系，做到合理布局，林种和树种结构配置合理，森林资源稳步增长，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⑤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沿海各个市加强恢复和重建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在全区适生地区逐步建成分布均匀、结构合理、生态功能稳定的红树林体系。

（5）农田与果木保护区建设。根据珠三角山区、丘陵区、平原区和城市郊区四大类型区域的生态特点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向，分别建立适于各个类型区域的生态农业优化模式示范工程（包括无公害农产晶和绿色食品生产示范工程）。目标是使各种优化模式的生态农业镇、村（场）达到国家农业部颁布的生态农业建设标准，以带动全区生态农业的建设。①全区九城市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分布于广州、佛山、江门、惠州和肇庆，这是区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桑基鱼塘是岭南水乡的一种特色景观，且已成为世界范围低洼地利用和推广模式，具有较大的景观、生产和科学意义。目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较大片、较集中的仅剩珠三角的顺德与中山交界处一处，应予以保护。②在现有农田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对尚未达到标准化的基本农田进行方格化、田园化、灌渠硬底化、机耕路规格化等标准化建设，使全区基本农田全部达到标准化。通过整治、清除污染，土壤环境恢复达到农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低产田通过稻秸回田、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改良土壤。

3. 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珠三角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重点是水环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固体废物处理、工业污染防治等。

（1）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法规，贯彻落实《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广东省碧水工程计划》、《广东省蓝天工程计划》，巩固和发展“一控双达标”成果，确保“三同时”和国家下达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完成。

（2）开展重点流域的综合整治。在《广东省碧水工程计划》的基础上，

实施以流域为单位的水质保护规划办制定的《广东省西江流域水质保护规划》、《广东省北江流域水质保护规划》，制定《广东省主要跨市河流边界水质达标管理条例》，从全局和整体考虑水质的保护，逐步改善和提高水污染突出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既定目标：适当增设必要的“市际断面”，将国控、省控和市际断面水质纳入到城市考核和环保目标责任制中考核。

（3）完善水环境功能区划。各城市要根据《广东省珠三角水质保护条例》和《广东省地表水功能区划（试行方案）》，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依法划定合理、科学的水环境功能区，制定改善水质的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4）治理污染严重的江河、湖泊、水库的水环境。搞好城市河湖水系的综合整治，改善地表水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既定功能区要求。重点加强流经城市河段水环境的综合整治，主要包括珠江广州河段、佛山水道（济江河）、深圳河、龙岗河、坪山河、观澜河、石马河、东莞运河、歧江河、江门河等。

（5）海洋水环境整治。结合国家碧海行动计划的实施，以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容量为基础，实行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重点要做好珠江口和大亚湾近岸海域水质保护。沿海近岸污染源主要来自海洋船舶及港口排污、城镇生活污水排放、沿岸工厂排污、水产养殖废水排放以及农田施用的农药等，在实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和工业污染源治理工程的基础上，要对面源污染实施控制，使沿海农业、水产养殖业引起的面源污染有显著的减少，同时禁止垃圾倾倒海洋，保护海岸带和近海的生态环境。沿海城市要在《海洋功能区划》、《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所辖海域的功能区划，制定保护和改善海域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珠江口的环境状况。主要商用港口和一、二级渔港要建立含油废水处理设施，船舶含油污水要集中处理，大亚湾还要重点结合南海石化项目的建设做好环境监控。

（6）优化能源结构。大气污染防治要与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相结合。优先发展水力、风力、太阳能、天然气、生物能等能源，大力发展天然气电厂、核电和水电等清洁能源技术；积极组织开发利用天然气、城市管道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实施“油改气”改造。在区内不再规划、建设新的燃煤、燃油电厂，现有燃煤、燃油电厂，要限期配套脱硫设施。

(7) 加强生活、工业垃圾等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加强对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再利用、处理直至最终处置进行全过程管理控制，促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从区域角度进行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厂等设施的规划布局，同时要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8) 加大力度控制和防治工业企业污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改、扩建和技改项目技术起点要高，要采用能耗物耗低、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严禁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设备和工艺，加强对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重点抓好电力、建材、化工、造纸、冶炼、制糖、食品发酵、电镀、纺织印染、制革等污染严重行业的治理；对工业企业的污染物从产生到排放进行全方位管理，逐步由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向全部污染物排放达标迈进；优化产业布局，规范工业区建设，促进“企业进园、进区”的格局形成，防治工业污染企业的无序扩散，逐步改善“遍地开花”的现象。对老工业区的改造、布局和新工业区的建设提出明确的要求，促进污染性质相近的工业企业在空间上逐渐聚集，逐步利用集小单元控制管理代替目前的分散点源管理，为企业污染的集中治理和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9) 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探索循环经济模式。推广高效、低耗、无废、少废的清洁生产工艺，争取用高新技术改造电力、建材、冶金、化工和石化等污染重的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效利用能源、资源，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水平。

(10) 加强污染物总量控制。各市要加大对污染源的监管力度，限期削减污染物，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分解到各市的总量控制指标。新建项目和技改项目的污染物排放量除了要达到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外，所增加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得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已超过的地区，必须在本企业和本地区内削减，实行“以新带老”，做到“增产不增污”，甚至“增产减污”。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达标的城市，要争取污染物排放的全面达标，一是达标单位扩大到所有排污企业事业单位，二是要求所有污染物（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中列出的污染物）排放都要达标。

4. 城镇环境整治与改善

(1) 加强城市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03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根据该法，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纳入到城市规划工作中去。

（2）城镇经济发展要充分考虑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按环境容量和环境功能，合理布局各功能区（尤其是工业区），并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相应的管理措施。要根据水和空气环境容量、区域功能和环境质量，来确定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规模、方式，合理规划城市规模、功能和布局，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功能布局和产业结构，要重点保护好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地、居住区、文教区、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区的环境质量。

（3）加强城镇间、城镇内部组团隔离带建设，使城市形态与自然协调，防止城镇摊大饼式蔓延发展，实现城镇（群）空间结构的山水化与田园化。

（4）完善城镇园林绿地系统，实现城镇园林化。园林绿地集中与分散发展相结合，绿化体现在市域、城市组团、街区、建筑等不同空间层次上，绿地数量、空间分布也应满足要求，各类公园、游园、袖珍公园布局合理、分布均匀，设施齐全。提高绿化覆盖率（>40%），增加绿色空间，减少灰色空间，用“绿化”制约“水泥化”是城市园林化建设的重要措施。城市绿化要注重对原生性植物群落和乡土性植物的保护。适当引进外来树种，以保持本土植物发展的延续和物种的多样性，并为动物提供生存环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绿化尽可能向城市森林（乔木）方向发展，反对过分追求美观而忽视其生态效应的绿化（如观赏草坪）。

绿地建设还应注重和鼓励生态经济林的种植，提高绿地生产力，使之成为生产性景观。公园绿化、居住区绿化、行道树等适当引入经济树种，增加景观生产力，可实现一定数量的水果自给。当然，这里增强景观生产性并非为了建立一个赢利的生产体系，而是为可能的生态过程创造一些机会。

（5）加强城镇内河段综合整治。把城镇内河段综合整治与城市防洪治涝、水体的保护与治理、污水的处理、交通组织及旧城改造与开发结合起来。合理的水岸开发方式能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增加岸边植物多样性，并且为居民提供美丽的休闲、娱乐环境。充分发挥河滨的潜力和特色，促进水岸的合理开发，分段形成不同特色的功能区，建设向居民开放的广场、草坪、林地、游园、公园，将城市景观、旅游、防洪、交通等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多样化的居民活动，如购物消费、娱乐、餐饮、工作、居住、游憩等，并结合自然环境，建立滨河绿化带，建立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及生态保护教育场所等城市开敞空间。

（6）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城镇环境洁净化。各市要加快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步伐，尤其是东莞和广州两市，更要结合巩固

“一控双达标”成果，加强对工业污染源和规模化禽畜养殖业污染的防治；控制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制定严格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积极推广使用先进的清洁能源汽车；进一步开展“噪声达标区”的建设，严格按照城市功能区划的要求布设有噪声污染的企业，在住宅区内不准开设工厂，住宅区内配套的娱乐场所和食肆项目应严格环境管理，在噪声污染严重的地方设置绿色声屏和隔音装置；实现城镇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与光环境水平达到优质标准，交通井然有序，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率和回收率高，城市物质生活空间整洁、卫生、宁静、安全。

（7）继续深化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彻底整治城镇脏、乱、差现象。优化、美化城镇环境，提高城镇环境的文化品味。城镇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人文景观各要素间要协调，街区、建筑布局与修建要符合审美要求，注意对地方建筑风貌特色的发掘与保护，使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利用与外境诠设结合在起。积极推进生态型小区、生态型城镇建设。总结、推广已有国家级、省级生态示范区的经验，广泛开展创建生态示范村、镇、市（区）以及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工作，进一步推进生态型小区、生态型城镇建设。

5. *乡村环境整治与改善措施*

（1）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农业用地的基础上，在保持农业用地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农、林、牧、渔各业用地结构、布局，要利用环境容量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建立良好的土地组织条件，同时通过农业生态工程和技术，改善土地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提高农业系统各项生态效率，促进农林牧副渔各业之间以及各业内部组成成分之间相互协调、全面发展，建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稳定和持续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

（2）农业生产区建设要做到保护与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开展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统一整治土地，营造高标准农田林网，兴修水利，建立完善的农田排灌系统，在此基础上，营造田间、沟渠绿化，保护耕地，抵御自然灾害，提高粮食产量。形成多树种、多层次的立体生态结构，实现全区平原耕地农田林网化和水利化，进而实现大地园林化。

（3）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积极推进农业生态示范区建设。通过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工程、旱作农业示范工程、沃土工程、农田蓄水排灌设施工程。太

阳能利用、秸秆气化、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沼气环保能源工程、庭院生态工程及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使生态农业在全区大部分地区得到普及，如在种植业中，模拟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中乔木、灌水、草本等多种植物的共生共存，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光能及其他生态因素多层次利用的特点，将具有不同生态习性、不同植株形态的农业植物有目的地结合在一起，实行多样化、立体化种植，以充实和拓展农田生态位，提高对光温水土的综合利用效率，以实现农业的高产、低耗、高效和优质。

（4）加强对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农药、化肥、农膜、集约化畜牧业废弃物污染的控制，控制水土流失与农业面源污染，推进全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控制。以东莞－深圳供水工程流域为先行点，逐步限制本区域内的规模化禽畜养殖业发展，到2005年要全部转至区外，减少面源污染；提倡绿色产品及健康养殖，为国民提供无公害食品。

（5）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加强村镇规划管理工作。村庄规划发挥村镇自然环境优势，营造良好的都市外部环境。制订和修编村庄规划要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对防治污染和绿化美化、生态保护要有明确的要求。集中紧凑发展乡村居民点（村庄），同时尽可能就近向城、镇集聚，改变乡村零乱、分散的状态，提高土地利用率。村庄建设要注重公用设施配套建设，合理安排教育、卫生和文化娱乐设施，形成宜人的农村社区环境。

（6）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城镇和村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开发用地要纳入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规划。坚持统一规划，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的原则。鼓励小城镇通过旧村改造，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解决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园林绿化等建设用地问题。

（执笔：宏观经济研究所　刘品安）

参考文献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城市化“十五”计划》。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环境保护“十五”计划》。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从战略构想到战略实施

——兼论区域合作中的政府作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一　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政府行为解释

一般区域经济发展大致上有均衡和非均衡两类理论。非均衡发展以自由主义新古典理论为核心，其基本假设是市场通过自由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发展会自动选择发展区域，不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常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西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认识和利用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作为国家或地区的主要稀缺资源，如果要实现各区域及全行业的经济增长，则无法突破资本约束。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在其初始空间进行，增长极的出现必然因外部效应等因素而使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出现不平衡，所以经济发展只能以一种不平衡达到新的不平衡的方式进行。同时他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超过扩散效应，致使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但随着极化效应的减弱，扩散效应逐步显现，区域差距有可能会逐步缩小。

均衡发展理论以前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为代表。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生产力的均衡分布，均衡发展的目的是为了缩小区域间的差别，其主要指导原则是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生产力，尽可能均匀地利用和配置全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各地区的生产相对集中。这一理论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为止，我国中西部

地区的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理论实践的结果。

20世纪50~70年代，随着很多国家区域经济问题的不断出现，区域经济理论开始重视区域均衡增长，广泛研究政府干预和区域政策的问题。如纳克斯认为，要突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恶性循环”，就需要有一个“强政府”，对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比例、创造投资环境及气氛、消除制度性障碍等方面做出有力的选择。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针对日趋严重的区域经济问题，如英国的“萧条工业区”、美国的“大都市病”等，由政府提出区域政策来加以调整。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此书提出著名的中心-外围模式）中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政府为消除因经济增长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区域差异，必然采取一定的区域政策来促进外围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使中心-外围模式逐步消失，以实现全空间内的经济一体化，各区域经济获得均衡发展，区域差距逐步消除。

应该看到，无论是均衡还是非均衡发展理论，都对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引进，引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争论，即中国区域发展梯度与反梯度发展的争论，这涉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最终非均衡发展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新思路，那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更加坚定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此时，中央政府又进一步开放了天津、上海等沿海14个城市。

1988年9月，邓小平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思想，第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第二个大局是指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个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992年春，邓小平在广东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科学地将我国区

域经济梯度发展思想上升到战略和理论的高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鼓励‘吃大锅饭’”。他提出来的具体阶段和办法是：“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缴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经过20多年以沿海地区为主带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规模，人均GDP从200多美元达到1000美元，社会发展水平也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但同时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明显拉大，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胡鞍钢等人经测算后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时期，他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性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十二大关系”，提出了“坚持地区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方针；1999年6月中央提出并于2001年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突出了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十六届三中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核心在于强调经济的均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求政府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全面部署和兼顾东中西各大区域的发展。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新一轮的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主要内容。

二　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不均衡发展，再到均

衡发展的三个阶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区域被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区划，采用均衡发展战略进行大规模的内地建设和布局。20世纪60年代在合并七大“经济协作区”基础上形成六大经济区，即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华东经济区、中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七五”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带：即东部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三大经济地带根据“梯度推移理论”对生产力进行布局，其中心思想是：经济建设的顺序应该是先东部，再中部，再西部，实行梯度开发。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在全国建立七个跨省市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地区和西北地区，要求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域界线，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来发展经济。

总的看来，我国目前对经济区域的划分还比较粗略，经济区域概念有待明确，经济地带和行政区划界线不清，区域发展政策有待完善，特别是依然囿于东、中、西的概念尚未突破。从实践上看，我国发展比较成熟经济区域还只有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这两大经区都位于沿海地区，发达地区怎样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东、中、西部如何协调、联动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2004年9月，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委、省政府率先提出泛珠江三角洲（简称泛珠三角或泛珠）区域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全省地厅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班开班典礼讲话上，明确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协作”的概念。他指出，广东要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

同年11月，广东为率先落实科学发展观，正式提出建设泛珠三角洲经济区战略构想。所谓泛珠三角洲经济区，包括珠江流域及周边的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海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自治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经济区域，简称“9+2”。张德江将其简化为“两广两南加闽赣，香港澳门云贵川”，并再次阐述了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区域的意义。他说，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区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同

时，要共同推动9省区与港澳特区的合作，建立“9+2”协作机制，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区。

2004年2月，广东省两会召开，在黄华华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明确列入新一年政府工作重点。这预示着“泛珠三角”经济区已经由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向战略决策转变。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并且受到珠江流域、周边省份和港澳特区的积极响应。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省、自治区纷纷提出全面融入“珠三角”的发展新谋略。之后，以广东省政府牵头、各省配合的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战略进程推进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

不到一年时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在2004年6～7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首届“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先后举行。特别是经贸合作洽谈会，有国家有关部门领导、“9+2”的领导和工商企业界以及有关人士15000人参加，4天的签约项目共847个，总金额达到2926亿元。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具备了区域合作机制中的所有要素，如合作宗旨、合作原则、合作领域，以及每年举行一次的内地省长、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及日常工作机构和部门衔接落实制度等，还形成了合作与发展框架协议、论坛和经贸洽谈会三大交流与合作平台：框架协议在总的区域合作框架内将区域内政府部门和民间的各种合作意向、协议包罗其中；合作与发展论坛除每年一次最高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外，还有市长、社科机构、媒体等次一层的各种论坛汇集；而经贸合作洽谈会则主要是企业间的项目合作和商务交流，这三大平台的构建，使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基础，一个巨大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正在建设和发展之中。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它表现为：

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区域合作的范围和内容上有重大突破。从区域合作的范围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区域合作机制，9省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泛珠三角在中国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从区域

合作的内容看，目前国内既有的区域合作模式，成熟的不多。长三角经济区的“15＋1”，同属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有“富人俱乐部”之嫌。而中西部的区域合作机制，如中南经济协作区、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等，成立时间虽然比较长，但取得的成效并不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同时涵盖了东、中、西三大不同发展地区，特别是将中国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港澳人均收入已列发达国家水平，而贵州人均GDP全国排最末位）整合为一个经济区域，以区域协调发展来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一大新的突破。

其次，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将大珠三角的腹地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区。泛珠三角的概念是从珠三角、大珠三角而来，既反映区域整合的范围不断扩大，又体现区域合作的内容不断变化。大珠三角是目前全球经济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区域，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目前以落实内地与港澳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为动力，在共同推介“大珠三角”、加快产业分工与提升、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事项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大珠三角”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迫切需要将发展的腹地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在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龙头带动下，用10年左右时间，形成一个以外向型为主的大型经济体系，成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发展极之一。

第三，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新一届政府重大发展战略之一。中国在加入WTO后，亟须建立自己综合的、多层次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体系。首先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2010年又将与东盟10国共建自由贸易区，一个包括双边、区域、多边三个层面并重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战略轮廓便显现出来了。泛珠三角中的广西和云南是中国连接东盟各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等国的东南亚和南亚的陆路通道，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连接东盟和印巴两大市场的重要区域。在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泛珠三角经济的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泛珠三角经济区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在与东盟的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个拥有17亿人口，近2万亿美元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超大型经济区将会出现，这将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因此，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全局中，泛珠三角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家发改委官员（新闻发言人兼副秘书长曹玉书）已表示，中央有意将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列入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这意味着“泛珠合作”将提升至国家战略的级别和层面。

三 困难与挑战：区域合作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强力推动下，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开局良好，进展顺利。但是，未来区域合作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困难与挑战将伴随整个发展的进程。

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可能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主要有：政府行为的协调与选择；统一市场建设及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制定；区域合作法制的基础和投入机制的建立等。

首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明确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但是，泛珠三角“9+2”各地方和特区政府，再加上中央政府，合作与发展涉及两种制度和两级多个政府，政府行为的协调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当前的“一国两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和财税体制下，各级政府是代表了地方的利益主体，因此，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是政府行为协调的主要内容。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希望本地区利益最大化，如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相互竞争，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政府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从国内一些区域发展的实践看，政府行为的协调工作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可能分散化、碎片化。

此外，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核心和龙头的作用，大珠三角无疑是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龙头，但核心和龙头地区的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广东省政府领导表示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广东“不当头”，有学者认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无核心”。一个缺乏领导力的区域合作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区域合作需要有统一市场的建设及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长三角经济区不同，泛珠三角中的各个地区发展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水平高低不一，既有经济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港澳和珠三角地区，也有处于初期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比较封闭的西南地区，统一市场的建设相当困难。一些地区商业惯例、法制精神的缺失，人治人为在经济生活中的

普遍表现，使得发达地区的经商、投资理念和方式往往在这些地区无法实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封闭，一旦对外开放，相当多的产业将受到冲击，因此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统一市场需要有统一的区域战略与政策来协调，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困难，区域整合需要的时间和过程也会很长。

再有，区域合作的成效取决于法制基础和投入机制的建立。从国际上区域合作的成功经验来看，合作的法制基础和投入机制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英、美、日等国在对一些问题区域的发展干预中，除政策、规划外，法制建设先行，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将区域发展纳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如英国对老工业区的开发、美国对西部的开发以及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等，都是在法制的框架下去实施的。同时，区域合作需要有投入机制的保障，资金是区域协调发展重要的手段。如在欧盟的发展中，结构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主要解决欧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结构基金向一些落后地区、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欧盟平均水平75%的“一类目标地区”提供财政援助，经过一段时间资金支持，受到结构基金扶持的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普遍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来看，类似的机制并不存在，因此，法制基础和投入机制的建立也是泛珠三角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之一。

四 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广东省政府的作用

为了使泛珠三角经济区更好地协调发展，政府的作用是重要的，特别在区域合作的初期，政府的作用更是关键性的。而广东省的政府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作用是中央政府和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无法替代的。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广东省政府担当和发挥了倡导者、发起者和总协调的作用，在今后的区域合作中，广东省政府还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除了政府关系（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的总协调外，至少还需要担当起两个重要角色，一是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二是区域合作制度的创新者和推动者。

政府关系的总协调。区域合作与发展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预计中央政府在区域合作发展方面会有进一步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安排。

作为区域合作机制，泛珠三角也应有相应的协调机构来对应中央政府的安排，而这一协调机构由广东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来承担是比较合适的。广东省政府与港澳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上具有多年的经验，协调能力强，这次提出和推动珠三角区域合作，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以及相关省区的支持和配合，作为区域发展、政府关系的总协调，应当之无愧、当仁不让。

（一）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倡导者和制定者

区域合作与发展需要有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来指导和规范，从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来看，一般都是地方推行和实践后，由中央政府来总结和完善。广东省政府应在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的提出、制定和实施上有所作为。目前需要研究、制定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整体战略规划和统一的区域政策，以此指导、规范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让有关各方了解其战略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有助于社会形成共识，有利于区域政策的推行。战略规划包括区域合作与发展理念、战略和目标、区域政府和企业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区域产业分工与整合、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等。区域政策主要是协调地区利益，消除区域间利益矛盾，避免区域内各利益主体的过度竞争、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使各方的合作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得以顺利进行。区域政策要重视区域差异和区域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以此推动区域合作的健康、协调发展。

（二）区域合作制度的创新者和推动者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体制优势，广东省政府应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制度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建设统一、高效、有序、规范的区域大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和行业壁垒，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区域合作制度创新方面，怎样与法制化相结合是一个新的课题。只有以法制化为基础的制度创新才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影响力和生命力。广东可以与国家立法、司法机构合作开展区域发展的立法工作，推动诸如区域经济合作法、公平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建立。日本在 1962 年制定的《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就是由地方政府提出的，在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后，

由地方政府领导的“新产业城市建设协议会”来制定规划并实施的。有学者还提出国家高等法院要建立区域和地方巡回法院，解决区域发展中的有关法律诉讼问题。总之，广东可以在制度创新、法制创新方面先行一步。

泛珠三角可以在资金合作方面大胆尝试。如建立共同发展基金，合作各方按生产总值一定比例交纳，还可吸纳一定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金。资金用于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主办论坛和经贸洽谈会等重大活动的资助；区域性公共项目的补贴、区域发展的专项研究、区域共同品牌的建立、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等，资金手段的运用将使区域得到更加平衡和协调地发展。

五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政府的“有为”与“无为”

以广东为出海口的南中国地区，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和GDP总量。该区域如果确实能够实现“4区域协调”，从而形成一种更有效率的分工、合作和交换网络，显然能增进这一广大地区人民的福祉。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区域协调”限于行政层面，以政府主导来对区域合作的事项进行过于具体的安排，本身就有可能妨碍区域合作、交换和分工网络的形成。当我们讨论到“9+2”区域合作模式的时候，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提出了应遵循自愿参与、市场主导、优势互补、开放合作、互利多赢等五大原则。

（一）政府不唱主角但要提供好服务

毋庸置疑，目前国内的经济区域分割状况比较严重。在很多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以省甚至以县为单位分布，形成低效率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格局。过去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尽管年年强调全国一盘棋，然而，悖谬的是，恰恰是在计划经济下面，形成了严重的区域经济分割。可能正是各区域高筑壁垒，才不得不反复强调全国一盘棋，并将其上升为一项政治原则。其中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中央政府不可能拥有管理经济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而，必然将管理权力下放，国有资源的日常管理由地方政府承担，经济活动必然按照行政区域展开，分工合作体系也必然在省、县的范围内进行安排。

目前，计划体制尽管已经不复存在，市场分割局面虽然有所减弱，但经

济活动依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以行政区域的边界为范围展开。

相反，市场从一诞生起，就是一种可扩展的秩序。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至于区域间的交换合作，更是小菜一碟。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就已经生动地描绘了战国时代跨诸侯国的商业繁荣局面。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市场内在地具有冲破区域分割、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企业家会本能地在更大范围内搜寻最佳的资源组合方式。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一种原材料或者某类劳动力，究竟是来自广东本省，还是来自邻省湖南或偏远的贵州山区，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只要有利于其实现利润即可。组合何处的何种资源最有效率，不需要旁人来告诉企业家，出于利润动机，他们会自觉地发现相关的机会和知识。

因此，解决区域分割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允许市场、允许企业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作用，从而打破区域分割的格局。市场分割的程度与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是与市场的自由度成反比的。

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就是提供公共服务，承担单个企业根据市场原则无法或不愿意提供的服务。正所谓政府不唱主角，但要提供好服务。

国际区域经济组织无不利用市场、法律、社会契约等手段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调节和约束，欧盟还形成了统一货币欧元。而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为企业间的投资合作牵线搭桥，更重要的是为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合作进行总体规划和统筹协调。如统一布局和建设跨区大型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协调规划产业发展，加强区域资源整合力度和协同发展能力，避免行政分割、低层次竞争、重复建设、产业趋同、资源浪费等种种弊端。

目前泛珠三角经济区内部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如港珠澳大桥、铁路公路交通网协同建设等。

（二）创造制度环境实现四大自由流动

具体而言，推动区域合作，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广泛地退出，把经济活动的主导权交给企业家。企业家自然会出于自己的利润考虑，超越地方边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组合各种资源。诚如众多官员和专家所说的，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其主角是市场，更准确地说，是企业，是时刻寻找利润机会的企业家。正是他们的活动，编织出一个纵横交错的分

工、合作与交换网络。政府的作用，则是创造合适的制度框架，让企业家更自由地寻找自己觉得最为必需、也最为合适的资源。

与此同时，各省区政府应当努力地拆除过去树立在省区际的樊篱，打破地区保护和地区分割，从而创造一种制度环境，减少企业跨省区从事经济活动的障碍，降低企业跨省区运营的成本。

省区际的区域合作属于一种初级水平上的统一市场，而不管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统一市场的基本目标都是确保人员、物品、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省区际的区域合作自然也应以这四大自由流动作为最终目标，只有实现了这些目标之后，才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而在这些方面，政府确实可以大有作为，以人员自由流动为例，只要进入欧盟境内，即使你是中国人，也不需要任何证件就可自由流动。然而，一位贵州的农民到深圳打工，却需要办理、出示好几种证件。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在国内无法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物品的自由流动也受到重重限制。另外，根据国家和各省市区政府的管制措施，大量行业的企业跨省市区设立营业机构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在这一方面，泛珠三角合作参与各方也意识到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在构筑“9＋2”区域经济体系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首先在建构道路运输一体化市场体系方面发力。2003年年底，泛珠三角的9省区以及重庆已经同意取消省市区际客运班车对等对开的经营原则，取消省市区际旅游包车的区域限制和景区限制等。

为了实现四大自由流动，各省政府可能需要大规模地清理其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各省区政府当以清理这些法规的“有为”，达到不妨碍四大自由流动的“无为”，从而实现“民自正”的目标：即让各种市场要素以更低成本参与跨省区的分工、合作及交换网络。

（三）通过司法途径打破区域分割

要打破区域分割，光靠行政部门的自我约束可能是不够的。依靠政府之间的商谈，确实可以清除部分区域壁垒，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可能都会有一些核心利益，这些利益政府是很难轻易让步的，比如，人员流动的壁垒是否可以彻底打破，就令人怀疑。

目前大多数市场分割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法规和政策来保护本地人员、企业，限制外地的人员、物品和服务流入，也限制本

地的资本流出。要打破区域壁垒，需要某种办法，有效地突破地方法规的限制。

在这方面，应当重视司法机构在维持统一市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推进欧盟统一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是一股重要力量，尽管它的作用被外界普遍地低估了。

因此，在推动“9+2”区域合作模式的时候，司法途径可能是清除各地政府及其立法机构所构筑的区域壁垒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当然，这涉及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我们可以设想，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区域性巡回法院，其管辖权中的重要一项是受理跨省市区的民事、经济纠纷。这个法院的突出特征在于，从制度上说，它将不会受到地方利益的掣肘，因而，它可以公平地站在人民与地方政府及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它可以通过解决分属于不同省市区的个体之间及个人之间的纠纷，以间接的方式宣告那些制造区域壁垒的地方性法规无效，从而绕开可能受集体自私控制的地方政府，并在避免政府间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逐渐地消除地方性立法和地方政府政策中的保护主义条款，为统一市场的发育形成创造法律环境。这样一种司法体制是消除区域壁垒、永久维护统一市场的最佳手段。

注：本报告摘用了深圳综合研究院《大珠三角区域融合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在此向原作者深表谢意。

（课题组长：刘品安，成员：成建三、扬志云、曾鸣，主要执笔人：刘品安）

CEPA与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下简称CEPA）源于2001年11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两地建立“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经过一年多的专门研究和充分磋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分别于2003年6月29日、9月29日和10月17日在香港、澳门签署，并于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概括地说，CEPA文本包括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内容。其基本目标是：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提高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CEPA的签署，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被誉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港澳的支持，并从制度安排上保障了港澳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尤其解决了香港经济未来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CEPA又以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发展空间。与此相应地，各类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研究，或是从宏观上解析CEPA的战略意义，揭示CEPA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的作用；或是评估CEPA给港澳和内地可能带来的影响；或是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为当地实施CEPA建言献策等。

本文拟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CEPA与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内地实施CEPA的过程中，珠三角地区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着眼于CEPA的实施可能或已经对大珠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产生何种影响；进而探讨应如何通过充分挖掘CEPA的作用来推动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进程。

一　CEPA之前大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合作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港澳地区由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在资金、技术、营销和管理经验方面，却有比较大的优势。而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发展经济缺乏资金和技术，却有大量素质较高、工资低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资源。于是，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珠三角转移，珠三角地区纷纷出现港澳商人投资兴办的“三资”企业和为港澳地区加工装配的“三来一补”企业。在生产要素组合上，则表现为香港的资金、技术、营销、管理和珠三角的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即双方优势的结合。从而形成了港澳专注于服务支援业务，珠三角地区专注于生产制造业务的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关系，俗称“前店后厂”模式，并开启了港澳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契机，港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大规模转移。统计资料显示，1979～2003年，广东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一共有103004个，其中来自香港、澳门的有82316个，占了79.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404.79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澳门的有977.36亿美元，占了69.57%。港澳和珠三角之间的“前店后厂”模式也由此逐步成型，即港澳地区的生产环节和资金、技术等要素通过不断转移的方式扩散到珠三角而形成分工，前者主要承担服务业重镇、科技研发中心和国际贸易网络的角色，后者则担负生产基地的任务。

“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的结果之一体现在港澳和珠三角之间进出口贸易额之上。2003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836.4亿美元，其中出口1529.4亿美元，进口1307亿美元。据海关统计，2003年粤港进出口贸易额是2054.6亿美元，占广东进出口总额的72.44%，其中出口到香港或经香港转口的有997.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5.23%，从香港进口的达到1056.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80.86%。2003年，粤澳之间进出口贸易额12.4亿美元。目前，香港经济的主要部分已经和珠三角的制造业连成一体。据香港工业总会委托香港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于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香港有63000家公司在内地从事制造业，其中53000家在珠三角。这些企业在广东直接和间接雇佣了1000万名工人，其中仅珠三角内的深圳和东莞两地就达660万人，占总数的2/3。同时，这些企业也为香港直接和间接创造了近

150万个就业机会。换言之，港商每在珠三角创造24个职位，就相应地为香港的支持行业增加了一个职位。

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和生产领域的合作，带动了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在贸易、金融、旅游和经济信息等领域合作的发展，表现为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合作，形成了“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济合作关系，有力地促进了三地经济的显著发展。

（一）以“前店后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优缺点

大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及其形成机制有着相当独特的地方。首先，大珠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纵向的，其直接目标主要不是为了促进区域间贸易，因此旨在占领当地市场的投资行为并不多，主要目标是利用大陆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在重新分配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偏重于外向型出口。其次，港澳与珠三角之间主要是利用互补性和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合作。第三，推动港澳与珠三角进行区域合作的动力主要源于市场，政府参与较少，并没有正式的区域协定和制度性安排。第四，大珠三角地区的要素流动呈现单向性。香港、澳门的资金投向、技术扩散与转移单向性地流向珠三角，即使在人员流动方面，由于中国内地对出入境人员实行严格管理的原因，亦呈单方面流动的形势，即港澳的从业人员大量流向珠三角，而珠三角流向港澳的却很少。

就大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模式的成功因素而言，首先，由于不存在正式的政府间协定和正式体制安排，大珠三角经济圈在形成过程中避免了区域合作的许多难题，例如降低关税问题，贸易协调问题以及有关的贸易规则和法律制度问题，在操作上易于启动和推进。其次，由于这种合作方式属于由市场推动和以企业为主角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组合，合作内容涉及领域有限，例如主要涉及外向型经济领域，着眼于区域外的市场，很少涉及对方的内部市场，故不存在贸易倾斜问题，所以不会引起外部方面其他区域集团的报复行动，贸易风险相对较低。第三，大珠三角经济圈的合作方式主要由投资推动而非贸易推动，所进行的活动是扩大经济空间，在区域内部形成产业分工，配置生产基地和以内部消化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所以这种活动不仅不具有排他性，还具有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的特点，参与各方在进行区域合作时，不仅不排外，还吸引其他外资，与外资分享增长的好处。

就大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模式的局限性而言，首先，由于缺乏来自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性质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很难在社会上下形成协同力量，对一些需要超越市场，运用理性的战略布局问题进行处理和调整，特别是当全面涉及区域内外贸易、服务、基础设施的协调规划与投资时，这种合作方式便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次，就是参与各方所利用的主要是出口加工资源部分，并非涵盖全部经济资源，难以全面发挥区域合作的竞争优势。

（二）CEPA 的出台及其对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含义

1. CEPA 的出台

长期以来，理论界提出了很多关于大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方案，比如“南中国自由贸易区”、“中港澳自由贸易区”、“粤港自由贸易区”和“深港自由贸易区”等。CEPA 在内容上与“自由贸易区”实质上是大体相同的，只有名称上的区别。事实上，CEPA 基本继承了“中港澳自由贸易区”的方案。而“南中国自由贸易区”、“粤港自由贸易区”和“深港自由贸易区”等方案之所以未获采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广东省、珠三角或者深圳作为中国管辖的地区，如果要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势必要与全国其他地方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并且要设立一套隔离机制，比如在广东和其他省份之间设立“海关”，监管省际贸易，这在技术上将非常困难。其二，从中央的角度来看，把广东省或广东省其中的一部分地区作为“试点”区域与港澳率先实行自由贸易区政策，容易造成地区封锁，拉大地区发展差距，从而引起其他地区的不满。

既然港澳已经同内地达成以“自由贸易区”为主基调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协定，在此背景下再谈港澳与珠三角，即大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似乎已无必要。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首先，“南中国自由贸易区”、“粤港自由贸易区”和“深港自由贸易区”等方案虽未获采纳，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案毫无可取之处。相反的，CEPA 还给其中的部分方案，比如深港共同市场等类似的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其次，无论是从珠三角和港澳地区既有的经济依赖关系，从两地在区位上的毗邻关系，抑或是从两地的文化认同角度出发，CEPA 实施的效果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发挥出来，广东和珠三角都具有战略地位。正因如此，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仪式后指出，“《安排》只

是建立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第一步。今后，我们不仅要认真执行这个《安排》，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继续研究、充实新的政策措施；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也强调，“在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合作中，广东的位置极其重要”。

2. CEPA对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含义

如前所述，珠三角与港澳之间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模式，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迁，粤港竞争愈演愈烈，两地之间重复投资、资源浪费、彼此掣肘等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伴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迅速崛起，珠三角和港澳三地均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情况下，港澳地区，主要是香港面临着重新审视自身定位的问题，提升香港与珠三角的合作分工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金融商贸等服务业来振兴香港，“融入珠三角”成为香港的强烈呼声。与此同时，珠三角也迫切需要利用香港服务业的优势来提升自身制造业的素质，推动本地服务业的发展。在这种默契之下，第六次粤港联席会议上，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珠三角和香港方面一致同意，珠三角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关系。

事实上，在CEPA的框架下，珠三角与港澳层面的合作不仅有着大量的机会，且两地经贸合作的具体形式将更加多样灵活。两地的合作可以不限于取消关税，而是在跨境区域合作、区域发展规划、基础建设配套、人员交流、通关便利、经济政策协调等多个方面，开拓更广阔的合作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CEPA是开启大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一把“钥匙”，它的实施必将大大推动中国跨境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二　CEPA之后大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合作

CEPA是一个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性框架，它的实施将对实际领域产生间接和直接的效应。CEPA从制度安排上明确了港澳，特别是明确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从法律上解决了香港未来的定位问题，这就是CEPA的间接效应，它侧重在理论和战略层面。更重要的是，CEPA的实施必将对实

际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主要有关税节约效应、制造业回流效应、投资刺激效应、市场扩大效应及市场竞争效应等。从实施几个月的情况来看，CEPA 的直接效应相当有限，CEPA 并没有对大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合作产生实质性的推动，其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一）CEPA 实施的预期效果

1. 关税节约效应

CEPA 的关税节约效应主要是针对港澳地区而言的，其短期效益不大，且对内地的关税收入影响也非常小。CEPA 实施后，港澳方面将先于其他 WTO 成员，率先获得 273 种产品的“零关税”待遇。据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估计，香港因为零关税每年可节约 7.5 亿港元进口成本。从静态来看，由于香港制造业在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仅为 5.3% 左右，香港对内地的出口也从 10 年前的 800 多亿港元萎缩到现在不足 100 亿港元。因此，即使全部出口到内地的港澳产品都实施零关税，CEPA 对港澳企业带来的好处依然有限。同时，中国目前的关税收入一年大概是 640 亿元人民币左右，关税节约效应对内地税收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但是从长期来看，关税节约效应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2006 年 1 月 1 日港澳产品全部实现零关税之时，中国对其他产地的商品关税率平均仍达 8.9%。港澳两地的制造业除获得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之外，由于进口成本的优势相对其他产地的产品仍然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这有助于港澳制造业的复苏和成长，从而提高制造业在港澳产业体系中的地位。

2. 制造业回流效应

CEPA 商谈的原则就是要令港澳企业在内地的待遇“优于 WTO，先于东盟”，同时消除了许多原产港澳两地的商品进入内地市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使原产香港商品的产地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凸显出来。因此，“零关税”待遇带来的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引发港澳在内地，主要是在珠三角一带的部分制造业企业或企业生产工序回流到香港和澳门。其中，零关税给香港的钟表、珠宝等高附加值产品带来的收益比较大，同时这些产业在内地生产的劳动力、厂房等成本节约意义不大，此类产业的部分港资企业可能回流搬迁；香港服装业在工人技术和产地品牌存在一定的优势，一些港资企业的研发、设计、推广类高附加值的生产工序也可能回流香港。2003 年 10 月，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一份调查显示，约有一成制造业企业表示打算把部分工

序回流香港，以享受零关税优惠。

3. 投资刺激效应

CEPA再有一个效应就是有助于吸引更多高增值生产活动在港澳进行，推动港澳企业发展针对内地新兴中产消费者的香港制造品牌产品，从而刺激外国投资者到港澳投资或促使港澳本地企业增加投资。CEPA实施后，香港和澳门的中介地位将会增强并赋予新的内容，预计有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会在港澳进行策略性投资，或者建立"关税规避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借此进军内地市场。对于内地而言，CEPA引起的投资效应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内地有望借CEPA吸引港澳服务业的投资；另一方面，CEPA将促使中国制造业发展出现新的格局，导致内地在吸引外资上可能要面对来自香港和内地其他地区更为激烈的竞争，内地制造业招商引资的难度将有所加大。

4. 市场扩大效应

CEPA实施后，港澳服务业将因提前进入内地而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按照CEPA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港澳服务业将先于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开放时间表进入内地市场。在部分行业，内地对港澳的开放程度还将超过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可获得取消股权比例限制、降低注册资本和资质条件要求、放宽地域和经营范围限制等优惠。这将有助于使港澳地区的专业服务类企业提前建立起日后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先发优势，而且也使港澳更多较小的服务企业有机会在内地发展。

5. 市场竞争效应

"零关税"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促进港澳企业与内地企业的竞争，促使内地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提高经济效率和管理水平。内地服务业普遍存在竞争不充分、市场监管不到位、开放度不够、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水平低、专业化程度弱等问题，与港澳服务业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CEPA使得更多的港澳服务业有机会进入内地，在增加服务供给的同时，必然加剧内地服务市场上的竞争，进而提高内地服务业的总体水平。

（二）CEPA的实施及其对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影响

1. CEPA实施以来的实际情况

中国内地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2004年3月31日，海关总署共接收香港工贸署等发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电子底账536份，经海

关验放进口的香港货物378份，价值1.72亿港元，免征关税1018.2万元人民币。同期，海关接收澳门经济局签发原产地证书电子底账7份，实际经海关验放进口6份，价值28.47万澳门元，免征关税1.67万元人民币。

在服务贸易方面，截止2004年2月26日，香港工贸署共收到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申请152份，已签发92份，涉及物流、分销、增值电信、银行服务、广告、管理咨询服务及会议服务和展览服务等。来自广东省工商局的统计显示，截止2004年3月底，广东全省共受理港澳个体户登记申请388宗，核准登记316户（香港280户、澳门36户）。申办地点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佛山6市合计294户，占总数的93%。

2. 对CEPA实施效果的分析

在CEPA的各类直接效应中，只有关税节约效应是即期的效益，且由于制造业在香港和澳门经济总量中的微小份额，这个效应也变得相当有限。这一点可以从CEPA实施两个月以来的实际情况获得证实。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4年1~2月，广东口岸自香港进口CEPA项下商品4.1亿美元，同比下降4.2%。换言之，内地进口的港产商品，不仅没有因CEPA的实施而出现大幅攀升的情形，反而有所下降。

制造业回流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更多包含着预期的成分，且这两个方面能否真正实现目前也未可知。就制造业回流效应而言，目前港澳地区一般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均数倍高于内地，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和厂房用地需求量大的港澳企业，这些都可能抵消CEPA对回流港澳企业的收益影响，构成回流的阻滞力量。就投资刺激效应而言，从国家全局的角度出发，内地不应该也不会允许以一个局部地区利益的小得，带来整个国家利益的大损。同时，目前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直接以内地为制造基地，从而实现“厂”、“店”和市场的三位一体，港澳的中介地位在这方面的意义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大。

市场扩大和市场竞争的效应则属于动态的效益，有待进一步观察。

3. 目前CEPA对推动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作用尚待观察

从实施几个月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大致可以推断，CEPA的直接效应是相当有限的。实际上，若是论对港澳经济的直接贡献度，CEPA还不如允许广东省境内居民个人赴港澳地区旅游。一方面，零关税所带来的货物贸易收益数额非常小；另一方面，港澳能够从CEPA中获得的最大收益，即服务贸易收益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它的市场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也仅是一种预期。目前而言，CEPA对推动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作用尚待观

察。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的贸易障碍本身已经很小，即便CEPA将两地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全部铲除，它所能带来的效应也十分有限。其二，港澳与珠三角之间的要素流动依然呈现单向性。尽管个人游从一定程度上放宽了两地人员来往的限制，继而一定程度上放宽了资金流动的限制，但是人员要素和资金要素的流动令我们认为，分析CEPA，必须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野出发，充分挖掘CEPA可能给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带来的机遇。当前，CEPA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港澳地区不能利用其在WTO框架下的特殊独立经济体的地位，与内地的有条件的局部地区，特别是合作基础最好的珠三角地区寻求建立更为直接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港澳地区仅仅与内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宽泛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效应也仅限于战略层面。

三　如何通过放大CEPA的作用推动大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合作

CEPA为在同一主权国家，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不同的关税制度下开展跨境区域合作、加速跨境区域的经济融合提供了制度依据，但它只是提供了一把"钥匙"或者说一个机遇，且CEPA难以从整体上推动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相比之下，局部突破的可能性更大。目前而言，最有条件推动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区域是与港澳地区毗邻的珠三角地区。为积极扩大CEPA的制度和政策效应，一方面，CEPA本身有待升级，增加新内容；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以区域接壤地经济一体化合作为突破口，比如城市同盟、共同市场式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区、跨境合作区等一体化合作建议，从实质上推动大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进程。

（一）充实CEPA的内容和扩大CEPA的作用

1. 扩大CEPA的实际政策效应

为了扩大CEPA的实际政策效应，在贯彻落实CEPA的同时应启动更高、更深层面的研究，组织协调全国有关科研部门和权威人士共同参与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取得从中央到地方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探讨关于在"两岸四地"（即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之间建立自由

贸易区特殊领域和政策的研究，比如在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内如何确定对外资的共同规则、如何展开一定范围的非关税合作、如何加强人员交流和劳务合作、如何尽快启动信息及贸易、投资数据库方面的合作；探讨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的研究，包括如何在物流链的联结、运输手段的组合等方面进行统一调配和整合，如何建立高效率的电讯网络、提高基础设施的衔接程度和运营效率等。

2. 继续增加和充实CEPA的内容

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规定，“双方将通过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安排》的内容”，也就是说CEPA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质，将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同时，根据CEPA成立的“联合指导委员会”也为这种开放性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CEPA的开放性为协议的不断充实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正如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所强调的，“CEPA不是一个‘菜单’，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机制……下一步还将在两地现有的资格互认磋商成果基础上，加快工作节奏，力争早日取得更大进展。另外，中央政府会与特区政府一起，积极稳妥地研究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和加强合作的问题”。

3. 提升CEPA的功能

目前在CEPA附件中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主要是针对银行、保险公司、会计师行、律师行等香港和澳门的专业企业，香港和澳门的公共收入及本地就业获益不大。2004年全国政协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政协委员曾钰成建议，允许香港专业服务公司直接在内地提供跨境服务。为避免因全面开放可能对内地一些行业及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可以首先在有需要及承受力较大的地区，比如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为试点，先行一步对香港开放服务业。此外，由于深圳与香港毗连，经济发展快，相互交流密切，对香港服务业进入能力强。因而，对一些难度更大争议性更大的行业，例如会计师和律师的资格互认及开业门槛，可以考虑在深圳先行试点。

（二）通过开展跨境区域合作放大CEPA的作用

1. 有选择地在相关领域缔结一系列的城市同盟

在这方面，美国的圣地亚哥和墨西哥的蒂华纳的经验可资借鉴。圣地亚

哥和蒂华纳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两个城市在经济、历史、文化、居民生活等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和墨西哥政府的联合规划之下，两个毗邻城市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合作的领域包括环保、能源、水务、医疗、贸易基础设施等，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城市联盟。

虽然蒂华纳－圣地亚哥是跨越两个国家的城市联盟，但其合作协调机制对于同样拥有边界接壤的港澳和珠三角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主要的做法是，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广东省政府的协调下，港澳与珠三角各城市依据双边合作需求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分别缔结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城市同盟协定，开展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全方位合作。以两地基础建设为例：可通过缔结相关的协定，成立一个常设性的、有权威的和由香港方面主导的协调机构，对整个区域的机场、港口等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以建设港珠澳跨海大桥和沿珠江入海口的东西岸铺设轻轨铁路线等为契机，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闭回环路，综汇大部分人流和物流，沿交通线，特别是在处于后开发阶段的珠江西岸地带进行新一轮的工业区和新市镇布局。作为试点，可以考虑先行在中国内地的经济特区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联盟，比如深圳－香港的城市联盟，珠海－澳门的城市联盟。

城市同盟是一种远远超越了经贸合作关系的一体化合作模式。其好处在于，可以将大珠三角区域内城市间的区位毗邻优势发挥到极致，因此可作为大珠三角地区一体化合作的一个远景目标。其难点在于中央政府能否认同此项方案，它也要求粤港澳三方能够立足于一种长远和整体利益，以期形成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2. 推动CEPA朝“共同市场式”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展

从长远来看，在“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港澳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理想模式应当为“共同市场”，即实现两地商品、人员、资金和信息等的双向流通。考虑到实际操作中的难度，两地可以不必要求拥有共同的对外关税，因此，这一合作模式又有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共同市场，而是在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增加了要素自由流动等功能，即“共同市场式”的自由贸易区。

“共同市场式”自由贸易区是一种介于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之间的一体化合作模式。其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和专长。其难点在于，港澳与珠三角进一步一体化必然涉及内地的经济体制与港澳的接轨问题，从而可能造成珠三

角与内地其他地区在体制方面的差异，需要得到中央和广东省较大的支持力度。

为此，可考虑选择珠三角的深圳和珠海作为先行试点。深圳与珠海是港澳的直接接壤区，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四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渐趋接近，经济联系广泛而深厚，对于商品、人员、资金的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而且深圳在市场机制的形成上领先于全国，既有同港澳直接对接的制度基础，又有二线与内地相隔离，有地方性立法的制度条件。据此，深港两地有条件率先建立起“共同市场式”自由贸易区，珠海、澳门可采取适当形式加入。

3. 在CEPA框架下加快深港“同城化”的进程

在200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提议在沪深两地试点自由贸易港区。成思危指出，为适应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可以考虑先以上海的外高桥及深圳的盐田为试点，将两个保税区发展成自由贸易港区，积累经验，然后进一步发展推广。

自由贸易港区的核心理念是“二线管住，一线放开”，或者说“一线管人不管物，二线管物不管人”。其内容简单说，就是现在的深圳和香港的边境管理线（一线）只保留边检的功能，放开对深港两地货物进出的限制，只对人员往来进行严格限制和严格监控；同时把深圳特区管理线（二线）变成海关线，对内地与深圳的货物进出进行严格限制和严格监控，但对内地人员进出深圳特区则只作简单的限制，而不做严格的监控。采取这样的制度安排后，深圳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大保税区”，深港两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完全融合，深港两地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实际上的经济共同体，完全实现了“同城化”。

将深圳开辟为自由贸易港区的好处是简单易行，不涉及WTO规则，但前提是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

4. 开展深圳－香港和澳门－珠海接壤地带的跨境合作项目

相比于前面三个方案来说，这个方案更简单，更易操作，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珠三角，只有深圳和珠海分别与香港和澳门接壤，因为它不涉及其他国际原则，甚至对深圳和珠海现行体制都不需要做大的变化，只要中央政府批准，深港和珠澳两地政府就可以通过协商，积极推动在深港和珠澳两地边境建立具有保税性质的跨境工业区。深圳和珠海方面可以在现时几个保税区的基础上划出一定的区域范围，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其与市区的其

他地区分别出来。香港和澳门方面也可以其边境禁区为基础，用严格的监管措施使其与香港其他地区相分隔。由于设立保税工业区符合世贸组织的原则，也不会涉及内地其他地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因素，因此把这两个管制区连成一体，成为保税的跨境工业区并不困难。

2003年12月，筹备多时的珠澳跨境工业区在澳门青洲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可以说，澳门和珠海在建设跨境合作区方面已经先行一步。目前，珠澳跨境工业区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且双方同意工业区将来可能再扩容。

在珠三角与港澳的接壤地带建立跨境合作区的好处是，通过设立类似于免税工业特区等园区，部分地解决港澳地区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

（执笔：宏观经济研究所　刘品安）

珠三角及港澳制造业发展分析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一　珠三角及港澳制造业发展分析

（一）制造业结构的分析

珠三角制造业从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珠三角产业体系门类较齐全，具备较强的生产、加工及配套能力。珠三角已是全国领先的大工业经济区，拥有包括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化工、森工造纸、医药、汽车九大支柱产业。2002 年，珠三角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15702 亿元，工业增加值 37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8%，产品销售收入 15320 亿元，实现利润 670 亿元，利税总额 1180 亿元。

珠三角制造业重工业化倾向和信息化倾向明显。珠三角目前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高到低的三个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31.8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1.70%）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5.05%）。三个行业的产值占了大约整个制造业产值的 50%，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66.5%。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是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产业，占全省工业产值的比重为 26.9%。珠三角正以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惠州为重点，发展通信产品、新型元器件、计算机及网络产品、数字视听产品、信息家电产品，努力建设国际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基地。1998～2002 年，珠三角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3.9%，比轻工业增速高出 11.2 个百分点，九大支柱产业主导地位继续加强，三大新兴支柱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比重不断上升，三大传统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三大潜力产业

发展势头强劲。

珠三角制造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趋势明显，高技术制造业水平居全国首位。由于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适时进行结构调整，珠三角产业结构与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在支柱产业构成中，1980年代曾排名珠三角工业产业前几位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建材等传统产业均已让位于新兴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2003年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430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8.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309亿美元，均在全国名列前茅。2002年广东全省认定的1731家高新技术企业，27596专利申请量中90%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规模位居各经济区前列。

（二）制造业布局的分析

珠三角制造业初步形成了以产业聚集为特色，以广州、深圳为核心，以中部都市区、珠江东岸、珠江西岸都市区为基础的产业地理布局。

以广州为核心，包括佛山、南海、番禺、顺德、三水、花都、增城和从化等的中部都市区，是全区政治、教育、文化、科研、金融、商贸、信息与运输的中心，以及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基地。

以深圳为核心，包括惠州、东莞、惠阳、惠东、博罗等的东岸都市区，通过与香港对接以及香港制造业和台湾等地区的IT产业的转移，珠三角经济区成为了国际化的前沿地带，其东岸形成了以轻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制造业基地和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开发、生产、应用基地和能源重化工业基地。目前在珠江东岸已经形成了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经济走廊，其制造业已完全加入到跨国公司供应链，成为跨国公司水平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

西岸都市区包括珠海、江门、中山、新会和鹤山等，是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依托，以资金技术密集的家电、机械加工等为主导的港口贸易发达的大都市区。其早期的发展以乡镇企业引进技术设备、内生性集聚和进口替代为主。这种以轻型制造业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布局，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市场需求。但在短缺经济结束后，由于其布局和结构的缺陷，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低迷。目前，西岸制造业企业正在经历体制全面创新，与跨国公司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潮流相配合，不断提高其竞争力。

珠三角制造业形成了以工业园区为依托的产业布局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重新规划后的各类工业园区已多达数百个。各级各类开发区

则超过70个，且普遍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在东莞，原有的180多个工业园区，现被重新规划整合为70多个，新规划的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总投资逾百亿元，将为东莞带来上百亿美元的出口值；在顺德，从2002年4月开始，对原先多达200个村一级的工业区进行集约整合，目前已整合的集约性工业区达15个，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面积从3.5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中山市规划了四个大型工业园区，每个园区按照"高起点投入、高强度投人、高效益产出"进行建设，结果试点的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吸引的资金剧增；惠州的石化工业园项目已经粗具规模，将成为改变珠三角产业结构的一个支点；南沙的重化工业园区，也已经在建设中，它将引导广州的工业化升级，对珠江两岸都有带动作用。

（三）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分析

集群化发展是珠三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珠三角产业转移的过程实际上是从要素集聚到产业集聚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促使珠三角建立了面向全球的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并开始创造出产业集群的良好效应。

珠三角产业集群规模大且集中度高。以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形成了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2003年完成销售收入6202亿元，占全国总量的33%，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是全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为主体，形成了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经济规模也达到了1000亿元的产值，在全国产业集中度为25.1%，居全国首位。在深圳仅计算机配套生产企业就超过了1500家，顺德则集中了我国家电总产值的15%，中山的电子信息制造企业达460家，占其工业总产值的40%；东莞生产的电脑主板、扫描仪、显像管、微型马达等，已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15%～40%，电脑机箱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0%。此外，珠三角钟表零配件的加工占据全国市场的70%以上。

珠三角制造业集群形成了以"一镇一品"为特色的专业镇体系。珠三角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专业产业区30多个，在区域内的400多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1/4。珠三角各具特色的专业镇，以"小企业，大协作；小产品，大市场；小集群，大作为"为特征享誉全国。在佛山，顺德区容桂等镇已发展成为广东最大的电器机械生产基地；南海大沥镇铝材生产占全国的1/3以上，形成了全国最大的铝型材交易市场和生产基地；中山古镇，已经明显地形成了灯饰企业的集群化，灯饰销售额占全国

50%以上；东莞虎门镇的服装产业集群名扬国内外，服装产量连续7年名列全国乡镇前茅；东莞石碣、清溪镇的中小电子企业的集群化，使珠三角成为全球几大电脑制造中心之一。此外，还有中山市小榄镇的五金制造、东莞厚街镇的家具生产、南海盐步的内衣生产、中山沙溪镇的休闲服装、南海西樵的纺织、平洲、里水及东莞厚街的制鞋业、南庄和佛山石湾的陶瓷、张槎的针织、顺德伦教、龙江、乐从的家具制造、江门恩平的麦克风，等等，都以大量的中小企业集群化形式出现。

（四）香港、澳门地区制造业发展分析

制造业在港澳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逐渐淡出支柱产业地位。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曾一度占很大比重，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减退。由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陆续移至内地进行以及转口、转运货物和离岸贸易、旅游、运输、电讯、金融服务的蓬勃发展，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显著下降，由1981年的23%跌至1991年的15%，2001年跌至仅5%。2001年澳门制造业产值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8.5%，比2000年的9.8%下降1.3个百分点。以制造业为依托的出口加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取代博彩旅游业而成为澳门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但由于经营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地区相同产业的发展使其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港澳制造业与内地形成了鲜明的“前店后厂”式分工。为了降低劳动成本，降低租金和地价，扩大生产规模，拉近与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距离和开拓国内市场，许多公司把大部分的采购材料、储存、运输和生产移向内地，把财务管理、地区总部、销售和市场以及IT管理等职能留在了港澳本地。由于港澳地区本地市场十分狭小，其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在港澳直接销售的数量有限，其中超过80%的产品经由港澳销往海外。2002年上半年，香港产品出口总值为612.2亿港元，其中出口美国、英国、德国等海外市场的比重分别为32%，6%和3.3%。

制造业以服装纺织业为主体。港澳的制造业是靠轻纺工业起家的，由于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重工业一直难以发展，以服装纺织为主的轻工业一直担当主要角色。在香港服装制品业和纺织业的从业人数占到了制造业从业人数的40%；另据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行业是成衣业，占据其投资总额的22.9%；在澳门，其制造业生产高度集中于服装纺织业，在主要的出口货物中服装纺织业也占了83.8%的绝大比重。

二　珠三角制造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同构性严重

由于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珠三角地区的市、县经济结构趋同的现象比较严重。从不同城市看，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7市的40类大产业中，排在前6位的大体都是电器、服装、电子、纺织、食品加工、非金属制品等6大产业。从一个城市看，以佛山为例，在市区、石湾区、南海市之间不到50平方公里的地区间，竟有250多家陶瓷生产企业。

珠三角的产业同构、基础设施同构比较严重。这如果是市场经济下的选择，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走向全面市场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往往会因为某些行业成为了投资热点，盲目而重复地在此地区进行该产业的布局。比如，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了热点，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上从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布局，下到某乡某镇的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布局。在传统制造产业方面，珠三角的许多地区政府也会为了强调本地区产业的全面性，而面面俱到地布局各种产业。此外，据资料显示，由于多年来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都较低，再加上中国简单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外资进入珠三角大都是低端的制造业。在珠三角，此类低层次的同质企业和产品布局大量存在。

这种产业布局的同构性，致使珠三角内不同地区间为了争夺市场和生存空间而展开一系列恶性的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从整体上消耗了区域内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使得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也日渐萎缩，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制造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技术含量低、自主开发能力弱

在珠三角，企业科技开发投入普遍偏低，R&D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于5%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到1/10；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机制尚未形成；产学研合作活力不够，技术开发力量不足。珠三角地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1%左右。在获准的10707件授权专利中，发明专利仅占0.72%。企业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之间缺乏良好的合作风气，活力不够，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自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偏少。

珠三角产业优势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且许多产业的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本地自有企业拥有的份额不多，拥有研究开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少；在部分制造业中，大部分仍属加工装配的后段工序，附加值低、劳动密集程度高；加工产品普遍存在加工精度低、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等问题；普遍存在对高技术产品的消化吸收慢的现象。

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中许多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产品，自我创新能力、独立进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能力较弱，科技开发水平低。直至目前，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培育出优势配套产业体系，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产业群。

虽然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体看来，技术创新不足仍制约着珠三角制造业的进一步成长和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产业科技水平低下、研发能力薄弱，限制了其对传统产业、低端产业的升级改造，以及高技术产业向高端化的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设置了障碍。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形成刚性

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使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大量来自港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由于珠三角各地所给予的各种优惠措施，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在各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珠三角前期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是“三来一补”等低层次的加工工业。珠三角欲成为世界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中心，依靠当前大量布局的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成事。再则，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盘踞，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制约了珠三角制造业产业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升。

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珠三角地区广泛布局，并形成了刚性。究其原因：①低素质劳动力自由移动的低成本和劳动力资源接近无限量供给，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低成本劳动力；②作为投资主体的港台企业，其家族化作业的背景，及其与珠三角地区的文化相近性和沟通便利性，致使其落地后便产生了“黏性”；③落地一段时间后，“潜制度环境”的形成，也使其不愿迁移。若长此以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刚性存在，将使珠三角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受到消极影响。

(四) 资源低效配置，结构升级机制呆滞

目前，珠三角相当部分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在最具竞争力优势的家电产业及电子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情况严重。在珠三角地区5家洗衣机生产企业中，除中山市威力洗衣机有限公司生产能力利用率（79.3%）较高外，其他厂家均在30%左右。在所有电冰箱生产厂家中，除科龙电器有限公司（81.45%）和中国雪柜实业有限公司（65.6%）生产能力利用率较高外，其他企业只在25%左右。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意味着资金、设备、厂房等生产要素过于集中或大量沉淀在某些生产领域，从而导致了产业要素低效配置、产业升级后续动力不足等现象的出现。

珠三角产业升级机制呆滞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各地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顾相关产业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而相互封闭、内向发展、自成配套的现象。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市从1980年代后期起，就掀起了大规模“西进”运动，现已形成较大的产业转移规模。而珠三角在这方面则显得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以后到1980年代中期，珠三角引进了100多万台技术设备，经过10多年时间的运转使用，不少已经老化，亟待更新改造。但是，在技术改造投资方面，珠三角比长江三角洲少得多。“八五”时期江苏省全社会技术改造投入1536亿元，而广东省才874亿元。

这种现象的出现及增加将削弱珠三角在家电产业、电子产品生产行业及相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恶化珠三角产业结构，延缓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五) 集群企业缺乏根植性

根植性是指个体对整体或外在环境的融入和适应。在产业集群中企业只有根植于地方，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和发展，吸引更多的新企业在本地繁殖和成长。目前，从珠三角制造业中小企业集群化成长的发育程度来看，珠三角的企业集群化还处在较低的聚集层次，还没有发展到产业集群的地域化经济高级阶段。群内企业之间尚没有形成长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网络，集群企业在该地区是不稳定、容易移动的。一旦区位条件发生变化，它们就有可能移至他地，使该地区形成产业空洞化，区域竞争力衰退。

以东莞的台资企业集群为例，台商虽已形成初步的聚集，但珠三角的嵌入型为主的企业集群并未真正嵌入或根植于当地。比如，1987年第一家台湾

鞋厂在东莞投资生产，到1990年时已有400多家台湾鞋厂在此落户，台湾的制鞋商、原材料供应商、包装商、机器维修店以及下包厂商在此形成一个新的企业网络。但由于根植性弱，台商没有深深扎根于当地。当时，这个大型企业选择外迁，带走了许多相关小企业，严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企业根植性弱这种现象在珠三角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中广泛存在，对珠三角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个不小的隐患，同时也制约着制造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六）产业集群间协作和关联不足

珠三角现阶段产业集群企业的产业协作和关联度十分低下，产业链条之间的分工协作是珠三角产业集群中的薄弱环节。由于市场发育不充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集群内多数企业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关系，企业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尤其是终端产品的生产上。比如，在顺德乐从和东莞厚街家具生产中小企业集群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生产以最终产品为主的家具，只是款式、品种、档次和类型有所不同。整个中小企业集群化经济中纵向的产业链条关系并未形成，家具生产的关键环节如木材采购和运输、设计、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等分工不明显，远未达到形成产业纵向链条提升整个产业增值的效果。

珠三角产业集群中普遍存在大量“小而全”的企业，很多情况下每个企业只通过内部分工就完成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全加工过程。东莞虎门的服装企生产、南海西樵纺织生产、南海大沥镇的铝型材生产、中山市张槎镇的针织、小榄镇的五金生产、佛山石湾镇的陶瓷生产等，大都具有这种特征。这种“小而全”的企业集群迫使企业自身要完成整个产业链条的所有环节，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既无法提高企业的分工效率，又难以集中企业的有效资源用于最具竞争力的环节，而且危及集群的自我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三　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策略与措施

（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技术升级

珠三角调整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应该努力推动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真正建立起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采取有效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实现R&D

的本地化；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以产业集聚区为基地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对一些有重要意义，但自身又缺乏条件操作的项目可面向全社会进行项目招标，以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珠三角产业还需狠抓技术改造，增强发展后劲。把产业关联高、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项目作为技术改造重点领域支持的主要内容；支持用技术改造振兴装备工业和实施名牌带动战略的项目；支持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重点骨干企业进行信息化的示范性改造项目，以及为企业信息化服务的骨干软件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

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珠三角制造业产业内部结构。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改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三大传统支柱产业，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培育发展汽车、医药、造纸、环保等一批有潜力的产业。以纺织服装、家电、食品饮料、建材等产业集聚专业镇（区）为重点，加强和完善信息化技术支撑体系和高新技术创新体制的建设，加快信息化技术在设计、制造、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应用，增强企业竞争力。具体来说，纺织服装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着重抓品牌建设，抓上档次产品，抓重点技术研发；家电产业要加快变频技术、空气净化技术在空调产品中的应用，使空调向节能、超静、健康型发展；发展模糊控制、环保、健康等多功能的电冰箱；发展网络家电产品；食品饮料产业可利用生物工程、微胶囊化、超临界流体萃取、分子蒸馏、微波杀菌、超高温瞬时杀菌、无菌包装等技术，改造提高食品的加工和包装保鲜工艺。

（二）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只有大企业才能有足够的资金积累和技术创新力量进行大规模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才有能力进入新兴产业领域。珠三角企业规模普遍过小是阻碍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又一因素。因此，珠三角应该加快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构建和完善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珠三角应该克服产业集中度低，大企业缺乏的劣势，发展大企业集团，使其发挥“榕树效应”；协调大中小企业关系，使其形成“中卫”体系。

对大型企业集团的培育，珠三角应该利用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辅以适当的产业组织政策，积极鼓励企业间的兼并、合

并和联合，以形成大型企业集团。同时，企业集团的组建须以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为核心，由此充实其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其成为促进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中坚力量。

在实施方面，在家电行业可以以冰箱业科龙，彩电业 TCL、康佳、创维，微波炉业格兰仕，空调业美的、格力等为中心，通过联合、兼并、资本运作等方式把以上企业做强做大，形成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家电企业；可适时设立 IT 企业研发专项基金，对引进优秀 IT 人才给予适当倾斜，扶持华为、中兴、长城计算机等企业使之增强竞争力，逐步成长为在世界范围内 IT 行业中的重要企业；积极扶持汽车行业的广州本田、钢铁行业的广钢、石化工业的惠州壳牌等企业，使之成长为业内领先的明星企业。

（三）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和结构布局

珠三角制造业可通过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和结构布局，促进其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在区域布局方面，重点是促进各城市特长的发挥和珠江东西两岸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在珠江西岸，广州应以汽车、造船、石化、钢铁等一批重点产业群为中心，集中力量推动一批产业关联度大、产品链条长、带动能力强、在国民经济中起重大影响的生产性骨干项目，形成制造业新型大工业骨架；佛山应强化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有色金属加工、家电、建筑、纺织、小五金等产业，建立陶瓷产业经济圈，把佛山建成世界陶瓷制造中心；澳门将积极推动和筹划澳珠跨境工业区，努力发展成为较具规模的区域性时装中心；珠海定位为研发和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及石化等重工业基地，集中力量建设港口、临港工业区；中山、江门以专业镇为特色，大力发展纺织服装、家具、精细化工、建筑陶瓷、五金、灯饰等优势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

在珠江东岸，香港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高增值产业，支持大埔、将军澳、元朗、观塘工业村在传统优势制造业的发展；设立创新及科技基金，以科学园、数码港为中心，拓展以知识为本的高增值行业。深圳应建成重要的创新及转化资本经营基地、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成果转化基地、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和成果交易中心。惠州则规划为石化工业龙头，发展以南海石化项目为龙头的石化产业，带动广东乃至全国塑料加工、轻纺工业、精细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东莞将成为以计算机生产、加工、配套为主的“国际

制造业名城”。

在结构布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应选择以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惠州为重点优先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广州、深圳、珠海、南海等地信息和软件园的建设；加强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和广州生物岛、深圳北大生物谷等产业园区建设，发展高技术医药产业。汽车产业，以广州为龙头，突出发展轿车，打造全国性汽车制造中心；机械装备制造业，以广州、深圳、佛山为中心发展专用设备制造业，重点发展大型、精密、机电一体化的石化设备、塑料机械、陶瓷机械、环保机械、工程机械产品；石化工业，建设惠州、广州两个重点石化基地以及珠海、汕头等各具特色的石化工业园区，推进珠三角沿海石化产业带建设；钢铁工业，以广钢和韶钢为核心发展临海大型钢铁基地，加快建设南沙钢铁产业基地，以带动产品结构优化。

（四）发挥政府引导和服务作用，促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

培育和建设产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珠三角产业集群建设中，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和产业本身，在此前提下，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引导和服务，首要的职能是打好基础。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创造基础条件，消除任何阻碍集群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因素，以科学、可行的产业集群政策替代简单的产业布局安排。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简化手续、改革管理制度、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等；不断帮助集群发展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自组织体系；建立法律、会计、仲裁、信息咨询、测试等方面的中介服务机构；改革金融体系，切实解决私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等。同时，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大力发展服务型的生产力中心、技术信息中心、质量检测控制中心、开放性行业技术中心等集群发展机构；建立区域服务体系和专业化市场；培养和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公共要素的投入，建设功能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各类担保机构；加强培训体系建设，根据各个专业化产业区职业特点举办培训和教育，进一步加强和大学、科研院所的相关专业的联系。政府还应该从理顺体制、健全制度入手，营造产业集群的氛围，整顿、规范市场。通过政府以上所述的引导和服务，推进珠三角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建设，提升珠三角制造业的竞争力。

（五）培育产业集群企业的根植性

依据经济增长理论，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终和持久力量是内源性因素，外源经济作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外部推力，必须促进和带动内源性因素的成长。珠三角不少地区制造业集群发展是在外资的示范和带动、民营企业仿效和追赶下成长起来的。由于缺乏本土经济作为依托，靠外资经济建立的产业和经济规模优势也极不稳固，极易发生迁移和流出，并且日益面临来自国内外其他地区，如长三角的竞争与挑战。

从国际上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看，嵌入性或植根性是产业集群能够取得成功和绵绵不绝的发展潜力的关键。因此，珠三角要营造制造业产业集群企业的根植性，这点对珠三角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哪里生产要素发达，资本就会粘在哪里。这种粘力蕴藏在本地产业群之中。要营造植根性，就要强化技术创新，形成有深厚技术创新能力支撑的区域品牌。为此需要运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对整个生产经营体系进行重组和改造，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加强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分工，形成弹性生产体系；加强与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的横向联结，形成集群创新的社会化基础；在集群中形成由中介服务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制造业产业集群内部的自组织，制定和执行行业规范，限制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

通过对珠三角制造业产业集群企业根植性的营造，提高珠三角产业集群竞争力，促进珠三角及其所带动的广东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执笔：宏观经济研究所　刘品安）

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本文所探讨的外来劳动力问题暂不涉及港澳地区，因为港澳地区就外来劳动力人口而言，珠三角地区和中国内地的人口是不能随便流动到港澳地区的。因此，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仅指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佛山、江门、惠州、肇庆。这也是国内文献中常用的“珠三角”的经济地理定义。

本文外来劳动力人口的概念主要是指统计上的暂住人口概念，这样应用的目的是便于把握总体的外来劳动力人口状况。

一　分析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流动人口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范围不断扩展，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制度的变化。

（一）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

改革之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相应形成了阻碍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了扭曲的产业结构、扭曲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相应的发展阶段。对于城乡间和区域间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来说，传统体制形成了两重障碍：第一，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第二，计划配置劳动力的体制为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区域间的转移设置了牢固的樊篱。

（二）改革后的制度变迁是劳动力流动的前提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城市化也以双轨制的方式进行。在计划轨道内，城市化速度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其规模并不足以矫正扭曲的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因而计划外的迁移和流动成为必要的补充。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以国有经济和城市集体经济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之外，生长出一个新生经济部门。后者包括城乡个体私人经济、三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封闭的经济体制和城乡隔绝的经济社会结构及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性壁垒被打破之后，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或者被排除，或者被打开一个缺口。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流动的前提和条件。

具体而言，对劳动力流动影响较大的制度变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价格制度和局部的户籍制度改革。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打破了人民公社“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旧体制，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自主权、收益分配权，土地生产率迅速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继而使农民获得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两大前提，即基本农产品剩余和资金剩余。这使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有了可能性。

其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和放开粮食价格、粮食市场以及取消城市粮食供给制度，使阻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屏障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跨区域流动有了生存和维持生机的基本保证。

再次，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使我国长期以来公民严格区分为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的户籍制度被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同时城市经济体制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为接纳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大量的就业空间。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又一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原因

如果说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是体制变革和政策导向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新时期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引发农

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根本动因。

（1）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且逐年增长势头不减，相反，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就业压力。

（2）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原有的农民收入增长机制失去功效，广大农民急需开拓新的渠道增加收入。一方面，原始的农民增加收入主渠道即随着农业生产增长而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逐渐狭窄。尽管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但抵不住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仍在不断加大，使农民务农的比较效益低下，以至于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现象比较普遍，使农民不得不开拓新的收入渠道。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主渠道，其功效也逐渐削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为了提高其竞争实力，原来意义上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得不以人才、技术、设备优势取而代之。近几年出现的强劲的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意味着其容纳劳动力的空间缩小。同时，乡镇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呈逐年放缓趋势，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一部分必要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发达地区流动成为必然。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使劳动力转移成为现阶段农民增加收入的必然选择。按照地区要素流动理论，劳动力总是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这是要素流动的普遍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特区政策和沿海开放战略，使绝大多数沿海地区和城市经济飞跃发展，引起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劳动力预期收入差异悬殊，形成了对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巨大诱惑力。而农村虽然先于城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使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终究不能抗衡于城市功能优势和巨大市场优势，城乡差距重新拉大。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配套改革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形成势不可挡的潮流。据调查统计，1994 年外出劳动力中，流向城市、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 80% 以上。

（4）农村职业分化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农民职业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农民在不断提高了的生产力水平上要求就业再分工、再拓展。一些农民要求弃农从商，离开农村迁入城市就业，而更多的农民要求转包土地，长期从事第二、三产业。这种追求高层次、高收入职业的行为冲动不仅反映了农业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迈进的客观要求和规律，也反映了当今农民行为选择的自我心态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四）珠三角地区吸引外来劳动力的制度变迁

作为劳动力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珠三角地区是全国最早的地区之一，而在珠三角地区，又是深圳开了引入外来劳动力之先河，因此，可以说，深圳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制度变迁在珠三角地区具有典型意义。

深圳在全国最早形成了以市场供需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机制。深圳劳动力市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得到发育和成长，在劳动力管理体制上率先建立起新的体制框架，并以法律形式使劳动力市场规范运行。1980年代中，深圳人才市场正式成立，成为闻名全国的创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1）在计划体制内探索建立劳动力市场体制。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还是计划体制时期，深圳就探索建立劳动力市场体制。在劳动力引进方面，深圳逐步形成的了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要素市场、劳动就业证制度、劳动务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制度等。这些制度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秩序。外来劳动力的管理已构成深圳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从2002年3月起，深圳又开始实行“深圳人才居住证”制度。根据规定，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高级技师技术等级、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并被深圳用人单位聘用到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人员，都可以申请办理深圳人才居住证。在深工作的非深圳户籍人才只要拥有深圳人才居住证，就可以享受到子女入托入学免交借读费、可报考重点中学的高中部，办理综合医疗保险，申请租用市、区住宅部门开发的全成本安居房或社会微利房等优惠待遇。凭深圳人才居住证，这些来深创业的人才们无需再办理劳务就业证即可在深合法工作、生活，也可以凭证进入深圳经济特区。据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来深圳创业的非深圳户籍人才高达36.46万人，占全市人才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持暂住证的高级职称人员和硕士以上学位的研究生突破1万人。“深圳人才居住证”制度成为吸引和管理人才的又一制度创新。

（2）深圳在吸引外来劳动力方面，制度变迁发挥了较明显的作用。深圳采取的方法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辅以政府宏观调控，大力推进劳动用工、劳动就业、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四项制度的改革。①废除固定工制度，取消企业中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建立了以劳动合同为法律特征的员工“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公平竞争”的新型劳动用工

制度；②废除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建立了以市场信息发布、就业政策咨询、转业培训指导、职业推荐介绍为主要内容，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并逐步完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双向选择、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市场竞争就业机制；③废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工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了“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宏观调控”的工资分配新机制；④废除了企业自保的劳动保障制度，建立了以养老保障、工伤保险、医疗保障、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3）在建立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高效的制度以后，深圳又以立法的方式确保新的劳动机制的运行。从实践中观察，深圳劳动立法起到了以下作用：

①巩固和深化劳动体制改革；②规范发展劳动力市场，确立市场原则，维护市场秩序，调整市场主体利益；③贯彻三方原则，规范和调整新型劳动关系，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④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⑤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使劳动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

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与深圳相比，基本的制度变化大体相同，只是程度不同。

二 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现状的描述

（一）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是吸引外来劳动力的内在原因

珠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1980～2000年珠三角地区以平均16.9%的速度增长，超过全国9.6%和广东13.8%的增长速度。经济的迅速增长，使得珠三角地区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2000年这一地区的GDP为7378亿元，财政收入为599亿，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69.6%和65.8%（1980年指标分别是40.7%和59.9%）。长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就业（见表1）。

（二）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主要来源地分析

深圳的公路客运去向和广州铁路节后临时客车客运的来源地与来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务工人员的原籍地域分布情况是大致吻合的。广东民工，尤其是

珠三角地区的民工来源地，基本上以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贵州、重庆、四川和陕西为主。

表1 珠三角地区经济总量（GDP）状况

单位：亿元

	1980年	1990年	1995年	2002年
广州	57.55	319.60	1243.07	3001.48
深圳	2.70	171.67	795.50	2256.82
东莞	7.04	64.62	205.63	672.89
惠州	6.60	45.55	211.79	511.66
珠海	2.61	41.43	185.06	406.27
中山	7.22	51.06	170.85	415.67
江门	18.73	100.55	379.39	660.82
佛山	16.77	136.73	545.89	1175.92
肇庆	14.03	79.29	338.09	531.51
合计	133.25	1010.50	4075.27	9633.04

根据深圳劳动部门的调查，深圳外来劳动力主要来自长江以南的省区：广东本省、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近年来，山东、河南、安徽到深圳务工的人员也有明显增加。这些省区都是农业大省。河南和四川还是人口大省。显然，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这些地区外流的民工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减缓了这些省区的农业结构调整派生出的就业压力，并为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增加了现金收入。

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于2000年7～8月，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问卷调查。调查地点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14个城市，占广东全部22个地级市的2/3；所选企业均为外商投资出口企业。接受调查的民工分别来自黑龙江、甘肃、山西、陕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贵州、四川、云南等12个中西部省区。可以初步确定，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劳动力几乎来自全国各地，但是，主要来源地还是周边省份，用一个基本的地理概念，其来源主要是泛珠三角地区。

（三）珠三角地区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成本变化

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统计体系，对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劳动力的成本即工资状况很难描述清楚。但是，通过政府发布的有关文件和一些典型

案例，可以推算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深圳市吸收的外来劳动力占珠三角地区的60%以上，因此，以深圳为例大致可以了解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变化。

1992年开始，深圳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给工人发放工资少于最低标准的就是违规，就要限期整改并补齐工资。虽然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远不能达到发达国家以社会平均工资的80%作为最低工资标准，但对保障深圳从事简单劳动的人群基本生活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99年最低工资标准经过两次调整，从430元上升到547元，2000年则是零增长。2001年经物价、财政、统计等部门研究，深圳市2001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比上年提高了5%：特区内2001年最低工资标准为3.43元/小时，折算成月工资标准为574元/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2001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为2.63元/小时，折算成月工资标准为440元/月。2002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为595元/月，特区外为460元/月。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在全国各个地区中高居榜首，比第二名上海市高出百元。2003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最低工资3.59元/小时，即600元/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最低工资2.78元/小时，即465元/月。2004年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最低工资3.65元/小时，即610元/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最低工资2.87元/小时，即480元/月。

东莞市最早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350元，到后来增加到380元。2004年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这在某些企业那里却成为最高工资线。劳动部门正加紧调查编制各种工种和技术岗位的指导性工资，让劳动者和企业对工资水平有一个衡量标准，引导市场推动提高外来工工资水平。

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与全国其他地方比较，还是比较高的。

较高的工资并没有完全影响本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从经济增长、吸引外资等指标分析，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相比，还是高于长三角。

因此，珠三角地区的竞争力并不完全是来自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更多的优势是来自于环境优势、制度优势、产业集聚的优势等。

（四）外来劳动力的分布

外来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而制造业方面又主要是分布在外资企业。根据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分析，外来劳动力80%分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外资型制造企业。这与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基本吻合。大量外来劳动

力的进入促成了珠三角地区中国制造业之都的形成。

但是，近年随着珠江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已有减速的趋势。估计按现在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珠三角地区还能接纳外来劳动力500万左右。

三　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对国家的贡献

珠三角地区吸引大量的外地劳动力，直接增加了外地劳动力的现金收入。与珠三角联系较紧密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民工务工的收入占全部现金收入的25%左右。2002年，湖南在外民工获得收入400多亿元。这包括邮局汇款、电汇、自身携带的抽样调查以及当地消费等，年人均收入6085元。

（一）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对原居住地的经济发展贡献

永州市是湖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全市输出劳动力70多万人，2003年寄回的劳务收入将近20亿元。浏阳市每年进城打工的农民通过邮局汇回家乡的钱有2亿多元，估计总收入在4亿元以上。

以湖南省浏阳市荆坪村为例，该村有800多青壮年劳动力，其中200多人在深圳特区打工，每年春节期间村子里都很热闹，出门打工的人带回了外面世界的光鲜气派。每次过完年，又有一批新人被带出去。这个村子外出打工的农民月收入水平最低的400多元，高的800多元，有的成为了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月工资收入高达1000多元。如果按一人一年消耗500斤口粮计算，全村一年就会省下10万斤粮食。出去的劳动力多了，村里人多地少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了。村民收入多了，盖了不少新房子。

河南省劳动厅驻东莞办事处曾对东莞豫籍民工做过调查，发现从事最多行业中的服装、电子、制鞋业的一般工人其月工资连加班费为600～700元，新手是400～500元，熟练工则达800～1000元。而外来工的所在工厂一般多包吃住，加之个人生活克俭节约，平均一人一月能寄回家400～500元，一年寄5000～6000元回乡的大有人在。每年广东都成为河南民工的一个重要流向。据初步统计，豫籍民工在东莞可能已达到50万人之多，如果每人按4000元寄回家，那么，每年从东莞寄到河南的汇款估计在20亿元左右。把范围扩大到珠三角地区，这一数字可能在50亿元左右。

据深圳的四川省办事处估计，迄今在深圳打工的四川人超过40万，他们每年向四川老家的汇款金额超过20亿元。1995年，出川打工族达518万人，寄回家乡的汇款为170亿元。2001年，四川向外省输出民工560万人，比2000年多100万人，从中获得的收入达400亿元，其中个人汇款为235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5亿元，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29%。2002年，川渝分治后，出川民工已近60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30亿元，其中从邮局和银行汇兑回川的款额达247亿元，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30%左右。

（二）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对流出地的经济贡献

珠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来劳动力对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据统计，2003年我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约1.7亿人，其中有1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县城及以下的镇，7000万转移到中等以上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区大约吸引外来劳动力1500万左右，而且都是中等以上城市。根据这一数字推算，珠三角地区的大中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占全国的1/5，即全国每转移5个农村劳动力到大中城市就有1个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完成的。从广东汇兑业务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2003年以来，为推进汇兑业务发展，广东省邮政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跨越”活动。2003年1~8月，累计开发汇票3792.02万张，开发金额409.46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25%和0.69%，业务量占全国的27.8%，其中民工汇款占80%，集团汇款（如邮购、代发工资、稿费等）占18%，其他占2%。

2002年东莞外来工通过邮政汇出金额已达142亿元之多，这一成就2003年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为东莞“综合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的十一大数字论据之一，显示出外来工的经济分量日增。据推算，东莞外来工汇钱回乡一年多过一年：1999年为119亿元，2001年为137.6亿元，2002年为142亿元。

2000年7~8月，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在广东做了一次外省民工问卷调查，范围主要是珠三角地区。从返回的问卷统计分析结果分析，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本在家乡做工或务农的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3.23倍，由144元提高到611元；每个民工平均每年往家汇款2606元，占其家庭年总收入的28.7%。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广东珠三角地区，既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对增加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收入有显著效

果，对提高中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深圳、东莞、广州等地外来劳动力总数字应在1500万人左右，如果每一个劳动力一年寄回3500元到流出地，总金额可达500亿元，相当于湖南、江西、四川等几个省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可想而知珠三角地区对外来劳动力流出地的经济贡献有多大（见表2）。

表2 外地打工者从珠三角寄回收入估计

单位：亿元

地区	2002年财政收入	从珠三角寄回的打工收入估计数	地区	2002年财政收入	从珠三角寄回的打工收入估计数
江西	141	100	四川	292	200
湖南	231	200	贵州	108	50
湖北	243	80	云南	207	20
广西	187	50			

资料来源：2002年各省市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电子版。珠三角地区数据是推算估计数据。从珠三角寄回的打工收入系根据外来工的地区分布估算。

（三）深圳吸引外来劳动力对国家的贡献

根据深圳2000年人口普查，深圳总人口约750万，户籍人口250万，500万为外地户籍人口。到2003年深圳总人口约1000万，增加的主要是龙岗和宝安两区的外来工。估计深圳外来民工已达700万以上。人均收入5000～6000元/年，每年有约200亿～300亿元汇到各地农村。按现行统计公布的数据，深圳市外来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75%。

在全部总人口中，15～64岁的年龄层次主要是外来劳动力。按550万外来人口推算，深圳的外来人口中，劳动力占480万左右。每人寄回流出地的工资按5000元计算，一年从深圳寄回全国各地的劳动工资收入达240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四 珠三角地区流入的外来工所存在的问题

目前外地劳动力流入珠三角地区存在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信息传递渠道不通畅，服务手段不完备，组织化程度低

从珠三角地区就业市场的观察情况分析，外来劳动力中，村集体组织劳务输出和民间职业介绍组织安排的外来劳动力比较少；政府职业介绍安排的也不多。绝大多数外来劳动力，除部分长期在外打工的本村村民带出或外地亲友介绍出去外，大部分是自发外出。这部分人既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又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同时，由于信息不畅、中介服务功能差等多种原因，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流入珠三角地区后，由于信息不灵，处于找工作欲出无门的状况。

（二）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稳定

劳动力的转移和生产的专业化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力两栖化现象比较严重。在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中，季节性外来劳动力占绝大多数。这部分人均属于兼业型，既外出打工，又要经营土地，意在两不误，实则两耽误。一些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经营土地比较粗放，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荒芜现象，这不仅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也使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进程受到阻碍。这种状况对流入地珠三角地区而言，农忙时招收劳动力就发生困难，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

（三）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不利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

流入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劳动力一般都是来自欠发达的周边地区，尽管流出的劳动力素质高于当地农民的素质，但多数只能适应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普遍缺乏劳动力的现代企业来说只能望洋兴叹。而目前困在农业生产上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素质又比较低，这是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突出矛盾。据深圳市对暂住劳动力人口素质进行调查，大部外来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大专及大学以上水平不及10%。外来劳动力素质总体上是比较低的。

与户籍人口相比，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深圳市户籍人口的素质是比较高的。

（四）劳动法规不完善，在外劳动力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

在对珠三角地区已有的研究中，大量问卷调查反映，外来劳动力对“在

外遇到的主要问题”，较普遍反映的是劳务报酬不能及时兑现，甚至不按合同兑现，很多人对工伤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心存疑虑。另外，比较集中的反映是有关政策透明度低，部门限制过多。特别是进城农民普遍感到待遇不平等，条件反差大，因此有心进城，却无力维持下去。这是直接影响劳动力有效转移的重要因素。2003年农民工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五 规范外来劳动力的政策建议

珠三角地区是全国吸引外来劳动力比较多的地区，为了进一步吸引外劳动力，还需采取一些扶助外来劳动力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服务组织机构，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有序性和组织化程度

在中央一级成立劳动力流动宏观协调机构的同时，珠三角地区的各市都要相应建立起组织协调机构，主要通过调查掌握农村劳动力剩余情况，劳动力转移流向、流量以及劳动力输出、输入地的供求状况，做好劳动力转移中长期规划，并根据劳动力供求信息，协调好地区间劳动力输出输入关系。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力中介服务组织和建立职业介绍机构，并赋予这些中介组织以就业培训的义务和权利，促使形成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在内的有机体系，缓和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的压力，提高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素质，以适应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的需要。

（二）加强劳动力市场法规建设，完善劳动力就业法规体系

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大量的人员是在外资企业就业，因此，在立法部门尽快制定和实施《劳动法》、《劳动者权益保障条例》、《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同时，各级执法部门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劳动力培训、就业管理、劳动保护和监察等环节的具体的市场法规体系建设，确保以健全的市场法规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组织行为，保护企业、劳动者和中介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对于某些三资企业劳动条件差，劳动保护设施简陋，安全生产管理不力，职工住宿生活条件差，违反劳动法规，超时加班加点，厂规苛刻，打骂虐待工人，拖欠克扣工资的情

况，采取加强劳动就业立法、执法的对策，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劳动管理中的作用，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监察手段，促使企业主增强法制观念，保证劳动政策和法令的实施。加强劳动保护和完善外来工的社会保险制度，这是维护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方面。同时，严格要求企业按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配齐劳动保护装置，逐步改善外地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是作为一个产品标准，现在很多国外进口商要求企业提供 SA8000 标准认证。珠三角地区的主管部门应以此为机遇，实施劳动力保护政策。

（三）改革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新的户籍管理体制

我国传统的严格区分城乡户籍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深化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阶段可采取试点的办法，其改革的终级目标是，无论什么性质的户口，只要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都应允许入籍。这是劳动力有效流动和优化组合的重要保证。珠三角地区外来劳动力是本地人口的 3～4 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达到劳动力要素在本区域内的完全流动。

（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珠三角地区虽然大部分外来劳动力参加了社保，但是还很不完善，而且参保人数也不稳定，这种情况对珠三角地区的长期发展存在一定的隐患，特别是当外地劳动力失去工作，没有任何保障时，有可能对珠三角地区的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一个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来说，离开土地确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此，改革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无疑对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关键。然而，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长期的实践过程，所以有计划、有目标地逐步建立包括农业劳动力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同时，现阶段要重点建立乡镇企业的就业保障机制，逐步实现并完善企业保险制度，减少农村非农产业的波动，使农业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感。与此同时，要彻底取消城市供给制度和改革就业体制，实现消费品商品化，就业市场化，福利社会化，为外来劳动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执笔：宏观经济研究所　刘品安）

参考文献

穆光宗：《给“中国人口问题”一个准确的定位》。

深圳市外来劳动力管理课题组：《制度创新：建立外来劳动力管理新机制——外来劳动力管理问题调研报告》，深圳市劳动局就业处。

李应强：《深圳经济特区外来劳动力证件管理工作的回顾、问题及对策》。

辛本兰、石贤银：《深圳特区外来劳动力管理的基本经验》。

深圳市劳动局课题组：《我国经济特区劳动立法专题研究》。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京津冀经济圈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Blue Book

2004~200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环黄海经济圈的发展与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国内外的地位

山东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刘淑琪

一　“环黄海经济圈”构想的提出与发展

（一）环黄海经济圈侧重的是中日韩环黄海地区的一种地方与地方、城市与城市之间合作交流的区域经济性组织

在环黄海地区，中日韩三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条件各异，但市场潜力大，经济互补性强，相互之间合作空间广阔。

日本目前正努力生产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把更多的工厂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日本的制造业产值占该国总产值的比例为19.5%。虽然这一比例仅仅比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略高一点，但是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业产值来源于高中端科技产品。这个比例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此类产品包括仪器仪表、电子设备、汽车和药品。很多公司在日本的工厂现在充当了技术研发中心的角色，其研发成果将被送至泰国、新加坡和中国，由设在那里的工厂复制生产。

韩国政府正在大力支持和推动融合技术，即把信息技术（IT）、生物工程技术（BT）和纳米技术（NT）等融合在一起进行开发的新一代高新技术，力争提前实现产业化，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相对应，也把一般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中国等国。

中国则具有巨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市场需求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

这一地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区域性合作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开展积极对话，全面探索新世纪经济共同发展大计，成为三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环黄海经济圈是中、日、韩三国学者根据环黄海经济地区——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苏北地区，韩国西海岸及东南地区，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地区，在经济互补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地方交流层次的经济合作体系。与当今世界上所形成的一些以国家间联合为主的国际经济同盟不同，环黄海经济圈侧重的是一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这种地方层次上的交流，由于以城市与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群、半岛与岛屿为主，相互间的文化又在儒学基础上趋同，因而在实践中越发显示出其灵活性，往往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开启中日韩三国之间环黄海区域经济合作，是打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大门的重要突破口。

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首先提出了黄海经济圈构想。韩国黄海经济圈设想的提出与中国当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沿海发展战略是密切相关的。黄海经济圈设想具体地落实在建立西海岸工业区的计划上。1986年韩国国土开发院和内阁建设部一致提出把1990年代的经济建设重点转移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韩国西部沿海地带，在西海岸建立大规模的工业区，以迎接同中国进行大规模贸易"黄海时代"的到来，形成一个黄海经济圈。在韩国提出黄海经济圈构想后，地处北九州的日本文部省所属的国际东亚经济研究所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环黄海经济圈规划设想，此事引起了北九州地方政府的关注，并着手倡导实施。

1991年东亚城市会议组织成立，环黄海主要城市就共同课题开展了交流。2001年，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机制开始启动。2002年10月，由日本，韩国，中国的政府机关、自治体、经济团体等参加的第二次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在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力图进一步扩大以环黄海海域为中心的贸易、投资、技术交流等实际经济，争取形成环黄海经济圈。与此同时，为了成为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先锋模范区域，日本、韩国、中国互相补充各自拥有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地区资源，扩大贸易、投资及产业技术交流。第二次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着手进行国际性地区间合作的具体工作，在贸易投资、人才交流、技术交流的各个领域，三个国家、地区共同协作，同时开展具体事业，对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议确定了三国分别承担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交流议题并提出了合作提

案，并决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地点是中国山东省的威海市。

2003 年 9 月，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上，中日韩三方分别就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交流提出了合作提案，并形成了共同文件。中国商务部官员指出，这标志着中日韩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环黄海经济技术交流会第三届会议在上次会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文件。共同文件内容务实，领域广泛，标志着环黄海区域合作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此次共同文件内容涉及高层会晤制度、促进环黄海地区物流合作、日韩企业参与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办环渤海地区机电产品和 IT 产品的采购洽谈活动等多项内容。会议提供的资料显示，中日韩三国地理接近，文化相似，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 1019 亿美元，中韩贸易达 440.7 亿美元；2003 年，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额分别达到 1335 亿美元和 632 亿美元。过去 20～30 年间达到持续高速增长的韩中日三国，如今已成为继欧盟与北美地区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中心圈，但也是惟一没有形成地区经济协作体而只形成环黄海次区域经济协作的地区。中韩两国贸易额在今后 5 年内有望实现 1000 亿美元，中日贸易也将在近年内实现 1500 亿美元的目标。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不仅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004 年 11 月 16 日，与环黄海经济圈相对应的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第一次会议在日本北九州市开幕。中国的天津、青岛、大连、烟台，日本的北九州、福冈、下关，韩国的釜山、仁川、蔚山等 10 个环黄海城市的市长和商会会长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加强环黄海区域城市间的合作，以推进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会议通过并签署了共同宣言，审议通过了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的基本设想和章程等事项。东亚城市会议组织自 1991 年成立以来，环黄海主要城市就面临的共同课题开展交流，分享知识和经验，努力推动环黄海地区的发展，会员城市已经由当初中日韩的 6 个城市增加到现在的 10 个城市。各城市间加强合作，促进交流，建立了牢固的相互信赖关系。针对政府和经济界的合作尚不充分等问题，为提高东亚城市会议的功能，成员城市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充分研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东亚各国的特点及国家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城市间今后的合作方向。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正是为进一步加强经济交流，增强市长会议和以商会为主体的经济人会议之间的联合而成立的机构。会议通过的共同宣言提出，在建立东亚经济圈，谋

求与欧盟、北美贸易区相竞争的过程中，必须把居于其核心地位的环黄海经济圈的建设作为新的现实目标加以明确，并积极推动。相信对东亚环黄海经济圈的探索，定能对更大范围的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按照会议通过的基本设想，东亚经济交流推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发掘新商务、提出政策性建议、建立地区之间的网络、进行人才培养等。今后这一机构将通过机构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第三者评价委员会、部会事业推进总部等不同层面的组织运行，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按照章程，机构内部目前设置制造业、环境、物流、旅游4个部会，其中青岛市是物流部会中国地区的牵头城市。

（二）APEC和环黄海经济圈的经济交流活动越来越多，使与日韩最临近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成为很多国际博览会、论坛和体育活动的举办地

由于APEC和环黄海经济圈的经济商务活动越来越多，使与日韩最临近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成为2004年很多国际博览会、论坛和体育赛事的主办城市。

——2004年6月2日～6日，“第三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在青岛市举行。其间，山东省举办了“中日韩制造业交易会”、“中小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研讨会”以及“中日韩投资项目和贸易洽谈会”三大主题活动，向参会的16个APEC成员体全面推介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及山东省投资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中日韩制造业交易会”全面推介了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并通过全面介绍日本、韩国在山东投资企业的情况，展示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半岛城市群形象和制造业发展水平，以及山东交通运输行业（汽车、造船）、电子信息及家电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医药化工业、食品加工业等五大产业群的行业优势。

——2004年6月15～19日，由商务部、信息产业部、山东省政府和亚太经合组织主办的AEPC电子商务博览会在烟台市举办。这次电子商务博览会为半岛城市群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进一步与电子信息领域的大公司、大商社、大企业深化交流与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的电子信息产品、技术和服务，促进产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整体竞争力。举办这次会议，不仅能够集中展示半岛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能向世界展示我国的

综合国力和山东省的综合实力，展示国家和山东省在电子商务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提高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美国朗讯科技、爱默生公司、UT斯达康公司、贝尔阿尔卡特，加拿大北电网络、大诚电讯，韩国LG电子，美国惠普、IBM、戴尔，以及爱立信、西门子等知名公司参会参展。世界500强企业参展达到十多家。博览会共安排了三场高层次论坛：电子商务高层论坛、电子政务市长论坛、CEO峰会论坛，同时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论坛也同期在烟举行。

——第十三届亚洲杯足球赛2004年在中国的北京、济南、成都和重庆四个城市举行。作为分赛场之一，济南于7月17日至8月7日承办包括一场半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韩国队的全部比赛在济南进行，日本队参加的争夺决赛权的一场半决赛也在济南举行，这不仅为吸引一水之隔的韩日两国球迷来济南看球，实现“看足球，游山东”的目的，而且韩日两国又是山东的主要投资国与贸易伙伴，这次亚足赛带来的济南基础设施的大变化又对进一步吸引韩商、日商到济南和山东投资有重要作用。

2004年10月8~9日，以“交流　合作　发展——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的2004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在威海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经过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与会代表达成了共识，形成并发布了2004年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威海宣言。宣言指出，东北亚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市场潜力巨大，加强对话与合作，符合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各国都应当维护区域多样性，尊重彼此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求同存异，携手共进，深化合作，要把实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作为中长期目标。应遵循“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加强理解，增强互信；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三项原则，努力把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办成一个非官方、高层次、开放式、地缘性、有影响力的经贸对话与合作平台，以促进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宣言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行动：定期在东北亚地区举办专题论坛，主要讨论贸易、投资、能源、交通运输及环境保护等有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问题等。作为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后续活动的东北亚经贸洽谈会也同时在威海举行。参会的中外嘉宾、客商近4500人，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近2000人。

二 山东半岛城市群在连接环黄海经济圈和黄河流域经济区中的特殊地位

（一）山东半岛城市群（或称青济都市区）是黄河中下游经济区龙头的理论已逐渐被国内外所承认

过去，山东省一直被看成环渤海经济区的一个次区域。如今，应把山东半岛城市群研究的视野从面向内海思维的环渤海地区转入面向亚太地区的环黄海经济圈，这是一个重大突破。由于山东省的主要深水港口都面向黄海和韩日等国，渤海湾中又难建深水大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又受韩日两国经济影响最大。因此，简单地、笼统地把山东省、山东半岛城市群惟一划入环渤海经济区和环渤海城市群中是不科学的。这一论点对辽东半岛城市群也基本是适用的，因其虽也处于环黄渤海地区，但其经济联系主要面向整个东北经济区，而不是面向京津唐城市群地区。也就是说，这三个城市群之间虽然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但基本上仍是三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群；把京津唐、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三大相对独立的城市群落硬性人为地划在环渤海经济区内，这是一个根植于计划经济时代和内海思维的概念。

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 2》[①] 中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发展和演化，目前已经或正在形成九大经济区域和九大都市区的提法比较接近中国实际。该书提出的九大经济区域是：华南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广东、海南、广西、湖南南部和江西西部；长江下游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的中西部；东北地区，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通辽、兴安、赤峰等四盟市；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包括山东以及河南、河北、山西部分地区；中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和江西部分地区；西南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北地区，以西安、兰州

①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另可参阅《我国正在形成的九大经济区和都市区》，《经济日报》2004年4月30日。

为中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闽台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台湾和福建省。该书提出的九大都市区分别是：大香港都市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惠州、清远、东莞、中山等城市；大上海都市区：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包括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等；大北京都市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沈大都市区：以沈阳、大连为中心，包括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葫芦岛等；青济都市区：以青岛、济南为中心，包括青岛、济南、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莱芜等；大武汉都市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武汉、九江、信阳、黄石、十堰、宜昌、襄樊、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咸宁、随州、岳阳等城市；成渝都市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包括成都、重庆、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宜宾在内。关中都市区：以西安为中心，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汉中等城市；大台北都市区：以台北为中心的中国台湾省城市群。

上述的把以济南、青岛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青济都市区（即山东半岛城市群）列入全国九大经济区和九大都市区的提法同本文的提法基本一致。

包括我国环黄海地带和韩日等国的环黄海经济区中，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黄河经济带与环黄海经济区的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交流的桥头堡之一，也是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出海门户。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崛起，不仅将带领山东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车道，还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四增长极甚至第三增长极，成为带动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经济起飞的龙头。2003 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八市实现 GDP 8336.1 亿元，比 2002 年的 7013.43 亿元增长 18.86%；而 2002 年比 2001 年八市 GDP 总量 6228.99 亿元增长 12.59%，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也由 2001 年的 6.49% 提升到 2003 年的 7.14%，两年中就提升了 0.65 个百分点，说明其已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个新的经济隆起带。在沿海六大经济圈中，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列第三到第四位，其经济优势明显：城市密集，外资进入集中，开发区密集，制造业聚集，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景观丰富；区位优势也明显：紧靠日韩，水陆空交通便捷，港口

集中。

面对全球制造中心东移的好机会，山东半岛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中乃至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带。当然，如果不注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努力创造条件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崛起，不为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创造好的软环境，这一地区也有在南面长江三角洲、北面京津唐这两个城市群的夹击下被边缘化和处于劣势地位的可能。因此，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机遇对半岛区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毕竟，目前这一区域的人才、物资、信息、资金顺畅流动的平台还远远称不上完整；与其他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相比，济南、青岛的经济实力还相对较弱，腹地也有待拓展。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协调利益，调整标准，放宽权限，统一规则，建设良好的制度平台，变经济加法为乘法，是对地方政府的一次挑战。

对山东省经济区位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科学定位是，山东半岛城市群是包括我国环黄海地带及韩日等国的环黄海经济圈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群（韩国的以仁川、汉城、釜山为中心的城市群，日本以北九州、山口、下关和福冈为中心的城市群，以及辽东半岛城市群等，也是其相对独立的城市群），是黄河经济区与环黄海经济圈的韩、日等较发达国家经济交流的桥头堡之一。目前，山东半岛城市群既同南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和北部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大首都城市圈地区相互促进，又以越来越大的辐射力影响和带动黄河流域和陇海兰新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新亚欧大陆桥和黄河流域通向韩日等国的主要出海口岸群和东方桥头堡之一。这就使山东半岛城市群既成为京沪中段的一个必然兴起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又成为黄河流域城市带（如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城市带，以太原、长治、阳泉为中心的晋中南城市群，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等）在滨海地区延伸和聚集的产物。山东省是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环黄海经济区的交汇点，是华北经济区和华东经济区的结合部。建设现代化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对完善我国的城市体系、加强由中日韩组成的环黄海经济圈的经济技术合作，有着重大意义。

山东半岛既处在我国南北之间的过渡地带，又处在东部沿海连接西部内陆的关键地带，是“南北对流”的中转站和“东西对接”的联系桥梁。山东半岛建成发达的城市聚集带，可以发挥连接京津塘和沪宁杭两大经济中心的区位优势，也可以与西部连接形成为东西向的城市辐射带，成为接东带西和接南北（京沪）带西的纽带。由于日（照）新（乡）—新月（山）—侯

（马）月—侯西（安）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段北线铁路能使半岛城市群同西安直接相连，并使其与西安—乌鲁木齐的陇海兰新铁路相接；胶济铁路也通过济邯铁路和邯郸连山西长治、太原的铁路，再连进陕西、内蒙古的铁路进入西安和包头；全线正在加紧建设的青岛到银川的高速公路将使山东半岛城市群同石家庄、太原、银川快速相连。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山东半岛城市群成为新亚欧大陆的东方桥头堡群和黄河流域的龙头。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辐射带动范围包括黄河流域的广大中西部地区，这一区域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重要腹地。从沿黄经济带的实际情况看，河南、河北（南部）、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急需加强与东部以及与海外的联系，沿黄地带的发展需要带动。

（二）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山东以其黄河流域的惟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直积极发挥其在黄河流域的经济协作中带动作用及黄河流域经济带与环黄海经济圈之间的桥梁作用

1988 年，由山东省政府发起，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九省区政府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新疆建设兵团共 11 方在山东成立了黄河经济协作区，每年分别在各省开一次经济协作会议和商贸交易会，先后举办了九省区共同参加的青岛交易会、乌鲁木齐交易会、第二届烟台 APEC 博览会等，进一步密切了黄河流域同亚太及环黄海经济圈的经济联系；并成立了黄河协作区的外经外贸、轻工、纺织、机械、军工等 22 个行业协作联系会，共达成各类经济技术协作项目数万项；还联合编制了《沿黄经济协作带经济技术合作规划》、《黄河治理开发纲要》、《沿黄协作带联合协作互惠办法》等规划和规定。1993 年 12 月，沿黄省区又入股 1050 万元成立了黄河协作集团公司，总部设在济南，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九省区的跨省区大商社性质的工商企业联合舰队。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山东省积极参加西部沿黄省区召开的博览会，每年都同沿黄省区达成一批企业协作项目。2004 年 4 月，山东代表团出席在西安召开的第八届西洽会的签约仪式上又成果丰硕，来自山东济南、青岛、淄博等半岛城市群等地的企业与西部各省市代表团正式签订合作项目协议 85 个，总金额达 226.62 亿元，其中与陕西的合作项目共计 23 个，总金额 142.05 亿元，合作领域涉及化工、煤炭、钢铁、餐饮、制药等方面。其中兖矿集团与陕西、贵州等合作进行能源开发，达成合作项目 3 个，总金额达到 162 亿元；济南钢铁集团与陕西金济

物资贸易公司签订购销协议，协议额1.6亿元，与陕西益新物资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贸易购销合同，合同额4900万元。

目前，中国重汽、胜利油田、济钢、青岛啤酒、济南三联集团等半岛城市群众多企业都同黄河流域的企业有日益密切的经济技术联系，向黄河流域经济带的辐射力越来越强。

（三）已开通的青岛—阿拉山口—中亚诸国的国际过境集装箱班列使青岛港更方便地服务于整个黄河流域的集装箱运输

青岛港有比连云港大得多的集装箱吞吐能力和国际航线，因此是吸引黄河流域和陇海兰新铁路及中亚诸国的集装箱货源同韩日美等国相互沟通的最佳港口。2004年4月30日，满载着100个国际集装箱的火车专列从青岛港开出，驶向阿拉山口并将抵达中亚诸国。由山东中铁公司、青岛港集团公司、青岛中远国际货运公司联合开通的青岛—阿拉山口国际过境集装箱班列，以一周双班运行在新亚欧大陆桥上。该班列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欧、亚、美的相互运输距离，降低了运输成本，将青岛港的货源腹地扩展到了西至中亚、俄罗斯，东至日韩、东南亚的广阔地域。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中国段，青岛—阿拉山口行程4300多公里，过境集装箱班列驶出阿拉山口后，经中哈边境铁路站，将集装箱转运至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和东欧国家。该班列实行定点、定线、定时、定价、定车次等“五定”运输方式，集中了一次托运、一票到底、一次付费、全程服务的“一条龙”集装箱运输和铁路运输综合优势。青岛港的国际集装箱过境货物运输业务，目前已拓展到日韩、东南亚、澳新、印度次大陆、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作为国际海铁多式联运主要发起人的青岛中远国际货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中远集团设在青岛口岸的大型货运企业。近年来，它借助青岛港和国内铁路的地缘优势，依托中远集团的全球航运网络，致力于开辟连接日韩、东南亚至中亚、俄罗斯的国际多式联运路径，在使青岛港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上的全程服务的“一条龙”集装箱运输港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山东省正在同河南省联合，建立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港口群为河南中原城市群通向韩、日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目前，河南正在制定以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平顶山和许昌

等城市组成的中原城市群规划。在青岛港已开通的青岛—郑州—西安—阿拉山口—中亚诸国的国际过境集装箱班列的条件下，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青岛、日照港为出海大口岸是其最近、最方便、成本最低的选择。为此，河南省和山东省商定，已全线开工建设从菏泽到兰考的高速公路。山东省将开建济南到菏泽的高速公路，建成后从郑州、洛阳到济南、青岛就全程通高速公路，郑州到济南、青岛分别只需要四个和八个多小时。另外，两省还将合作修建东平到新乡的高速公路，并进一步促进国家建设菏泽到兰考的双轨铁路连接线。目前，已开通了郑州至青岛、郑州至日照、洛阳至济南的客运列车，今后可开通更多的客运旅游客线路。

（五）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半岛制造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加速了山东与同属黄淮海经济区的安徽省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半岛制造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使山东在本次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大戏中占据了主动。安徽省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融入长三角战略的同时，也与山东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亲密合作，试图利用山东这一平台，承接韩国、日本和山东本地的产业资本。2004 年 10 月 25 日至 31 日，由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王金山带队的 17 地市代表团组成的“招商大队”，带着农业、制造业、旅游业等 5 大领域 214 个重点合作项目来到山东。仅在 10 月 26 日于济南召开的皖鲁两省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便签署了 11 个专项合作协议，企业间签署了 47 个重大合作项目，总投资额达 62.8 亿元。此后，安徽方面又分赴青岛、烟台、泰安等地进行招商合作。10 月 27 日，安徽招商团又在青岛皖鲁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续签了 13 个项目、签约投资 8 亿元。目前，山东正在各领域与安徽企业联手，合肥海尔工业园的建立，青岛啤酒、海信集团、鲁王集团、绿叶制药等在安徽各地的投资便是见证。两省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已进入了活跃期，仅青岛海尔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兴建的占地 500 亩的合肥海尔工业园就投资 6 亿元。

三　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国内沿海六大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发展趋势和目标

由济南、青岛、烟台、淄博、威海、潍坊、东营、日照等 8 个地级市和 22 个县级市组成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其国土面积为 7.3 万平方公里，人口

3900万人，2002年实现GDP 7013.43亿元；2003年实现GDP 8336.1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7.14%，人均GDP过2500美元，从而使山东半岛城市群进入了全国六大城市群的行列。

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崛起的近期目标是在全国建立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之后的第四极城市群，即在沿海“三小”城市群中努力争取和保持最优（特别是在吸引外资、开发区建设、中心城市建设及各项人均指标上力争最优，目前很多人均指标还落后，总量指标领先），并经过长期努力，尽量缩小同“三大”城市群的差距，特别是同京津唐城市群和小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差距。从目前我国沿海城镇密集的几个区域来看，山东半岛的GDP总量，仅次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高于京津唐城市群，也高于辽宁与吉林两省GDP之和、四川与重庆两省市GDP之和及福建、河南、湖北等全省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第三个较为成型的都市经济连绵区。但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地在华东和华南地区的惟一性相比，山东半岛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仅在北方地区就有京津唐、辽中南两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青岛和济南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加上北京的首都地位具有济、青等市在北方无法竞争的区位优势和科教文化优势。所以，从包括经济、科技、文化及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指标相比，必须承认山东半岛城市群目前同京津唐城市群还有较大差距。但由于山东半岛的经济总量和吸引外资量的优势及同时具有青、济、烟、淄、潍五个GDP过千亿的大城市等条件，已远远高于其后面的其他城市群，如辽中南半岛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大武汉都市圈等竞争对手，目前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的青岛市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沈阳、成都、西安等老牌工业城市一倍以上，也远远地将大连、武汉、重庆等城市甩在了后面。这些都增加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目标的确定性。

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崛起的目的，是树立一个山东省在国内外能叫得响的产业带和城市群高地的品牌，把半岛城市群建设成为韩日等国资本和产业转移的高度集聚的地区，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外资密集、内外结合、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经济高地和城市群之一。这并非是要使山东半岛封闭起来孤立发展，恰恰相反，是要全方位加快山东半岛对国内外的全方位开放，除尽量多地接受来自韩、日、美等国资本和产业转移外，还包括全面接受来自港澳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和东北三省的南北辐射，以及同京津唐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一起，共同为繁荣环渤海地区经济做出贡献；同黄河流域的

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晋中南城市群等实现优势互补，更多地起到黄河流域的经济带头作用。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这一目标正在实现中。据山东省统计局统计，2003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在山东省的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都继续增加，总共有 84 家企业在山东落户。其中，日本、美国和韩国是投资大户，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仍是外商投资热点。2003 年山东省实际利用外资 110.3 亿美元，其中半岛城市群八市达到 100 亿美元，已远远高于京津冀之和的 53.43 亿美元，也高于辽宁省的 57.1 亿美元。来山东省投资的 84 家 500 强企业投资兴建了 138 个项目，比 2002 年增加了 14 个，其中已建成投产开业的项目 124 个，正在筹建的 14 个。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的投资企业分别有 31 家、19 家、10 家，这 3 个国家占来鲁投资企业的 71.4%。从投资兴建的项目数来看，日本、美国、韩国分别为 74 家、24 家、14 家，占投资兴建项目数的 81.2%。在全省 17 个市中，500 强在山东省 8 个市有投资项目，其中在青岛投资兴建了 90 个，烟台 20 个，济南 7 个，潍坊、威海各 6 个，日照 4 个，淄博 3 个，滨州 2 个。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青岛、烟台、济南、潍坊、威海、日照等 7 个半岛城市共投资兴建了 136 个项目，占全部来鲁投资兴建项目的 98.7%。外商投资行业仍以制造业为主。500 强投资的 138 个项目中，集中在制造业的有 106 个，占投资项目的 76.8%。2003 年 138 个项目实现利润总额 34 亿元，增长 60.3%；税金总额 21.4 亿元，增长 27.1%；工业总产值 386.3 亿元，增长 40.7%；主营业务收入 397.7 亿元，增长 37.7%；出口额 13.2 亿美元，增长 27.2%。截止到 2004 年 3 月底，山东共与韩国签订利用外资项目 10476 个，2003 年实际使用韩资超过 28 亿美元，占全国的 63%。这说明山东半岛城市群正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外资密集、内外结合、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经济高地和城市群之一。

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

山东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生态经济研究中心　马传栋

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群都有一个龙头城市和至少有三个功能有所分工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如美国东海岸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为纽约，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作为世界级经济中心的纽约、作为美国政治中心的华盛顿和作为世界级文化科技中心的波士顿；而作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龙头城市是上海，其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上海、南京和杭州；中国京津唐城市群的龙头城市是北京，三个中心城市就是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作为渤海沿岸最大经济中心城市的天津和作为北方重要能源化工和原材料城市的唐山。因此，加快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规划和建设，使青岛尽快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龙头型国际化城市，使济南、青岛两市尽快进入全国超大型城市的范围，使烟台成为第三个具有跨省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特大城市，形成济、青、烟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这对建设现代化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及区域性中心城市同其他城市群相比有较大差距

由济南、青岛、烟台、淄博（上述 4 市城市人口已过 100 万，其中济青两市过 200 万）、威海、潍坊、东营、日照等 8 个地级市和 22 个县级市组成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处由黄海和渤海湾相交接的山东半岛地区，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和有百年历史的胶济铁路是半岛城市群成长的交通大动脉，

其国土面积为7.3万平方公里（山东省面积为15.67万平方公里），人口3900万人，2002年共实现GDP 7013.43亿元，人均GDP过两千美元；2003年8市实现GDP 8336.1亿元，同比增长18.86%，以占全国0.76%的领土生产出相当于当年全国7.14%的GDP，人均过2500美元；2003年该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辽宁和吉林两省之和、四川和重庆两省市之和以及京津唐城市群之和，从而使山东半岛城市群进入了全国6大城市群的行列。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群体经济竞争力较强，2003年拥有青岛、济南、烟台、潍坊、淄博5个GDP过1000亿元的城市。2004年威海GDP也将过1000亿元，青岛GDP将过2000亿元，一般大中型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较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两个传统经济中心城市济南和青岛及新兴滨海对外开放城市烟台同其他城市群相比，存在着城市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科技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说，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两个副省级特大城市济南、青岛，不论是城市规模，还是经济总量、地方财政收入总量，都无法同京津唐城市群的北京、天津，长江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南京、杭州，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相比。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城市青岛更难以同上海、广州、北京等国内城市群的领头城市相比较。目前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城市青岛及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南、青岛、烟台同国内城市群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龙头城市看，青岛的总量比上海、广州都低

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使上海市金融、信息、技术等各种优势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无可取代，外商投资的辐射中心作用日益显现。上海经济总量稳居长三角首位，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遥遥领先。2002年上海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出口总额分别占该地区的28.3%、43.9%和34.8%，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头羊，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连动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市以全国1%的人口、不足全国0.1%的土地面积，提供和创造了全国5.3%的国内生产总值、8.5%的地方财政收入和9.8%的外贸出口额。同样，广州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领先于珠三角其他城市。2002年，广州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珠三角地区的31.8%、31.8%和12.2%，而人口和土地面积仅占珠三角地区的17.6%和6.4%。青岛市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

1780.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20亿元，分别占到半岛城市群8市总额的1/5和1/3。山东半岛8市的龙头青岛2002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出口总额分别占该地区的21.6%、29.5%和56.3%，三项指标分别相当于上海的28.1%、14.0%和32.9%，相当于广州的50.6%、41.0%和76.7%，总量差距明显。

（二）济青烟三个中心城市在全国城市竞争力的排名中低于其他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山东省的青岛、济南、烟台3个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分（为各城市得分与相比较城市平均分的比）排名分别为51.43、49.83和14.54，分别列全国200城市的第14、15和第38位，除略高于辽东半岛和福泉厦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外，比其他3个城市群的主要中心城市都低。

在2004年版《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中，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主要城市在全国200个城市中综合竞争力的排队名次是：青岛排第12名，济南排第18名，烟台排第30名，威海排第36名，淄博排第47名，潍坊排第51名。青岛和烟台的排位较上年有所提升，济南略有下降。

在2004年11月2日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以市区（即不包括城市所辖的县和县级市）经济社会实力发布的2003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排名中，济南市以综合指数达到87.1016分被排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第13名；青岛市以综合指数达到75.04分列第21名；烟台市以综合指数达到55.6378分列第30名；东营市以综合指数达到48.0478分列第37名；威海以综合指数达到47.3102分列第39名；淄博市以综合指数达到31.6033分列第48名；潍坊市以综合指数达到14.8181分列第65名。虽然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八市中除日照外都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但济、青、烟三个中心城市在全国的地位只分别列第13、21和30位，仍大大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二　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必要性

建设任何一个区域性城市群都要建设好一个龙头城市和两至三个中心城

市。因此，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青岛）、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南、青岛和烟台）的格局，真正使青岛市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龙头城市和东北亚的国际化城市，使济南市真正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西部和我国黄河下游和黄淮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使济、青两市尽快进入全国超大型城市的范围，使烟台成为第三个具有跨省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特大城市，使济、青、烟三市成为经济总量过3000亿元、具有跨省意义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就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崛起和建设的当务之急。

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快济、青两市的城市化步伐，通过新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园区建设等途径，使济、青两市市区常住人口由目前的200万人口左右发展到2020年的400万～500万左右，进入世界超大城市的范围，并使其经济总量尽快过3000亿元（济、青两市分别达到3000亿元经济总量的时间是2010年和2007年左右）；使青岛市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与由中日韩三国组成的环黄海经济圈接轨的国际性城市和经济龙头城市，到2010经济总量达到或接近4000亿元；使济南市真正成为山东省的政治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和山东半岛城市群西部的经济中心，成为黄河下游和黄淮海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使烟台市到2010年左右经济总量也过3000亿元、中心城区人口2020年达到200万～300万，使其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第三个有跨省辐射（主要是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东北亚地区）和带动作用的特大城市。

1. 济、青、烟金三角的形成，可以建立环黄海经济圈的跨国城市走廊

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青岛）、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南、青岛和烟台）的格局，就使山东半岛城市群有了成为中国经济板块和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带的基础；也有了同日本的下关—北九州—釜冈和韩国的仁川—汉城—釜山之间形成相对应的环黄海经济圈大金三角的城市骨架，形成跨国城市走廊的实力。中国之大，经济核心区不止一个。珠三角、长三角两个都市连绵区已经成型，其他的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山东半岛在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分工协作及促进南北协调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板块东北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带。济、青、烟金三角的形成，可以同形成环黄海经济圈金三角骨架的上述城市之间尽量开通其国际机场、航运等相互交流的航线，建立环黄海经济圈的跨国城市走廊。

如果扩大一点，适合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的跨国城市走廊应建立在环黄渤海经济圈基础上，即面向日韩的跨国城市走廊，主要包括：中国的青岛、济南、烟台、天津、大连、沈阳，朝鲜的平壤，韩国的汉城、釜山、仁川，日本的北九州、下关、山口、长崎。构筑了这一跨国城市走廊，实质是寻求一个资源配置的最佳地域范围，并在这个地域内寻求自然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产业的互补，加强产业间或价值链上的分工，从而构建一个更大的市场，取得规模效益，实现跨国城市走廊内各城市的多赢。跨国城市走廊的构筑，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息息相关。

2002年11月，我国提出中日韩三国适时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建议，得到了日韩两国的积极回应。2003年10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自由贸易区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由于有靠近韩国的良好地理区位，山东半岛城市群将是这个自由贸易区最大的受益者。

现在，青岛、烟台、威海等东部沿黄海城市与日韩两国已形成了一日生活圈。在韩国或日本工作，周末去烟台、青岛打高尔夫球已成为不少韩国人和日本人喜爱的休闲方式。韩国人周末乘飞机在烟台打高尔夫球比韩国还便宜2/3。在半岛这些城市，长住韩国人都在万人以上，韩国料理、韩语学校、韩语电台、日本的动画片、韩国的言情剧已成为这些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繁华的中日韩一日生活圈的形成其实是三国经济合作发展的结果，投资贸易的往来，带动生活的变化、文化的交流，这种趋势将会有增无减。

2. 龙头城市青岛市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了半岛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水平

山东半岛赶上长三角和珠三角要有许多因素的支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青岛能否形成带动整个半岛地区的强势龙头作用。这是因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相比，山东半岛的县和县级市与这些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差距，但作为半岛两大核心城市的济南和青岛，其自身经济实力的明显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长期群龙无首已经对半岛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继续下去，将会制约半岛城市群向都市连绵区发展演化的进程。青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功能使其更加适合担当半岛地区的龙头城市，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演化的必然。要在全省上下形成这样的共识：真正把青岛视为山东的青岛，视为山东半岛和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

三　建设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条件

目前，山东省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龙头城市（青岛）、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南、青岛和烟台）格局的条件已经具备。这里只从以下两个综合方面加以论述。

（一）青岛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对外经贸的龙头城市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青岛正在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历史性关键时期，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对外经贸的龙头城市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 *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很多方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标志着青岛市经济发展正在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03年青岛市经济已创造1996年以来第二个高增长速度，并出现了“五个快于”的良性变化，即：郊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市平均水平，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非国有投资快于全社会投资水平，轿车、住宅、通讯等新型消费增长快于社会平均消费，税收增长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青岛向超大型城市发展的空间框架已经拉开，城市特色明显显露出来，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趋势、素质和综合环境具备了向现代化国际大城市过渡的基础条件。2004年青岛市的GDP总量将超过2000亿元，其中市区GDP总量将超过1000亿元。

2. *青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进入高潮期，青岛处于承接日本、韩国产业转移的前沿。在国内，中央宏观调整政策为青岛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青岛市正在建设的若干重大项目绝大部分都在国家支持发展之列，我们选择的发展模式与中央的要求相吻合，例如中石化与山东省、青岛市合资兴建的1000万吨级的大炼油厂已经开工建设。从省内形势看，2004年8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在青岛召开了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与山东半岛城市群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建设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和半岛城市群要以青岛为龙头，青岛强则半岛强，半岛强则山东强，全省要一致支持青岛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城市。青岛正在步入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机遇期。

3. 山东半岛城市群由于在区位上更靠近韩日，近年来吸引外资已远远超过京津，青岛已成为目前韩国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城市，2003年青岛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超过北京和天津之和

2003年，天津合同利用外资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6.33亿美元；北京合同利用外资3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5亿美元。而2003年，山东省实际利用外资达110.3亿美元，其中，半岛城市群8市实际利用外资88.586亿美元。2003年仅青岛就合同利用外资8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0.1亿美元。这就是说，仅青岛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就超过天津和北京之和。山东省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也比京津冀3省市的总和53.43亿元多56.87亿元。

青岛已成为目前韩国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城市。到2004年初，已登记注册的韩国企业累计达到5500家左右，实际投资超过50亿美元，韩国投资在青岛对外开放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青岛跟汉城、釜山、大邱之间的飞机直接通航。而1994年最早在青岛开设的韩国总领事馆，为青岛后来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吸引韩国投资企业客观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4. 由于青岛港的区位更靠近国际主航道，2002年其集装箱运输量和外贸运输量已达天津港和大连港之和

2002年，青岛港的集装箱运量达到341万标准箱，基本上是天津港和大连港两大港的集装箱运量之和（2002年上述两港的集装箱运量分别为210万和121万标准箱）。青岛港在2002年外贸集装箱航线成功西移至前湾新港区和2003年中英荷三国四方合资签约建设青岛集装箱港的强力拉动下，集装箱生产实现了跳跃性发展，2003年青岛港吞吐量突破了1.4亿吨，接近于2002年山东省的海港吞吐总量，其中全年集装箱运量跨越420万标准箱。预计2004年能突破500万标箱。

5. 青岛市在培育海尔等大企业集团方面已具有了同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相竞争的实力

目前，海尔成为中国惟一的世界100个最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之一。2004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序前10家企业中，青岛的海尔集团居第一位，海信集团居第六位，说明青岛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另外，国家科技部近期下达的《2004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中，青岛市申报的57项新产品列入国家计划，入选项目数量列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一

位。在57项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中，海尔集团占11项，海信集团占5项，澳柯玛集团占4项，充分显示了大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力和自主开发新品能力。

（二）青岛、济南和烟台三城市正在形成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金三角结构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金三角城市格局已经基本成熟。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构建以青岛、济南和烟台三城市为核心的城市职能分工和产业协作体系，形成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金三角结构，这一格局目前已粗具规模。

（1）济、青、烟三市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过1000亿元，分别达到1200亿、1518亿和1115亿元人民币；2003年三市又更上一层楼，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367.8亿、1780.3亿和1316亿元，年均增长14.5%、15.8%、17.2%；三市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完成65亿元、120.1亿元、55.1亿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7.3%、23.9%、26.7%。这表明青岛的龙头地位正在凸现，济、青、烟三个增长极正在越来越强。

（2）三市的基础设施条件越来越强。青岛港已成为有50多条国际航线的国际性港口，2002年的集装箱运输量同天津和大连两港的运量总和大体相当。2003年集装箱运输量达到420万标箱，成为世界第13位集装箱港，2004年有望突破500万标箱。这使青岛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和国际化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济南市是有3000多公里的山东高速公路的枢纽和中心。正在施工的胶济铁路电气化工程2005年完工后，济、青两市只用2.5小时就能到达。京沪高速铁路和太原至青岛的快速客运专线的即将修建，使济南在黄淮海地区的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烟台市随着烟大铁路轮渡的开工建设和同三高速公路、胶新铁路的通车以及港口运输能力的不断扩大，也具有了跨区域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3）济南、青岛和烟台3个国际机场都开通了通向韩国和日本的航线，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飞机场，2002年三个机场的乘客分别达158.95万、321.99万和75.41万人。这使三市机场都有机会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八城市同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形成半岛城市群现代制造业带服务。最近几年，济南、青岛和烟台3个国际机场都进行了改扩建。青岛机场的跑道由原来的2600米延长至3400米，扩建了2.6万平方米的停车场、18万平方米的停机坪和6.4万平方米的候机楼；济南国际机场投资建设了一条3600米的新跑

道，目前正在进行机场改造，新建候机楼8万平方米，建成后年客运吞吐量将达1000万人次；烟台航空口岸扩建了4.2万平方米停车场，绿化面积达到42%，正在改扩建1.03万平方米国际候机楼、3.2万平方米停机坪、5个C类、1个D类停机位以及加宽滑行道、联络道等。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已确定，未来几年内，我国华东地区的机场建设将会有重大突破，形成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和福建东南沿海3个航空区域性重点。在进一步加快上海航空枢纽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快建设青岛——济南、杭州——南京、厦门——福州3个区域性航空运输板块以及相关区域性重点机场。

（4）济、青、烟三市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结构。青岛市的电子家电产业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当前，青岛加快形成以海尔、海信、澳柯玛、浪潮、朗讯、LG为核心企业的家电电子产业集群；以炼油、二甲苯、芳香烃和PVC为核心产品的石化产业集群；以轿车、轻重卡车、客车、公交车及车辆零部件为核心产品的汽车产业集群；以集装箱船、游艇、巡逻艇、摩托艇及船舶零部件为核心产品的造船产业集群；以港口运输、集装箱作业、现代物流、临港加工分拨、港务机械制造为核心行业的港口经济产业集群等五大集群。

通过中国重汽集团与瑞典VOLVO集团的全面合作，济南市正以一个在国内外竞争力愈来愈大的重型汽车产业集群著称于全世界。济南软件园也成为国内发展最快的国家级软件基地之一。济南钢铁、石油加工、机械、化学等传统工业通过技术改造，在国内外竞争力愈来愈大，为济南正在建成的信息、机电一体化和重型汽车研制基地起到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作用。中国重汽和济南钢铁两大集团2004年的销售收入都将超过200亿元。

烟台市已形成汽车、信息、黄金、食品工业的四大产业集群。2003年这四大产业实现其销售收入占到全市规模以上销售收入的3成以上，正在形成和提升烟台产业结构中新的产业集群。其中上海通用东岳轿车、浪潮－LG、招远黄金集团、张裕集团等大型企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国家批准的第11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恒丰银行，总行设在烟台，已在济南和青岛设立分行，该行计划在两三年内走出山东，到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行。

（5）济、青、烟的金三角型点轴结构带动了一大批中间的大中型城市迅速成长，例如在济青之间是由百年历史的胶济铁路培育起来的老经济带，沿途的四个地级市（济、淄、潍、青）都是国内生产总值过1000亿元的大

城市，这一轴线促进了淄博、潍坊、青州、高密、胶州等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在青、烟轴线上促进了威海、莱阳、莱西、文登、荣成、即墨等一群在胶东半岛颇具活力的城市的发展，在济烟轴线上促进了东营、寿光、莱州、龙口、蓬莱等一群在山东半岛颇具活力的城市的发展，从而使山东半岛城市群不断壮大。

（6）2004 年 9 月以来，随着山东半岛城市群济、青、烟三市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的逐渐确定，使三市及三市形成的金三角的国际化程度和在国内城市排行中的地位有了一个大的提高。

——在 11 月 2 日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发布的 2003 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排名中，济南市被排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第 13 名。本次综合实力进入前 10 位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南京、大连、杭州、沈阳、哈尔滨。本次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评比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对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地级）综合实力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估。它根据城市人口与劳动力、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环境等 5 个一级大指标、19 个二级子系统、50 个三级小指标体系综合评定，全面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2003 年，济南市成为我国 15 个人口超过 250 万、18 个地区（不含下辖县级市和县）生产总值超过了 1000 亿元的城市之一。

——2004 年 11 月 4 日，“2004CCTV 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选揭晓，青岛当选“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并获“企业家满意奖”（单项奖）。除青岛外，成都、大连、东莞、杭州、深圳、沈阳、苏州、温州和无锡也获得了“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奖。青岛拥有全国第三大港口、9 个全国驰名商标、31 种中国名牌产品以及全国 1/3 的海洋科研机构和 1/2 的海洋高科技人才。城市中国系列活动组委会认为，青岛是一个随时都能感受到品牌力量的城市，青岛诞生的品牌已经影响了中国，正在影响世界。这次评选范围不包括港澳台城市和直辖市。

——2004 年 9 月 18 日，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2004 年度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烟台市脱颖而出，成为 10 个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之一。广东东莞、福建泉州、云南大理、海南三亚、江苏昆山、四川都江堰、浙江绍兴、广西桂林、河南洛阳同时入选。参加本次评选活动的是除直辖市、行政特区、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外所有其他城市。评选魅力城市的标准包括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充满活力的经济、富有创造力的城市建设、优雅的城市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等 7 个方面。

参考文献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 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马传栋：《论全面提高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东岳论丛》2003年第3期。

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彭智敏　宋来胜

一　武汉城市圈的提出及范围

1. 武汉城市圈——痛苦与恰如其分的选择

武汉城市圈是个新名词，至今不过几年的时间，在国内有些影响并被大众知道的时间仅仅两年。它的提出一是与国内外当前都市圈、城市带发展迅速相适应，二是正确认识自己、从基础做起的恰当选择。

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有众多的人口——人口总数近800万，其中城区人口超过400万；武汉有极佳的位置——长江和汉江、京广铁路与汉（口）丹（江口）铁路、武（昌）九（江）铁路、京珠高速与沪蓉高速公路的交汇处，与我国东南西北四大中心城市沪穗渝京间的距离都在1000公里左右，优越的地位——国家长期的投资重点，1980年代初武汉的资产规模和经济总量仅次于京沪津三大直辖市，居全国第四位；武汉有安逸的环境——周边省份的郑州、长沙、南昌、合肥等与其有较大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对其中心地位构成威胁；武汉有悠久的历史——湖广总督衙门和中南局所在地是华中经济协作区的中心。这诸多因素让武汉长期以华中经济区、武汉经济区或者长江中游经济带的中心城市自居，高高在上。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先后超越了武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更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北上、西进，挤压、“蚕食”甚至“占领”武汉经济区的势力范围。不仅如此，周边省会城市也都在大踏步地前进，缩小了与武汉之间的差距。到了1990年代初期，武汉经济区不仅名称、形式上空，内容、范围也都成为了“空白”。进入21世纪，部分学者提出，武汉与其徒有虚名，不如放下架子，脚踏实

地从基础做起，与周边城市开展实质性的合作，重塑辉煌。2002年6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在省八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建设武汉城市圈，即发展建设以武汉为核心，包括周边100公里以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八市，逐步将其发展成内陆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

2. 范围及经济状况

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公里左右为半径，呈放射状分布的城市群，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等九个市。

武汉城市圈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圈内人口总数达3071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50.4%；面积5.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33%；2002年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达到2977.54亿元，占全省的59.1%；工商业主要指标占全省的5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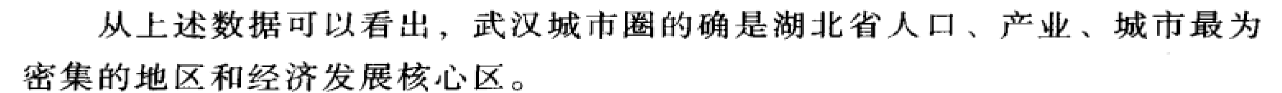
从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看，2002年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完成707.99亿元，占全省的59.05%。其中武汉市363.8亿元，占全省的30.34%，占城市圈的51.42%。其他8市在城市圈中所占比重依次是：孝感9.8%，黄石9.5%，黄冈9.1%，鄂州5.4%，仙桃4.7%，咸宁3.7%，潜江3.9%，天门2.6%。

从利税完成情况看，2002年武汉城市圈实现利税216.87亿元，占全省的57.93%。其中武汉市完成144.66亿元，占全省的38.64%，占城市圈的66.70%。

从利润完成情况看，2002年武汉城市圈实现利润85.86亿元，占全省的57.85%。其中武汉完成6.02亿元，占全省的40.58%，占城市圈的70.16%。

从技术改造投资情况看，2002年武汉城市圈完成210.58亿元，占全省的68.27%。其中武汉完成128.13亿元，占全省的41.54%，占城市圈的60.84%。

从贸易情况看，去年武汉城市圈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7.04亿元，占全省的61.73%。其中武汉市完成770亿元，占全省的35.02%，占城市圈的56.74%。其他8市社会零售额在城市圈中所占比重依次是：黄冈9.42%，孝感9.14%，黄石6.76%，仙桃4.51%，天门3.95%，咸宁3.85%，鄂州3.31%，潜江2.3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的确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和经济发展核心区。

更重要的是，武汉城市圈内的9座城市地理位置相邻，彼此之间特别是8座城市与武汉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换频繁，经济合作早就开展了。但由于行政区划等多方面的原因，没有正式提出武汉城市圈的概念。

二　发展基础与环境

1．基础设施一体化已初步形成

过去，近在咫尺的9座城市没有形成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相互之间的沟通存在一定难度。但经过这些年的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高等级、高标准的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电信把整个城市圈连接成为了一个畅通的有机体。目前，沪蓉高速公路和京珠高速公路汇合于武汉城市经济圈，形成了十字交通网状；318、107、317国道呈发散状通达各地；长江、汉水内河运输发达，京广铁路纵贯武汉城市经济圈；武汉天河机场为国家六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6座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是长江流域拥有跨长江大桥最多的经济区域；正在兴建的武汉阳逻长江大桥、武汉天兴洲长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和武汉长江隧道建成后，武汉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八纵八横"光缆干线5条通过武汉城市圈。这些内河运输系统、铁路系统以及航空港、信息港网络系统等构成了武汉城市经济圈紧密合作的前提。

2．武汉与周边8市分工定位发展，城市功能明确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武汉与周边8市的产业结构、城市功能没有得到统一规划，重复建设、盲目攀比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自武汉城市圈开始建设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正。目前，武汉市重点发展与中心城市聚集功能直接相关的金融业、交通通信业、商贸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业、科技文化等高级形态的第三产业和关联度、附加值较大的光电子信息，汽车、钢铁、机械设备、石油化工等制造业，以及都市型现代农业。周边8市在与武汉的总体关系上都确立了武汉的龙头地位，都确定了依托武汉、加快发展的思路。黄石定位发展为大武汉都市圈的次中心，武汉重工业的主要合作和配套基地；鄂州定位发展为大武汉的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工园、创业园之一；黄冈定位发展为大武汉的特色农业基地和现代中医药生产基地；孝感定

位发展为大武汉的制造业配套加工基地和“米袋子”；咸宁定位发展为大武汉的“后花园”及绿色产品基地；仙桃定位发展为大武汉的轻纺工业扩散基地和水产品供应基地；潜江定位发展为大武汉的化工基地和精品农业基地；天门定位发展为大武汉的棉纺、机械工业的配套基地和“菜篮子”。

3. 武汉城市经济圈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后劲

目前以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葛店新技术开发区为主，依托现有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科技优势和产业基础，连接鄂州、黄石和孝感，构建的“武汉·中国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群。2010年，电子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500亿元。以东风有限、神龙为主体，积极推进区域内汽车零配件企业重组和联合，形成具有武汉地缘优势的汽车及其零部件研究、制造、营销服务体系，力争经济圈2010年生产各型汽车70万辆。以武钢为龙头，以冶钢、鄂钢为骨干，推进钢铁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形成钢铁制造及深加工产业集群。

4. 城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达成共识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加入WTO，中国三大经济圈的迅猛发展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形成的经济运行的新环境，使得武汉城市经济圈内各市面临着相同的压力，产生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共同要求。武汉与周边8市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发展武汉城市经济圈经济一体化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有助于圈域内各市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有助于各市在更为广大的空间内调整产业结构，配置资源，是一种具有互补、互促、多赢效应的发展战略路径。

5. 政策环境有利于推进城市圈经济一体化

近年来，中央实施的整顿市场秩序、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武汉城市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政策环境。目前，武汉城市经济圈内各级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批有助于圈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这无疑为破解武汉城市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难题开启了大门。

三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瓶颈

1. 行政分割导致各自为政

由于武汉城市圈建设的时间很短，因此过去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现

在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如城市圈内各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缺乏特色；经济运行带有明显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受地方短期利益的驱动以及行政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圈内市场化程度不高，各城市的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市场准入、质量技术标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各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保护倾向，导致经济协调和沟通渠道不畅，缺乏紧密的圈域经济联系，没有从分工协作关系上考虑如何集合成一个整体参与经济竞争。

2. 行为扭曲导致过度竞争

圈域内各开发区陷入了招商引资的倾销式竞争之中，并以比照政策优惠的方式来吸引有限的外部资金。人为阻挠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异地投资企业实行双重税政策，严重影响了优势企业的跨地区迁移或兼并重组。

3. 重复投资导致产业结构趋同

各城市之间生产布局重复、产业同构、特点相似、职能相近现象较为突出。在武汉城市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也相当明显。如此的趋同化倾向，不仅使武汉城市经济圈的整理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了限制，而且也减弱了该区域抗全国性经济波动的能力。

4. 龙头辐射作用还不强

以 2002 年为例，从武汉对全省其他城市的投资来看，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其数量排名在温州等外省城市之后。不过这也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关。武汉要加强与省内兄弟城市的联系，协调与其兄弟城市的关系，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圈内一体化，为经济圈今后的扩展打下基础。虽然武汉近几年在这方面有所加强，各商业企业已经开始对周边城市扩展，可要达到城市圈内各个城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 圈域交通、通信网络体系有空白

由于长期的各自为政，武汉城市经济圈内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虽然总体规模很大，网络内部联系比较顺畅，但城市之间的连接处则由于缺乏统筹，导致大网络设施不对接、功能不完善。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谁都懂，许多地方都把修路当成振兴地方经济的第一抓手。可是长期以来，大家各修门前路，超过边界一米也不多修，毕竟“花的都是自己的财政收入”。于是，城与城之间，总有一段“爹不亲娘不爱”的断头路和瓶颈路，被车辆和行人视为畏途。城际高等级公路纵通横不通，周边八市与武汉的联系虽已

基本实现高速化，但相互之间的高速联通大多需绕道武汉；圈域内的信息网络尚未完成互联互通，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开发明显缺乏平台支撑。

四 加快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策

1. 加强统一规划，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这也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个一体化”之一。建设武汉城市经济圈，首要任务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交通设施的高速化和网络化建设，并充分发挥武汉承东联西的区位优势，提升武汉的集聚、辐射功能，为整个城市圈经济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完善公路网。加快武汉公路主枢纽的建设，重点完成武汉中环线向外辐射的出口高速公路的环线放射状路网，加快圈域内城市间的高速公路建设，完成各城市所辖县、市之间的高等级干线公路的改造，形成公路网络化、客运便捷化的公路运输体系。第二，完善水运网。充分利用天然河流的有利条件，在现有工程设施的基础上，继续实施必要的航道治理工程，形成以长江、汉江为主通道，并沟通其他主要通航支流的支干联网的区域航道网；加强专业化码头建设（如集装箱码头），大幅度提高港口的机械化水平；加大运输船舶更新改造的力度，大力发展江海直达运输、汽车滚装运输、液化石油及沥青等特种运输。第三，提升铁路网。重点完善既有铁路干线，提高既有铁路的装备水平，加快既有干线铁路全面提速及加快高速铁路和客运专线的建设，推动铁路支线、专用线的配套建设，形成以高速铁路为主骨、快速线路为构架、普通线路为分支的铁路运输体系，增加武汉城市经济圈发展的铁路辐射能力。第四，提升航空港。加快天河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建设步伐，增加省内各机场间及其至全国旅游城市的航班密度，开辟国际航线，进一步提升武汉航空中心枢纽地位。第五，加快建设信息网。跨越式发展邮电通信和信息网络，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城市经济圈共同的金融、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信息系统，积极推进教育科研信息化进程，规划和建设城市经济圈公用信息交换平台，大力推动经济圈企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和公共领域信息化的建设。

2. 集聚产业群，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

产业布局一体化是城市圈成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

纽带，以延伸产业链为主线，优化资源配置，重点培育，壮大一批既具有本城市圈特色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群。①依托“武汉·中国光谷”，整合东湖高新区、武汉经济技术区、葛店高新区等园区的产业资源，连接鄂州、黄石、孝感三市，培育、壮大武汉城市经济圈光电子信息产业群，做强“中国光谷”品牌。②依托“武汉·中国汽车城”，整合武汉、孝感、黄冈三市的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武汉城市经济圈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产业群，做强“中国·汽车城”品牌。③依托武钢、鄂钢和冶钢，整合武汉、鄂州、黄石三市的钢铁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武汉城市经济圈钢铁产业群。④依托“中国药谷”品牌，整合武汉、潜江、鄂州、黄冈四市的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武汉城市经济圈生物工程及医药产业群，放大“药谷”品牌效应。⑤依托“汉派”服饰品牌效应，整合武汉、黄石、鄂州三市的产业资源，培育、壮大武汉城市经济圈纺织服饰产业群，放大“汉派”服饰品牌效应。

3. 加快共同市场建设，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

市场一体化是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为此，必须加强规划协调，打造现代物流产业；以资本、技术、信息、产权和人才等要素市场建设为重点，加快以武汉为中心的共同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流通业态的转变。

第一，建设和完善金融市场。充分发挥武汉金融服务辐射功能，打破武汉市及8个二级城市之间金融市场方面人为设置的各种界限，形成城市经济圈内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金融资源在圈域内自由、快速流动及合理、高速配置。第二，建设全国性的粮食、棉花、油脂大型工业中心批发市场，巩固发展一批全国性、城市圈的大型工业批发市场，形成3～5个交易额过百亿、现代化管理程度较高的消费品市场。第三，进一步发展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优化整合城市经济圈人力资源，构筑人力资源共享平台。第四，加强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整合各城市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以武汉产权交易中心为主体的覆盖城市经济圈的产权统一交易市场。第五，发展区域一体化的技术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建设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城市经济圈技术创新能力。第六，加强法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进一步加强政企分开的工作，坚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4. 建立完善协调机构，实现运作机制的市场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圈的建设主要应依靠市场的力量，因此，必须坚持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原则，努力实现运作机制的市场

化。①建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对城市经济圈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探索组建武汉城市经济圈合作发展委员会，负责重大问题的研究、协调、规划。②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组建武汉城市经济圈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行业规划、协调、交流、咨询等服务职能，组织区域内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③建立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方案。通过统一的规划，指导各地产业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同时解决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努力形成区域内的共同利益机制，使各地利益的实现真正建立在做大整个蛋糕的基础之上。

5. 优先发展龙头，带动龙身和龙尾

武汉城市圈又称为“1+8”。显然，这个“1”居于核心地位。近年出现的“总部现象”，显示出武汉强大的经济集聚能力。2003年9月28日，东风公司总部新址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此举被认为是武汉经济建设里程碑式的大事，标志着武汉制造业发展跃上新台阶，对于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前后，全国最大的水电施工企业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潜江制药、江钻股份有限公司、肯德基、麦当劳、麦德龙等国内外行业领头企业，也纷纷将区域总部或总部设在武汉。我国最大的合资企业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和东风本田也先后落户武汉。

有人担忧，武汉在湖北“一城独大”，与周边城市落差明显，会不会成为城际融合的障碍。省委书记俞正声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压制武汉发展，相反还要全力支持武汉发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武汉的龙头作用，带动周边和湖北的整体发展。

当然，城市圈的核心，不仅要能“聚”，而且要能“散”，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辐射到周边城市，形成密切配套、上下延伸的产业链条。现在，武汉城市圈内，以大企业、大项目为依托，武汉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对接正在多个层面展开：烟草行业，武烟集团已在孝感、咸宁、黄冈乃至全省范围内实行兼并重组，全省卷烟产能分散、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钢铁行业，武钢与鄂钢联手，并在大冶和黄石陆续建成大型球团矿生产基地；纺织行业，武汉一棉集团在沙洋兴建企业，红人集团在孝感投资8000万元建设服装出口加工基地；生物医药行业，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春天药业等民营企业相继进入鄂州葛店经济开发区。

这样，“1+8”的后面，不仅是龙头高扬，而且龙身和龙尾处处彰显活力，整个武汉城市圈有望发展成为上下联动、分工合作、协调发展我国中部及内陆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圈和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张兆安:《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正当其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 年第 5 期。

武汉市人民政府课题组:《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问题研究》,《武汉经济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吴传清、李洁、罗银航:《武汉城市经济圈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对策研究》,《武汉经济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加快城市圈建设促进跨越式发展——“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研讨会”发言摘登》,2003 年 11 月 11 日《湖北日报》。

钟惟:《湖北九城圈的路网瓶颈》,2002 年 12 月 2 日《经济观察报》。

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福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伍长南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产业领域具有相互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发展，并形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通过产业与区域的有机结合，提高产业生产率，从而在一定范围（如区域、国家或国际）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以其较强的产业竞争优势，促进区域企业发展，提升区域系统创新能力。因此，产业集群是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一　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态势

自 2002 年始，福建省着手培育、发展产业集群。到 2004 年 10 月，海峡西岸经济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约 60 个，工业总产值达 3000 亿元以上，占海峡西岸经济区工业总产值的 60% 以上。

（一）全省层面：重点培育三大主导产业集群

为培育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解决产业集中度偏低、主导产业规模偏小等问题，从 2004 年开始，海峡西岸经济区将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三大主导产业为主体，培育具有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的产业集群；计划用 3 年时间重点扶持、培育 30 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各区市着重培育一批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产业集群，各市县着力培育若干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集群。从全省层面看，重点培育的三大产业集群具体为：

（1）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保持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长态势，凸显福州—厦门市沿海地区电子信息带产业集群优势。

（2）机械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汽车、船舶和工程机械制造业，突显东南汽车、金龙客车品牌优势，建设东南沿海重要的汽车制造业基地；加快戴—克项目建设，实现批量生产；加快闽台合资华擎发动机项目建设；重点推进福州青口汽车生产基地、厦门造修船基地等基地建设。

（3）石化产业集群：围绕炼化一体化项目，重点加快湄州湾、海沧石化工业基地、莆田临港化工园区、福州江阴化工工业区等基地建设。

（二）沿海经济密集区层面：重点培育区域性产业集群

1．福州市产业集群

（1）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了以福州市区、马尾开发区、福清融侨开发区三足鼎立的格局，全省确立的4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福州市占了3个。2003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330亿元，占全省比重达37.6%。2003年显像管、显示器两大主导产品产量分别为1586万只、1552万台，均占全国同类产品首位，为福厦电子信息产业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系以冠捷电子公司为龙头，以华映光电公司为核心，形成在全国独具特色的显示器及其配件产品产业集群。其中，华映光电公司生产的显像管主要为冠捷电子公司显示器提供配套，冠捷电子公司生产的显示器为国内外计算机公司提供配套。此外，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还有华科、福日、实达、新大陆等公司。2003年福州市以显像管、显示器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含配件）销售额290亿元，其中显像管产业集群销售额约60亿元。

（2）汽车制造产业集群。①培育壮大青口汽车城。自引进东南汽车主机厂后，带动了一大批协作、配套企业投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配套产业链。目前，东南汽车公司的配套企业已由首批27家发展到103家，2004年初又有24家汽车协作厂签约，一批配套企业进行大规模增资、裂变，增资额是最初投资额的2~3倍以上，促进中、下游配套企业在青口集聚，东南汽车产业链产值已达150亿元。②延伸产业链，做强汽车产业。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是指汽车主要的总成、零部件不仅要国产化，更要实现地产化，车身、车桥、车架、发动机甚至内饰件等，都要实现本地化生产。目前，东南汽车

公司在经历两岸合作后，正逐步向国际市场合作转化，而引进戴——克项目、华擎发动机项目，将使青口汽车城产业规模继续扩大，功能更加完备，产业链更加延伸，最终形成完整的汽车产业集群。伴随着戴—克项目的引进，台湾华擎发动机项目也已加盟，为青口汽车城注入了新的活力。戴—克、华擎项目投资后，将会吸引更多的配套企业跟进，预计到2008年配套企业将达250家，青口汽车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1000亿元，占福州市工业总产值的1/5。

（3）软件产业集群。福州软件园是国家科技部批准的软件产业基地之一，自1999年投入建设以来发展迅速，到2003年底入园企业达200多家，入驻企业逾百家，其中年产值超亿元以上的有5家，超千万元以上13家。2003年园区企业实现技工贸总收入23.7亿元，比2002年增长116%；实现税收1.66亿元，比2002年增长308%；软件园产值占全省软件产业总产值的60%以上。福州软件园已入驻的企业主要有：榕基、宏智、吉通、网讯公司，成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软件产业步入快速成长期，从事软件开发、推广、应用及服务的企业增加，登记的软件产品360个，软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其中8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企业14家，通过ISO9000认证的企业16家，有4家企业即宏智科技、榕基软件、顶点软件、富士通软件公司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的重点软件企业。

为促进台湾软件产业转移，福州软件园设立了海峡两岸软件合作示范基地。目前已有16家台湾软件企业入驻，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势重组，在网络通信应用软件和系统集成等方面形成自主核心技术体系，在网络终端和网络通信领域培养一批独具特色的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

（4）纺织产业集群。近年来，长乐市抓住纺织工业发展的新机遇，加快民营纺织工业的发展，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截止到2003年度，长乐市有各类纺织企业772家，实现纺织工业总产值103.6亿元，比2002年增长41.3%，提前实现了百亿“纺织城”目标，初步形成了一条原材料（棉纺、化纤）—织造业（经编、纬编、机织）—印染业—服装服饰业的产业链。其中，棉纺业已达130万纱锭规模，居全省首位；化纤年产量17万吨，居全省第二位；经编业产量占全国的1/5。目前，以松下、潭头、凤阳为主的染整产业集群，以峡漳路沿线为主的化纤产业集群，以鹤上、两港工业区为主的棉纺产业集群，以金峰中心区、垅下工业区为主的经编、服装产业集

群已初步形成。

2. 厦门市产业集群

厦门市工业产业以外商投资为主体，在全市1400亿元工业总产值中，以电子、机械、化工三大主导产业为主，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的79%，形成了戴尔、翔鹭、厦工、厦华、夏新、金龙、柯达等一批骨干企业。

（1）电子信息产业集群。2003年厦门市电子信息产业企业200多家，其中进入全国电子百强企业2家，进入全国三资电子百强企业5家，进入全国电子元器件百强企业4家。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5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主要产品有：数字电视、传真机、汽车音响、显示器、电话机、激光视盘机、变压器、电容器、IC引线框架、继电器、光电器件等，拥有厦华、厦新、戴尔、松下、TDK等知名企业。

厦门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是做大做强产业规模，实施“戴尔带动”计算机主机战略，实现公司在设计、主机组装和全球营销主体向厦门市转移；实施“培育品牌、壮大规模、逐步延伸”的手机战略，培育国内知名品牌；实施“技术创新、市场带动、依托周边、做大做强”的视听产品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目标是：到2005年实现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1200亿元，年均增长32.83%，占工业总产值比重55%以上，实现销售收入800亿元。

（2）石化产业集群。厦门海沧石化基地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点规划的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已纳入国家石化产业发展规划中，重点发展芳烃系列产品及塑料制品。据统计，2002年海沧区化工产业总产值达73.89亿元，占该区工业总产值的50%。预计到2005年可实现产值160亿元。

厦门市已建成世界级彩色相纸、胶卷生产基地；建成在全国和东南亚市场上拥有相当份额的橡胶轮胎企业；建立了全球单系列最大的PTA生产线、全国聚酯生产和研发基地；产品涉及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化肥、涤纶化纤、感光化学品、橡胶制品、精细化工品等。石化产业主要企业有翔鹭化纤、翔鹭石化、华亚PVC管材管件、明达塑胶、正新轮胎、柯达感光公司等。翔鹭芳烃项目已得到批准并启动建设。海沧区石化产业将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石化产业链。

（3）机械冶金产业集群。目前，厦门市机械冶金工业企业180余户，在工程机械、配电设备、大中型客车、钨制品加工、飞机维修等领域确立了在

全国同行业的优势地位，拥有ABB真空开关及中压开关柜、ABB空气断路器及低压开关柜、LINDE静压传动叉车、金鹭牌仲钨酸铵及蓝色氧化钨、金鹭牌钨粉、碳化钨粉、钨丝、厦工牌装载机、金龙牌大中型客车、达顺牌双零铝箔等知名企业和产品品牌。厦门航空工业区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大型商用飞机维修基地。

3. 泉州市产业集群

泉州市所辖各县（市、区）形成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如晋江的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石狮的纺织服装；南安的石材加工、水暖、消防器材；安溪的乌龙茶、竹藤工艺等。2003年泉州市民营工业企业4.2万家，年产值2054亿元，税收50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000多家，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185家。

目前，泉州市块状经济粗具规模，在全市25个块状经济中，工业总产值超百亿元以上的有6个，即石化、纺织、服装、鞋业、石材、机械产业，如服装产业产值352亿元，建材产业产值278亿元，石化产业产值230亿元，鞋业产业产值219亿元，纺织产业产值139亿元，机械产业产值115亿元，食品饮料产业产值101亿元。其他块状经济为：建筑陶瓷产业、水暖器材产业、电子产业、工艺陶瓷产业、石雕产业、树脂产业、玩具产业、竹藤产业、包袋产业、纸业产业、伞业产业、家具产业、糖饼产业、文体用品产业、饮料产业、茶业产业、水产品加工产业、芦柑产业、花卉产业等。这些产业也分别达几十亿元规模。

在泉州市块状经济发展中，一批“国”字产业的崛起，成为支撑泉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泉港区——崛起中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丰泽区——中国树脂工艺之乡；晋江市——中国鞋都；石狮市——中国服装名城；南安市——中国建材之乡；惠安县——中国石雕之乡等，据统计，这些“国”字号块状经济群落，已占泉州市经济总量的80%，是泉州市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力。

泉州市块状经济发展目标是：到2005年25个产业总产值超过2500亿元。为此，泉州市将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以块状经济集聚生产力，形成辐射力，增强竞争力，提升发展平台，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块状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延伸块状经济产业链。通过向上下游产品或辅料业发展，拓展产业链，在分工协作、专业生产、相互配套上做文章，从而在一定区域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增强服装业、鞋业等产业竞争力；二是抓好产业、企业向园区集聚。

通过工业园区的整合，在新建工业园区内，规划不同的产业园区，引导同类产业、企业的相对集聚。同时，在泉州市分别建立研发中心、市场中心和展示中心，面向众多中小企业，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以及技术、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产品知名度。

4. 漳州市产业集群

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漳州市着力延伸产业链，推动专业市场与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近年来，漳州市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石英钟表、雨伞、钢木家具、建材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为主，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工业园区聚集、名牌产品延伸等手段，引导片状经济向链群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

（1）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以紫山集团、统一食品、锦溪集团、闽兴集团及东海、南海、海魁、益龙等企业为龙头，充分挖掘农业、水产品资源优势，扩大罐头、饼干、饮料、果蔬、鱼糜制品和粮食、饲料品种和产量，带动制罐、制瓶业、包装业、仓储运输业和农作物品种升级换代。目前漳州市食品工业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在全省占有重要位置。2003 年水产品加工厂（场）499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1 家，省市级龙头企业 13 家，有 10 多个水产品获得无公害产品使用权或地方品牌称号，以水产品加工与流通为骨干的二、三产业产值达 400.2 亿元。

（2）机械制造产业集群。以龙轴集团、力佳集团、红旗集团、诺尔港机、永大钢铁集团、国安造船、神州造船、新恒辉钢艺和台资仿园集团、彰亿股份为龙头，提升机械制造业发展水平，带动冶金、港机、材料、模具、注塑等产业的发展。机械制造业发展重点企业是培植主导产品，在农机具专用设备、包装器材、汽车（摩托车）配件、关节轴承、针织机、钢塑和不锈钢板材等六个方面形成一批企业集团和拳头产品。目前，漳州市机械加工产业还有石英钟、钢木家具等特色产业。

5. 莆田市产业集群

（1）电子产品产业集群。莆田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点培育的电子信息产业三大基地之一。该园区已有 12 家重点骨干企业建立了技术开发中心，相继引进生产 STN 系列液晶显示器的德荣电子、制造光电产品的华光电子、生产新型电子元件的冠顺电子、生产双面线路板的佳宜电子、生产钽电容的华达电子等 8 家高新企业落户，形成以台湾通讯和新威电子为骨干的现代通讯产业群，以德基电子和德荣电子为骨干的电子信息产业

群，以新智电子和安特半导体为骨干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其中，电子表产量占全球的30%，通用型电子计算器占全球的70%。2003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总产值40.8亿元，比2002年增长36.5%，预计至2005年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可达百亿元。

（2）鞋革产业集群。鞋革是莆田市的主导产业之一，荔城区、涵江区是莆田市制鞋产业的重要工业区域。2003年荔城区有规模工业企业116家，其中，鞋革企业78家，完成鞋业产值27.2亿元。涵江区规模以上鞋革企业预计产值40亿元，新增12条冷粘鞋生产线，促进产业朝规模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化。

6. 宁德市产业集群

（1）电机产业集群。20世纪80年代初，宁德福安市电机产业从用锤子加螺丝刀生产电风扇、鼓风机，到如今电机产品已出口到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小打小闹发展到强强联合，其中，产业集群链在电机产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福安市有电机生产企业638家，其中，有13家企业被国家确定为“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主要生产企业有大地、安波、万达、德丰、嘉华公司等。200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3%。其中，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有9家，产值超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家，产值超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70家。电机产业主要产品有电动机、发电机、水泵等200多个系列、1000多个品种，产品95%以上出口中东、东南亚、欧美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机产品出口量占全国的1/3，成为中国县级市中电机产量最大的县市。

为了加快福安市电机产业集群的发展，福安市组建了恒实担保有限公司（由政府出资560万元，吸收企业资金520万元），在银企中架设一座担保、贷款的金桥，目前已累计为80多家民营电机电器企业提供担保贷款10.18亿元，为电机电器制造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福安市电机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到2006年电机电器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实现百亿电机城发展目标。

（2）船舶产业集群。船舶工业是宁德市的传统产业，主要集中在福安市赛江沿岸。近年来，船舶工业通过技术改造、引进新技术、新工艺，现已具备制造万吨轮船的生产能力。2002年福安市船舶修造业实现产值13亿元，比2001年增长15%。为了加快民营船舶修造企业的发展，福安市组建了恒顺担保公司，为船舶修造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力争通过3～4年的努力，把

福安市建设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船舶修、造、拆的重要基地及船舶交易市场。

(3) 石板材产业集群。花岗岩是宁德市最具优势的非金属矿，主要品种有花岗石、玄武岩、辉绿岩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福鼎白琳镇“福鼎黑”玄武岩、宁德虎贝“丁香紫”花岗石、古田鹤塘“桃花红”花岗石、屏南“芝麻黑”等5个产品，被列入国家级天然石材首批国家标准基地。

福鼎市白琳镇玄武岩矿区总储量5000万立方米，被誉为玄武岩之乡，是中国十大石材出口基地之一。目前，在白琳镇金山工业区内从事石板材加工的企业达326家。其中，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30家，产值上千万元以上的企业6家，产品以出口为主。

(三) 内地经济发展区层面：重点培育区域性产业集群

1. 南平市产业集群

(1) 电缆产业集群。南平市电线电缆产业发展历史悠久，1998年后，借全国电网改造机遇，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目前，南平市电线电缆企业达44家，仅延平区就有20多家。其中，产值上亿元的企业有太阳电缆、南线电缆、三红电缆等3家。2003年规模以上电线电缆企业实现产值8.29亿元，占中心城市规模工业的比重为11.05%，其中太阳电缆公司2003年完成产值5.3亿元，省内市场占有率30%以上。在“太阳”电缆公司龙头效应带动下，南平市规模以上线缆企业已发展到8家，成为福建省电线电缆业的生产中心，产业聚集效应初步形成。

(2)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南平市现有纺织服装企业2034家，2003年总产值10.06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产值8.83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5.6%，占全省同行业比重为1.1%。目前，南平市已初步形成了纺纱—织布—染整—合成革和针织—染整—成衣两条纺织服装产业链。重点企业有南纺、金月、新华安、邵武和丰公司等。特色产品有：PU革基布、印染布、童装等。其中，南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PU革基布生产企业，综合经济效益连续多年名列全国同行业前列，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以上；新华安公司已成为全省知名针纺童装生产企业，产品远销海内外。

(3) 化工生物产业集群。南平市现有化工与生物医药生产企业350家，2003年总产值26.17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4家，完成产值21.96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4%，在全省同行业中占8.9%，已初步形成合成氨、硝铵、草酸、白炭黑、氢氟酸、活性炭、味精、香料等为特色的精细化工行业体系，生物制药、保健品生产也粗具规模。

（4）林竹加工产业集群。南平市有丰富的林业资源，现有林业用地3259.3亩，占辖区总面积的82.58%，林竹加工企业235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6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20%，形成了以木材采伐为主的森工采运业，以木竹为原料的制浆造纸业，以锯材和人造板为主木竹加工产业体系。其中，制浆造纸企业3家，年生产能力40万吨；人造板企业63家，年生产能力64万立方米；细木工板年生产能力20万立方米，竹木地板年生产能力100万平方米，竹胶板年生产能力4.5万立方米。重点企业有：南纸、邵武中竹、邵武沪千人造板、南平佳成竹木、南平延发竹木等，主要产品有新闻纸、纸浆、纸制品、装饰板、竹木胶合板、竹木地板、竹凉席、竹木筷、家具、工艺品等。

2. 三明市产业集群

（1）冶金工业产业集群。冶金及压延工业是三明市的传统优势产业，现有规模以上企业32家，2003年实现利润11亿元，在三明市工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培育三明市冶金及压延产业集群方面，必须把三钢（集团）公司等龙头企业发展置于战略先行地位，重点抓好三钢公司品种结构调整和区域调整、大田汤泉铁矿年产5万吨冷固结球回转窑直接还原铁项目。

（2）机械工业产业集群。三明市机械加工企业190余家，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有31家，机械工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产业规模，近几年产值以30%以上的速度发展，拥有厦工三重、华橡自控等一批在省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骨干企业。在培育机械产业集群方面，要以路面工程机械、橡塑机械、机械基础件为主，培育具有产业基础、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产业，增强机械工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3）林产加工产业集群。林产加工业是三明市的特色产业，具有加快发展的条件和优势。2003年三明市规模以上林产加工企业实现产值44亿元，但林产加工产品结构较单一，附加值低，如全市林产加工企业主要以科技含量较低的胶合板、刨花板为主，生产中密度板、高档家具的企业少。在培育林产加工产业集群方面，要大力扶持龙头企业，重点以青纸、永安林业、滕荣达、铙山纸业集团等企业为龙头，大力发展林木深加工，减少木材原料直接外销，实现林产加工增值。

3. 龙岩市产业集群

（1）冶金产业集群。以紫金矿业公司、卓鹰制铁有限公司、马坑矿业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为主体，2003 年紫金矿业公司黄金产量超 10 吨，营业额超 10 亿元，净利润 3 亿多元。

（2）建材产业集群。目前已涌现出三德、紫金、麒麟等一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2002 年以来在全面淘汰 4 万吨以下小水泥厂的同时，投入巨资加大水泥企业技术改造，既提高了石灰石资源利用率，又大大降低了对大气的污染。目前全市有水泥生产企业 120 多家，年产水泥 800 多万吨，占全省水泥实际产量的 40%。

（3）纺织产业集群。以佳丽公司、喜鹊公司等企业为骨干和长汀纺织城为重点的纺织产业集群如长汀纺织产业群，现有生产企业 110 多家，年产值 67 亿元。

三　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布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区域、城乡、产业发展的原则，把培育产业集群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布局，实现区域、产业的协调与互动发展（见图 1）。

1. 依托中心城市，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

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可分为沿海经济密集区、内地经济发展区中心城市，其中，前者主要包括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宁德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密集区。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竞争，在做大产业集群规模的同时，重点是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后者包括三明、南平、龙岩市，重点是发展资源型与非资源型产业集群，做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推进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

2. 依托沿海港口，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

以海峡西岸优良的天然良港为依托，发展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空间布局上，以福、厦、泉为重点，向北、向南延伸，形成自北向南包括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一线的沿海产业集群。沿海产业集群要充分发挥港口、岸线、开放、区位等优势，加快临港重化工业、机械工业、电子信息、船舶工业的发展，形成海峡西岸产业集群密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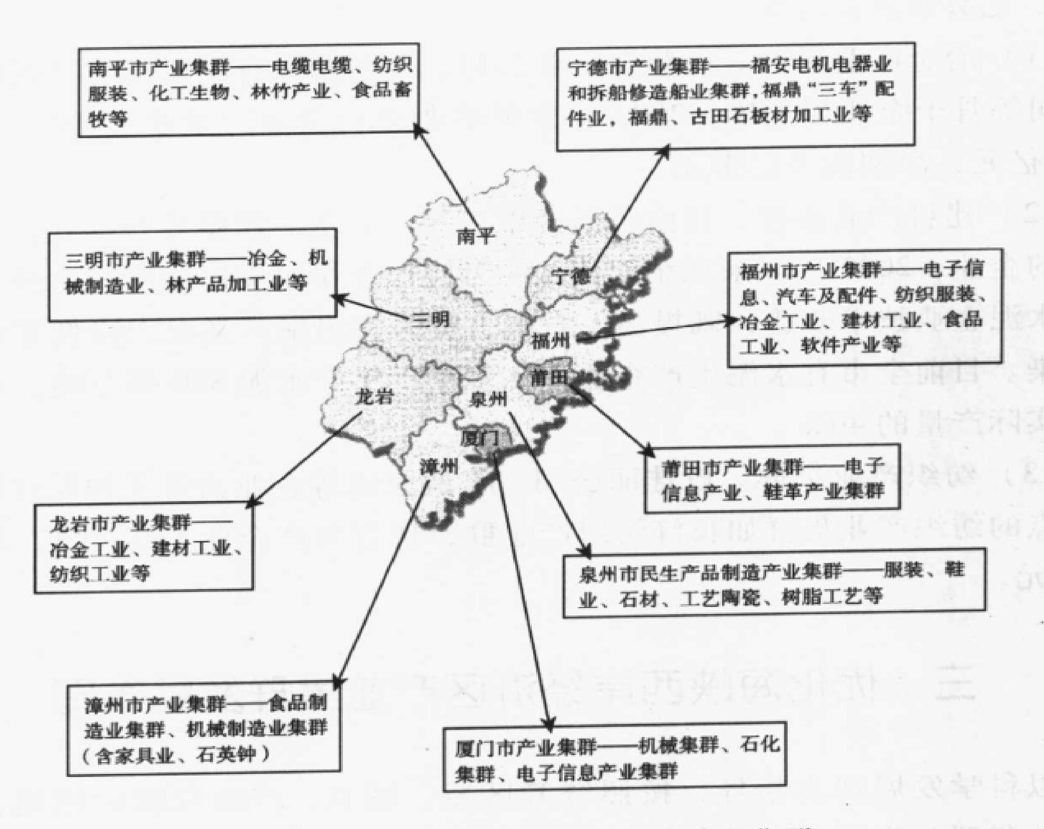


图1　海峡西岸经济区9个设区市产业集群

3. 依托交通干线，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

一是同三、京福高速公路沿线产业集群。这两条高速公路贯通海峡西岸经济区主要的设区市要以构建沿海经济带、山海产业联动带为契机，加快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并向南平、三明、龙岩等地延伸，大力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特色优势的产业集群，促进山海联动开发、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同三高速公路向北、向南延伸的优势，将宁德—福鼎—温州沿线建成闽浙产业对接带，加快宁德电机电器产业集群、船舶修造产业集群、汽摩配件产业集群、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医药石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将漳州—诏安—汕头沿线建成闽粤产业对接带，重点食品加工与食品制造业产业集群、家具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钢铁产业集群。

二是“厦—赣”、“福—昌”沿线产业集群。“厦—赣”沿线即“厦门—龙岩—长汀—赣州”公路沿线，“福—昌”沿线即“福州—南平—邵武—南

昌”沿线。前者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矿业产业集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集群、水泥产业集群、林产加工产业集群和纺织产业集群；后者重点发展壮大工艺品产业集群、民用陶瓷产业集群、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业集群、针织产业集群、化学工业产业集群、林竹工业产业集群和食品畜牧产业集群。

此外，加快“宁德—浦城—九江”沿线和“泉州—三明—宁化—石城”沿线产业的发展，加快培育石材加工产业集群、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 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培育制造业增长极，壮大区域产业规模

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与山区工业发展条件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必须通过培育工业增长极，让更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加快发展，进而带动其他地区工业发展。从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结构看，处于第一层面的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三大产业结构平均为10.12:49.45:40.43。其中，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的仅有厦门市和泉州市，分别为55.7%和52.8%，其他地市第二产业比重都在50%以下。其中，宁德市、南平市所占比重均低于40%，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龙岩市、三明市所占比重为40%，刚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因此，从海峡西岸经济区工业发展条件看，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和若干交通沿线地区更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一是要加快三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产业整合，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工业发展的“三大簇群”，进而以福州簇群辐射南平市、宁德市，形成沿闽江流域和闽东北地区工业发展极。以厦门簇群辐射漳州、龙岩市，形成沿九龙江流域和闽东南地区工业发展极；以泉州簇群辐射莆田、三明市，形成闽中地区工业发展极；二是加快高速公路、铁路沿线工业带建设，形成同三、京福高速公路和赣龙、梅坎铁路沿线制造业经济增长极；交通沿线区域要主动接受“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成为两大三角洲产业转移的“盆地”；三是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交通网络建设，尤其要加快漳龙、泉三等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制造业逐步向山区转移，构筑海峡西岸经济区山海协作通道。

（二）突破区位约束，加快产业集群对接

海峡西岸经济区工业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如何实现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在招商引资中要以大型投资项目、大型企业为突破口，按照“抢占上游、巩固中游、谋取终端”的思路，实现产业与企业集聚，垒大区域经济总量。

一是推进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三大主导产业的重点企业以外商投资为主体，凡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的产业，内资企业的市场空间明显萎缩，外资企业对国有、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特征极其明显。为此，要转变竞争策略，推进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对接，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转变为关联效应，内资企业要转变观念，发挥中小型企业的优势，走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道路，主动对接外资企业，接受外资企业产品配套订单，纳入外资企业产业分工协作链中。同时，在若干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周围，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园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增强内外资企业竞争力，降低市场经营风险。

二是推进沿海地区与内陆山区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与山区发展差距日趋扩大，加快山区经济发展，除了继续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等输血措施外，更应营造山海产业对接机制：①加快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向山区转移，营造海峡西岸经济区传统产业的发展腹地；②加快山区与沿海地区制造产业对接，形成电子信息、机械产业配套型协作关系。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与山区的产业、企业对接，要改变重行政推动、对口帮扶，轻市场推动、产业培育的观念，依靠市场力量促进沿海地区资源型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山区的有序转移。

三是推进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对接，重点是承接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产业转移。①培育区域主导和重点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产业集聚能力，吸引区域外产业和企业的转移和集聚；②以漳州、宁德市为突破口，把闽南、闽东部分工业园区作为承接两大经济区产业转移基地，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③增强外引内联吸引力，改变“重外轻内”观念，坚持外引与内联并重，要以“猫论”看待内外资，把吸收省外资金视同吸收外资；改变考核外资为内外资同等考核，在投资审批的前置程序、办事效率、税费、土地使用费等方面，使内外资企业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



（三）延伸产业链，构建产业集群分工协作体系

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区域产业集中度高，企业组织形式以“核心能力+产品外包”为主，众多企业围绕着产业分工形成“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这种深度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使众多小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专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能把零部件质量做得最精、批量做得最大、成本做得最低。要提高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竞争力，应形成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各类工业园区不应成为同类产业企业的简单扎堆，而应形成产业分工的经营协作体系；各类产业中的重点企业（大型企业和名牌产品生产企业）应担当起产业发展的“龙头”，强化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各中小企业要正视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主动担当配角，改变“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和追求自创品牌、独立经营、不愿当配角的观念，促进大中小型企业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调整研究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高新才　滕堂伟　郭爱君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西部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在国家一系列倾斜政策和大规模的投资带动下，西部地区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由于五年来西部大开发主要着眼于打基础，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加之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历史欠账较多，投入产出效果整体上较差。因此，国家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并没有有效遏止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基本趋势。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落实、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入世后过渡期的到来以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加迫切，任务更加繁重。本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多重差距进行了全面分析，剖析了西部大开发实践的不足之处，并对西部大开发政策体系的调整与改进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较强、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一　当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所言："成功的集团或地区，会广泛而过分地宣扬他们比本国的其他地区及其人民更为优越，归因于运气、天赋的资源、勤劳开拓开放的精神、德行不俗等，并必须按此要求去生活，继续要求其下一代这样去做。其他地区也对此承认并加以宣扬。结果，一种特别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气氛将会在某些领先的部门或区域来临，而且这使经

济决策者更加坚定其对这些地区的偏好，并使这种偏好更为合理。”[1]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有力地遏制了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有效到减弱了艾伯特·赫希曼所讲的那种“南方经常感受的沮丧与自卑感”。

但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我们需要在正视这种严峻局面的基础上，坚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追求“五个统筹”，通过积极调整与改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来有效地缩小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保证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我国西部大开发正积极有序地稳步推进，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如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在扩大，民间资本迟迟不能全面启动，工业化进程仍需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局面没有完全打开，发展环境亟待改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今后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一）有效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目标尚未实现

林凌、刘世庆（2003）分析了东西差距扩大的原因，认为东部之所以发展更快，主要是东部内在的自主增长率大幅增强，形成了强大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又面临一个新一轮国际资本和高科技产业向中国东部转移的重大机遇，外国投资者“不仅纷纷将公司的制造部门转移到中国，而且也将部分研发部门设到了中国，形成了外国企业竞相与中国结合的所谓‘中国蜜月’”。现在东部已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经济更快增长的时期，产业结构迅猛升级，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增长的附加价值高；而西部的经济增长还处在依靠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很弱，一旦国家投资减少，速度还有可能下降。缩小的方法不是抑制东部的发展，而是在保持东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快西部的发展速度。如何做到这一点，是西部大开发面临的重要抉择。

---

[1] A. O.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58.

（二）投资结构单一导致的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形成了建国以来的又一次投资高潮，推动西部进入了历史上人气最旺、发展最快、形势最好的时期。王洛林、魏后凯（2003），认为，在国家财政投资和国债资金的引导下，西部12省市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有效地拉动了西部地区需求的增长，为西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但是，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2004）认为，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入拉动，投资拉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愈益增强，但投资结构单一、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愈加突出。从投资的来源看，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财政逐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西部地区财政投资占全国比重明显提高，人均占有财政投资额迅速增加；同时，国家安排的国债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投放在西部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投资占到70%左右。与此相反，国内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积极性不高，大多仍持观望态度，并没有大规模地相应跟进，所占投资比重较低，由此出现了“政府热、民间冷”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a，2003b）认为，目前西部地区投融资机制还较为单一，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基建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来拉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领域，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来源主要是依赖政府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没有相应跟进的这种状况不仅使西部经济发展对国家投资拉动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且使这种拉动的效应也在逐步减弱。因此，理论界普遍认为，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和外资大规模投入，保持投资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作用，启动消费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从投资的作用看，王洛林、魏后凯（2003）认为，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有的跟当地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有的通过外地（主要是沿海地区）采购和承包，其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

（三）工业化过程中竞争性工业发展明显不足

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产业发展显得滞后和迟缓，工业总量规模小，发展水平低，竞争力不足，工业化进程推进缓慢。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2004）的研究发现，近几年来国家加强了对西部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建成了一批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项目，呈现出基础设施发展适度超前的局面。这种局面和产业的相对滞后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由于更新改造资金较少，原有的生产能力得不到改造和提高，甚至相对萎缩，加之产业投入不足，特别是对加工业的投入更少，新开工的项目不多，致使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西部工业化推进缓慢，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使西部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因此，在继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怎样加大产业项目建设力度，不断增强自身发展和积累的能力，也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王洛林、魏后凯（2003）对西部11省市区工业结构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①从工业增长速度看，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虽然西部工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但相比较而言，其增长速度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②由于工业增长缓慢，导致西部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说明即使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我国工业生产力仍在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在工业内部，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工业生产能力在不断向西部地区转移，而制造业则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③由于竞争力较弱，增长速度较慢，西部地区制造业在全国所占份额不断下降。这说明与1998～1999年相比，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制造业份额急剧下降的趋势已有所遏止，但并没有根本扭转。④从产业组织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小企业特别是民营小企业的快速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小企业发展严重滞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⑤从工业增长来源看，虽然东部和中西部工业增长的一半以上都来自大型企业，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贡献率要相对高一些，而小型企业的贡献率则要相对低一些。这说明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增长还主要依靠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突出，其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点恰好与沿海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进一步分析了西部地区小企业发展严重滞后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在西部一些地区，由于各类市场发育不完善，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技术、信息服务、咨询、培训等中间机构不发达，企业进入门槛较高，投资软环境较差，制约了私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二是缺乏较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小企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就必

须向“小、精、专、新”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和产业配套条件。目前，西部地区社会化服务网络不发达，产业配套条件较差，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三是政府支持服务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由于中小企业担保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发育滞后，各种中间机构发育迟缓，政府办事效率较低，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生产经营成本较高，技术信息不灵，由此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

（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王洛林、魏后凯（2003）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尽管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至今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改革开放方面，西部地区软环境建设尚存在较大差距，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商投资和出口占全国的份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外向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很小。

实施西部大开发尤其是入世以来，尽管国家投资在逐步向西部地区推进，但是，外商投资并没有相应跟进。

王洛林、魏后凯（2003）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在海外寻找一个最有利的生产区位，并把其纳入企业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中。在这种全球产业链体系中，跨国公司选择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不仅有利于加强与公司总部和海外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各种原料、设备和产品等的进出口。二是在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效率、投资软环境、商业文化氛围以及产业配套条件等方面，目前中西部地区仍与沿海地区具有很大的差距。三是外资的进入需要进行前期调查和可行性研究。目前一些外商投资还处于前期研究阶段，有的还处于观望的状态。

（五）针对西部在区域分工格局中相对不利地位的利益补偿机制发展滞后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市场化配置自然资源和经济区域分工协作的格局进一步形成，但资源保护和利益补偿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西部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特别是以煤、油、气为代表的能源类资源相当丰富。随着国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西部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经展开，我国经济区域分工协作的大格局进一步清晰，西部资源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3b)，郭小龙、周世健、詹新武（2004）和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2004）认为，由于相应的资源保护和利益补偿机制没有跟上，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存在着不少隐患和问题，主要是宝贵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资源税税额过低等导致市场准入不严，一些企业采易弃难、乱采滥挖；对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的投入不足，大规模开发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和土壤污染、植被损毁、地表塌陷以及搬迁、拆迁、复垦等，直接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资源开发地区群众生活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一些油气输出地区的老百姓却用不上气，一些资源开发地的人均收入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仅为当地中央资源开发企业职工收入的1/16，这给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增加了困难和压力。

（六）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政策环境尚未完全形成

对西部大开发政策环境的研究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代表性的观点有王洛林、魏后凯（2003）和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2004）等。他们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环境氛围正在形成，但一些配套措施尚不到位，“倾斜”效应不很明显。为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出台了有关的规划和文件，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和倾斜，但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落实起来仍有不少困难。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开发落后地区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必须更多地依靠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进一步改善政策环境，加大落实力度，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二　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任务的解读

（一）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正确处理好几对关系

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紧密围绕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大努力，确保全面完成2010年的奋斗目标。在重点任务的确定方面，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1. 经济增长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落实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 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继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争取2010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确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3. 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提升的关系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改善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硬环境。同时，运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

4.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

加大国有经济的改革力度，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要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不断提高市场化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拉动作用。

5. 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的关系

要加大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技术模仿）的力度，不断培育西部地区的内生增长能力和内源发展动力；同时要继续实施东西部对口支援，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

6.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经济发展要讲求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惟一目标。通常，效率是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的，但政府更应着眼于社会公平的达成。为此，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千方百计扩大就

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把扩大就业作为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提供新就业岗位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完善就业培训和服务体系，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

（二）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

在正确处理以上关系的基础上，今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应该是：

（1）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2）着力推进产业发展，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和内源动力。

（3）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重点地带重点开发。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广循环经济模式，确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5）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经济主体和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6）把扩大就业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不同阶层的公民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7）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稳步解决“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

（8）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区域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发展。充分利用区内、区外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重点推进区际公平，为不同区域的居民提供均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9）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事业，着力推进社会发展，全力化解社会危机。

（10）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着力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营造更加和谐的民族关系。

三　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要点建议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调整方向建议

我们认为，今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调整方向应该是以下几点。

1. 生态环境建设政策要突出长效机制的完善

西部大开发以来，生态环境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生态环境建设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就其产品性质而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具有建设投资大、生产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的特点。只有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效机制，才能保证生态环境建设在西部大开发前十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首先，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要有持续性，即要保持政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政策之间的相互衔接。其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必须以公共财政投入为先导，诱导民间资金进入，以扩大资金来源渠道。要保持生态建设资金投入的持续性。公共财政在生态建设项目投入上的稳定性是前提条件，公共财政筹集生态建设资金的完善机制是基本保证。第三，认真搞好“五个结合”。通过政策引导，优化树种、草种结构，切实解决农民增收和长远生计问题，调动退耕还林工程中农户的主动性，保证退得下、还得上、能致富、不反弹。

2. 产业扶持政策要着重于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

随着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面貌的改善，西部地区要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导向，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要通过政策创新，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国内民间资金和外商投资大规模跟进；要加强体制创新，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自主增长机制；要推进产业创新，在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提高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强化西部经济长期发展的产业支撑。

3. 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于综合效益的提高

“十五”期间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十一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应向社会发展型基础设施方面倾斜，主要投资于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科技推广等领域，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

4. 重点地带开发的政策要突出集成效应

"十一五"期间，重点地带开发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必须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国家的产业开放政策、财税改革等新政策的试点要向西部重点开发地带集中，尽快形成相互配套、结构合理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策的集成效应，以达到加快培育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目的。

（二）完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要点

我们认为，中央已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改变；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不能减弱；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能减慢。为此，需要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现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对西部大开发政策进行相应完善。具体而言，今后完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要点包括：

1. 持续、规范、量化的中央财政资金投入政策

财政资金投入是西部大开发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义务教育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领域，财政资金应该成为其投入的主渠道。财政资金的投入主要包括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与财政转移支付两部分。财政资金投入政策需要体现出持续、规范、量化的特点，建立起财政资金持续投入机制。

所谓持续，是指中央财政投入力度一般不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个较大的投入规模。所谓规范，是指要调整现行体制上约束和财政分成办法，减少税收返还，将体制补助和结算补助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系，建立以因素法为依据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考虑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的可能性；明确转移支付的目标是实现公共支出和服务水平的区域均等化，改变目前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解决地方财政运转困难的最低目的，切实履行好中央财政的公共财政职能。所谓量化，是指每年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投入西部的比例不能低于1/3，在国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时，保证1/3以上用于西部地区；在不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时，可发行西部开发专项国债，全部用于西部大开发。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部分也要制定出规模、比例的硬约束。

2. 发行地方公债

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行一定量的地方债券，以规范的债务形式取得资金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不仅有利于规范财经秩序，也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中央财政的国债负担也有望降低到适当水平。应在国债发行规模有一定限度的情况下，由中央立法，在一定时期内赋予西部省级地方政府向全国范围发行地方公债的举债权，并将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作为地方债券首选的投资方向。

3. 成立西部开发专项基金

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体，吸收多方投资，成立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开发中的特别领域。

4. 允许西部城市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彩票

重视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增长极效应，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允许西部城市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彩票，开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5. 税收优惠与税收调整政策

（1）调整中央与西部地区增值税共享比例。增值税按75:25的比例在中央与地方间划分的“一刀切”政策，致使西部地区可靠的增量财源减少。为缩小地区间差距，建议采取有差别的政策，按西部各省经济实力的不同，将地方共享比例由25%提高到30%～40%，对西部经济最弱省可以实行50%的共享比例，以提高西部落后地区自身的积累能力。

（2）完善所得税制。调整企业所得税划分办法，将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形成协调、规范和统一的所得税制，充分体现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原则。尤其对于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有的各种税收优惠，应尽可能扩大到内资企业；对西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国家鼓励的基础产业项目实行较低的差别税率；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执行期，建议将内资企业从事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产业的税收优惠执行期改为从企业获利年度起开始计算。考虑到上述基础产业的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实际，建议同时将税收优惠期适当延长为“两免五减半”。

（3）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建议中央先在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诸如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等基础性产业、高技术产业以及重复征税较严重，税收负担较重的资源型企业等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由此带来的税收减少，由中央财政承担。

适当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将征收营业税的建筑安装业和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以扩大税基并解决地区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

（4）提高资源税率。为了更好地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建议提高资源税税率，并将新增收入留给地方，用于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应合并各种对资源征收的使用费，如将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山维护费等并入资源税，并逐步把森林、草原等保护性开发的资源纳入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5）开征“协调发展税”。建议借鉴国内外经验，以东部向西部进行利益补偿为依据，开征专门用于西部开发的税种，为西部开发筹集专项资金。

（6）税率优惠。对国家鼓励投资的产业及项目，如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物制药和新型电子工业等，在税收上给予明确的支持。企业收购初级农产品及小规模纳税人矿产品的抵扣率可以由13%和6%适当予以提高，以保护西部地区资源企业的实际利益。

（7）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将已经征收的超标排污费、生态环境恢复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并扩大其征税范围，对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征收，以突出其广泛适用的特征。

（8）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针对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建议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6. 金融政策

（1）充分发挥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功能。建议改革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西部开发提供政策性融资服务，或者直接考虑设立西部开发银行。政府通过政策性融资，提高财政投资效果。通过回收投资，可以扩大政府的融资能力。在此方面应学习世界银行管理融资项目的经验和方法，建立起高效的政府投融资机制。

（2）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商业银行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必然是西部大开发中经济发展的融资主渠道之一。但商业银行首先考虑的是安全与收益，因此，应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如贷款期限创新、贷款种类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创新等。

（3）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政府财政提供担保和贴息，由建设单位发行“西部重点企业（项目）债券”。利用政府的信誉，由建设单位直接向社会发行各类建设债券，由财政担保或贴息。所筹资金用于西部能源、原材料等

大型骨干企业的发展，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通过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

7. 产业政策

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大力扶持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培育区域主导产业，壮大区域支柱产业，对区域衰退产业实行退出补贴援助政策。

成立西部产业投资基金，用于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发展。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支持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8. 教育政策

将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建立起稳定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将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由国家包起来；对于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中小学公用经费和危房改造以及新建、扩建校舍投入，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中央和西部省市各承担一定比例，中央占大头；同时制定《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法》，依法保障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持续稳定地发展。

采取灵活的学制与教学方法，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大力发展以培养实用性人才为目的的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

9. 卫生保健政策

加强西部农村卫生保健体系的建设，切实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特别是重视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卫生扶贫，彻底改变这些地区的农牧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西部地区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总体评价》，《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7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78期。

王洛林、魏后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及效果评价》，《财贸经济》2003年第10期。

林凌、刘世庆：《审视西部大开发》，《改革》2003年第4期。

郭小平：《从“路径依赖”到“后发优势”——刍议西部大开发策略》，《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3年。

杨荆楚：《西部大开发的新进展》，《满族研究》2003 年第 4 期。

胡长顺：《西部大开发：重点、进展、政策与创新》，《经济地理》2003 年第 1 期。

杜平：《西部开发的回顾与展望》，《首都经济杂志》2003 年 2 月刊。

邓浪：《西部开发的历史与现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第 8 期。

李未无、胡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研究》，《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Luolin Wang and Houkai Wei, 2004: Progress of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Drive,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China & World Economy* / 20 – 33, Vol. 12, No. 2, 2004.

陕西省发展研究中心：《重视解决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新问题》，《发展》2003 年第 3 期。

邢淑芳：《关于西部大开发问题的研究与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 年第 1 期。

郭小龙、周世健、詹新武：《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4 年第 2 期。

李凌：《西部大开发亟须解决的四大矛盾》，《思想理论双月刊》2003 年第 4 期。

全国区域经济比较

京津冀经济圈

上海与长三角

广东、珠三角与泛珠三角

其他经济圈

2004年中国主要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Blue Book

2004～2005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长江三角洲

• 2004年3月10~11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学平，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殷一璀率上海市代表团赴无锡考察文化产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国生，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陪同考察。

• 2004年3月12日开始，长三角地区所属的15个城市消费者异地消费维权将不再受地域限制。一张联通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上海、扬州、镇江、南京、常州、南通、无锡、苏州、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温州）的消费维权网络已经开通。

• 2004年4月5日，苏沪浙三方代表在杭州签署了《长三角演出经营战略合作协议书》。长三角演出市场正式联盟，从而将三地演出市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合作模式以协议的形式书面化、具体化。

• 2004年4月24日，在温州举行的“长三角地区公交行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沪苏浙三地公交将从此建立起常年的协调会制度，从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政策法规、信息平台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协作探索。

• 2004年5月15日，沪苏浙三地旅游管理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教育培训合作工作的实施意见》。三地将合作培训长三角旅游人才。

• 2004年5月9日，由江苏、浙江、上海和南京、杭州、宁波（两省四市）贸促会发起成立的长三角地区“两省四市”贸促机构联席会议（简称为“长三角贸促机构联席会议”）暨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举行。

• 2004年5月11~13日，第三届长三角都市圈省（市）际公路交通发展论坛隆重举行。“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规划方案”在本次论坛上正式亮相。

• 2004年5月17日，在浙江湖州市举行的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论坛”上，长三角16个城市的代表共同签署了《共建信用长三角宣言》，合力打造区域性信用监管平台。

• 2004年6月20日，来自上海、浙江和江苏的人事部门以及三地19个城市人事局的负责同志共80多人汇聚南京，围绕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的共同主题，召开了年度工作会议。

• 2004年6月22日，“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沪召开。

• 2004年6月25～26日，首届“长三角信息一体化高峰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该论坛是由长三角信息合作联席会议为开拓长三角信息服务领域，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而举办的活动之一。

• 2004年6月25日，上海市科委、浙江省科技厅、江苏省科技厅首次联合发布“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项目”招标公告。联合攻关项目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海洋经济，以及资源、生态、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

• 2004年7月5～6日，“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16城市共同签署《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表示将逐步取消各地旅游壁垒，建设中国首个无障碍跨省市旅游区，并面向国际市场联合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 2004年7月7日，沪苏浙三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在浙江奉化召开首届长三角地区道路运输稽查联席会议，正式确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今后，三地将逐步实现信息共享，编织起一张联动稽查的大网，使长三角范围内的违规车辆无处藏身。

• 2004年7月15日，首部由长三角16城市共同编写的《长江三角洲零售市场白皮书》开始上市发行。

• 2004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率领的南京市代表团抵沪考察访问，两地领导举行了会谈。

• 2004年8月24～25日，开展了上海著名企业浙江行活动。

• 2004年8月26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统计合作与交流网络”第一次统计局长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标志着长三角城市的统计合作与交流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 2004年8月27日，我国第一部由交通部牵头制订的区域性交通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出台，并正在报国家有关部委审批。

• 2004年9月，沪苏浙启动长三角质量月（全国第一个区域质量月）在长三角正式启动，沪苏浙联手建立质量打假“黑名单”制度。

• 2004年9月17～18日，首届长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论坛在浙江嘉兴市举行，论坛的主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探讨城乡一体化和小城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 2004年10月11日，长三角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黄山峰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此次的主题是构建“大一统”的长三角旅游经济圈。

• 2004年10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率领的杭州市考察团抵沪考察。

• 2004年10月20日，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上海市正式建立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协助认证机制，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 2004年10月25日，以“创新与合作——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长三角发展与机遇论坛”在沪举行。

• 2004年11月2日，长江三角洲地区16城市的市长齐聚上海，共同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协议》。

• 2004年11月2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时在上海举行。

• 2004年11月2日，由沪苏浙三地人事厅局联合发起的“长三角地区首届网上人才交流大会”拉开了帷幕，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 2004年11月12日，首届“长三角科技论坛”在浙江拉开帷幕。

• 2004年11月27～28日，“第四次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规划，协同并进，把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推向新阶段。

• 2004年12月1日，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并签署了《沪苏浙对外宣传工作合作协议》。

• 2004年12月4日，长三角中小企业发展与政策论坛在沪举行。来自沪苏浙的学者及企业代表近200人共聚一堂，围绕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投融资”、“现代化管理”等三方面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2004年12月7～8日，以“融合与发展，兴业与责任”为主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青年企业家浦东论坛在上海举行。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陈　维）

珠江三角洲

• 2004年2月，广东省两会召开，黄华华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明确列入新一年政府工作重点。这预示着"泛珠三角"经济区已经由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向战略决策转变。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分别于2003年6月29日、9月29日和10月17日在香港、澳门签署，并于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 2004年4月8日，"泛珠三角"内九省（区）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港澳有关负责人在广州召开会议，商定于当年7月举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届时各省（区）领导人将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文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还将加快建立领导人联席年会、工作协调委员会等机制。

• 2004年4月13~22日，张德江率广东党政代表团在广西、湖南学习考察，就加强省际交流合作、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和协调发展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广东经贸代表团与两省区签下844亿元的经贸合作项目。从4月~6月，广东经贸代表团先后到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福建、海南考察洽谈，并签下一大批经贸合作项目。

• 2004年6月1日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出席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前夕，对香港进行了首次访问

• 2004年6月1~3日，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举办了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论坛分别在香港、澳门、广州举行，以

"合作发展，共创未来"为主题，并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泛珠三角各成员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在不同体制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进入实施阶段。

• 2004年6月7~9日，在四川召开了"泛珠三角区域道路旅游运输协作会议"，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客运网络"的概念。此次会议，有包括广西在内的十省（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要领导以及各大道路旅游客运企业负责人参加，并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暨重庆市道路旅游运输一体化合作发展协议书》。

• 2004年6月下旬，在四川省人民政府驻深办事处倡议下，"9+2"驻深机构联席会在深圳成立，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9+2"驻深机构在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促进经贸合作中应有的作用。

• 2004年7月14~17日，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穗召开。洽谈会与会客商达1.5万人，签约项目达847个，签约金额2926亿元，标志着泛珠三角合作和发展进入了实质性运作阶段。

• 在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上，9个省区的劳动厅负责人签订了泛珠三角劳务合作协议，此举将打破9省区间的流动就业的壁垒。

• 在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上，铁道部、广东省政府、湖南省政府联合签订《关于加快武广客运专线湘粤段等项目建设有关问题的协议》，三方将就加快武广客运专线湘粤段、洛湛铁路通道、新广州站、广深四线项目建设等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协议商定，三方将共同做好项目设计、建设协调、征地拆迁、市政配套及交通衔接等事宜，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加快构筑泛珠三角铁路网。

• 2004年8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广州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就加强粤港合作、促进香港繁荣稳定交换了意见。

• 2004年8月4日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在广州隆重举行，这是CEPA全面实施之后，粤港两地政府召开的一次大规模、高层次的重要会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分别率领粤港代表团出席并共同主持会议。黄华华和董建华对如何进一步抢抓CEPA先机、全面加强粤港合作的有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磋商，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并确定了14个重点合作项目。

• 2004年8月11日上午，随着蛇口海关、防城海关联系配合办法的签

订，以及深圳市海格物流公司、蛇口集装箱码头公司、赤湾集装箱码头公司、防城港务集团公司公共快线合作协议的签订，防城港——蛇口/赤湾集装箱全球公共快线宣告正式开通。这是继当年7月2日开通防城港——釜山集装箱近洋干线后，防城港务集团公司开通的又一条集装箱航线。

• 2004年9月16日，来自泛珠三角九省区的省会城市市长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相聚羊城，召开首届"泛珠三角省会城市论坛"。会议主题为"如何发挥省会城市和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集聚、带动、辐射作用"。"泛珠三角九省区食品药品监管合作座谈会"同一天也在广州举行。

• 2004年10月29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省份代表在成都签署"9+2"驻深圳机构联席会备忘录，这标志着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份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11方在实现区域信息共享上达成了一致。继"首届9+2论坛"和"珠洽会"后，"泛珠三角经济圈"新信息战略的实施由此起步。

• 2004年10月31日泛珠三角电视媒体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讲话。泛珠三角9省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14家电视媒体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会后签署了《泛珠三角电视媒体合作框架协议》。

• 2004年11月14日，由广州市公安局牵头，来自广州、深圳、厦门、成都、福州、南昌、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等11个泛珠三角省会市暨副省级市的警方负责人，在广州共同签订《泛珠三角省会市暨副省级市警务协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泛珠三角跨地域警务协作开启了新的篇章。

• 2004年11月30日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珠岛宾馆会见了率团与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一行，并共同探讨了设立泛珠三角横琴经济合作区有关事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魏书华）

京津冀经济圈

• 2004年2月12日～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暨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同志，在廊坊市共同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石家庄市、衡水市、邯郸市、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经充分协商，达成10点共识（廊坊共识）。

• 2004年2月23日中国农科院（万庄）国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在廊坊市奠基。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河北省副省长龙庄伟等参加了开工典礼。中国农科院（万庄）国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位于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总规划面积2万亩，预计总投资50.8亿元，将于2007年底全部建成。

• 2004年4月京津冀三地博物馆联网发行了2004年通票，游客只需花80元钱就可在一年中以各种优惠价参观、游览三地的138家博物馆和旅游景点。

• 2003年4月，首钢200万吨钢铁生产项目正式在迁安开工，2004年7月建成投产。

• 2004年5月18日，包括京津辽在内的全国10省市的26个城市和地区的旅游界代表，在廊坊“5·18经贸洽谈会”期间举办的中国三大旅游圈合作论坛上，就促进和加强旅游区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 2004年5月21日，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环渤海七省市区领导同志参加的“环渤海经济圈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达成了三点共识：一是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二是召开五省二市副省级会议，正式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三是鉴于河北廊坊的区位优势，将合作机构的日常工作班子设在廊坊。

• 2004年6月14日，“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 2004年6月15日，北京三元集团与张家口市政府“农业经济技术全面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京举行，同时签约的还有北京三元绿荷奶牛养殖中心与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的“肉牛、饲草基地建设项目”。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河北省副省长宋恩华出席签字仪式并讲话。北京市、河北省和张家口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及三元集团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 2004年6月26日，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在廊坊召开。会议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担任主席，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在会上致欢迎词，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负责人以及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七省市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重点围绕建立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计划在2004年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磋商，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本次会议商定成立三层组织架构，负责推进合作发展。第一层架构是确立由各省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担任环渤海合作机制轮值主席，每年举行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决定区域合作重大事宜。第二、三层架构是建立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制度和部门协调制度。鉴于廊坊具有内环京津，外环渤海的优势，环渤海区域经济合作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络机构设在廊坊市。

• 2004年7月8日，由北京市长途汽车有限公司、河北张家口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保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高客长途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发起的北京长途客运法人联合体宣告成立。今后，联合体还将陆续吸收天津、山东的长途客运公司加盟。该联合体目前有14家成员，全部为道路客运二级以上资质企业。联合体现有车辆13154部，经营进出京路线400条，2003年的年客运量达到1100万人次。

• 2004年8月初，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倡议和组织下，在秦皇岛市召开了京津冀三省市信息化工作研讨会。会上来自三省市信息办的40多位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深入探讨，国务院信息办常务副主任曲维枝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 2004 年 8 月 26 日，“东北亚暨环渤海国际合作论坛”在河北廊坊市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环渤海的崛起，东北亚的机遇”，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发起，旨在进一步推动东北亚与环渤海之间的地区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中方首席代表陈锦华，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等东北亚国家驻华大使，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内蒙古、河南等环渤海八省（市、区）的政府官员，以及东北亚地区著名企业和学术界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首次进行了“高层非正式对话”，探讨建立东北亚与环渤海地区的合作机制。

• 2004 年 8 月 29 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社科联和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的“京张区域协调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中国科协副主席徐善衍、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以及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代表共 200 多人出席论坛。

• 2004 年 9 月 23 日，我国印刷机制造龙头企业北人集团公司与河北省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联手主办的三河京东印刷装订机械城开业。

• 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中国移动正式启动京津冀“跨区服务”联盟，为全球通用户在异地办理各种相关移动通信业务，异地查询、异地停机/开机、异地交费等。

• 2004 年 10 月 18 日，在第八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上，由河北省政府和经济日报社共同主办、廊坊市政府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区域经济（廊坊）高层论坛同时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京津冀经济圈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京津冀的分工、聚合和相互辐射，以及廊坊在京津冀环渤海区域合作中的功能和角色定位。

• 2004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一行到天津参观考察。刘淇在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等陪同下考察了滨海新区，听取了新区管委会的情况介绍，察看了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中新药业现代中药产业园和钢管公司。两市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分别介绍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2004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率北京

市考察团到河北省唐山市考察。刘淇在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省长季允石的陪同下，重点考察了曹妃甸港区的建设情况，并赴唐山市南部采煤沉降区考察了改造工程，前往唐山抗震纪念馆参观了唐山建设成就展。他在考察时指出，加强京冀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地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 2004年11月15日，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决定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国家发改委提出，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把区域规划的编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并决定先期启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 2004年12月3日，京津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讨论通过，由国家发改委批复下达，预计2005年上半年将开工建设。建成后，旅客乘火车来往京津间半小时即可到达。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魏书华）

山东半岛城市群

• 建立了以省长韩寓群为组长的半岛地区区域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具有综合宏观调控功能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并正在筹建八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和区域性行业自律组织。为了使《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的思想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省政府决定，要抓紧进行《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岸带发展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发展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科技发展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公路网与港口发展规划》、《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规划》等多项具体实施规划,山东半岛八市也进行相应的规划。这些规划正在抓紧进行中。

• 2004 年 5 月 15 日，由省计委负责编制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论证稿通过专家论证，经修改后将报省政府审批并颁布实施。这标志着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山东省副省长赵克志参加会议并讲话。论证会由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主持。来自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省内高校和院所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组认为，此规划总体目标清晰，各项措施政策得当。同时，大家针对规划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有益的修改建议和意见。

• 2004 年 8 月 26 ~ 27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青岛召开了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座谈会。韩寓群省长在会议上提出，全省要支持青岛成为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乃至山东省的龙头城市。青岛兴则半岛兴，半岛兴则山东兴。这标志着山东半岛城市群已由边规划、边发展阶段进入了按规划全面建设的崭新阶段。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马传栋）

武汉城市圈

• 2004年7月6~7日，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武汉召开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突出产业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四个重点，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

• 2004年7月20~21日，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全面加快湖北发展，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强调："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加快大中城市的发展。"

• 2004年10月~15日，湖北省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清泉强调，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有所作为。要注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引导推动城市圈建设。

• 2004年11月6~7日，"东湖论坛2004年年会"在武汉举行。此次年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企业联合会主办，省委宣传部联办，湖北电视台承办。年会以"中部崛起与武汉城市圈"为主题，就武汉城市圈与产业经济链、城市经济圈与房地产发展等领域设置了多个议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彭智敏　宋来胜）